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重庆市一级期刊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2025/2

统一战线学研究

二〇二五年第二册（总第五十期）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本刊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2023年10月修订）反映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敬请作者在投稿前仔细阅读、对照处理，以使稿件经制度化流程得到更高效率的办理。

一、常设专题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

二、选稿标准

秉持“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办刊理念，提倡宽视角、学理化、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研究统一战线。倾向选用从宏观和中观层次研究统一战线的稿件，坚持“以题审文、按质取文”。

三、具体要求

（一）导向。稿件须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用学术讲政治。注意防范具体表述、引用注释或参考文献、图表中的话语歧义与隐形意识形态风险。我刊在审编校全程中对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稿件实行“一票否决”。

（二）选题。立足宽广时空视野，及时回应党和国家战略关注，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角度新颖、力求前沿，坚持大统战视角，立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统一战线议题作出使读者有较大启发的研究，避免“就统战谈统战”。

（三）立论。立论基础坚实，问题提出部分应包含研究背景陈述、文献述评、创新点阐述等内容。要有精到的文献综述，开门见山地指出所研究问题、理论价值和政策依据、现实意义。重视援引前沿成果（含正文论述），且实际引用了大量的期刊前沿文献。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30条，其中引用近3年期刊论文不少于10条，同时注意回溯三年以上的代表性论文。

（四）论证。论证中注意材料支撑，使用丰富、可信、有说服力的论据，避免泛泛而谈。题目、摘要、关键词、图表应做到规范、简洁、清晰。

（五）文字。提倡简洁、清晰、准确、顺畅、朴素的文风。表述符合语法规则，主谓宾结构清晰，无病句，无文字差错，无逻辑错误。请逐一仔细核对原文，如发现问题较多、学术态度不端正的，特别是如在编校中发现文字硬伤、低级文字错漏情形，即使已经审理录用的稿件也将作退稿处理。

（六）注释与参考文献。注释使用尾注体例。引用各类文献时务必核实原文，确保准确性。参考文献体例详见《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https://mp.weixin.qq.com/s/kv8cyCnRcp7QbkyXlJeX0g>。

（七）篇幅。不少于12 000字，论述深入的优秀论文篇幅可达1 5000~20 000字左右。

（八）学术诚信。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文字重合率一般不高于15%。作者在投稿前应明确作者顺序（依据作者的实际贡献），投稿后不接受对作者署名及顺序、基金项目等基础信息的更改。

（九）审稿周期。审稿周期为一个月。来稿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本刊返修意见或有关回复的，作者可自行撤稿。审稿流程：一审→二审（含专家外审）→三审。

（十）其他约定。对契合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的稿件，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

（十一）投稿方式。采取邮箱投稿，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

（十二）联系方式。电话：（023）62874725；微信公众号：[tyzxxj](https://mp.weixin.qq.com/s/RXpUuqE7ivLXv5qv54MYEQ)；开放获取：<https://cqsy.net.cn/?Tongyi/Zhanxian/>。

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详版请见本刊微信公众号相关推送：<https://mp.weixin.qq.com/s/RXpUuqE7ivLXv5qv54MYEQ>。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5 年第 2 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

编 委：王 浩 王英津 王浩宇 田飞龙
吕 鹏 刘福军 齐鹏飞 李 俊
李 捷 杨 恕 肖存良 汪仕凯
汪曙申 宋 俭 张 建 张献生
陈 纪 陈 兵 陈奕平 陈家刚
相德宝 袁 征 钱再见 徐理响
郭永虎 黄天柱 蒋 锐
韩云波 薛庆超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 长：夏晓华

主 编：王 鸿

执行主编：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5年第2期（总第50期）
双月刊 2017年创刊 第9卷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专题

“两个结合”视角下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

- 01 边疆治理的根本在中华文化认知认同 / 牛汝极 丁邦文
- 1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基于“两个结合”视角 / 林华山 王京菁
- 25 大团结与真团结的共融共进：统一战线的显著政治优势 / 王艺腾
- 36 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生成基础与学理阐释 / 樊士博 张雨婷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 48 破解“内卷式”竞争视角下新质生产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依据与战略构想 / 徐政 郑霖豪
- 59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依据、进展与路径 / 陈晓仪 徐梦瑶
- 71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逻辑、历史与经验 / 潘智璇

- ◎ CSSCI (2023—2024) 扩展版来源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专题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统战工作研究

- 82 数字文明新范式：DeepSeek开源创新的生态建构 / 许丹荔 王炳涵
- 94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DeepSeek的核心特征、价值超越及未来路向
/ 王闻萱 王丹
- 108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理与启示
——基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论析 / 李培鑫
- 122 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机制创新与实践理路
——基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案例分析 / 刘衍峰
- 135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的话语建构与策略转向
/ 林功成 谷端为 李莹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全球超级选举年选后效应与大变局下世界政党政治走向研究

- 147 算法时代的政党政治：重要影响、现实后果与应对逻辑 / 曹克亮
- 159 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探析：政党政治视角 / 王贯之
- 封二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 封三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5 No.2(Sum No.50) Vol.9

- 01 The Foundation of Frontier Governance Lies in the Cognitive and Identity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Niu Ruji&Ding Bangwen
- 13 The Original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Thought on Advancing the United Front Wor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A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Two Integration"
Lin Huashan&Wang Jingjing
- 25 The Integration and Co-advancement of Great Unity and Genuine Unity: The Distinctive Political Advantage of the United Front
Wang Yiteng
- 36 The Foundation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Elucidation of the Political Advantag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Fan Shibo&Zhang Yuting
- 48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Sector Economy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Strategic Framework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Deconstructing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Xu Zheng&Zheng Linhao
- 59 The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for the Private Sector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urther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s: Basis, Progress and Pathways
Chen Xiaoyi&Xu Mengyao
- 71 The Logic, History and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Leadership in the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for the Private Sector Economy
Pan Zhixuan
- 82 A New Paradigm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Open-Source Innovation in DeepSeek
Xu Danli&Wang Binghan
- 94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Value Transcend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China'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epSeek
Wang Wenxuan&Wang Dan
- 108 Mechanisms and Implications of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the Symbol Syste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Ne Zha: The Demon Child's Uprising
Li Peixin
- 122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in the Subjective Narrative Mechanism of Chinese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Ne Zha: The Demon Child's Uprising
Liu Yanfeng
- 135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and Strategic Shifts in Western Media's Hong Kong-Related Coverag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Lin Gongcheng&Gu Duanwei&Li Ying
- 147 The Party Politics in the Algorithmic Era: Significant Impacts, Practical Consequences and Governance Logic
Cao Keliang
- 159 The Analysis of the Trajectory of U.S. Policy Toward China During the Trump 2.0 Era: A Party Politics Perspective
Wang Guanzhi



边疆治理的根本在中华文化认知认同

牛汝极 丁邦文

(喀什大学 国家民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新疆 喀什 844000)

摘要: 边疆治理的根本在中华文化认知认同。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 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关乎全局。中华文化认同将边疆地区的各族人民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华文化认同的强化能够有效铲除民族分裂主义思想的滋生土壤, 促使边疆地区民众形成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为边疆地区经济合作提供文化基础。但边疆治理也面临文化认同构建仍需加强、文化多元协调难度高、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关系须正确看待等挑战。未来我们要以中华文化认知认同为导向探寻破局之策: 构建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教育体系, 挖掘中华文化在边疆的经济社会价值, 搭建中华文化传播平台, 培育中华文化认知共情。

关键词: 边疆治理; 文化认同; 文化安全; 中华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2-0001-12

在当前全球局势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 边疆治理已然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边疆治理发表重要讲话, 为我国边疆治理工作指明了清晰的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2013年3月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 提出“治国必治边”的重大战略思想^[1], 开启了党中央治边稳藏富民的新实践, 彰显了边疆治理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地位。此后, 在边疆治理的探索与实践中, 相关理念不断深化与拓展。2014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之纲, 也为边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2.001

作者简介: 牛汝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喀什大学国家民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教授; 丁邦文, 喀什大学党委书记。

引用格式: 牛汝极, 丁邦文. 边疆治理的根本在中华文化认知认同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1-12.

疆治理提供了关键的思想指引^[2]。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3]。2023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汇报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性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边疆治理的关键^[5]。

学术界对于边疆治理的研究由来已久，众多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为边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了丰富的研究成果^[6]。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边疆的历史沿革、地理特征以及民族关系等基础层面，为深入了解边疆地区的基本情况奠定了坚实基础^[7]。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研究视角逐渐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维度^[8]。在政治方面，学者们探讨了边疆地区的治理体制、政策执行以及政权建设等问题，力求完善边疆地区的政治治理体系^[9]。在经济领域，学者们围绕边疆地区的资源开发、产业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等内容展开研究，旨在推动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繁荣^[10]。在文化层面，学者们关注边疆地区的文化遗产、文化交流以及文化认同等议题^[11]，强调文化在边疆治理中的重要作用^[12]。既有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构建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边疆治理体系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对于如何通过强化中华文化认知认同，切实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推进边疆地区的发展，学术界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2024 年 12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深入做好边疆治理各项工作，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指出，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边疆治理各方面全过程，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主线，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引导边疆地区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推进边疆治理需要强化理论支撑，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深化边疆治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推出更多具有影响力、说服力的研究成果^[1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边疆治理的关键。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可以看到，边疆治理的关键在于围绕中华文化建构，引导各族群众达成“五个认同”目标，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守住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底线。边疆治理的根本正是在中华文化传承、传播过程中铸牢中国心中华魂，让边疆每个个体都能对中华文化有高度的认知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边疆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鲜明展现出两个紧密交织的基本向度。向内看，它体现为国家的治理效能与凝聚力量、提升国民向心力，使民众对当下社会制度架构、政治秩序产生深度认同感，而这往往借助文化与意识形态有机交融得以达成。文化将国民紧密团结于国家发展的共同愿景之下。向外望，其彰显为国家的防御屏障与国际感召力，意味着一国文化须具备独特魅力与外向延展力，以文化软实力为依托，吸引他国国民目光，融入世界文化交流浪潮，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在全球文化版图中站稳脚跟，为国家发展营造有利外部文化生态。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我们认识到，边疆治理关键要围绕中华文化认知认同建构，以此引导各族群众不断达成“五个认同”目标，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守

住边疆治理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底线。推进边疆治理必须强化理论支撑,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深化边疆治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要求, 本文围绕边疆治理的根本在中华文化认知认同展开论述。

一、文化引领：边疆治理的密码

边疆作为国家领土的重要边缘区域, 其治理成效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发展与统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边疆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统一多民族国家构成和丰富的文化生态成为中华大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中华文化,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犹如一条坚韧的纽带, 贯穿于边疆治理的始终, 将边疆与内地紧密相连。

中华文化绝不仅仅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实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根基, 承载着先辈的智慧、信仰与价值追求, 为后世子孙标定精神坐标、指引发展方向。边疆地区作为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的前沿阵地。边疆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繁荣与国际形象。长期以来, 我国在边疆治理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民生改善, 从军事防卫到经济扶持, 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 在诸多努力背后, 边疆地区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隐患, 如民族分裂思想暗流涌动、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社会凝聚力有待提升等。中华文化是边疆治理底层逻辑中的“密码”, 它渗透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之中, 从根本上影响着边疆地区的发展走向。只有解开这个“密码”, 抓住共建中华文化并实现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知认同这一根本, 才能真正实现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

从陆疆来看, 我国与 14 个国家接壤, 陆地边境线长约 2.2 万千米, 这些边境线穿越高山、荒漠、草原等复杂地形, 既是连接国内外的通道, 也是抵御外部势力渗透的前沿防线^[14]。以新疆为例, 它位于中国西北边陲, 是连接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重要陆路通道, 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就途经此地, 如今更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关键节点。新疆的稳定与发展, 直接关系到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以及地缘政治格局。在西南边疆, 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相邻, 边境线上民族跨境而居、文化相互交融, 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为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提供了诸多便利, 同时面临着边境管理、跨国犯罪防控等诸多挑战。海洋边疆同样不容忽视。我国拥有广阔海域, 海岸线绵延 1.8 万多千米, 海洋资源丰富, 海洋权益维护至关重要。沿海的边疆地区, 如广西、海南等, 不仅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 承担着渔业、航运、海洋能源开发等重任, 也是捍卫我国海洋主权、应对海上争端的桥头堡。近年来, 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推进, 这些地区在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海上执法力量强化等方面不断发力, 确保我国海洋边疆的安全与发展。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 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关乎全局。一方面, 边疆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地, 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否直接影响社会稳定。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 有 30 余个与境外同一民族跨国界线相邻而居,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边疆治理的核心任务。另一方面, 边疆地区的基层政权建设至关重要, 它是国家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只有强化基层组织力量, 提高治理能力, 才能确保边疆地区政令畅通, 社会秩序井然。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 边疆地区面临着经济发展、人民团结、国家

安全等诸多方面的风险。与内地比较，边疆地区的中华文化符号元素存量相对匮乏^[15]。一些边疆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与内地差距逐渐拉大；部分跨境民族受境外势力影响，文化认同出现波动；境外反华势力妄图通过文化渗透、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等手段，扰乱边疆秩序。这些问题不仅威胁着边疆的稳定，也对国家整体发展构成挑战。在此背景下，聚焦中华文化认知认同和传承传播，挖掘其在边疆治理中的核心价值，探寻有效路径，成为破局之关键。这不仅有助于增强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促进民族和谐共处，推动边疆经济社会发展，更是维护国家主权、确保边疆长治久安的固本之举。

二、中华文化：边疆治理的核心纽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合一共命、一统多彩的显著特性^[16]。它是中华各民族在漫长历史岁月中共同创造、传承与发展的精神结晶，既包含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精髓，又涵盖了各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风貌。这种“多彩”使得中华文化犹如一座绚丽多彩的文化宝库，各民族文化在其中交相辉映。“一统”则凸显了中华文化的内在统一性与强大凝聚力。尽管各民族文化各具千秋，但都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共享着诸如对家国情怀的崇尚、对祖先的敬仰、对团圆和睦的期盼等核心价值观念。汉字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贯穿于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之中，哪怕方音不通，凭借汉字书写，各民族也能心意相通，传承共同的历史记忆。从《诗经》的悠悠吟唱到唐诗宋词的璀璨华章，从万里长城的巍峨雄伟到故宫博物院的金碧辉煌，这些中华文化符号跨越时空，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标识，将边疆与内地紧密相连，让边疆人民深知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员。

在民族团结方面，中华文化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黏合剂作用。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中相互欣赏、彼此学习，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格局。传统节日便是绝佳例证，春节时，边疆各族同胞与内地人民一同贴春联、吃年夜饭，欢庆新春；端午节，少数民族同胞也会举办包粽子、赛龙舟活动，感受屈原的爱国情怀；中秋节，各族人民共赏明月、品尝月饼，寄托团圆相思之情。这些节日习俗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共同基因，拉近了民族间的距离，消弭了隔阂。

在增强国家认同层面，中华文化是筑牢根基的关键力量。边疆地区学校广泛开展国学经典诵读、中华历史文化普及等教育活动，使边疆青少年深入了解中华民族从古老华夏文明一路走来，历经无数沧桑却坚韧不拔、蓬勃发展的辉煌历程，知晓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历史大势所趋。像新疆地区持续推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工程，让各族孩子从小浸润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中，产生对国家的深厚热爱与强烈归属感。

于经济发展而言，中华文化蕴含着蓬勃动力。边疆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风情吸引着大量游客，带动了文化旅游产业蓬勃兴起。云南丽江、大理等地，凭借纳西族、白族等民族的特色建筑、民俗文化，打造出一批热门旅游景点，促进了当地就业与经济增长。内蒙古的草原文化节、那达慕大会，将蒙古族文化与现代旅游、体育产业相结合，为区域经济注入新活力。同时，传统手工艺如藏族唐卡、苗族银饰、新疆艾德莱斯绸制作等，依托文化传承走向市场，创造出可观经济效益，成为边疆

人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从维护国家安全视角看, 中华文化是坚固的精神防线。面对境外势力妄图通过文化渗透、传播宗教极端思想扰乱边疆的行径, 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给予边疆人民强大的辨别力与抵抗力。扎根边疆的传统文化习俗、世代相传的民间信仰以及深入人心的爱国故事, 让边疆群众自觉抵制不良思想侵蚀, 守护边疆的和谐稳定。

文化认同, 本质上是人们基于共同历史记忆、相仿文化习俗等诸多要素的共享, 萌生出对特定共同体的深度归属感。它将个体与所属群体紧密相连, 使得人们在传承先辈记忆、遵循固有习俗的过程中, 真切感知到自身作为共同体一员的独特身份。文化认同是边疆治理中最为核心的要素之一, 它是凝聚边疆各族人民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石。

中华文化认同将边疆地区的各族人民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华文化认同的强化能够有效铲除民族分裂主义思想的滋生土壤。分裂势力往往会通过歪曲民族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关系来蛊惑人心, 而广泛的中华文化认同能够使边疆各族人民清晰地辨认这些错误观念^[15]⁷。在边疆地区, 多种民族文化相互交织。中华文化认同能够提供一个共同的文化框架和价值标准, 帮助不同民族文化在交流融合过程中减少误解和冲突。例如, 儒家文化倡导的“和而不同”理念, 被边疆各族人民广泛认同, 有效引导各民族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和谐共处^[17]。在云南、广西等边疆地区, 各民族在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 相互欣赏文化特色, 如壮族的歌圩文化与汉族的诗词文化相互交流, 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中华文化认同能够促使边疆地区民众形成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当人们认同中华文化中的仁爱、诚信等价值观时, 会在社会交往中更加注重相互信任和互助。在边疆的社区建设中, 文化认同使各族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 如共同举办文化活动、维护社区治安等, 为社会稳定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

中华文化认同为边疆地区经济合作提供了文化基础。边疆地区举办的各类文化交流活动, 如文化节、民俗展览等, 可以吸引内地投资和游客, 促进边疆地区旅游业、文化产业等发展。例如, 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 在弘扬蒙古族文化的同时, 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 带动了当地经济繁荣。这种文化认同驱动的经济合作, 有利于边疆地区融入国家的整体经济布局。边疆地区和内地基于中华文化认同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联系, 能够打破因地域差异产生的经济壁垒。边疆地区还可凭借自身资源优势, 与内地开展广泛的贸易往来。在文化认同的促进下, 内地的技术、资金和人才更容易向边疆地区流动,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边疆地区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传播区域, 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能够确保中华文化精髓在当地得到传承。无论是传统的文学经典、书法绘画, 还是民间技艺等, 都可以在边疆地区找到传承者。例如, 在边疆的一些学校开设国学课程后, 学生们对古诗词、传统戏曲等中华文化瑰宝产生浓厚兴趣, 这些文化遗产在边疆地区得以传承和延续。文化认同能够激发边疆各族人民的文化创新活力。在认同中华文化的基础上, 结合边疆地区的民族文化特色和地域特点, 可以创造出独具魅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形式。比如, 在西藏地区, 将藏族传统的唐卡艺术与中华文化中的佛教文化相结合, 创造出了具有现代审美和文化内涵的新型唐卡, 既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又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历史镜鉴：中华文化治边的往昔华章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历代中央政权对边疆的治理中贯穿始终。从古代到近代，不同时期的智慧与策略共同书写了一部边疆治理史，彰显着文化的强大力量与深厚底蕴。

（一）古代：文教先行，融合共生

秦汉时期作为大一统王朝的开端，为边疆治理奠定了基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蒙恬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设郡县管理，又征发民众戍边，充实边疆人口。同时，统一文字、度量衡，为文化传播打通壁垒，汉字的推广让边疆与内地在文化交流上有了共同的工具，儒家经典如《诗经》《尚书》等也逐渐在边疆文人中流传，开启了文化融合的序章。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府，派遣官员、驻军，保障丝绸之路畅通，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输出，西域的葡萄、苜蓿、胡桃等物种传入，经济交流频繁。文化上，太学兴盛，吸引边疆子弟到内地求学，同时在边疆地区设立学校，教授儒家经典，以“仁”“礼”为核心的道德观念深入人心，促进了民族融合。例如，楼兰古城遗址出土的汉简上就有汉字书写的儒家经典语句，足见汉代文化传播之广。

唐宋时期，边疆治理政策多元且成熟。唐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民族政策开放包容。在北方，唐朝对突厥采取分化瓦解与怀柔安置并重策略，安置突厥降众，任用突厥贵族为官，使其融入大唐。文化上，科举制度向边疆民族开放，吸引各族英才，如高昌、吐蕃等地纷纷派遣学子入长安求学，学习儒家经典、诗词歌赋与典章制度。“华夷一家”的观念广为流传。文学领域，唐诗的繁荣成为文化向心力，边疆诗人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等诗句描绘西域风光，融入大唐文化圈。艺术方面，西域乐舞传入中原，与本土乐舞融合，艺术形式不断丰富。《霓裳羽衣曲》就有胡乐元素，深受宫廷与民间喜爱。宋朝虽军事相对较弱，但在文化治理边疆方面独具特色。对辽、西夏等政权，一方面通过岁币维持和平，减少战争损耗；另一方面，在边境设立榷场，贸易往来不断，瓷器、丝绸、茶叶等大量交易，文化交流借此升温，汉字书法、绘画作品备受青睐。程朱理学兴起后，其强调的道德伦理观念在南方边疆地区传播，书院教育兴盛。比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培养的学子将中原文化理念带到边疆。

高昌回鹘的文化内核可以说是儒释道传统。从公元 10 世纪开始，回鹘人深受吐鲁番本土汉人儒释道文化的影响，积极研习中华语言和文化。吐鲁番发现了回鹘文《开蒙要训》《千字文》等多种童蒙读物译本以及回鹘文《春秋》《论语》《舜子变》等译本。回鹘佛教受汉地佛教影响最大，几乎把《大藏经》的主要经典都翻译为回鹘文。回鹘人有对佛教圣地朝圣的习惯，佛教洞窟中 310 多条回鹘文朝圣者题记是对圣地朝圣的记录。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献还有道家讲八字命运的内容：“金命的人白而富，木命的人青而富，水命的人黑而富。”回鹘文《易经》译本至少有两个版本，回鹘文《玉匣记》《管子》译自汉文道家文献，胜金口石窟发现有回鹘文二十八宿的写本和壁画。中华文化结构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回鹘文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和属性^[18]。

元明清时期，边疆治理体系日臻完善。元朝疆域空前广阔，统治者实行行省制度，在边疆如云南、岭北、辽阳等地设行省，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尊重各民族文化习俗，主张“因俗而治”。喇嘛教在青藏高原广泛传播，得到元朝统治者扶持，成为凝聚藏族等民族向心力的宗教纽带；蒙古族

传统的那达慕大会受官方认可, 促进民族文化遗产。元朝大力推广驿站制度, 从大都通往边疆各地的驿站星罗棋布, 不仅保障政令畅通, 更促进人员往来、文化交流。马可·波罗便是沿着驿站路线来华, 见证了元朝多元文化交融盛景。明朝建立后, 在边疆设置卫所, 加强军事防御, 如在东北设奴儿干都司, 管理黑龙江流域等地区。文化上, 朱元璋重视教育, 在边疆地区广设学校, 教授儒家经典, 培养忠君爱国思想; 明成祖时编纂的《永乐大典》集古今图书大成, 抄本流传至边疆, 成为文化遗产的宝库, 边疆文人墨客从中汲取知识, 提升文化素养。清朝前期国力强盛,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致力于边疆统一, 平定准噶尔部、收复台湾、安定西藏, 巩固多民族国家版图。在治理上, “修其教不易其俗, 齐其政不易其宜”, 清朝尊重民族宗教信仰, 册封达赖、班禅, 维护西藏稳定; 在新疆设伊犁将军, 屯垦戍边, 中原农耕技术、文化习俗扎根边疆。例如, 锡伯族西迁伊犁后, 既保留自身语言文化特色, 又吸收汉文化精华, 促进当地发展。满族文化与汉文化深度融合, 旗袍等满族服饰元素融入中原服饰体系, 满汉全席成为饮食文化融合典范, 展现出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与整合力。

（二）近代：文化凝聚，共御外敌

近代以来, 中国边疆面临列强蚕食鲸吞的严峻危机。中华文化凝聚起的民族力量成为抵御外侮的坚固长城。在东北, 沙俄妄图侵占我国领土, 当地各族人民以渔猎、农耕文化中练就的坚韧与智慧奋起反抗。鄂伦春族猎手们穿梭山林, 为抗沙俄队伍传递情报、袭扰沙俄军队补给线; 赫哲族渔民利用熟悉的江河水道, 协助清军布雷设障, 抵御沙俄军舰进犯。在文化层面, 抗俄故事融入东北民间流传的评书、二人转等艺术形式。

西北边疆, 如新疆地区遭受阿古柏侵略与英俄势力渗透。左宗棠携棺出征, 彰显捍卫国土决心, 新疆各族人民踊跃支援, 维吾尔族同胞送粮送水、照料伤员, 哈萨克族骑手侦察敌情、传递消息。军民团结抗敌故事融入新疆传统音乐, 奏响新乐章, 在营地乡镇传唱, 鼓舞士气, 凝聚人心, 守护祖国西北门户。

西南边疆, 如西藏面临英国觊觎, 云南遭受法英侵略。西藏僧俗民众严守国土, 喇嘛们诵经祈福, 民众手持传统武器、配合清军构筑防线, 藏传佛教的爱国教义与中华文化的家国情怀相融, 筑起精神防线。云南各族人民在刘永福黑旗军等带领下, 抗击法英侵略, 彝族、白族战士冲锋陷阵, 傣族、哈尼族民众提供后勤保障; 抗敌故事融入滇剧、花灯戏等本土艺术, 如《滇海重关》展现军民同仇敌忾守护家国的故事, 掀起当地人民爱国热潮。

四、困境与挑战：边疆治理难题分析

在边疆治理的宏大议题中, 我们不能忽视当前存在的诸多挑战。文化认同的构建、文化多元的协调以及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的认知等方面, 都面临着现实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关乎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更深刻影响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团结统一。

（一）文化认同构建仍需加强

首先, 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融入中华文化并非易事^[19]。边疆大地之上, 众多少数民族聚居繁衍, 各民族文化恰似繁星璀璨, 独具风姿、熠熠生辉, 无疑是中华文化浩瀚星空中耀眼的明珠集群。然

而，部分少数民族同胞对本民族文化怀有的炽热归属感，与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认知之间，仿若存在一股无形张力。一方面，他们世代沿袭本民族的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等文化基因，对这些民族文化符号倾注了深沉眷恋；另一方面，面对中华文化核心要义，以及汉字、传统佳节等极具广泛代表性的文化标识，其理解深度与接纳程度参差不齐。因远离政治、文化与相关社会秩序核心，边疆人群有可能摆脱各种核心典范的约束，或在两个或多个政治文化体之典范间作抉择。从一个政治文化体的核心观点来看，边疆社会较容易失序和混杂^[20]。譬如在某些偏远闭塞的边疆村落，年轻一代对本民族的古老传说、精湛技艺如数家珍，可谈及春节、中秋等中华传统节日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蕴时，却一脸茫然，难以将民族文化瑰宝与中华文化巍峨大厦完美榫接，这无疑悄然侵蚀着从文化维度凝聚国家向心力的坚实根基。

其次，地域文化差异导致认同分散。边疆地区疆域广袤无垠，自然环境、经济发展节奏以及历史演进轨迹各异，孕育出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强烈的地域归属感，却也可能在国家文化认同的宏伟构建进程中，悄然化作一道无形“藩篱”。以新疆为例，南疆仿若一片绿洲织就的绮丽画卷，绿洲农业文化蓬勃生长；北疆则似骏马奔腾的草原诗篇，草原游牧文化独领风骚，二者承载的生活模式与价值理念均有差异。当地民众于日常往来、经济协作之际，更多地以地域文化为情感纽带相互联结，却使得基于国家层面的共同文化认同相对淡薄。如此一来，当关乎国家整体利益的政策落地、资源统筹调配时，局部与全局利益的认知冲突便极易滋生，这可能对边疆地区协调发展之路形成阻碍。

（二）文化多元协调难度高

一是价值观念多元。边疆地区孕育出不同价值取向，这些取向于诸多生活场景偶有“碰撞”。在教育理念方面，部分少数民族同胞对国民教育重视不足，错误认为孩子只需熟稔本民族传统生存要诀即可，这与国家全力倡导的全民素质教育、创新人才培育宏伟蓝图不相统一。在经济活动方面，一些民族秉持平均分配、集体决策等传统模式，与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有所区别，既阻滞当地经济向市场化转型，又容易引发不同群体间的矛盾。

二是宗教信仰多元。宗教信仰于边疆地区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占据关键“生态位”^[21]，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诸多宗教在边疆各地皆有虔诚信众^[22-23]，各宗教的教义阐释、仪式流程、宗教场所精细化管理规范各具千秋。在一些宗教信仰多元交织的城镇，倘若宗教建筑的空间布局、宗教活动的时间编排缺乏科学统筹、合理协调，信众间的误解、不满情绪便易滋生。更有甚者，宗教极端思想这颗“毒瘤”不时冒头，打着宗教神圣旗号进行破坏社会安定、煽动民族分裂的罪恶之事，给边疆地区和平稳定局面带来严重威胁^[24-25]。

（三）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关系须正确看待

在一些族际文化活动中，部分人可能因为民族身份而对参与其他民族文化活动或推广中华文化活动热情不高^[26]。例如，在举办中华文化主题活动时，如国学讲座、中国传统手工艺展示等，有些群众可能会觉得这与自己的民族文化活动相比不重要，缺乏作为中国公民积极参与中华文化和交流的主动性。在部分边疆地区，存在过度强调民族文化边界，弱化公民文化共性的现象。在一些边疆地区的基层选举中，部分选民可能更倾向于从民族角度考虑代表人选，而不是从公民的整体利益和候选人的综合能力角度出发^[27]。面对国家或地方政策时，部分群众可能会以民族身份来衡量政

策是否对自己有利, 而不是从公民的普遍权益视角去理解和支持政策^[28]。

在法律纠纷处理中, 存在部分人更多强调民族身份而忽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26]150-152}。例如, 在民事纠纷或轻微刑事案件中, 有人可能会以民族习惯法为由, 抵制国家通用法律的适用。他们认为本民族的传统处理方式应该优先, 而没有充分认识到作为公民都应遵守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系。部分群众在看待司法判决时, 若涉及不同民族当事人, 可能会质疑司法公正是否基于民族因素而产生偏差。

在社会福利分配如扶贫物资发放、教育资源分配等过程中, 有些群体可能会以民族身份为依据, 要求特殊对待。例如, 在分配贫困生助学金时, 有人会认为本民族的学生应该得到更多的份额, 而不是从贫困程度、学业成绩等所有公民通用的衡量标准来公平分配。对于公共资源如就业岗位、公共住房等竞争, 部分人可能会强调民族身份的特殊性, 而不是基于公民平等竞争的原则^[29]。例如, 在一些边疆地区的企业招聘中, 可能会出现部分求职者认为企业应该按照民族比例招聘员工, 而忽略了招聘应基于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等因素。

五、破局之策：以中华文化认知认同为导向的边疆治理路径

对文化认同、文化多元协调等挑战, 我们要以中华文化认知认同为导向探寻破局之策。这不仅关乎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 更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

（一）教育引领：构建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教育体系

一是课程设置改革。在边疆地区的学校教育中, 应提高中华文化相关课程的比重。除了常规的语文、历史课程外, 要专门开设如“中华文化经典研读”“中华传统技艺”等课程, 同时融入地方文化元素, 使中华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有机结合。比如, 在介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时, 可以对比当地民族建筑风格, 阐述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二是师资队伍建设。定期组织教师参加中华文化知识讲座、学术研讨会等, 提高教师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传授能力。例如, 举办“中华诗词教学方法培训”, 让教师掌握如何生动地向学生讲解诗词的意境、格律等知识。鼓励内地优秀教师到边疆地区支教, 同时推动边疆地区的教师到内地交流学习。

三是教育资源均衡分配。加大对边疆地区教育资源的投入, 包括建设现代化的图书馆、文化活动室等设施。这些设施应配备丰富的中华文化相关书籍、影像资料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开展远程教学。通过网络直播、在线课程平台等方式, 让边疆地区的学生能够同步学习内地优质的中华文化课程。

（二）文化产业驱动：挖掘中华文化在边疆的经济社会价值

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具有日益强大的驱动力量, 而挖掘中华文化在边疆地区所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 更是具有多重深远意义。

其一, 聚焦文化旅游开发。精心打造以中华文化为鲜明主题的旅游线路是开启边疆经济新篇的关键一步。边疆地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得天独厚, 既拥有鬼斧神工的自然风光, 又承载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此时巧妙融入中华文化元素, 便能碰撞出全新的火花。边疆地区可围绕美食、体育、

民俗、自然等不同主题开发旅游线路。开发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同样重要，诸如设计精美、带有中国传统图案的旅游纪念品。龙凤纹所承载的祥瑞之意、如意纹蕴含的美好祝愿，瞬间便能勾起国内外游客对中华文化的深深向往。

其二，着重文化创意产业培育。鼓励文创从业者以中华文化为灵感源泉进行创作创新，开发更多文创“爆品”。如在内蒙古，当地企业可将草原文化与中华文化深度融合，开发动漫作品。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举措。园区是文化创意的摇篮，为文化创意企业遮风挡雨，提供茁壮成长的优良环境。园区内设立中华文化创意工作室，可以汇聚设计师、艺术家在这里挥洒创意，将中华文化的精髓融入各类作品之中。园区定期举办文化创意产品展销会等活动，为企业与消费者搭建桥梁。

（三）文化交流融合：搭建中华文化传播平台

搭建多元文化交流平台，是推动文化交流融合的关键举措。

其一，开展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定期组织边疆地区与内地城市之间精彩纷呈的文化交流活动，力求全方位、深层次地促进双方的文化互通。例如“边疆—内地文化艺术巡回展”能让内地民众近距离领略到边疆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能把内地文化精品引入边疆。在边疆地区和内地广泛选拔“文化使者”，开启意义非凡的双向交流访问之旅，在社区、学校、企业等地讲述文化故事，能够促进文化的广泛传播与深度交流。

其二，完善族际文化交流机制。在广袤的边疆地区，建立凝聚着民族融合力量的族际文化交流中心，为各民族之间常态化的文化交流提供固定场所。为了确保文化交流的顺畅无阻，应着重加强中华文化交流的引导工作。在当地有影响力的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上开设“中华文化交流”专栏，消除文化交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解与偏见。

其三，展示中华民俗文化。在边疆地区精心打造中华民俗文化博物馆或展示中心，展示中华民俗文化的源远流长。以巧夺天工的实物、栩栩如生的模型以及逼真还原的场景，全方位展示传统民俗文化。例如通过场景还原，完整呈现古代结婚“六礼”，让边疆群众直观感受中华民俗文化。

（四）文化参与体验：培育中华文化认知共情

其一，开展节庆活动。在边疆地区大力开展庆祝中国传统节日的活动。以春节为例，组织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写春联、贴春联、挂灯笼等活动，让边疆各族人民了解春节民俗所蕴含对新年的美好祝愿。在中秋节时，举办赏月、猜灯谜、制作月饼等活动，讲解中秋节背后团圆的文化寓意以及与嫦娥奔月等神话传说相关的中华文化故事。同时，邀请民间艺人到边疆地区展示传统节日相关的技艺，使边疆各族人民在学习传统技艺的过程中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知。

其二，开展文化艺术表演。定期组织中华传统艺术表演活动，如京剧、昆曲、杂技等走进边疆。演出前后，专业人员介绍京剧的行当（生、旦、净、丑）、脸谱的含义、昆曲的唱腔特点等知识，鼓励边疆地区群众参与中华传统艺术表演。举办中华诗词大会或朗诵活动，吸引边疆地区青少年积极参与。

其三，组织文化典籍诵读。在边疆地区的图书馆、社区阅读室等场所，配备丰富的中华文化典籍，包括经典文学作品（如《诗经》《楚辞》）、历史典籍（如《史记》《资治通鉴》）、哲学著作（如《论语》《老子》）等。同时，组织读书俱乐部或读书分享会，引导边疆群众诵读典籍。开

发适合边疆群众阅读的中华文化典籍简易读本或漫画版。对于一些较深奥的典籍, 出版社可以通过简化文字、增加注释和生动的漫画插图等方式, 让边疆群众更容易理解典籍内容。

其四, 应用现代科技手段。一是 VR 与 AR 技术重现历史文化场景。利用 VR 创建中华文化历史场景, 如长安城、丝绸之路等, 边疆民众戴上 VR 设备可沉浸式感受古代生活与商贸往来。二是 AR 应用展示传统技艺。边疆民众扫描相关素材, 可观看虚拟剪纸艺人展示步骤并听语音讲解, 直观学习传统技艺。三是互联网与移动应用平台建设。开发中华文化知识在线课程平台, 提供丰富课程, 由知名学者、艺术家录制讲解视频, 边疆民众可随时随地学习。四是文化体验互动游戏设计。设计以中华文化为主题的手机游戏和网页游戏, 如古代昆仑神话游戏、传统建筑搭建游戏, 吸引边疆青少年参与, 增强文化体验。五是多媒体数字内容创作与传播。制作高质量中华文化纪录片和短视频, 展现戏曲、美食、节日习俗等内容, 吸引边疆民众在碎片化时间了解中华文化。六是制作文化数字故事与有声读物。

六、结语

边疆治理的根本在中华文化认知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主线, 要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 引导边疆地区各族群众不断增强“五个认同”,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对中华民族来说, 中华文化是凝聚向心力的核心源泉。中华民族历经无数风雨沧桑, 却始终保持大一统格局, 根源便在于共同文化基因的传承。这些共通的文化符号使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心怀认同, 无论身处何方、遭遇何难, 都因文化的召唤而心向祖国、团结奋进。边疆治理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诸多层面, 但中华文化认同始终处于核心地位, 贯穿边疆发展的各个环节。文化认同是边疆稳定的根基, 它凝聚着各族人民对国家、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使边疆地区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坚守国家统一的底线。民族文化的多元共生是边疆文化的魅力所在, 也是发展的动力源泉, 合理引导多元文化和谐发展, 才能为边疆经济、社会注入创新活力。

展望未来, 我们应以文化为先导, 持续深耕边疆文化土壤,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促进边疆与内地协同发展, 让边疆地区在新时代绽放独特光彩, 成为国家发展、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的坚实阵地, 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 [N]. 人民日报, 2013-03-10 (1).
- [2] 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 李克强俞正声讲话 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N]. 人民日报, 2014-05-30 (1).
- [3] 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 把握战略定位坚持绿色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蔡奇陪同考察 [N]. 人民日报, 2023-06-09 (1).

- [4] 习近平在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汇报时强调 牢牢把握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战略定位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 蔡奇出席汇报会 [N]. 人民日报, 2023-08-27 (1).
- [5]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4: 64-69.
- [6] 马大正. 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1949—2019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 [7] 林荣贵, 毕奥南. 中国古代疆域史: 全 3 卷 [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6.
- [8] 马大正, 刘逊. 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 [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 [9] 周平. 民族政治学二十三讲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308-321.
- [10] 马汝珩, 马大正. 清代边疆开发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11] 余太山, 牛汝极, 等. 新疆文化的现代化转向 [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2.
- [12] 田卫疆, 范学新, 李文亮. 边疆中华文史研究: 第 1 辑 [M]. 北京: 研究出版社, 2023.
- [1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入做好边疆治理各项工作 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12-11 (1).
- [14]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 [EB/OL]. (2024-12-12) [2024-12-15]. <http://www.qstheory.cn/20241212/4d8e062960454a6fa6e6b8b7131ab2d2/c.html>.
- [15] 王明珂. 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474.
- [16] 牛汝极. “合一共命”: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70-81.
- [17]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39.
- [18] 牛汝极. 丝绸之路上回鹘人的中华文化观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4 (5): 95-115.
- [19]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89: 1-18, 29-35.
- [20] 徐杰舜. 雪球: 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1.
- [21] 金宜久. 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7-29.
- [22] 李兴华, 秦惠彬, 冯今源, 等. 中国伊斯兰教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2-15.
- [23] 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60-63.
- [24]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 中国反恐怖主义研究报告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7: 40-43.
-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疆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 [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9: 20-23.
- [26] 马戎. 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4-64.
- [27] 周平. 民族政治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35-38.
- [28] 关凯. 族群政治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 93-102.
- [29] 杨富强.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就业问题研究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85-88.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校对: 卢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基于“两个结合”视角

林华山 王京菁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重庆 400064）

摘要：“两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推进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两个结合”为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和大众化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内核提供了崭新视角。这一重要思想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创性理论贡献：把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同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有机结合，创新发展统一战线法宝论断；把马克思主义团结观同中华传统大一统思想有机结合，创新提出统一战线同心圆论断；把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同中华传统天下观思想有机结合，创新提出统一战线共同体论断；把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同中华传统治理思想有机结合，创新发展统一战线制度论断；把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同中华传统整体论思想有机结合，创新提出构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论断。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两个结合”，立足党的创新理论整体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立足统战工作实践经验升华这一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2.002

作者简介：林华山，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执行主编、编审，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王京菁，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助理编辑。

基金项目：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专家团队牵头课题“‘两个结合’视角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原创性理论性贡献研究”（2024-A01）

引用格式：林华山，王京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基于“两个结合”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2）：13-24.

重要思想，立足话语多维融通研究阐释这一重要思想。在“两个结合”视角下，这一重要思想为认识统一战线打开广阔的文化视野，启发统一战线理论研究注重挖掘和运用文化话语叙事，拓展研究新空间、开辟实践新阵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党的创新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5) 02-0013-12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两个结合”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机理，成为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和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结合”，创新发展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下简称“这一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目前，学界对这一重要思想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形成逻辑方面，主要从理论渊源、文化底蕴、实践基础、现实逻辑四个维度进行阐释。相关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渊源^[2]。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合理念、义利思想、变易思想为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文化资源^[3]，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其提供了重要镜鉴^[4]。有学者认为，这一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坚持运用好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在实践中不断凝练的经验^[5]。还有学者认为，这一重要思想源自于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战略选择，内生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着眼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政治基础，服务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功能^[6]。二是理论体系方面，杨卫敏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治国理政、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宏观视角研究阐释这一重要思想，臧秀玲、贾晓强从核心论、本质论、规律论、方法论、关系论梳理这一重要思想的内容体系，莫岳云则从统一战线本质论、战略论、策略论、统战工作重点论、统一战线方法论以及国际统一战线论分析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7]，笔者前期研究认为这一重要思想是包含“点线面体”的科学体系^[8]。这一重要思想就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集中概括为“十二个必须”^[9]，为学界开展研究阐释提供了理论框架。三是原创贡献方面，有学者从理论定位、制度定位、目标定位三方面阐述这一重要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认为理论定位的原创性贡献表现为“三个重要法宝”“大统战工作格局”“三个更加重要”论断，制度定位的原创性贡献表现为将统一战线纳入国家基本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目标定位的原创性贡献表现为“画出最大同心圆”“四个凝聚”“两个实现”^[10]。有学者梳理了这一重要思想 12 个方面的重大创新性论断，包括“三个更加重要”“基本任务”“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和“人心力量问题”“强大法宝”“大团结和真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大统战工作格

局”“最大同心圆”“新型五大关系和谐”“重要任务”“生动局面”“根本要求”等论断^[11]。

目前, 学界对这一重要思想的研究侧重从统战工作各领域政策和工作部署角度展开, 较少从整体上贯通梳理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内核。与此同时, 大多数关于“两个结合”的论文更多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宏观角度展开, 如论述其科学内涵^[12-13]、逻辑机理^[14]、实践路径^[15]、原创贡献^[16]等, 而较少运用该视角探析党的创新理论中统一战线相关内容, 更缺乏运用该视角对这一重要思想开展整体性研究。经学术数据库检索发现, 专门从“两个结合”视角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进行整体论述的研究成果极少。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主要为肖存良教授从“两个结合”视角分析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中各个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17]。更多学者则用“两个结合”视角研究统一战线各领域理论政策的创新发展。也有部分研究成果阐述马克思主义民生观、团结观等与统一战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统一战线的关联^[18]。可见, 学界运用“两个结合”视角对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进行整体化研究仍需加强。运用“两个结合”视角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这一重要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对于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推动统战工作守正创新, 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二、这一重要思想内蕴的“两个结合”理论要义

党的统一战线扎根于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原生版”转化为“中国版”,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联盟思想的“古代版”转化为“当代版”。这一重要思想运用“两个结合”构建新时代统战理论体系, 彰显系统严密的马克思主义风貌和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风格。

(一)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19]统一战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关于无产阶级开展革命、取得政权、建设治理国家以至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同样蕴含“两个结合”的内在机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20]以及“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盟, 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建设没有剥削的新社会制度的重要条件”^[21], 阐明了无产阶级“联盟”思想, 指出了保持自身团结和形成同盟军的重要性。恩格斯创造了“统一战线”术语。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组成反对剥削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共同推进全人类的进步事业”^[22], 丰富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政治联盟的内涵。苏联在二战时期同英美等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扩展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范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主张囿于特定的历史条件, 只提出了基本原则和开展了初步实践。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进入中国后, 经过“两个结合”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运用“第一个结合”, 科学回答了革命建设改革中如何正确区分敌我友以及“团结谁、怎么团结、团结为何”等重大问题,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形成对国家的一体多样治理。中国共产党运用“第二个结合”, 激活统一战线的中华文明基因, 传承发展

“六合同风、四海一家”和“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取向，丰富建设中华文明的重要资源。“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契合实际、彰显特质，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基于“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这一重要思想成为回答时代重大课题、彰显民族特色的科学统战理论体系。

（二）“两个结合”为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提供根魂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地坚守这个魂和根。”^[23]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同样必须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基本原理构成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魂脉。这一重要思想汲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无产阶级政党的同盟策略转化为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大战略，坚持党的领导、服务中心工作、以人民为中心和社会主义方向，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为中国共产党实现自身团结统一和团结其他力量完成历史任务提供了科学指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构成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根脉。这一重要思想秉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德政”“仁政”的思想主张、“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彰显中国话语的叙事风格。“两个结合”不仅为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为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沛的根魂资源。

（三）“两个结合”激发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取得新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时代党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24]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三次理论飞跃。党的统一战线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的极具中国智慧、中国气派的独特创造。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与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开辟新境界的整体进程相一致，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也不断得到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中的统战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围绕“团结站起来”主题，形成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统战理论同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提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围绕“团结富起来”主题，形成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二次伟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统战篇坚持“两个结合”，对党的统战理论作出了系统性原创性贡献，围绕“团结强起来”主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这一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发展，开辟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两个结合”使这一重要思想成为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统战理论和毛泽东统战思想、邓小平新时期统战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一战线理论、科学发展观统一战线理论之后的新的集大成者。

三、这一重要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呼唤和孕育着党的统战理论创新发展。这一重要思想坚持“两

个结合”,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回应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的重大变化,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两个结合”视角看, 这一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可初步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 把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同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有机结合, 创新发展统一战线法宝论断

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的群众工作。马克思主义人民观认为,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 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同时,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强调人民是面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求主体, 人民的需求是革命的发展方向^[25]。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民生观, 蕴含着以民为贵、以民为重、安民恤民的丰富意蕴^[26], 也孕育产生了关于人心、民心决定国家和政权兴衰的观点。诸如“民为邦本”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精华, 凸显人心向背对国家及政权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观, 扬弃发展中华传统民本思想, 对“为何需要统一战线”问题作出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对此, 毛泽东最早提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重要论断。

新时代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统一战线法宝地位作用作出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搞统一战线, 从来不是为了好看、为了好听, 而是因为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27] 一是以“三个更加重要”深刻阐明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时代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对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目标任务赋予了新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 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28] “三个更加重要”的重大论断立足世情国情党情, 既标定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使命, 又阐明了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 使我们对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二是以“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深刻阐明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内在本质。统一战线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根本任务是凝心聚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 是最大的政治”, “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 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2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心和力量的重大论断, 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提升到事关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关键的战略高度来认识, 既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治国理政经验的深刻总结, 也是基于中华文化中民本、民心政治观对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地位、作用和功能的高度概括。三是以“强大法宝”发展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认识境界。历史上我们先后将统一战线视为“法宝”“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1] 39} 习近平总书记把统一战线从“重要法宝”发展为“强大法宝”, 进一步鲜明回答“统战工作不是过时了、不重要了, 而是更重要了”^{[28] 38}, 极大发展了对统一战线重要性认识的境界。

这一重要论断把统一战线同世情国情党情相关联, 同人心向背、力量对比相联系, 以“最大政治”定位“最大工作”, 把统一战线从“联盟形式”上升为“政权基石”、从“重要法宝”发展为“强大法宝”, 既是对统一战线重要地位作用认识的继承发展, 又以“赢得长期的人心支持”超越“改变短期的力量对比”, 有力驳斥了“统战过时论、上层论、麻烦论、无关论”等错误论调, 实

现了统一战线法宝理论时代化的新飞跃。

（二）把马克思主义团结观同中华传统大一统思想有机结合，创新提出统一战线同心圆论断

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统战理论作为关于联盟的理论，要回答“团结哪些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团结在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认为无产阶级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和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0] 419}，强调加强无产阶级团结、党内团结、工农团结、国际团结，并将团结理念转化为统一战线策略与实践。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便具有大一统传统，“自秦统一中国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30]。追求“华夷一家”的共同理想、“大一统”的政治观念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向心力的思想基础^[31]。这种“协同内外，混一戎华”的政治文化秩序，体现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智慧，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从精神层面联结起中华各族人民的血缘纽带，具有向内凝聚的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融合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团结观和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传统，根据中心任务需要调整和扩大联合范围对象，形成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大联合的理论自觉。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统一战线的联盟属性，创新提出同心圆论断，推动形成最广泛的大团结大联合。一是首次提出同心圆论断，为大团结大联合提供通俗表达。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29] 32}。这一论断以生动形象的语言深刻揭示：统一战线就是一个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以中国共产党和党外其他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共识为半径的同心圆；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就是一个不断寻找中国共产党和党外其他社会政治力量之间最大公约数的过程，旨在增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及各方面的团结，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二是鲜明强调固守圆心，为坚持发展统一战线提供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32]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圆心”是同心圆的根本立足点，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只有固守住这个“圆心”，同心圆才有稳定性和包容性，形成围绕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向心团结、实现万众一心，才能巩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确保统一战线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三是创新推动延长半径，为坚持发展统一战线提供广阔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把“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纳入爱国者联盟的范畴，不断延长团结的半径、扩大朋友圈。这一理论创新发展更大限度地扩大了同心圆的覆盖范围，使“两个范围联盟”携手组成浩浩荡荡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大场景中团结奋斗，为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华章建功立业。

这一重要论断创新运用同心圆思维，科学揭示“固守圆心”与“最大团结”的辩证关系，既坚持领导权又扩大团结面，把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团结范围和对象进行了空前拓展和极大延伸，构建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团结”，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最大同心圆，彰显了最广泛团结的文明根基，使大团结大联合更具历史文化基础。

（三）把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同中华传统天下观思想有机结合，创新提出统一战线共同体论断

统一战线是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结成的联盟，是利益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实现自身团结与联合广泛力量服务于最终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真正的共同体”的理想社会目标。《尚书·尧典》有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

族既睦,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中华文明在演进中开创了万民共在的天下秩序, 产生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思想, 彰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天下情怀。中国共产党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和中华传统天下观, 运用统一战线促进形成和维系现代大一统共同体。

新时代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提出统一战线共同体论断。**一是鲜明提出统一战线是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体。**统一战线各方面各领域“一”和“多”无处不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 只有一致性、没有多样性, 或者只有多样性、没有一致性, 都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33]这一创新论断在全面系统总结我们党正确认识和处理纯与不纯(重点是纠正“清一色”偏向)、同与异(重点是正确对待差异问题)的基础上, 首次将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确立为统战工作基本方针。这是立足百年统战实践作出的科学总结, 也是对统一战线规律的准确把握, 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明确了指针和方向。**二是鲜明强调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体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制度的基础上, 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34]。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 更加凸显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共同性, 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推进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中国式现代化, 有效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三是鲜明倡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促进世界人民大团结。**为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共创美好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35], 提出“三大倡议”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崭新命题。这一重要论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 是中华“天下”观念和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处理世界关系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 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崭新实践, 既为促进国内中华民族大团结营造有利外部环境, 也为开辟人类社会美好未来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这一重要论断把巩固发展统一战线与协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度连接起来, 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的联通, 运用世界眼光拓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广度和深度, 创造性推动人类社会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真正的共同体, 体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相统一, 极大增进大团结大联合的文明特性、情感特质、精神底色、世界意义。

(四) 把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同中华传统治理思想有机结合, 创新发展统一战线制度论断

统一战线制度是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强调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 必须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 使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 广泛地参与国家治理。在历史演进中, 中华民族创立了以都护府、理藩院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制度、羁縻制度、屯垦戍边制度、重大事项商议的廷议制度^[36], 形成“共和”“商量”等施政传统和政治智慧。中国共产党融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和中华传统治理思想, 把统一战线作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

新时代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高度创新发展统一战线制度。**一是里程碑式提升统一战线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

线工作，2015 年制定出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2020 年进行了修订。《条例》是关于统战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把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新成果上升为制度性规定，是提升统一战线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标志，为开展新时代统战工作提供了政治保障、组织保障和法治保障，对推动统一战线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二是创造性提出统一战线相关制度论断。比如，2018 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政协联组会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大论断，并用“三个新”对中国政党制度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以宏大视野阐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生必然性和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推动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迎来崭新起点。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政协制度”论断，在坚持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定位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其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论断，强调“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三是完善性发展统一战线有关制度内涵。比如，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强调“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要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35] 168}，进一步明确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特别行政区制度方面，强调正确理解和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深刻阐明“一国”是实现“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这些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一以贯之，但时代特征更加鲜明、内涵要义更加丰富。

这一重要论断把统一战线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使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通过国家治理“良政善治”的制度实践，为“中国之治”提供可靠的政治制度保障和最广泛的力量支持，在“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过程中更好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作用，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巨大优势和深厚文明底蕴。

（五）把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同中华传统整体论思想有机结合，创新提出构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论断

统一战线工作涉及部门多、领域广，需要形成各方面共同做好统战工作的强大合力。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强调以全面的、发展的、辩证的、普遍联系的观点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使系统发挥最大效能、实现最优目标。马克思主义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后形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等工作机制，推动形成团结合力。整体思维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注重对事物性质、相互之间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万物一体”整体把握，强调运用整体思维来安邦兴国、经纶天下。中国共产党对如何优化统战工作实践和运行机制形成了规律性认识，特别是在党的组织机构中设立统战部，专门做团结党外人士的工作，在各国政党中独具特色。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提出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扎实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提供了坚强保障。一是深刻揭示大统战工作布局源于大团结大联合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 39}新时代大团结大联合，要求团结的面更广、团结的人更多、团结的程度更深，我们必须坚持统战对象发展到哪里、统战工作就跟进到哪里的工作布局，不管是大陆内和大陆外“两个范围”，还是网上与网下“两个空间”，都要求在布局上全方位、全覆盖地做好团结的工作。二是

深刻揭示大统战工作格局源于大统战布局的内在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党派工作、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港澳工作、对台工作、侨务工作,都是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37]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统战工作点多面广线长的实际和布局,必须通过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推动各级党委和党员领导干部提高统战意识、强化统战思维,形成工作合力。**三是深刻揭示大统战工作布局的机制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29] 608}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政策举措作出明确部署。大统战工作格局旨在破解“统一战线不统一问题”,推动统战工作布局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工作相互促进、协同推进,推动统一战线的政策性与公共事务性相统一,使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得到有效加强。

这一重要论断把大统战工作格局明确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各方共做、推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制度安排,既契合新时代统战工作对象更加广泛的实际,又契合中华文明的大一统取向,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重要论述和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有机结合,用“大格局”促“大团结”,使“统战”的力量显著加强、“落实”的能力明显提升、“整合”的效能充分显现,鲜明体现统战工作的中国特色和巨大优势。

四、这一重要思想原创性理论贡献的实践指向

这一重要思想坚持“两个结合”形成的原创性理论贡献,为新时代新征程更好进行学习贯彻提供了根本遵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思想,要坚持“两个结合”,在深化、内化、外化上持续用力。

(一) 整体把握: 立足党的创新理论

这一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两个结合”的重要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等。这一重要思想与党的创新理论的具体成果深度交叉关联,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其他具体方面的重要思想、重要论述是密不可分、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深入学习把握贯彻这一重要思想的要义和精髓,要自觉把其放到党的创新理论中一体学习理解和贯彻落实。比如,同习近平经济思想相关联,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习近平文化思想相关联,着力发挥文化凝聚共识的基础性作用;同党的自我革命重要思想相关联,把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的辩证关系和统战路径;等等。

(二) 理论升华: 立足统战工作实践

这一重要思想是对新时代统战工作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是关于巩固和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最新理论集成。这一重要思想是开放的发展的,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善于总结、研究、

提炼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特别是统战工作的新经验新观点新思想，并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知与行相统一，作出新论断新概括新表述。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思想，关键是把学和做结合起来、知和行统一起来，在增共识、聚人心、促团结上见实效，着力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结果导向，深入开展新时代统一战线重大理论问题和各领域重点难点问题调查研究，树立统战思维，增强统战意识，善于运用统战资源和统战方法，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推进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宏阔进程，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步伐，密切关注新时代国家发展实践的伟大创造，对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实践成就和经验及时进行深入分析和系统总结，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三）研究阐释：立足话语多维融通

这一重要思想是集政策话语、理论话语、社会话语于一体的话语体系。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思想，要立足多维融通原则开展研究阐释。要加强内容建设，多类型复合构建统一战线话语。实现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在党政部门政策对外传递、学术界理论建设、民间社会认知接受等环节的紧密衔接，实现高效跨界生产与传播。加强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探索统一战线学的交叉学科建设规律，推进在国家学科目录中设立“统一战线学”一级学科；推动在国家 and 地方社科规划办单独设立统一战线学科组，加大对统战专业研究的资助力度。要加强主体协同，多主体跨界塑造统一战线话语。构建以官方叙事为主导、学界叙事为支撑、民间叙事为补充的叙事主体联动体系，推进多主体合力构建与协同叙事。要丰富叙事方式，多层次传递统一战线的鲜活故事。在坚持领导权的前提下，从叙事“主体本位”转向“受众本位”，做好分众传播。融通国际与国内的统一战线话语叙事，在做好国内场域统战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同时，综合使用新闻外宣、影视传播、书籍外译出版等方式，加强统一战线话语的对外有效叙事。要健全叙事平台，多载体激发话语统战的实践效能。要使新技术平台从一般的统战宣传功能衍生出话语统战功能，并在现有各地网络统战、数字统战平台建设中加强大数据分析、舆情研判、互动与回应功能。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历史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38]。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展现科学体系的完整性和理论贡献的原创性^[39]，为我们认识统一战线打开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即统一战线既是一种具有“大用”的策略与战略，更是一种蕴含“大道”的价值与文明。这种“大道”源自人类社会因生存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朴素、普遍的合作需求，并在历史中演进成为一种文化价值和文明构造。统一战线不是无产阶级政党或中国独有，但党的统一战线因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而成为一种以人为本、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文明创造，本质上区别于西方一些国家为维护霸权而组建的排他性联盟或西方国家内部一些政党为取得执政地位而组建的功利性联盟，也区别于中国历史上的“合纵之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日益融为一体，鲜

林华山, 王京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基于“两个结合”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13-24.

明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团结标识”，不仅成为立党立国、兴党强国之道，而且助力走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新路。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人类社会面临着思想割裂、文化纷争的共同威胁，人类文明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40]。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所珍视和践行的团结价值、团结精神更加彰显文化力量、道义感召力。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南和根本行动遵循^[41]。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背景下，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要在既有政治话语叙事为主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和运用文化话语叙事，拓展研究新空间、开辟实践新阵地。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7.
- [2] 何虎生. 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三重维度 [J]. 教学与研究, 2024 (10): 5-17.
- [3] 赵婷, 张祎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的中国文化基因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1): 109-118.
- [4] 俞佳奇, 秦宣.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内涵、价值及实现——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38-52.
- [5]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15.
- [6] 臧秀玲, 贾晓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多维阐释 [J]. 科学社会主义, 2024 (1): 48-56.
- [7] 莫岳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 (12): 45-53.
- [8] 林华山.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 (4): 5-18+65.
- [9] 习近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J]. 求是, 2024 (2): 4-7.
- [10] 江国华, 乌日尼勒. 习近平“爱国统一战线”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1): 25-32.
- [11] 冉小毅. 习近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原创性贡献研究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1): 33-43.
- [12] 余卫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辩证关系和实践创新 [J]. 探索, 2022 (3): 1-14.
- [13] 陈金龙. “两个结合”的三维阐释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5): 5-11+241.
- [14] 武文豪, 周向军. 习近平“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三重逻辑论析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 (3): 31-35.
- [15] 徐国民, 王国洪.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 [J].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2): 11-20.

- [16] 黄凯锋. “两个结合”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J]. 社会科学, 2022 (4): 3-14.
- [17] 肖存良. “两个结合”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12.
- [18] 商莹, 蒋满娟. 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J]. 社会科学家, 2020 (5): 135-138.
- [19]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 年 6 月 2 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35.
-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024.
- [2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列宁年谱: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IV.
- [23] 习近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J]. 求是, 2023 (20): 4-9.
- [24] 习近平. 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J]. 求是, 2022 (13): 4-19.
- [25] 唐正东.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创新发展 [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 (12): 37-47.
- [26] 唐海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伦理共性论析 [J]. 齐鲁学刊, 2023 (5): 72-81.
- [27]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58.
- [28] 本书编写组.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问答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40-41.
- [29]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608.
- [30]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4 年 9 月 27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4.
- [31] 高永久, 冯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团结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丰富意涵与时代价值——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体会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2): 5-16.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562.
- [3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03.
- [3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3-10-29 (1).
- [35]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2016 年版)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6: 264.
- [36] 陈喜庆. 中国古代统战智慧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 234.
-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264.
- [38] 陈明明, 杨东光. 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12.
- [39]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 [M]. 人民出版社, 2024: 109.
- [40]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4: 3.
- [41] 韩云波, 陈思思.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坚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之“魂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与中国特色意识形态问题探讨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3): 144-160.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校对: 卢媛



大团结与真团结的共融共进： 统一战线的显著政治优势

王艺腾

（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大团结与真团结作为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原创性、标识性政治概念，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强大功能与独特优势。大团结之“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以政治的包容性、目标的明确性、组织的严密性、文化的先进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不同党派、民族、阶层、群体、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中华儿女都凝聚起来，造就广泛、牢固、紧密、持久的团结。真团结之“真”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倡导的团结既是真知真行、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团结，是真诚坚定、充分发扬民主的团结，也是真心批评、讲求斗争原则的团结，更是真抓实干、合力应对挑战的团结。大团结与真团结二者辩证统一，构成了统一战线的一体两面，也表征了统一战线的价值旨趣和重要特征。大团结为真团结提供人心和力量基础，为寻找共同利益点和价值点、画出最大同心圆创造条件，是真团结的前提。真团结是大团结的深化和升华，有助于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提升大团结的韧性，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行稳致远。

关键词：统一战线；大团结；真团结；政治优势；标识性概念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5）02-0025-11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2.003

作者简介：王艺腾，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共产党团结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024EKS0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团结观研究”（2024110625）

引用格式：王艺腾. 大团结与真团结的共融共进：统一战线的显著政治优势[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2）：25-35.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1]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广泛凝聚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顺利推进改革十分重要。”^[2]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任务，统一战线作为党的百年奋斗十大历史经验之一，也作为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在应对新征程上的各类风险挑战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这要求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既有优势，不仅需要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追求人员数量上的积累，以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还应注重大团结质量的提升，持续打造有深度、有强度的硬核团结和“牢不可破的真团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多不多是数量问题，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是质量问题。”^[3] 这里的“多”与“铁”正分别指向统一战线增强团结的两个主要面向，即“大”与“真”。

大团结与真团结的双重目标旨趣和价值诉求，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强大功能与独特优势。大团结强调团结的广泛性、牢固性、紧密性和持久性，要求广泛联合各界力量，共促民族复兴与人类进步。真团结强调团结的实质性、有效性、深刻性和原则性，要求团结不能流于形式或停留在表面上、数量上的联合，而是要排除各种不利于团结的消极思想和错误行动的影响，发扬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传统，将大团结建立在统一战线成员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对民族复兴的坚定认同基础上。

大团结与真团结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领域两个极具原创性、标志性的政治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同中国这一多民族、后发现代化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理念、“天下为公”追求、“和而不同”思想、“求同存异”精神、“兼收并蓄”原则、“以民为本”主张、“敬业乐群”美德等相结合的大众化时代化表达。但学界对这两个关键概念的学理阐释和内涵解析尚显不足。针对大团结，一是在各级各类党报党刊中，理论工作者多是将其作为一个政治标语和政策方针进行解读，突出其对统战工作的指导意义。二是在学术文章中，学者围绕大团结大联合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4] 和发展历程^[5]，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6] 及其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进程中的时代功效与经验启示^[7]，大团结的逻辑理路与价值意蕴^[8]，大团结的伦理基础及其夯实方略^[9]，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目标指向和实践机制^[10]，新时代大团结的基本要求和实践指向^[11]，以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12] 等进行了讨论，但并未阐发大团结的理论内涵。针对真团结，有学者指出“真团结”是相对于一团和气的、老好人式的、无原则的“假团结”而言，是“斗争的团结”的综合概括^[13]，这观照了中国共产党内部如何通过批评、斗争实现真团结。以上研究未能揭示统一战线何以能够实现团结的“大”与“真”，且未能从整体的视角考察大团结与真团结如何构成统一战线的一体两面，亦未能以发展的眼光考察两者的辩证关联。有学者指出，学界对统一战线整体议题研究少，且对不同议题之间、统一战线与各议题各概念之间的关系，尚缺乏清晰明确的图谱式梳理^[1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15] 团结是统一战线的主题和原则，是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和方向，而统一战线是达成团结的路径和方略。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将团结

理解为与统一战线紧密相关但又高于统一战线的一个概念, 从而突出团结在统战研究中的独特性。这不仅展现多维团结是面向强国目标的统一战线历史方位与发展形态^[16], 亦凸显坚持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团结政治形态^[17]以及构建“团结学”^[18]的多重意义。如此也能更好地响应“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19]的时代命题。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 实现更广更高更深层次的多维团结和坚强团结, 始终是统战工作需要回应的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分析大团结的多重向度及真团结的丰富意蕴, 阐述两者的交融互动关系及其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作用, 进而探讨统一战线促进大团结与真团结的双重旨趣、理论价值和现实路径。

二、以何为“大”: 统一战线巩固大团结的多重向度

统一战线要实现大统一和大协作, 将“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 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 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 国内同胞和国外侨胞”^[20]都团结联合起来, 就要以政治的包容性, 依托健全的体制机制汇聚多元力量; 以目标的明确性, 为全体中华儿女指明共同奋进方向; 以组织的严密性, 筑牢联系不同群体的桥梁纽带, 形成全党上下一齐动手、共抓统战的工作局面; 以文化的先进性, 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情感共鸣和思想精神活力。

(一) 政治的包容性造就广泛的团结

政治的包容性是统一战线巩固大团结的内在要求。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政治架构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开放包容是人类繁荣进步的基本条件。”^[21]“唯有开放才能进步, 唯有包容才能让进步持久。”^[22]兼容并包的理念不仅内蕴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流合作之中, 还浸润在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制度设计、政策安排以及政治实践之中。

一是在制度设计上, 统一战线具有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和协调各方关系的优势, 能够广泛吸纳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比如,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建具有统战性质的“三三制”政权, 要求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 共产党员要“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 并倾听他们的意见”^[23]。这样可以吸纳各方面的代表, 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和阶层。正如毛泽东所言: “有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就有了胜利。我们的势力越大, 胜利的把握就越大, 这是很硬的道理。”^[24]而在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进一步尊重并保障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要求。持续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 “拓展同台湾岛内有关党派团体、社会组织、各界人士的交流交往”^{[15] 271}; 大力吸收侨胞代表参加政协活动, 形成了包容而多元的团结局面。这种广泛的团结为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汇聚了多元主体力量, 提供了坚实政治基础。二是在政策安排上, “爱国统一战线是安排人事, 合作共事, 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必要途径”^{[20] 503}。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重视培养和用好少数民族干部, 统筹做好党外干部工作”^{[3] 55}。党中央对少数民族干部、党外人士充分信任, 广泛吸纳他们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管理, 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三是在政治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 不断拓展协商方式和平台, 培育协商民主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和民主协商会, 听取意见和建议。事

实践证明，“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25]。

（二）目标的明确性造就牢固的团结

目标的明确性是统一战线巩固大团结的重要基础。当人们拥有共同政治理想和目标时，更容易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是最有力的奋斗。”^[26]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目标任务，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与形势发展变化和现实情况相适应的团结奋斗具体目标任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不断开创团结奋斗新局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觉将团结问题置于重要战略地位，认为团结真正的朋友，促进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关乎“革命的首要问题”^[27]。经过 28 年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整个“问题的中心”^[28]。党中央根据形势任务变化，继续推进各领域团结包括政党团结、国际社会团结等，并依托宪法的出台和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各类政治制度的落实巩固各领域的良好团结局面，既为国家建设营造了有利条件，也在具体实践中将对团结观的建构由团结救国推进到团结兴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大力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尽快摆脱贫困走向小康，富裕起来。党中央立足国内外环境，认为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团结的面越宽越好，积极吸纳各方面人士投身现代化建设事业，始终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锚定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依托爱国统一战线汇聚共识，引导人们认识中国梦的深刻意蕴，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29]。在不同时期党的奋斗目标指引下，统一战线在推动人们勠力同心推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组织的严密性造就紧密的团结

组织的严密性是统一战线巩固大团结的关键支撑，也是确保统一战线发挥战斗力的关键因素。我国具有超大规模人口和地域特征，要整合全体民众的意志与力量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自觉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内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30]。

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统一战线在组织上具有严密性。统一战线通过建立健全各级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注重发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的作用，形成了上下贯通、左右互联的组织网络和工作格局。各级各类统战组织通过多元的工作机制，开展丰富多彩的联谊交友和协商座谈活动，以及各种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能把各领域人士凝聚起来，形成万众一心的力量，不断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同心圆。党中央、国务院通过举办常态化、高规格、成体系的重要工作会议，如中央（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等，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对统战工作作出系统部署，

王艺腾. 大团结与真团结的共融共进: 统一战线的显著政治优势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25-35.

创新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此外, 统一战线通过加强自身组织建设, 提高成员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履职本领, 使统战工作有序开展; 通过建立健全统一战线工作制度机制, 确保统战工作顺利推进。这种组织的严密性、工作的规范化为大团结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 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提出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31], 并在省、市、县级党委组建社会工作部门, 设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 健全基层组织建设、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等机制等, 加强了党对社会领域相关工作的统筹。上述举措让基层治理从分散走到整合, 不仅是党中央为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稳健前行而提出的构筑融合大党建、大统战、大社会的一体化大治理格局的新要求; 也是立足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所打造的强化凝聚引领、优化治理结构、激发基层活力、激励内生动力的新方案。为提高全社会的参与度、平衡不同阶层利益、防范化解风险挑战, 塑造了既充满活力又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 也为良好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团结提供了新的制度支撑^[32]。

(四) 文化的先进性造就持久的团结

文化的先进性是统一战线巩固大团结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不断坚守“魂脉”、厚植“根脉”, 坚持文化主体性, 树立文化自信, 推动文化发展创造,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统战文化。统战文化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上, 更体现在对现代文化的吸收借鉴和对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的汲取融合上, 为开展文化统战提供了道德规范、价值追求和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 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 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3] 285} 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在统战实践中, 尊重文化多样性, 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积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时代相契合的价值观念和道德风尚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中。这不仅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 还为民族团结提供了精神支撑, 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统战工作的双向赋能^[33], 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化了民族文化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超越了地域与阶层的界线, 成为凝聚人心的持久力量。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强调通过文化创新彰显文化的思想力和先进性, 并以文化大发展巩固海内外儿女大团结。在文化统战领域, 中国共产党鼓励和支持文化生产创作和文化产业发展, 倡导通过文化交流互鉴, 推动中国故事、中国声音和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进而加强同海外华人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举例来说, 国产游戏《黑神话: 悟空》和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封神第一部: 朝歌风云》等以其独特的艺术设计、场景塑造、视觉效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与表达, 为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提供了一场场文化盛宴。这些文化产品不仅得到国际观众高度认可, 使中国文化元素和价值观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传播和认同, 还吸引大量海外华人关注, 触动了他们作为中华儿女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共情共鸣, 强化了他们与祖国的情感联结, 也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统战文化创新和文化统战感染, 既有力促进了不同群体间的思想交流与文化融合, 也有效减少了分歧矛盾, 整合了团结力量。

三、何以为“真”: 统一战线构筑真团结的丰富意蕴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与构筑“牢不可破的真团结”是统战工作的一体两面。真团结不是

表面的联合，而是建立在真知真行之上，夯实团结的根基；以真诚坚定的态度，充分发扬民主精神，拉紧团结的纽带；秉持真心批评的原则，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以积极健康的斗争方式推动团结向新的更高层次上发展。同时，以真抓实干的决心，使各方力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共同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黑天鹅”“灰犀牛”。

（一）真知真行、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团结

真知真行、照顾同盟者利益是构筑真团结的坚实基础。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观念、处事方法。“懂团结是真聪明，会团结是真本领。”^[37]在统战工作中，真知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懂团结、讲团结，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指导下，根据不同时期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创立了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战线。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创新性发展^[34]，实现了对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方向目标、方针原则、使命任务和领导力量^[35]的深刻认识，实现了对团结奋斗之于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实现民族复兴重要性^[36]的规律总结。真行则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重团结、会团结，通过具体的统战政策和有效的措施来落实团结的原则。比如，老一辈革命家以崇高的风范团结多数、凝聚人心、争取党外人士的事迹广为流传。为进一步提高统战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中共中央制定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强调要在广泛的政治联盟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特别是守住思想政治底线，提高各族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信赖感，增强他们的团结意识和协调能力。

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不仅要有共同目标认识和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还要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即“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38]。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9]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要坚定不移，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的利益”^[3]³⁵⁷。统一战线始终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团结人民群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通过建立常态化调研机制，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通过系统化政策供给，着力解决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通过制度化保障体系，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通过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实现了团结对象的广泛覆盖；通过创新工作载体和方式方法，确保了团结举措的有效落地；通过建立健全评估反馈机制，推动了团结实效的持续提升，最大程度维护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二）真诚坚定、充分发扬民主的团结

真诚坚定、充分发扬民主是构筑真团结的中心环节。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真诚坚定的态度对待各族各界人士。一方面，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原则，尊重不同党派、民族、阶层、群体的差异和多样性。统一战线是由“同”和“异”交织构成的统一体。“异”是由事物多样性决定的，客观存在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同无异，就没有必要建立统一战线。有异无同，就建立不起统一战线。”^[20]⁵⁰⁶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就是通过协商、沟通和交心，促进不同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以达成共识，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为团结创造更好的氛围和条件。这既要求统战成员“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40]；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尊重不同阶层群体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通过主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开展思想心理疏导，理顺各方面的情绪和心态，有效化解各种价值分歧和利益矛盾。

另一方面，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发扬民主精神，贯彻民主理念。邓小平指出：“惟有发扬民主精神和实质，才能达到充分发动群众的目的，才能实现群众自觉自动起来为自身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目的，也才能巩固群众的发动和群众的组织。”^[41] 团结与民主具有同构性，而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耦合性^[42]。“实现紧密团结，发展民主才更有基础；发扬广泛民主，加强团结才更有力量。”^[43] 从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团结与民主构成了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这一辩证关系深刻揭示了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逻辑：只有在民主政治充分发展的制度环境下，才能实现最广泛、最真实的社会团结，这种团结既具有价值正当性，又具有实践可行性。这要求我们进一步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渠道建设，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优势，使其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我们要“贯彻民主协商、平等议事的工作原则，尊重和包容不同意见的存在和表达，以民主的作风团结人，不断增进思想共识、加强合作共事”^[44]；还要着力加强基层民主建设，通过民主恳谈会、社区议事会等平台，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三）真心批评、讲求斗争原则的团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敢于讲真话、讲诤言，及时反映真实情况，勇于提出建议和批评，帮助查找不足、解决问题，推动各项改革发展举措落到实处。”^[44]⁶⁹ 真心批评、讲求斗争原则是构筑真团结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真团结的“定盘星”。批评与自我批评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也是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力武器。列宁指出：“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中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迅速而彻底地克服它们。”^[45] 这句话揭示了共产党人对待自身存在问题的态度和担当，也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23]³⁵⁹ 事实上，这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拥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气度和胸襟，具备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能力。中国共产党坚持发扬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鲜明品格，接受并欢迎来自外界的不同声音，“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46]。

从统一战线工作的本质属性来看，团结与斗争构成了辩证统一的两个维度。“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23]⁷⁴⁵ 一方面，扩大团结面、充实“朋友圈”，构建最大“同心圆”是统战工作的根本任务。这要求我们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拓展工作领域，将新的社会阶层、新兴群体纳入团结范围，通过政治引领、情感认同、利益协调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坚持原则性斗争是确保统一战线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障，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复杂的形势下，必须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在原则问题上敢于亮剑。但这种斗争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讲究策略艺术的辩证统一。既要坚持底线思维，又要注重方式方法；既要解决现实矛盾，又要着眼长远发展；既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团结凝聚人心的优良传统，根据新时代特征创新工作方法，“又要善于斗争、增强斗争本领，努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15]。进言之，既要敢于同违反原则、破坏大局、损害团结的行为和言论作坚决斗争，也要真心维护统一战线的稳定，增进各族各界掏心见胆、并肩奋斗、和衷共济的信念，确保形成高质量、负责任、讲大局的团

结。总之，要坚决保证“统一战线追求的团结，是广泛的团结，也是坚强的团结，是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向着共同目标前进的团结”^[47]。

（四）真抓实干、合力应对挑战的团结

真抓实干、合力应对挑战是构筑真团结的应有之义，也是真团结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诞生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际，在应对时代挑战中发展壮大。当下，针对世界格局深刻演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3] 352}

一方面，统一战线对外要积极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和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挑战。在国际社会，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尽管面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仍大力团结各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48]。为应对一些国家的科技封锁和贸易制裁，党中央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企业界人士，“增强责任感和危机感，丢掉幻想，正视现实，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15] 372}，努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同时，还积极拓展港澳台和国际交流合作，壮大知华友华力量。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澳门“要进一步加大双向开放力度，促进同葡语国家全方位互利合作，积极投身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国际‘朋友圈’，打造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的桥头堡”^[49]。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指明前进方向，既促进了澳门在中西方经济社会合作和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作用，也可助力我国国内大循环畅通，并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新优势，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对内要助力化解国内改革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面对经济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风险防范化解、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等重大问题，统一战线能够充分发挥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作用，团结各方力量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统一战线筑牢意识形态防线，抵御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活动，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在经济建设方面，通过建立常态化沟通对话机制，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基层代表座谈会等，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协助党和政府宣传政策、稳定预期、化解矛盾，引导广大成员及所联系群众全面辩证看待经济形势、发展大势，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50]。这种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践，彰显了统一战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实现政治整合与社会稳定有机统一的制度价值。

四、大团结与真团结共融共进：为民族复兴凝心聚力

大团结与真团结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双重旨趣。一方面，大团结不断向真团结转化。另一方面，真团结又会巩固和拓展大团结。同时，真团结所体现出的高质量、负责任的团结关系也会发挥示范作用，激励更多群体参与到构建和谐友善关系的时代进程中来，从而使大团结不断发展壮大，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强保障。

（一）大团结的巩固为真团结提供人心基础、力量前提，是真团结的前提

首先，大团结的广泛性使得更多力量能够参与到统一战线中来，为真团结的形成提供更深厚的

人心和力量基础。只有当尽可能多的力量形成一个有组织的联盟，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实现坚强的团结。其次，大团结的牢固性使统一战线中的不同阶层能够形成强大向心力，找到共同利益点、价值点，画出最大同心圆，从而聚拢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向着同一个目标勇毅前行。再次，大团结的紧密性使统一战线中的成员能够被统战组织网络所覆盖，融入团结的大家庭，更深入地交流合作。即通过紧密团结，不同阶层和群体可在统一战线的引领下齐心协力、协调配合，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最后，文化的先进性可使统战成员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也更好地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51]，为真团结的形成提供可靠前提。

（二）真团结进一步拓展大团结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是大团结的深化和升华

首先，如果说大团结是一种数量和范围上的广泛联合，那么真团结则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质的飞跃，强调团结的质量和深度。真团结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其本质为在大团结所涵盖的群体之间建立起真诚真心、休戚与共的团结纽带。这种团结关系绝非停留在表面形式的“手拉手”或“肩并肩”，而是基于共同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背靠背”与“心连心”。它不仅要求个体在行动上保持一致，更要求在思想、情感和利益上形成深度共鸣与认同。其次，在大团结的框架下，不同群体可能存在一些浅层次联系，但真团结深入挖掘各群体的共性，通过照顾同盟者利益、发扬民主作风、开展斗争批评以及共同应对挑战等，增强群体间的黏性。这种内在的强大整合力使得统一战线在面对各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时，能够保持高度稳定性，是大团结从松散型结合走向紧密型联合的关键所在。最后，真团结的形成，可帮助统一战线深入了解各方面需求，为大团结提供更精准的服务，提升大团结的韧性。

（三）大团结与真团结协同共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首先，广泛团结起来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互动合作会不断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也会不断加深。其次，统一战线通过健全主体建设机制、力量建构机制、责任建设机制和社会工作机制等^[52]，将推动不同群体和阶层逐渐从简单的交往联合走向深度的交流融合，从利益共同体发展到认同共同体，从领域共同体进阶到国家共同体，从初级共同体演变为高级共同体^[53]。最后，真团结具有的强大向心力会吸引更多群体加入统一战线，以巩固团结秩序。这也将切实避免不同政治力量排斥异己、彼此倾轧的恶性竞争力量，亦可避免“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54]，从而凝聚起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智慧和力量，形成同心筑梦的生动局面。

大团结与真团结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创造的原创性、标识性政治概念，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两个标识性概念不仅承载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逻辑，也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从理论维度看，大团结强调团结的广泛性、牢固性、紧密性和持久性，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度；真团结则突出团结的实质性、有效性、深刻性和原则性，彰显了统一战线的深度。二者辩证统一，构成了统一战线的一体两面，也表征了统一战线的价值旨趣和重要特征。从实践维度看，这一理论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在经济层面，通过服务党的中心任务，为经济快速

发展凝聚了强大合力；在社会层面，通过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社会长期稳定奠定了制度基础；在政治层面，通过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民族复兴营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层面，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面向未来，我们要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以真团结确保大团结的质量，以大团结拓展真团结的广度，通过健全制度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不断开创党的统一战线事业新局面。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2024-07-22（1）.
- [2]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N]. 人民日报，2024-10-30（1）.
- [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58-359.
- [4] 王延中，宁亚芳. 中华优秀文化理念与中华儿女大团结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2）：27-33.
- [5] 王喆. 大团结大联合思想的发展历程 [J].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4）：69-75.
- [6] 冉小毅. 以大团结大联合汇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2）：32-41.
- [7] 周虎. 中国共产党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2）：28-39.
- [8] 吴洁，叶昌友. 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逻辑理路及价值意蕴 [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22-27.
- [9] 杜帮云. 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伦理基础及其夯实方略 [J]. 道德与文明，2022（6）：50-58.
- [10] 束赟.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大团结与大联合：大统战格局的目标指向与实现机制 [J]. 南京社会科学，2024（11）：1-11.
- [11] 陈妮，易玥瞳. 新时代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内在逻辑、基本要求与实践指向 [J]. 观察与思考，2024（10）：34-43.
- [12] 丁勇强，柳鸿志. 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4）：126-138.
- [13] 张彦. “团结的斗争”与“斗争的团结”的行动辩证法 [J].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3（3）：18-28.
- [14] 龚静阳. 中国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图谱：维度、特征与展望——基于 2020 年以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的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6）：194-210.
- [1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09.
- [16] 林华山，龚静阳，刘涪菡. 多维团结：面向强国目标的统一战线历史方位与发展形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4）：12-25.
- [17] 徐理响，胡文婷.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团结政治探析：统一战线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6）：1-11.
- [18] 张献生. 构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 [J]. 政治学研究，2023（5）：3-16.
-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17.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01.
- [21]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832.
- [23]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3.
- [24] 毛泽东文集：第 5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6.

王艺腾. 大团结与真团结的共融共进: 统一战线的显著政治优势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25-35.

- [25]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蔡奇主持 [N]. 人民日报, 2024-06-03 (2).
-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554.
- [27]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4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355.
- [29] 江泽民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43.
- [30]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41-342.
- [3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N]. 人民日报, 2023-03-17 (1).
- [32] 戴洁. 形塑社会团结新样态: 组建社会工作部与治理结构体系化探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57-69.
- [33] 李艳霞. 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统战工作的双向赋能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4 (7): 103-111.
- [34] 何虎生. 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三重维度 [J]. 教学与研究, 2024 (10): 5-17.
- [35]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6.
- [36] 艾四林.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J]. 红旗文稿, 2022 (21): 41-44.
- [37] 习近平. 之江新语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21.
- [38] 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273.
-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86.
- [40]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4年9月20日) [N]. 人民日报, 2024-09-21 (2).
-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文集 (1925—1949): 中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78.
- [42] 汪仕凯. 论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耦合共生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5): 1-14.
- [43] 江泽民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413.
- [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71.
- [45] 列宁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35.
- [4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08.
- [47]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代表中共中央, 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新春祝福 俞正声张高丽出席 [N]. 人民日报, 2015-02-13 (1).
- [48] 习近平.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J]. 求是, 2025 (1): 4-19.
- [49] 习近平. 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N]. 人民日报, 2024-12-21 (2).
- [50] 征求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通报有关情况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4-12-10 (1).
- [51]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4年9月27日) [N]. 人民日报, 2024-09-28 (2).
- [52] 肖存良. 服务强国建设: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内涵、特征与机制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4): 1-11.
- [53] 林华山. 共同体视角下统一战线的战略功能与发展趋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6): 26-38.
- [54]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29.

责任编辑: 卢媛 校对: 王京菁



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生成基础与学理阐释

樊士博 张雨婷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 人民政协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 具有显著政治优势。具体来看, 人民政协政治优势主要源自坚实的理论基础、文化基础和实践基础, 表现为理论优势、文化优势、界别优势以及制度优势等。一直以来, 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人民政协自身建设, 展现出人民政协的制度优越性与组织优越性。新时代新征程, 发挥人民政协政治优势具有多重效能: 从“制度—治理”视角看, 有利于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 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从“情感—力量”视角看, 有利于汇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 从“价值—观念”视角看, 有利于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道德基础。科学把握人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 对理解中国共产党推进协商民主、统筹多样社会关系的行动逻辑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人民政协; 政治优势; 统一战线; 协商民主; 政治协商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2-0036-12

2024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指出, 人民政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显著政治优势, 是科学、有效、管用的制度安排, 在人类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具有

DOI: 10.13946/j.cnki.jcqi.2025.02.004

作者简介: 樊士博,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纪检监察研究院副院长; 张雨婷,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微党课激活党员作用的机制与实践研究”(TJFHZYJ24-24); 上海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2024ZSW002);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预研项目“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研究”(2024ECNU-YYJ061)

引用格式: 樊士博, 张雨婷. 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生成基础与学理阐释[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2): 36-47.

独特政治价值”^[1]。廓清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 有利于我们更好从“中国之制”理解并诠释“中国之治”。近年来, “以中国为方法”的学术研究取向渐成热潮、引为新风。“以中国为方法”的核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 关键在于“以制度为中介”。人民政协作为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实践结晶。

目前, 学界关于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研究已有一定积淀,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构成研究。尔肯江·吐拉洪认为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包含三个层面: 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 统一战线的组织优势, 协商民主的功能优势^[2]。马雪松重点聚焦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 将其解构为价值引领优势、效力提升优势、合力汇聚优势三个方面^[3]。江泽林则聚焦人民政协作为“两会制”之一的独特优势, 提出了自身的见解^[4]。二是关于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实践研究。董明聚焦地方实践, 以解剖麻雀的形式提出人民政协在协商式监督过程中主要依赖“政协的广泛性、包容性、客观性和贯通性等独特优势”^[5]。与此类似, 罗峰结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 强调了人民政协的代表性、动员性、整合性以及包容性优势^[6]。三是关于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比较研究。虞崇胜探究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与其他监督的比较优势^[7]。陈家刚从文化背景、理论基础、制度结构等方面探究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下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8]。

既有研究已揭示了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基本构成。基于此, 进一步从学理上探察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多重来源、时代显现与集成效能等问题, 成为深入研究的必经之途。具体而言, 学界应继续回答如下问题: 人民政协具有政治优势的基本依据, 多重优势的功能指向。研究这些问题是深化人民政协理论研究的应有之义。

一、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来源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回顾人民政协六十五年的发展历程, 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人民政协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 产生于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 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实践,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9]在历史发展中, 人民政协政治优势源自“两个结合”的理论基础, 中华和合文化的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制度创造的实践基础。

(一) 理论基础: “两个结合”的伟大成果

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首先表现为理论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10]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学术图谱, 人民政协在其理论中至少可以追溯三大源泉。其一, 统一战线理论为人民政协提供了思想肇始的动因。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 资本主义仍处在上升趋势。无产阶级若要冲破束缚, 必须与其他力量进行必要的联合。联合需要辅之以合理的形式, 人民政协就是中国共产党选择的统战工作形式。其二,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为人民政协的生发提供了思想空间。马克思恩格斯擘画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学说, 揭示了政党的发展规律。人民政协扮演了多党合作、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的平台角色, 是强化政党合作的重要机制。其三, 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为人

民政协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方向。民主不是镶嵌在国家制度中的装饰物，社会发展是衡量民主适应性的标准。在人民政协框架中，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协商民主结出累累硕果。

世界各国禀赋不同，理论选择有所差异，同一理论在不同国度，结局各异。南橘北枳的自然道理，早已揭示了这一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历理论复制的失败后，旋即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开启了用“中国化”理论“化中国”实践的历史。人民政协在中国大地的生长与发展，是“两个结合”产生的伟大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11]正因如此，人民政协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魂魄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进而释放出源源不断的政治势能。

（二）文化基础：中华和合文化的文明滋养

文化是人民政协释放政治优势的柔性构成要素，极具韧性力量。界别优势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广交朋友和实践智慧，突显的正是和合文化。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体现合作、参与、协商、包容精神^[12]。“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13]

中华民族之所以绵延不绝，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传承、文明延续。传承中华文明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念兹在兹的使命夙愿。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文化建设的自然进程中，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的精髓用于治国理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其他有关政治力量主张“协商建国”。但国民党倒行逆施，政协协议很快便成为一纸空文，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也成为梦幻泡影。从“旧政协”到“新政协”，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给和合文化作出了新注解。实际上，人民政协化解冲突是一个“寻找—聚合—转化”的过程，其中蕴含“和合”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和实生物”等理念^[14]。

人民政协建立在中华和合文化的基础之上。从宏观上看，人民政协的发展过程展现了和合文化“求同存异”的精神特质。各民主党派虽有不同政治主张，但在人民政协框架内实现了精诚团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密切合作、共商国是，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这一基本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际关系中赓续中华和合文化的显著体现。在人民政协实践中，政党不是相互倾轧、彼此攻讦的关系，而是携手共进的朋友关系。近年来，国外政党间的博弈冲突与人民政协下的政党合作形成了强烈反差。美国两党围绕第 60 届总统大选展开的政治角力，反映了社会撕裂的现实情况。韩国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权力之争，给国家稳定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些案例凸显了人民政协崇尚和合文化的优势。从中观上看，人民政协的工作方法也体现了中华和合文化。人民政协承担围绕国家大政方针进行调查研究、建言献策等任务。比如，2023 年全国政协“从 1 755 个建议议题中遴选出 21 个重点协商议政题目，围绕中心任务和群众期盼协商议政、建言资政”^[15]。从微观上审视，人民政协能够容纳不同社会群体参与国家事业和社会事务。通过人民政协，不同社会主体有了发声平台，有助于国家实现意见吸纳，保证政治稳定。人民政协的构成也是中华和合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

邀请的人士组成，设若干界别。”^[16] 界别是人民政协产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组织基础，突显了鲜明的政治优势。界别优势是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界别的委员能够联系本界别群众，及时传递民意。

（三）实践基础：政治制度的伟大创造

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还表现为制度优势。人民政协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携手创建而成的。人民政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中国特色民主制度和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载体。

民主优势是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来源之一。人民政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组织依托，更是协商民主的组织化表达，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扮演着基座型平台角色^[17]。人民政协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个环节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协商民主最具中国特色，展现出了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18] 众人的事情，众人一起商量解决，是中国人的古老智慧。协商之中包含民主，民主却并非仅有协商一种样式。西方国家在“民主”的外衣包裹下，选择了票决民主的单一形式，在协商层面几无建树。部分西方国家的民主看似人人都有选票，实则存在严重弊端。2021年的美国“国会山”骚乱，2024年美国大选中的“死人票”，都暴露出西方民主的虚假。协商是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底气，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又一来源。当代政治学理论把政党视为现代民主体制的关键机构和制度，政党是与现代民主政体互栖共生的^[19]。观其大要，各国政党制度可分为一党制、两党轮流、多党轮流等类型。一党制容易出现监督乏力，常常陷入不受约束的危险中。西方国家的两党制，看似实现了民主机制上的“交替坐庄”，但却经常造成相互指责诋毁的结果。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避免了西方国家政党之间争权夺利、推诿扯皮的弊端。依托人民政协的平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以由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二、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时代彰显

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既源于历史，也源自实践。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人民政协自身建设，展现出极强的制度优越性与组织优越性。较之以往，人民政协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功能、发挥职能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

（一）围绕中心：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言献策

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中国政治的核心议题，亦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2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开始提质跃升，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呼之欲出。党的二十大科学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篇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指明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方向^[21]。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易事，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结果。现代化是一个富有广延性的概念，可以剥离出诸多具体形态，经济的

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生态文明的现代化均是其重要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牵涉甚广，是齐头并进的现代化，不是单一事业的现代化、更不是丧失平衡的现代化。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中国式现代化对社会各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推进党和国家现代化事业，需要万众一心、齐心协力。正因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覆盖广泛，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更需要凝聚合力。

人民政协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彰显了显著的政治优势。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为现代化事业发展提供了力量主体，但也给凝聚共识带来了挑战。平衡多种利益主体、弥合多元价值主张、防范社会发展风险，离不开人民政协凝聚思想共识的政治优势。新时代以来，人民政协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迫切问题，形成了强大合力。此外，人民政协还积极建言献策，为重大决策提供了智力支持。分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协历届历次会议的提案审查情况报告，由表 1 和表 2 可知：提案数量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体现出委员履职的责任感和建言的积极性很高；提案内容更加聚焦，调研更加扎实，建议更加具体，时效性也更强，覆盖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各方面，尤其对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关注与日俱增。这些提案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各方面展开，对提升现代化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表 1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协历届历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

会议届次	提案数量 (件)	转为意见和建议的 提案数量和百分比	立案数量 和百分比	委员立案数量 和百分比	集体立案数量 和百分比
十四届二次	5 898	732 (12.4)	5 006 (84.8)	4 534 (90.6)	472 (9.4)
十四届一次	5 399	628 (11.6)	4 689 (86.9)	4 234 (90.3)	455 (9.7)
十三届五次	5 979	965 (16.1)	4 979 (83.8)	4 503 (90.4)	476 (9.6)
十三届四次	5 913	846 (14.3)	4 940 (83.6)	4 454 (90.2)	486 (9.8)
十三届三次	5 709	742 (13.0)	4 849 (84.9)	4 387 (90.5)	462 (9.5)
十三届二次	5 113	1 121 (21.9)	3 859 (75.5)	3 499 (90.7)	360 (9.3)
十三届一次	5 360	777 (14.5)	4 438 (82.8)	4 049 (91.2)	389 (8.8)
十二届五次	5 210	920 (17.7)	4 156 (79.8)	3 754 (90.3)	402 (9.7)
十二届四次	5 375	824 (15.3)	4 248 (78.9)	3 859 (90.8)	389 (9.2)
十二届三次	5 857	728 (12.4)	4 984 (85.1)	4 545 (91.2)	439 (8.8)
十二届二次	5 875	614 (10.5)	4 982 (84.8)	4 600 (92.3)	382 (7.7)
十二届一次	5 641	70 (1.2)	5 254 (93.1)	4 884 (93.0)	370 (7.0)

数据来源：新时代以来历届历次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表 2 全国政协提案立案类型分布 (2018—2024 年)

会议届次	经济建设 (百分比)	政治建设 (百分比)	文化建设 (百分比)	社会建设 (百分比)	生态建设 (百分比)	其他提案 (百分比)
十四届二次	39.70	9.30	9.10	28.70	13.20	
十四届一次	42.40	8.80	7.30	28.50	13.00	
十三届五次	38.40	10.00	7.80	31.00	12.30	0.50
十三届四次	36.80	6.30	6.30	36.60	9.50	4.50

樊士博, 张雨婷. 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生成基础与学理阐释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36-47.

会议届次	经济建设 (百分比)	政治建设 (百分比)	文化建设 (百分比)	社会建设 (百分比)	生态建设 (百分比)	其他提案 (百分比)
十三届三次	38.32	11.05	8.33	31.97	7.32	3.01
十三届二次	38.46	7.98	6.89	34.62	9.07	2.98
十三届一次	36.35	9.85	7.57	32.58	9.08	4.57

数据来源: 2018 年以来历届历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 服务大局: 发挥统一战线的组织功能

统一战线的组织功能, 主要依靠人民政协得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人民政协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 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凝聚共识, 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10] 266} 作为顶层设计, 统一战线性质决定了人民政协的组织功能。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三大职能是历史发展积淀而来, 已然成为中国大地上的政治传统。

借助人民政协平台, 不同界别群众能够实现顺畅的政治沟通。“组织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要靠信息交流的渠道。”^[22] 政治沟通的实现, 保证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化进程。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依托人民政协平台优势, 完善了统一战线工作的组织化运转。一方面, 加强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 夯实统一战线组织功能转化的领导力和引领力。为切实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用制度化保障人民政协在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上的组织作用。比如, 全国政协于 2023 年 9 月印发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的意见(试行)》, 明确了政协委员“联系谁”“联系什么”“怎么联系”等问题。再比如,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十六次主席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协商议政质量评价工作办法(试行)》, 明确了评价标准, 对提升双周协商座谈会质量、专题调研质量、提案质量、社情民意信息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在一系列制度机制规范下, 人民政协在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上越走越实。

(三) 设置议程: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故事

讲好民主故事是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应有之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 “民主是什么呢? 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 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2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4]。中国式民主的真正意义在于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既有政策上的谋划, 也有举措上的保障。西方国家的民主, 往往只是少数人设计的口头民主。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 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是人民发挥对国家监督作用的保障, 也只有人民最了解现实的情况^[25]。民主政治的形式是多样的, 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 更不能陷于故步自封^[26]。

人民政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彰显。一方面, 人民政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载体之一。特定群体的民主建议在人民政协内被吸纳, 发挥建言资政的作用。另一方面, 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组织载体。协商民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成果的重要构成,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关怀。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 同选举民主相互补

充、相得益彰。协商民主通过对话让多种主体交换意见和诉求，构建了开放性的问题解决场域，提供了良政善治的基础^[27]。“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8]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实现了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的相互贯通。

三、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效能集成

衡量政治组织是否具有优势或优势是否明显，效能是重要标准。在中国政治的复合议题中，人民政协显著政治优势的功能指向了制度、情感、价值与观念等不同维度。

（一）“制度—治理”之维：完善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

人民政协之所以具有显著政治优势，是因其服务国家建设大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体系。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尤为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人民政协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在倾听民意、汇聚民情、集中民智、激活民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人民政协与人民代表大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整体。

评价制度优劣，效能是关键。人民政协既是审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背景，也是中国民主制度内涵之一。制度背景是民主实践顺利开展所构成的整体框架，彰显着国家政治发展的总体安排与科学设计。人民政协能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若干方面进行广泛调查研究，以政治参与增进国家大政方针的科学性。人民政协是中国特色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内在构成。作为一种精巧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协在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体系中，肩负着将新型政党制度、协商民主制度等落为实践的重要任务。借助人民政协的实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释放出国家治理、政党治理的实践效能。正如有研究认为：人民政协非科层的组织形式与政治效能从外部依托制度途径输入政府后，不易被层级链条向下传导消解，有助于政府超越科层约束，实现有效治理^[29]。人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使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避免了西方政党那样陷入制度空转的尴尬处境。人民政协构成了中国民主实践的生动注脚，向世界提供了协商民主、政党民主监督的中国方案。

（二）“情感—力量”之维：汇聚了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

借助人民政协的平台优势，中国共产党能够从情感上汇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一个处在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30]中国共产党依靠组织和动员，解决群体融合与阶层融合的问题。组织主要指自身的组织体系和关系网络，而动员则主要是依靠情感与政策。人民政协在组织与动员两个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31]。依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民族宗教工作、港澳台统战工作、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从民族工作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民政协在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发展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汇聚起磅礴力量。从港澳台统战工作来看，人民政协有助于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海外统一战线来看，人民政协能够促进海外人士友好交流，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发挥特定人群与海外联系广泛的优势作用。这一点有利于中

国共产党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发挥人民政协政治优势, 目的在于汇聚干事创业的合力。一人拾柴火不旺, 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是某一个阶层自身的任务, 而是亿万中华儿女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 离不开亿万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政协能够统筹各种社会关系, 精准化解社会多重矛盾, 凝聚起不同阶层的政治力量, 助推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众擎易举, 独木难支。新时代新征程,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境遇, 中国共产党更加迫切需要人民政协发挥出凝聚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的政治优势。

(三) “价值—观念”之维: 巩固了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对执政党的政治发展和治国理政而言, 共同思想基础至关重要。共同思想基础是维系国家主流价值观念的纽带和支撑, 事关民族凝聚力的养成、政党团结力的实现。人民政协针对特定人群的团结实践, 有利于塑造“心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 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32] 当今世界的政局变化, 说明了思想基础的重要性。共同的思想基础, 可以实现目的性的价值牵引, 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价值追求^[33]。在谈及人民政协的思想基础时,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 “人民政协要始终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28]⁹² 经历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不懈探索,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 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与制度, 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维护。

中国历史实践充分证明: 分裂不得人心, 团结才能安邦。人民政协展现出了包容型团结的制度角色^[34]。共同思想基础, 要害在凝聚共识, 关键在形成合力。在人民政协的实践框架下, 不同力量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过, 由于社会环境纷繁复杂, 历史虚无主义、政治虚无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应对各种虚假包装后的“奇谈怪调”, 需要政治组织协同发力。人民政协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致力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主张巩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 极大维护了思想安全和政治安全。

四、发挥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新征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越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杂演变, 越是接近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越要发挥出人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

(一) “思想—文化”层面: 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

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赓续历史经验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政协理论, 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是党的创新理论在人民政协工作中的实践篇章, 是新时代新征程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根本遵循。学深悟透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 须从三个方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其一, 坚持系统观念, 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局出发, 加深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1]⁷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根本指南。科学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必须做到由大到小，以全局观指导关键处。其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35]。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要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基础之上，以党的领导优势激发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其三，坚持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政协理论。实践不断发展，理论之树常青。随着人民政协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展开的实践愈加丰富，人民政协的理论也需不断总结凝练。

（二）“使命—任务”层面：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现在，统战工作不是过时了、不重要了，而是更重要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10] 609}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赋予了人民政协新的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成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统一战线工作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问题，人民政协要在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发挥出应有的平台作用和组织特色。人民政协本身就是统战平台，须强化人民政协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地位，讲好人民政协的“团结学”、统一战线的“组织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构建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迈出了坚实步伐，发挥出了人民政协的强大统战功能。一是要不断增强人民政协的覆盖面。人民政协独特的界别优势，使其能够兼顾多样化统战对象的利益诉求。随着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人民政协应进一步强化自身的代表性、包容性以及连接性。二是要进一步明确人民政协的基本属性。统战属性是人民政协最基本的属性，统战职能是人民政协最基本的职能。因此，人民政协要在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三是要协同社会多种力量，实现人民政协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大统战理念之“大”，关键在主体之多，关键在结构之繁。凝聚广泛共识，离不开人民政协的组织优势。

（三）“行动—能力”层面：提升政协委员的履职本领

实现人民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不断提升政协委员的履职本领为前提基础。政协委员的能力事关人民政协工作的效率。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是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提升政协委员的能力作为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关键抓手。近年来，伴随书香政协建设，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强化了建言资政的实际效能。

职能发挥，能力为要。2019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加强委员队伍建设，教育引导委员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36]其一，政协委员要懂政协。政协委员不仅是一种身份，还是一份责任，必须清楚人民政协的性质、职能和定位。其二，政协委员必须会协商。协商是一种能力，也是政协委员的权利。人民政协要引导委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展政治协商。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协双周座谈会成为重要创新举措。双周座谈会涉及诸多重大议题，有效提升了议政质量。十二届全国政协共开展7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37]，十三届全国政协共开展68次双周座谈会。落实双周座谈

会机制, 要求政协委员必须会协商。其三, 政协委员要善议政。参政议政是政协委员的基本要求, 也是发挥作用的关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第十六次主任会议上通过的《政协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年度好提案评选办法(试行)》对政协委员通过提案参与议政提出了郑重要求。其四, 政协委员要守纪律。政协委员肩负重要使命, 必须遵守纪律,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其五, 政协委员要讲规矩。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规范的政治生活, 需要规则、规矩保驾护航。其六, 政协委员要重品行。品行就是道德, 道德是为政之资, 体现了政协委员的行为准则、职业操守和思想境界, 需要内修常修。

(四) “话语—知识”层面: 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

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泉, 理论又是实践发展的先导。发挥人民政协的显著政治优势, 必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学术创造, 构建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人在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上采取了诸多有益举措, 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对实践的指导。“知识体系的价值在于以实践为中介的文明传承与文明创造,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既有利于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理论与实践困境, 也有利于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38]在这个交流交往交融日益加快的世界中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既要抓住“自主”二字, 又要聚焦“体系”二字。“自主”是要把中国独有的事与物, 通过理论化、系统化、学理化的形式讲出来。“体系”是讲求发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集团优势和整体效能。

作为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人民政协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着眼整体, 要坚持从内容、主体、方式、平台上建构自主知识体系^[39]。人民政协自主知识体系既要从小处落笔, 也要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问题上大处落墨。从学科体系看, 与人民政协有关的学科具有多样性, 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民族学、人类学等都与此相关。因此, 人民政协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 应发挥学科连接点的优势。从学术体系看, 人民政协涉及政党政治、民族宗教、民主理论等多条学术脉络, 是学术交流、跨学科交叉的中介单元。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 新型政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构成了中国学术的前沿焦点, 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从话语体系看, 人民政协讲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新话语、统一战线实践的时代新话语, 有利于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五、结语

新时代新征程, 发挥人民政协政治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人民政协政治优势表现为理论优势、界别优势、文化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等, 肇始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 发展于中华和合文化的文明滋养, 丰富于中国共产党制度实践的伟大创举中。新时代以来, 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发挥出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功能, 在讲好协商民主故事、全过程人民民主新理念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面向未来, 越是发展形势复杂, 人民政协越要发挥出自身政治价值。在“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的情势下, 人民政协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言献策, 有助于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4 年 9 月 20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2.
- [2] 尔肯江·吐拉洪. 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 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 [J]. 红旗文稿, 2024 (20): 10-14.
- [3] 马雪松, 陈虎. 人民政协凝聚全过程共识的民主意蕴、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 [J]. 理论探讨, 2022 (6): 30-36.
- [4] 江泽民. “两会制”民主视域下的人民政协——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政治制度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12): 110-130.
- [5] 董明, 徐琴. 地方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实践功能与推进路径——以温岭委派民主监督员工作为例 [J]. 治理研究, 2024 (4): 128-141.
- [6] 罗峰. 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及其发挥——人民政协视角的分析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0 (1): 177-184.
- [7] 虞崇胜. 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性质、特点和优势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8 (1): 29-34.
- [8] 陈家刚. 中国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 [J]. 新视野, 2014 (1): 20-26.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67.
- [10]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64.
- [1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 年 6 月 2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8.
- [12] 王长江. 政党论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81.
- [13] 习近平. 之江新语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50.
- [14] 邵涵. 以“和”求“合”: 人民政协化解冲突的过程与逻辑 [J]. 东岳论丛, 2024 (10): 165-170.
- [1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10.
- [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2-23.
- [17] 束赞. 基础性共识与基座型平台: 人民政协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与位置 [J]. 社会科学, 2024 (12): 94-105.
-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1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82.
- [19] 包刚升. 民主的逻辑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224.
- [20] 臧峰宇.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 (7): 39-55.
- [21] 樊士博.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10): 12-21.
- [22] 安格鲁·帕尼比昂科. 政党: 组织与权力 [M]. 周建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42.
-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0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315.
-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4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59.
- [25] 金观涛, 刘青峰. 问题与方法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503.
- [26] 樊士博, 徐敏.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 团结与民主的辩证实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1):

樊士博, 张雨婷. 人民政协政治优势的生成基础与学理阐释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36-47.

78-85.

- [27] 韩志明. 过程即是意义——协商民主的过程阐释及其治理价值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 (12): 55-62.
- [28]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97.
- [29] 韩莹莹, 廖嘉豪. 政协协商制度化: 演进历程、结构功能与动力机制 [J]. 公共治理研究, 2024 (5): 18-31.
- [30] 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王冠华, 刘为,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332.
- [31] 李昱丰. 统一战线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样态构成、作用机制与行动路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23-33.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23.
- [33] 王韶兴.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 (6): 4-24.
- [34] 张铮, 李政华. 新时代人民政协制度功能角色研究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4 (6): 64-72.
- [35] 陈喜庆.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 缘由、定性和功能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9.
- [3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06.
- [3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文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23.
- [38] 张乾, 刘同舫.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之“知识”的哲学阐释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6): 20-29.
- [39] 林华山, 龚静阳. 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26-144.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龚静阳



破解“内卷式”竞争视角下新质生产力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依据与战略构想

徐政¹ 郑霖豪²

(1.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09;

2. 福建投资集团 闽投研究院, 福建 福州 350005)

摘要：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它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民营经济发展也一定程度存在“内卷式”竞争的现实困境。民营经济“内卷式”竞争的困境，其根源可归结为市场维度、制度维度和企业维度等多个方面的因素。这种竞争模式容易导致资源浪费、创新受限和利润空间压缩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其中，技术革命性突破是重塑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模式的关键，通过引入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民营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在战略构想上，新质生产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围绕创新驱动、制度保障、产业升级、资本赋能和人才支撑等方面展开。新质生产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助于破解“内卷式”竞争，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2.005

作者简介：徐政，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河北省重点高端智库“河北省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郑霖豪，福建投资集团闽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基金项目：江苏省全省党校系统调研课题“江苏加快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阵地研究”（XT24015）；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重点资助项目“江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路径研究”（24SYA-019）

引用格式：徐政，郑霖豪. 破解“内卷式”竞争视角下新质生产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依据与战略构想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48-58.

关键词: “内卷式”竞争; 新质生产力; 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 新型生产关系

中图分类号: F12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2-0048-11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 “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 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 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这些举措对于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促进公平有序竞争具有重要意义。2024年7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经济形势、部署经济工作, 指出“要强化行业自律, 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2024年12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 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这一部署是党中央在准确认识阶段性问题和深刻把握市场规律的基础上, 解决当前经济发展矛盾的关键举措, 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1]。

“内卷式”竞争在行业内表现为企业间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排挤竞争对手, 而采取无限度降价的策略, 以期获得短暂的竞争优势。然而, 这种竞争方式非但没有改善企业的处境, 反而迫使各方投入更多资源, 导致行业整体环境恶化, 企业生存压力骤增。这种竞争模式类似于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个体理性选择最终导致集体非理性, 损害了集体利益。“内卷式”竞争不仅造成利润压缩, 还导致行业走向低价竞争、过度宣传、技术抄袭和资源过度开采等歧途, 严重削弱了创新力, 阻碍了可持续发展^[1]。对消费者而言, 这种竞争同样非福音, 因为低价往往伴随着品质下滑和服务缩减, 最终损害的是消费者的整体利益。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面临着“内卷式”竞争的严峻挑战。这种竞争模式不仅消耗了大量资源, 还限制了企业的创新空间和发展潜力。2024年12月27日,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 1—11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6674.8亿元, 同比下降4.7%。从单月情况看, 11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7.3%。竞争应当是公平有序的。在市场经济运行中, 只有在合理范围内、遵循公开透明规则和标准的竞争, 才能使市场供求达到均衡, 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企业优胜劣汰, 并使经营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竞争行为与社会整体利益的改进优化相统一。如果竞争失去节制, 不同地区、各类经营主体之间盲目开展“内卷式”竞争, 将会扭曲市场机制、破坏市场公平。在微观层面, 这将导致企业压缩必要生产成本、降低产品质量, 不仅有损企业信誉和品牌形象, 也会损害消费者利益。在中观层面, 这将破坏整个行业生态, 导致行业利润微薄、产能相对过剩, 影响再生产与研发投入, 使整个行业发展后劲不足。在宏观层面, 这将导致市场经济运行偏离正常轨道, 创新活力受到抑制, 落后产能挤出先进产能, 产业链安全受到威胁。防止“内卷式”竞争, 不是不要市场竞争, 而是要摒弃破坏市场秩序、有损经济发展的恶性竞争, 以良性竞争推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2023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 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新发展阶段下生产力形态的战略思考。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当年十大任务之首, 标志着发展新质生产力被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要位置。2025年2月1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 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加强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努力为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多作贡献。当前，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的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我国正在加快培育和发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主要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特征、形成逻辑以及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2]。高帆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驱动的生产力，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有机结合^[3]。笔者也认为新质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能够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是传统生产力在信息化、智能化生产条件下衍生的新形式和新质态，伴随着科技持续突破创新与产业不断发展升级，代表着生产力质态的能级跃升^[4]。黄群慧和盛方富认为，在当代科技进步的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既有战略性新兴产业生长出的新枝，也有未来产业萌发的新芽，是经济发展的强劲动能和新型优势^[5]。

民营经济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主体，具有转型灵活、市场嗅觉敏锐、经营高效等特点，拥有巨大的创新动力，是市场活力的源泉。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4）》，2023 年，民营企业数量超过 5 300 万户，占全部企业数量的 92.3%，提供 90% 以上城镇新增就业。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破解民营经济“内卷式”竞争的重要抓手。新质生产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助于破解“内卷式”竞争，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6]。

二、民营经济“内卷式”竞争的根源探析

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模式与竞争态势一直备受关注。“内卷式”竞争现象在民营经济中也一定程度存在。这不仅制约了企业的健康发展，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整体活力。民营经济当前面临的发展困境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探究其根源，可从市场维度、制度维度和企业维度三个方面入手^[7]。

（一）市场维度：内外部需求与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

市场维度的民营企业“内卷式”竞争，是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下一种值得深思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不仅根植于国内市场的特定结构与发展阶段，还深受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从国内层面来看，虽然我国一直在推动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以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来激发内需潜力，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地域性市场分割、行业标准不统一、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依然存在，导致国内需求难以得到充分释放，市场碎片化现象较为严重。这种国内市场的不完全整合状态，限制了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的发挥，使得企业在争夺有限市场份额时，倾向于采取低价竞争、牺牲品质等短期行为，从而陷入了“内卷式”竞争的漩涡^[8]。与此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为制造业的竞争态势增添了复杂变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外部需求的减少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显著增加。对于高度依赖出口的部分制造业企业而言，外部订单的减少直接冲击了其生存和发展空间，迫使这些企业不得不转向国内市场，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而国际循环衔接的不利，

不仅体现在订单数量的减少上, 还包括供应链中断、物流成本上升等多方面挑战。这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迫使它们采取更加激进的竞争策略以求生存。市场维度的制造业“内卷式”恶性竞争, 是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尚不完善与国际循环受阻双重作用的结果。破解这一困境, 既需要国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加快构建高效统一的市场体系, 促进内需持续扩大和升级; 又需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 优化出口结构, 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 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性建设, 以更加开放和创新的姿态应对全球经济的变局^[9]。

(二) 制度维度: 产业政策的不足与法律保障的不完善

制度维度的民营企业“内卷式”竞争, 其主要原因在于产业政策不足和法律保障的不完善。一方面, 制度维度的“内卷式”竞争来源于产业政策的不足。在有的地方政府追求短期政绩的“晋升锦标赛”竞争模式下, 往往倾向于通过提供优惠政策与补贴措施来快速发展先进制造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 忽视了从国家全局利益出发或促进国家产业链与供应链整体优化的原则^[10]。这种做法导致有的地方政府以横向竞争或零和博弈的心态来引进和布局产业项目, 以期短期内提升 GDP 数值。然而, 产业政策的扭曲可能导致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一些本该用于支持创新、提高产业附加值的资源被浪费在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上, 加剧了“内卷式”竞争。在产业政策扭曲的情况下, 市场机制可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有的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可能导致市场竞争失序, 企业难以通过正常竞争获得市场份额和合理利润, 进而陷入价格战等恶性竞争之中^[11]。另一方面, 法律保障的不完善是出现“内卷式”竞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市场监管的缺位具体可以分为履行监管职责不力、监管执法不严和监管信息不对称。履行监管职责不力指监管机构未能对市场状况进行全面、精准判断, 缺乏对市场变化的及时反应。监管机构与市场之间的衔接如不够紧密, 将影响监管效果^[12]。监管执法若不严会助长不正当竞争, 如知识产权侵权、利用网络水军抹黑对手等, 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监管机构涉及多个领域、多个部门、多个阶段, 导致信息的源头管理和整合难度大, 存在监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监管机构如无法及时掌握市场的真实情况, 无法及时发现问题, 也就无法及时防范风险^[13]。

(三) 企业维度: 经营决策的短视与客观的技术壁垒

企业经营决策的短视是导致民营经济“内卷式”竞争的微观原因。有的民营企业为了迅速扩大市场份额或提高短期利润, 往往倾向于采取低价竞争、过度营销等短视策略^[13]。这种策略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带来一定的收益, 但长期看却会破坏市场秩序, 导致企业陷入价格战等恶性竞争之中。有的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缺乏长远规划, 只关注当前的市场需求和竞争态势, 忽视了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潜在的市场机会。这种行为使企业难以把握市场先机, 错失转型升级的良机。此外, 有的民营企业的决策机制不完善, 决策过程缺乏科学性和民主性^[14]。企业家的个人意志往往凌驾于集体决策之上, 导致企业决策失误频发。这种不完善的决策机制使企业在面对市场变化时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调整。除了企业经营决策机制存在不足外, 客观的技术壁垒也是导致民营经济“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核心技术支撑, 只能依赖低成本、低价格等策略参与市场竞争。这种竞争方式不仅难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还容易陷入价格战等恶性竞争之中^[15]。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比, 民营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往往较为有限。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和人才储备, 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往往较难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限制了其市场竞争力的提

升。即使一些民营企业拥有一定的技术创新成果，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转化机制和渠道，这些成果也难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并为企业带来实际效益。这种技术成果转化的困境进一步加剧了民营经济“内卷式”竞争的局面^[16]。

三、新质生产力破解民营经济“内卷式”竞争的理论依据

民营经济“内卷式”竞争已成为制约其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之一。新质生产力理论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有力支撑。技术革命性突破为民营企业发展创新模式提供了可能，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则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同时，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成为激发民营企业高端智能化发展的关键^[17]。这些理论依据为民营经济摆脱内卷、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技术革命性突破重塑民营企业发展创新模式

技术革命性突破在重塑民营企业发展创新模式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而民营经济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主体，具有转型灵活、市场嗅觉敏锐、经营高效等特点。利用技术创新驱动生产力发展，有助于培育新成果、新业态、新模式，增强创新驱动赋能，重塑民营企业发展创新模式^[18]。随着全球科技创新的不断加速，民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正积极拥抱技术革命，推动自身发展模式深刻变革。技术革命性突破为民营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民营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自身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例如，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区块链技术、材料技术前沿、生命健康前沿、生物育种前沿等领域，民营企业积极布局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努力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技术革命性突破还促进了民营企业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在数据、算力、数字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的推动下，民营企业能够灵活调整企业策略和资源分配，推动新生产要素和传统生产要素的高效赋能和深度融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技术革命性突破也推动了民营企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20]。民营企业利用新技术改进生产工艺流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或通过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增加附加值，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此外，民营企业还积极布局新兴产业领域，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成为激发经济创新发展活力、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21]。

（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提升民营企业资源利用效率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是提升民营企业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途径。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民营企业通过优化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够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经营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22]。一方面，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投入到技术创新与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这一进程不仅重塑了传统生产模式，更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与自由流动。通过引入先进科技手段和管理理念，民营企业成功地将技术创新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这一转变不仅提升了生产要素的内在质量，还催生出更加灵活高效的生产组织形态^[23]。这些新型组织形态如同桥梁，紧密连接起核心主导产业、交叉融合产业、潜在关联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形成了一个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网络。在微观层面，技术创新与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通过自动化、智能化手段提高了生产效率，进而提升了劳

动生产率, 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宏观层面, 这一过程优化了国家整体的产业结构, 促进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向数字化、智能化时代迈进提供了强大动力^[24]。民营企业作为这一变革的先锋, 不仅赋能了创新生态系统, 更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展现了其在国家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重要价值与使命。民营企业正以开放的姿态, 积极探索跨领域、跨部门的协同创新路径, 通过构建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的紧密合作关系, 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与优化组合。在这一模式下, 企业与学界携手并进, 共同研发前沿技术、创新工艺, 有效加速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步伐, 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策略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民营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 还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共同发展, 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良性循环, 为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25]。

(三)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民营企业高端智能化发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 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民营企业必须加快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 以提升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 以知识和信息为要素, 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力形态^[26]。它强调通过颠覆性技术突破引领生产力跃迁,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 新质生产力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引入新技术、新工艺和新管理模式, 企业能够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实现产品的差异化竞争。同时, 新质生产力还能够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发展, 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在积极构建创新型产业链的实践中, 众多民营企业凭借既有的产业集群作为稳固基石, 纷纷致力于在核心设备研发与关键链条节点上实施自主突破, 力图通过补齐短板、强化优势、拓展延伸产业链条, 显著增强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影响力^[27]。鉴于单一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存在天然局限性, 这些企业采取了更为明智的策略——在行业内部广泛建立起技术交流与合作机制, 以此作为推动开放式创新的重要途径。这种开放合作的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创新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 使创新要素的投入能够产生更为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 促进了民营企业加强产业链协同和资源整合。通过与上下游企业的紧密合作, 民营企业能够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构建高效协同的产业链生态体系。这种协同合作不仅能够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和风险, 还能够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和发展。通过搭建跨企业、跨领域的协同创新平台, 民营企业不仅能够有效降低研发成本, 还能加速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 共同应对市场变化带来的挑战。此外, 依托创新型产业集群的辐射作用, 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竞争力的新产品应运而生, 新业态、新模式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为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民营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 民营企业能够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管理, 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28]。

四、破解“内卷式”竞争视角下新质生产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构想

在企业“内卷式”竞争的背景下,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一些挑战。新质生产力作为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动力, 其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践路径值得深入探讨。创新驱动是核心, 为民营企业提供持续发展动力; 制度保障是基石, 确保市场竞争公平有序; 产业升级是方向, 引领企业向

高端智能化迈进；资本赋能是助力，为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人才支撑是根本，奠定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人才基础。

（一）创新驱动：从“初级模仿”到“自主原创”

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关键在于深植“创新”之根，这不仅局限于硬科技领域的突破，更涵盖了软价值层面的创新。硬科技创新，如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与应用，能够显著提升产品或服务的性能与质量，打破传统以低价、低质、低成本为竞争焦点的旧有模式。软价值创新，则侧重于商业模式、管理理念、品牌文化等方面的革新，它强调的是在满足消费者深层次需求的同时，构建难以复制的独特竞争优势。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创新驱动已成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实现从“模仿”到“原创”的跨越，不仅是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也是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29]。模仿虽能快速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初期发展，但长期依赖会导致创新能力缺失，陷入低附加值陷阱。原创技术和产品能够为企业带来独特的竞争优势，避免陷入同质化竞争和价格战，提升市场地位和盈利能力。原创性研发能够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高端化，增加产品附加值，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高品质、个性化需求，拓展市场空间。通过创新驱动，民营企业可以引领产业升级，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业链环节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环节攀升，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因此，民营企业需主动求变，将目光投向原创性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激发内部创新活力。通过有效政府和有为市场相结合，政府提供长期可持续的外部支持，扮演好引导者和支持者的角色，优化创新生态，提供政策扶持、资金补助、税收优惠等措施，降低企业创新风险与成本；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鼓励企业敢于创新、乐于创新。从“模仿”到“原创”的转变，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创新驱动不仅能够提升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还能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30]。

（二）制度保障：从“局部构建”到“系统完善”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高质量发展对于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为了确保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显得尤为重要。为此，要加快制度建设，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近年来，我国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修订，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更会将民营经济法治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为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31]。目前，关于新质生产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需从立法完善、执法公正和司法保护三个方面入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法律支持体系。首先，立法完善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律基石。应加快制定和完善与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明确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为其创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律环境。明确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为民营企业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增强其发展信心。执法公正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保障。应建立健全公正、高效、透明的执法体系，确保法律法规得到严格执行，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要完善执法监督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司法保护是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强后盾。应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权益救济机制, 确保民营企业在遇到纠纷时能够获得及时、公正、有效的司法救济。要提高法官对商业案件的审理能力, 确保案件得到公正处理。要完善执行机制, 加大执行力度, 确保判决结果得到有效执行, 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32]。

（三）产业升级：从“低端竞争”到“高端制造”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激发民营企业向高端智能化发展的关键驱动力。破解民营经济的“内卷式”竞争, 需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实现从低端竞争到高端制造的产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强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推动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要求充分利用新兴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民营经济在推动产业链高端化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民营企业通常更加灵活, 能够迅速响应市场变化,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进行生产。同时, 民营企业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能够不断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例如, 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 民营企业通过引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等先进设备, 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 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推动了产业链向高端化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推动产业集聚和协同创新生态的形成。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等手段, 企业能够形成紧密的产业链合作关系, 共同推动产业的升级和发展。民营经济在加快产业集聚和形成协同创新生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民营企业通常更加注重市场导向和灵活应变, 能够迅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要鼓励民营企业之间通过合作与交流形成协同创新生态, 实现产业内的良性竞争和共同进步, 共同推动产业的发展和升级。以长江首城宜宾为例, 当地民营经济在晶硅光伏、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医药等产业领域形成了紧密的产业生态圈, 通过合作共赢、资源共享, 提高了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要支持行业进行并购重组, 畅通市场退出机制。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 支持龙头企业对问题企业并购重组, 提高行业集中度, 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改善供求关系, 防止“内卷式”竞争^[34]。

（四）资本赋能：从“短期获利”到“长期主义”

耐心资本指以长期价值创造为目标, 对风险具有较高容忍度, 能够跨越经济周期波动, 通过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资源赋能和生态协同共建, 助力企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资本形态。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优化资本结构成为促进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策略之一。通过精细管理企业资产与负债的比例, 合理配置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 不仅能够降低财务风险, 还能有效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 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财务基础。发展耐心资本, 强调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理念, 鼓励投资者以更加稳健和长远的眼光看待企业成长, 为民营企业提供稳定而持续的资金支持, 助力其跨越成长周期中的各种挑战。推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 是激发市场活力、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这要求我们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 积极探索产融结合的新模式, 如产业投资基金、供应链金融等, 使金融资源更精准地对接实体经济的需求, 特别是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绿色经济等领域的支持力度。金融服务创新同样不可或缺, 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 开发适应民营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如快速贷款审批、定制化风险管理方案等, 以科技赋能金融, 降低融资成本, 提高服务效率。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有助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避免企业在低水平重复建设中消耗资源, 鼓励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 引导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培育新质

生产力，如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能够为民营经济开辟新的增长点，推动其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社会整体效益的提升^[35]。

（五）人才支撑：从“低成本劳动力”到“高素质人才”

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民营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从低成本劳动力向高素质人才的转变是关键。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强调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核心作用。这一转变不仅要求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更需要构建一支具备创新思维和战略视野的高素质人才队伍。首先，高素质人才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他们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创新能力，能够有效利用新技术、新工具，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民营经济中，这类人才能够引领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企业向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方向发展。其次，高素质人才能够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他们通过优化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组合方式，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绿色化和高效化。在民营经济中，这类人才能够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技术改造，提升产业链韧性，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最后，高素质人才还能够促进民营经济的创新发展。他们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战略眼光，能够发现新的市场需求和商业机会，推动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和业态。在民营经济中，这类人才能够引领企业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因此，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加强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加强人才培养，要通过教育体系改革和职业培训，提升人才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要积极引进海内外优秀人才，为民营企业注入新鲜血液。要持续推动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培养服务新兴产业、面向未来的新时代人才，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基础。

五、结语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我国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创新促进、就业增加和民生改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内卷式”竞争的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涉及市场、制度和企业等多个方面，导致资源浪费、创新受阻和利润下降，严重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有力支撑。技术革命性突破成为重塑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模式的关键，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引入助力企业转型升级。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优化了资源配置，降低了成本，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在实践层面，新质生产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于创新驱动、制度保障、产业升级、资本赋能和人才支撑。创新驱动是核心，制度保障是基石，产业升级是方向，资本赋能和人才支撑则提供了重要保障，共同助力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新质生产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助于破解“内卷式”竞争，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参考文献：

- [1] 本报评论员. 紧抓关键环节完成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N]. 人民日报, 2024-12-18 (1).

徐政, 郑霖豪. 破解“内卷式”竞争视角下新质生产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理论依据与战略构想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48-58.

- [2] 周文, 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 [J]. 改革, 2023 (10): 1-13.
- [3] 高帆.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 [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3 (6): 127-145.
- [4] 徐政, 郑霖豪, 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 [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 (11): 51-58.
- [5] 黄群慧, 盛方富. 新质生产力系统: 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 [J]. 改革, 2024 (2): 15-24.
- [6] 张林, 蒲清平.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 137-148.
- [7] 蒋永穆, 张荣, 乔张媛. 新质生产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 [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9): 113-126.
- [8] 胡湘永, 廖文和.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产学研深度融合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与协同机制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 (8): 142-149.
- [9] 周文, 李雪艳. 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 (4): 84-99.
- [10] 丁守海, 徐政. 新质生产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6): 58-67.
- [11] 尹俊, 孙巾雅.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J]. 改革, 2024 (5): 45-53.
- [12] 何雨婷, 刘宗灵. 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逻辑关系、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40-50.
- [13] 侯亚, 张雯婕.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关系、支撑与实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88-100.
- [14] 迟方旭, 王志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理论的理论根源、演进脉络与经验启示 [J]. 经济问题, 2024 (5): 18-25.
- [15] 程名望, 常臻. 民营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 逻辑与对策 [J]. 应用经济学评论, 2024 (1): 51-58.
- [16] 刘伟. 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 [J]. 经济研究, 2024 (3): 4-11.
- [17] 任保平. 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逻辑 [J]. 经济研究, 2024 (3): 12-19.
- [18] 石云鸣, 姚桓. 党领导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历史脉络和学理逻辑 [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 (2): 43-54.
- [19] 周文, 张奕涵.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障碍与破解路径 [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 (2): 24-32.
- [20] 袁莉.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民营经济营商环境的优化策略 [J]. 改革, 2024 (1): 111-120.
- [21] 陈梦根, 侯园园.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变迁: 2000—2019 [J]. 经济研究, 2024 (1): 53-71.
- [22] 徐政, 吴晓亮, 郑霖豪. 民营经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困境与路径 [J]. 当代经济管理, 2024 (4): 37-46.
- [23] 罗永宽, 杨娇.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 [J]. 上海经济研究, 2023 (12): 5-15.
- [24] 朱安东, 张宏博. 科学认识当前我国产能过剩 [J]. 上海经济研究, 2023 (12): 25-36+62.
- [25] 沈坤荣, 程果. 以全面深化改革塑造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 [J]. 经济学家, 2024 (10): 34-43.
- [26] 徐政, 郑霖豪, 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 优势条件、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 12-22.

- [27] 江静, 张冰瑶. 解构与转型: 中国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J]. 学术月刊, 2022 (12): 59-70.
- [28] 盛朝迅. 从产业政策到产业链政策: “链时代”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J]. 改革, 2022 (2): 22-35.
- [29] 徐朝阳, 白艳, 王韡. 要素市场化改革与供需结构错配 [J]. 经济研究, 2020 (2): 20-35.
- [30] 张莹, 王磊. 地方政府干预与中国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兼论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 [J]. 宏观经济研究, 2015 (10): 102-110.
- [31] 陈云良. 民营经济专门立法的理据、定位及体系表达 [J].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3): 247-260+288.
- [32] 任晓猛, 钱滔, 潘士远, 等. 新时代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问题、思路与举措 [J]. 管理世界, 2022 (8): 40-54.
- [33] 林昌华. 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战略导向探究 [J]. 山东社会科学, 2022 (6): 117-123.
- [34] 洪阳, 兰传春, 洪功翔.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市场规模效应研究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2 (2): 101-112.
- [35] 张菀洺, 刘迎秋. 开拓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新境界——中国民营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6): 77-97+205-206.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校对: 龚静阳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 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依据、进展与路径

陈晓仪¹ 徐梦瑶²

(1.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4;
2.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民营经济法治建设是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 其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根本依循, 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重要牵引,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目标指向。新时代以来, 我国通过法治理论创新、规范体系完善以及营商环境优化, 在民营经济法治建设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 实践场域仍存在法治效能阻滞的困境, 存在制度文本与政策执行的衔接偏差导致规范供给碎片化, 市场准入壁垒与隐形规制影响政商沟通实效等问题。《民营经济促进法》的专项立法, 将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权责明晰、程序规范的法治供给, 在制度建构、信心提振、经济治理等维度发挥积极作用。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后续实践中, 需强化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在民营经济法治建设中构建秩序稳定与创新激励的辩证统一框架, 以问题导向破解制度体系梗阻, 以系统观念推进治理范式迭代升级, 通过法治的人民性依归、开放性扩容、整体性调适与规范性提升, 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协同共进。

关键词: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促进法; 法治建设;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1; 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2-0059-12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2.006

作者简介: 陈晓仪,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徐梦瑶,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 陈晓仪, 徐梦瑶.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依据、进展与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59-70.

一、问题的提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1]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并强调改革需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实现改革和法治的统一。2025 年 2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将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坚强的保障。”^[2]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截至 2024 年 9 月底，我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达 18 086.48 万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 96.37%^[3]。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不可或缺的发展力量，其法治建设问题也备受社会关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加快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民营经济促进法》），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学界对“民营经济”概念的界定经历发展过程。在 21 世纪初，有学者将其简单等同于非公有制经济^[4]；有学者将国有经济以外的各种所有制经济视为民营经济^[5]；也有学者结合所有制形式与经营方式进行界定^[6]，并提出狭义与广义民营经济的区分^[7]。本文认为，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都属于非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民营经济的概念范畴更为广阔，私营经济属于民营经济的一部分，随着历史背景和社会观念的转变，民营经济概念被广泛使用。民营企业属于非公有制企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及的“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相关内容均围绕民营企业展开，故本文对民营企业的探讨内蕴于对“民营经济”概念及其发展实践的分析之中。民营经济法治建设，指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与监督，以及法治理念的培育，推动民营经济在公平、有序的法治轨道上动态发展的过程。

学界对“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研究涵盖宏观政策、企业治理、立法、司法、执法监督、营商环境和政商关系等领域，呈现多维度、跨学科的特点。《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学界研究聚焦于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立法原则、历史进程、法治政策举措等方面。一是从法学角度探讨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基本原则。刘俊海提出地位平等、共同发展、公平竞争、互利合作、平等监管与平等保护六项核心原则^[8]；蒋悟真认为立法理念应重点面向合法权益保护、公平发展、扶持激励、规范经营等方面^[9]。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不同范畴分析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路径。耿灏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探究民营经济法治体系的演进、问题及发展方向，呼吁建设更加完善和灵活的法治环境^[10]；邓建鹏从新质生产力角度探讨制约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提出加强法治保障的具体路径^[11]；黄卫以税收政策为切入点，分析了民营经济税收优惠政策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构建税收优惠政策法治保障体系的建议^[12]。三是基于“经济-法治”关系探讨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现实困境和纾解思路。张守文^[13]、陈云良^[14]、江必新^[15]等学者强调法治能够发挥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梳理了民营经济面临的实际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总体上，既有研究多从法治体系建构的原则、历程、环境等出发，分析法治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但对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内蕴的政治经济学机理及其与经济实践的内在关系分析尚待丰富，尤其需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扩充对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社会经济结构是发展的现实基础，“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16]为其提供支持与保障。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的体现，其发展依赖市场机制，同时

陈晓仪, 徐梦瑶.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依据、进展与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59-70.

需要法治保障公正与稳定的市场秩序。本文基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 首先从基本经济制度定位、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三个方面给出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政治经济学依据; 随后分析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成效、困境和创新尝试, 呈现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发展的内在理路; 最后探讨加强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路径, 提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益思路。

二、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政治经济学依据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两个轮子”一起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明确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 为民营经济的角色定位提供了制度依循。民营经济法治建设需以法律法规为依托,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以制度创新和规则完善为其后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 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与法治建设相统一, 让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民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一)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

民营经济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具体形态, 其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回溯党和国家在经济建设上的政策演变, 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为民营经济的角色定位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中国成立初期, 党和国家为推动国民经济建设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 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 私营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限制。改革开放以来, 民营经济开始出现并逐步得到承认, 党和国家也陆续提出一系列重要论断, 如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17], “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8], “坚持平等保护物权, 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19]等。1995年, 党和国家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0]; 1999年, 宪法修正案确立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1]; 2004年, “私有财产不受侵犯”^[22]入宪。这些政策和法律的调整, 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发展, 也表明党和国家通过根本大法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基本经济制度之外的“补充”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之内的“构成”, 这为我们从政治和法律的意义把握民营经济的角色地位提供了重要依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 “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 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23], 强调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24]。在此基础上, “鼓励社会投资 39 条”“促进民间投资 26 条”“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 29 条”等具体政策陆续出台, 这反映出党和国家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方面的统筹把握和持续投入。2017年, 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从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上升为国家基本制度; 2019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 将民营经济发展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 由此反映出民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互相补充、民营企业与公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的关系。上述政策演进意味着民营经济的规范化发展要求, 同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完善需要之间具有一致性。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实际的必然选择；民营经济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所有制的结构形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又赋予民营经济独特的制度意义，决定其发展必须与国家经济政策保持一致，并接受制度和法律的规约。

（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市场平稳运行及其作用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强有力的法律体系保障，亦即离不开法治建设。“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2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决定的经济关系内蕴于既有的法治建设之中，而法治的发展完善能够相应地促进经济关系发展。这要求法治建设不能脱离社会中人的现实需要和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实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26]，其高水平发展要求高质量的法治建设。在我国，法治建设不仅是规范经济主体行为的工具，而且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环境、保障民营企业活动始终沿着正确轨道运行的重要手段。“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27]，国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实质上是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出发，在遵循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通过法治手段调适市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与民营经济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内在矛盾，由此成为凸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的重要一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为民营经济法治建设提供坚实基础。其一，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通过深化经济机制体制改革，“从立法完善、执法公正和司法保护三个方面入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法律支持体系”^[28]，有利于从制度、政策、法律层面保障民营企业平等权利，在更广泛领域、更深层次上对民营企业做到一视同仁。其二，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经济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有利于打破市场壁垒，提升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激发创新动力，推动其在更加稳定、公平、透明、规范的市场环境中发展。其三，提高法治建设实施效果。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有利于优化政府职能配置，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严格市场监管，推动市场主体行为规范化，并增强对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保护。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强化法治对市场机制的规范与约束作用，健全和完善民营经济相关法律法规，使民营企业既“放得活”又“管得住”^[29]，迸发出强大生机和活力。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筑牢法治保障的重要内容

作为经济发展与结构优化的驱动力，改革与法治构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保障。前者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后者确保制度运行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其总体目标聚焦于“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9]⁴的战略部署。在此框架下，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核心在于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这一建设进程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高民营经济现代化治理水平亟需加强法治建设。改革进程的深入推进必然要求制度体系的系统性完善与治理结构的创新性重构，而法治建设则通过制度化

的法律确认, 为改革成果提供稳定性保障。历史经验表明, 改革与法治具有辩证统一关系, 改革进程的深化必然要求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发生相应变革。审视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 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审批程序冗杂、政策执行弹性化等阻滞因素的出现, 不仅制约了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 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运行。在此现实语境下, 法治建设在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竞争秩序层面的重要性愈益凸显。

在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等新兴业态加速替代传统经济模式的转型期, 民营经济的资本扩张呈现出二重性: 既驱动生产力创新发展, 又潜藏加剧社会分化的风险。例如, 部分平台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整合, 迅速积累了资本, 但同时存在通过技术垄断、算法操控和数据滥用等不当行为或进行无序扩张的情况。这要求民营企业重视法治建设, 在激发市场活力与维护社会秩序间寻求动态平衡。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既需要市场竞争提供的创新活力, 也离不开法治建设提供的制度秩序。在这个意义上, 将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纳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 使其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协同推进, 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现实进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 民营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 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 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法治建设作出了一系列工作安排和重要部署, 推动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同时, 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下, 民营经济法治建设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当前, 党和国家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 为全面强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提供了重要指向。

(一) 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成效

我国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 其历史性成就主要体现在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理论创新、法治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等方面。

首先, 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理论开创新境界。改革开放初期, 民营经济因其法律地位不明晰而受到诸多讨论与争议。然而,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民营经济逐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地位与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全国两会、民营企业座谈会等重要场合以及在各地考察调研时, 多次围绕加强民营经济工作作出重要论述, 包括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建立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秩序、依法平等保护产权和民营企业家人身与财产安全等多个方面。这些论述不仅为民营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为民营经济法治建设注入了理论支持。同时, 学术界对民营经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其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思考, 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民营经济的内在规律, 明确其法治建设的方向和重点。

其次, 保障民营经济的法治体系逐步形成。在法治保障层面, 党和国家通过顶层设计统筹推进民营经济法治建设进程, 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基础, 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等行政法规为支撑, 以《中小企业促进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专门法律为配套的制度性框架。其中,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通过负面清单制度明确政府

权责边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着力破解账款拖欠顽疾,共同构筑起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法治保障体系。值得关注的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已进入立法审议程序,标志着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向法治化、体系化迈进。在地方实践维度,一些地方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制定差异化实施方案。如深圳通过《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2023—2025 年)》探索商事纠纷速裁机制,江苏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推进“放管服”改革标准化,《浙江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创新“链长制”产业协同模式,辽宁通过专项政策破解东北地区民营经济结构性矛盾。这些政策聚焦准入壁垒破除、融资渠道拓展、公平竞争维护、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领域,形成“中央立法+地方细则”的多层次法治供给格局,有效回应了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中的法治诉求。

最后,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近年来,我国积极发挥各级工商联的桥梁纽带作用,提升法律服务机制,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不断加快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步伐。其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强化对政商关系的规范和监督。通过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严格实施反不正当竞争的相关法律,构建起清晰、透明的政商互动机制,促进政府的角色从单一的管理者转变为市场的公正裁判者,有力确保市场竞争的有序性和透明度,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其二,各级工商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重要抓手,以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平等保护产权为关键,深化与公检法司机关的联系协作机制”^[30],大力推动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自 2019 年起,全国工商联已连续举办五届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峰会,打造出社会普遍关注、企业积极参与、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品牌工程,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服务保障。其三,建设更加透明、公正、专业的法律服务机制,推动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对接,帮助企业妥善处理法律纠纷,有效化解过去企业面临的法律不确定性和风险问题,为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筑牢了法治防线。其四,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的财产权。尤其是司法机关加大对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保护力度,例如,“最高法院重审纠正了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增强了民营企业对完善法治环境的信心”^[31],有力推动了法治化营商环境和法治民企建设的协同发展。

(二) 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衔接偏差”与“隐性壁垒”

当前,我国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强化法治保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政策话语与实践场域的衔接效能仍需提升,法治保障机制的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既有政策与法律的“衔接偏差”导致规范供给的碎片化,影响民营经济创新活力。法律具有稳定性和强制性,一经制定和公布,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修改或废止;而政策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时效性,可能随社会发展和形势变化而改变。当前,民营经济的理论创新成果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层面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这些成果在法律层面尚未完全得到充分体现,“部分理论创新成果和政策革新在转化为具体法律法规和法治实践的过程中尚存在一定的差距”^[12]。例如,关于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市场准入平等、产权保护、融资渠道等方面的理论尚未系统性地转化为具体法律条文。同时,党和国家出台的许多有利于民营企业的政策往往更多体现在行政措施和文件中,在法律法规层面缺乏明确的规定和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政策和法律之间的“衔接偏差”。由于现有法律法规未能及时跟上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一些新业态处于监管真空或模糊地带,针对民营企业家的网络谣言、名誉侵权、虚假不实信息时有发生。民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多依

托具有迟滞性、碎片化特征的规章制度。此外, 人才和资源短缺、融资困难以及“数据要素权属不清、定价不明、交易中介服务机构不足”^[32]等问题, 也严重制约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其次, 不合理的限制政策和隐性壁垒影响政商沟通效果。近年来, 尽管诸多政策旨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 但在部分地区或行业, 法治建设仍显滞后。例如, 在产权保护领域, 部分地方对民营企业的产权纠纷解决不及时、程序不透明; 在市场准入方面, 尽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推行在制度层面为民营企业进入更多领域创造了条件, 但在实践中, 仍存在变相审批等行为影响民营企业享受优质、高效的政府服务, “有不少民营企业反映, 一些地方在市场准入、项目招标投标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了不合理的限制和隐性壁垒”^[33]。这些隐性壁垒和不合理的限制政策, 一方面来源于法律适用的模糊性, 即部分法律条文和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较大解释空间, 缺乏明确的指导原则; 另一方面来源于地方在政商互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和行政干预过多的问题。部分地方政策执行的不规范和实际治理过程的不透明, 不仅会降低政策的执行效率, 也会影响民营经济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此外, 就法治文化建设而言, 部分民营企业家的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尚待加强。受法律服务成本高、法治宣传教育不到位、社会认知差异、企业对法律的依赖性和契约精神的理解不足等因素影响, 部分民营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存在漏洞, 法务部门未能发挥实际作用, 缺乏有效的法律风险防控机制, 且在知识产权保护、合规经营、合同管理和争议处理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而且, 部分民营企业家“存在自身法律素质不高、经营中无视法律甚至违反法律、参与非法竞争、以假冒伪劣产品和服务损害消费者权益等问题”^[34], 此类问题不仅影响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也对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平造成了冲击。

(三) 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创新尝试与现实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 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35]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 推动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 以法治建设增强民营经济发展预期, 回应民营经济面临的质疑和挑战, 让民营经济领域真正实现有法可依, 成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制定是对我国现有经济立法体系的重要补充。2023年7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聚焦7个方面推出31条重大政策举措, 回应民营经济的关切和问题, 强调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2024年10月10日,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年12月21日, 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民营经济促进法》作为我国首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 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关于民营经济的方针政策和有效举措上升为法律规范, 将填补中国民营经济领域专门立法的空白。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颁布将是提振发展信心的有力举措。《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一次在法律中明确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能够利用法律公信力对社会形成积极影响, 有效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2018年11月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批驳澄清了“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等错误言论, 深入剖析了民营经济遇到的市场、融资、转型的问题, 强调打破投资准入

和金融政策方面的“卷帘门”、阻滞民营企业了解新规新政的“玻璃门”、管理服务和审批流程上的“旋转门”。这些不平等对待的隐性壁垒严重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阻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尽管国家大政方针已明确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但社会上仍不时出现对民营经济地位的错误议论，甚至借民营经济的问题否定和怀疑改革方向。《民营经济促进法》聚焦民营企业的核心关切，通过针对性的法律条款设计，从法律层面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促进“两个健康”等原则，明确民营经济的定义、性质、范围、地位与作用，回应了民营企业“产权保护不足”“市场准入不平等”“营商环境不稳定”“创新动力不足”“融资难、融资贵”“税收负担过重”“劳资矛盾加剧”“国际化竞争压力”等方面的疑虑和担忧，有利于减轻民营企业家的思想负担，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强大信心。

未来，《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施将有助于完善国家经济治理，激发民营企业活力。《民营经济促进法》以明确的法律条款，在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一方面可以为民营企业提供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会，对于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构建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可以明确民营企业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加强对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的依法治理，加大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有利于规范引导民营企业依法经营、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履行社会责任，真正实现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民营经济促进法》将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举措法律化，有利于确立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增强民营企业家的法治意识，消除社会对民营经济的偏见，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更加包容、宽松的社会氛围，让民营企业家在合法合规的框架下大胆发展、放心发展。

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加强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路径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迈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强民营经济法治建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推动民营经济法治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党在民营经济法治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在此基础上，应秉持守正创新的理念，坚持问题导向，运用系统观念与辩证思维统筹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各项工作，不断提升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人民性、开放性、整体性和规范性，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蓬勃发展。

（一）以坚持党的领导彰显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人民性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最大政治优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发挥着关键作用。党的领导有助于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推动各级政府提升资本治理的能力。同时，这种领导机制可确保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始终与国家改革发展的大局保持一致，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党对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领导，一方面要体现在顶层设计和政策推动层面，党要领导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和颁布《民营经济促进法》，确保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要落实在各项法律制度的具体实施与执行过程中，党和国家要尽快建立健全配套的立法、执法、监督机制，使民营企业在法治框架下得

以保护产权、保障权益、优化布局、整合资源。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为了人民而改革, 改革才有意义; 依靠人民而改革, 改革才有动力”^[36]。这揭示出人民群众是改革的初心、使命和不竭动力。民营经济是数以亿计劳动者实现就业、改善生活、追求幸福的坚实依托。加强民营经济法治建设, 不仅是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需要, 更是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热切向往的必然选择。在推进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过程中,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 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始终, 确保法治建设围绕人民群众的利益展开, 引导民营企业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 更加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以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进而让民营经济在法治的护航下, 成为增益人民福祉的重要力量。

(二) 以守正创新的原则增强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开放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37]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这些理念生动诠释了守正创新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原则。

新时代, 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如融资成本过高、技术和人才资源短缺、数字经济带来的法律风险等问题。对此, 要立足新的历史条件, 坚守正确发展方向, 将法治建设贯穿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 建立健全动态法律调整机制。加强民营经济法治建设, 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 紧跟时代步伐, 顺应实践发展, 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和现有体制框架的束缚, 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态度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 积极探索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同时, 应进一步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与民营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广泛听取民营企业的意见和建议, 紧密围绕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 全面审视法治建设中的问题与挑战, 推动民营经济领域的理论创新积极融入法律条款及法治实践中。此外, 鉴于我国不同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的差异, 地方政府需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的特点,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探索适合本地发展的法治创新模式, 确保相关法律法规既具有普遍适用性, 又能体现地方特色, 有效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并通过区域法治协同, 实现优势互补, 增强法治建设的开放性, 切实推动民营经济法治建设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三) 以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凸显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整体性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曾深刻指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8] 问题导向强调直面矛盾和挑战, 立足于现实世界解决实际问题。在推动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过程中, 一方面, 要精准识别当前法律体系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和瓶颈, 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例如, 法律保障的相对滞后性、部分领域法律适用的模糊性, 以及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执行法律时的选择性, 都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必须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和加强执法监督予以解决。另一方面, “坚持问题导向要求在开拓创新中探求思路和解决问题”^[39]。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崛起, 民营经济所处的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其发展也面临着新特征与新挑战。传统的法律框架和政策体系在应对这些新兴领域的法律问题时, 逐渐显现出局限性, 无法完全满足民营经济发展的新需求。因此, 民营经济法治建

设应具备前瞻性和灵活性，不断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及时识别并有效解决这些新兴领域中出现的法律问题。

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基础上，还需运用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注重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整体性及同其他领域建设的协调性。具体而言，民营经济法治建设不仅关乎企业的法律需求，还涉及法律法规的调整完善、政府政策的引导支持、市场机制的优化健全以及社会各方力量的协同配合。在推进民营经济法治建设时，必须充分考虑各个层面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从宏观政策制定、法律制度构建、执行机制优化以及社会文化培育等多个维度进行统筹规划与布局，确保政策、法律和执行措施的内在一致性。同时，全面深化改革本质上是一项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系统性变革。民营经济法治建设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紧密结合、形成合力，始终服务于国家整体改革战略。

（四）以辩证思维提升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规范性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是法治体系建设的四个关键环节，它们彼此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制衡，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推进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辩证思维，统筹协调各个环节，注重法治精神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的有效运用。

其一，在立法层面，应根据新形势的变化，聚焦特定领域开展法治创新，及时修订和完善涉及民营经济的法律法规，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通过健全的法律规范体系，为国家治理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提供明确的法律解决方案，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二，在执法层面，各级政府必须坚持依法行政，明确行政执法权限，提升执法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要将法律的权威性与实践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解决法律实施中的隐性障碍和企业自身的法治意识不足等问题，确保法律在地方层面的有效实施。其三，在司法层面，应依法审慎处理涉及民营企业的案件，积极探索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确保涉民营企业纠纷能够得到公正、及时的解决，加大司法机关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增强民营企业对法治的信任和信心，保障民营经济活动在法治框架内有序开展。其四，在守法层面，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育，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推动社会各界对法治的认同与信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坚持诚信守法经营，树立正确价值观和道德观，以实际行动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2]。在后续的法治建设实践中，必须营造全社会尊重企业家、企业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使法治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石和动力。总体而言，民营经济法治建设需要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主体的共同参与，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有机衔接和协同推进，全面提升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规范性，形成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五、结语

加强法治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鲜明特征及实践路向之一^[40]。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通过法治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撑。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在民营经济法治建设上展现出显著

陈晓仪, 徐梦瑶.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依据、进展与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59-70.

的制度优势。我国民营经济法治建设虽起步较晚,但在改革中逐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强调政府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而且重视法律、政策与市场之间的有机协调。当前,我国正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从制度和法律层面保障民营经济的平等地位,不断加大法律的执行力度,坚决抵制任何污蔑或抹黑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错误言论,为民营经济营造了更加公平、透明、规范的法律环境。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形态,承担着推动国家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任务。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更需依托法治化营商环境实现有序健康发展。对此,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守正创新、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以辩证思维推进民营经济法治建设,不断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11.
- [2] 习近平在民营经济座谈会上强调 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李强丁薛祥出席 王沪宁主持 [N]. 人民日报, 2025-02-18 (1).
- [3] 我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超 1.8 亿户 (新数据 新看点) [N]. 人民日报, 2024-11-10 (1).
- [4] 冯秀慧. 论民营经济的内涵与外延 [J]. 广东社会科学, 2003 (3): 153-155.
- [5] 宋醒民. 关于民营经济的定位问题 [J]. 当代财经, 2001 (3): 3-7.
- [6] 阳小华. 民营经济内涵问题探析 [J]. 江汉论坛, 2000 (5): 38-40.
- [7] 黄孟复.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No.1 (2003)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
- [8] 刘俊海. 论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六项核心原则 [J]. 法治研究, 2025 (1): 59-76.
- [9] 蒋悟真. 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理念及其制度实现 [J]. 东方法学, 2024 (6): 28-40.
- [10] 耿灏.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民营经济法治体系的历史演进、现实审视与未来展望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6): 130-147.
- [11] 邓建鹏, 李铨瑜. 民营经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法治保障路径 [J]. 求是, 2025 (1): 1-11.
- [12] 黄卫. 民营经济税收优惠的法治保障及其体系化建构 [J]. 探索与争鸣, 2024 (12): 171-179+227.
- [13] 张守文. 论在法治轨道上推动经济发展 [J]. 法学论坛, 2024 (3): 18-29.
- [14] 陈云良, 朱文辉. 民营经济发展的四大现实问题及其法治纾解 [J]. 探索与争鸣, 2024 (12): 162-170+227.
- [15] 江必新, 曹梦娇. 论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及其法治保障 [J].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3): 261-270.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91.
- [17]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38.
- [18]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24.
- [19]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25.
- [20]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19.
-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57.
-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64.
- [2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259.

- [2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2.
-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03.
- [26]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129.
- [27] 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大事记 (1921 年 7 月—2021 年 7 月)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2022: 305.
- [28] 徐政, 郑霖豪. 破解“内卷式”竞争视角下新质生产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理论依据与战略构想 [J/OL].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1-10 [2025-03-0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215.C.20250103.1650.002.html>.
- [29]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4-07-22 (1).
- [30] 傅春荣. 聚合法治力量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N]. 中华工商时报, 2023-08-02 (1).
- [31] 郭朝先, 石博涵. 内外兼修: 新时代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策略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2): 63-71.
- [32] 张钟文. 推动数字经济与民营企业深度融合 激发发展新动能 [N]. 经济参考报, 2024-11-07 (2).
- [33]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这场发布会信息量很大! [EB/OL]. (2023-07-20) [2025-01-23].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7/content_6893298.htm.
- [34] 董少平, 李锡青. 加快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法治保障 [EB/OL]. (2023-08-22) [2025-02-20].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08/t20230822_5680537.shtml.
- [35] 习近平. 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 [J]. 求是, 2023 (4): 4-9.
- [36]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工作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38.
- [37]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4-10-30 (1).
-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40.
- [39] 陈晓仪. 中国共产党关于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演进与经验启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5): 62-78.
- [40] 何伟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鲜明特征及实践路向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14 [2025-03-20].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50304.1920.002>.

责任编辑: 卢媛 校对: 王京菁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 逻辑、历史与经验

潘智璇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组成部分、经济奇迹缔造的重要参与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我们党历来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 在认识上不断深化、战略上不断完善、实践上不断丰富。党领导的民营经济法治建设蕴含着理论认识、实践演进和文化价值三重逻辑。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课题, 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历程呈现阶段性特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立足于战时需要, 在政治统领下初步开展法治实践;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法治发展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市场经济为逻辑的法治体系逐步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强调以系统治理全面提升法治效能。新时代推动民营经济法治高质量发展, 一要坚持守正创新, 推动理论创新、政策革新转化为法治实践; 二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筑牢平等公正的法治生命线; 三要坚持在改革创新中完善民营经济法治体系, 凸显民营经济法治科学性、前瞻性和系统性。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 既是民营经济政策方针的法治化表达, 又彰显了民营经济法治建设与经济改革的有机统一, 标志着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进入系统集成与协同高效的新阶段。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促进法; 法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2-0071-11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2.007

作者简介: 潘智璇,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文明意蕴及其世界意义研究”(24CKS037)

引用格式: 潘智璇.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逻辑、历史与经验[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2): 71-81.

一、问题的提出

2022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1]。2023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强调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加速了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落地进程。2024 年 2 月，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同组织召开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座谈会，会议强调要加快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2]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作为 2025 年经济工作部署重点，提出“高质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3]。2025 年 2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长春市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指出，“要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4]。2025 年 2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5]。这些重要论述和部署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营经济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支持，为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动力。从“两个大局”看，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制定既是大国博弈中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现实需要。

在不同历史时期，民营经济概念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营经济多使用“民族工商业”“私人工商业”表述，表明民营经济作为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地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民营经济多表述为“私营企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意在区分公私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形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营经济包含于“非公有制经济”“非公企业”之中，虽不再强调公和私的对立，但民营经济专属提法仍在酝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对民营经济的认识和把握进入新的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民营企业的提法首次正式进入中央文件，此后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提法在各种文件中频繁出现。

目前，学界对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议题的探讨主要有四种范式。一是聚焦于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历程，总结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有学者将新中国成立后民营经济法治发展划分为创建时期、蛰伏时期和复兴时期，围绕调整手段、立法目的、规制对象来概括民营经济法治演进的特点^[6]。有学者分别从宪法、行政法和经济法层面系统探讨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成就^[7]。还有学者着眼于改革开放后的民营经济法治概念嬗变，分析政策和法律的共演关系^[8]。二是从政策视角探索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内在机制和外部环境，回顾党在不同时期对民营经济的理论认识、政治态度以及政策重心，阐明新时代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政治依据。有学者认为党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从限制利用到鼓励支持的过程^[9]。有学者梳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个阶段党制定

出台的一系列兼具理论创新和实践价值的民营经济政策^[10], 探讨民营经济政策的变化^[11]。还有学者从改革开放后关于民营经济的理论争论切入, 阐发理论与政策的相互作用^[12]。三是结合全面深化改革、培育新质生产力等论题, 剖析当下推进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必要性。有学者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 指出确立和完善民营经济法律框架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13]。有学者结合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需要, 从民营经济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角度, 明确构建民营经济法治体系的必要性^[14]。有学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出发, 阐明完善民营经济法治体系是民营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要求^[15]。还有学者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视角论述了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法治举措^[16]。四是从法理视角讨论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法律地位和立法理念, 并对其进一步完善提出意见。有学者认为民营经济促进法是民营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 其制定必须坚持平等和自由的立法原则^[17]。有学者指出作为促进类企业立法的总则性和统领性立法文件, 市场主体平等原则构成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逻辑起点^[18]。有学者从地位平等、共同发展、公平竞争、互利合作、平等监管与平等保护六个方面, 阐述作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根本大法的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核心原则^[19]。有学者围绕统合和衔接宪法内容^[20], 完善立法原则^[21]、立法目的和立法概念^[22]等方面, 给出民营经济立法的建议。

可见, 学界对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研究多从梳理党对民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展开, 缺少对民营经济法治发展的系统分析; 或聚焦于对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法理结构探索, 忽视对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政治逻辑和制度基础的考察。具体说来, 第一种范式具有时期性特征, 将我国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起点定位在新中国成立前后, 缺少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发展的讨论, 没有形成完整连续的研究视角。第二种范式表现为明显的政治性, 以对党关于民营经济的政策梳理代替对其法治建设的分析, 忽略从具体的法治实践来认识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机制和规律。第三种范式具有较强的现实导向性, 但是缺少对不同时期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具体情况的历史溯源。第四种范式基于法学研究的视域, 缺乏对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多学科视角讨论。因此, 本文基于不同历史时期民营经济法治实践, 系统考察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和演进特征, 进而回应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现实课题。

二、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蕴含的逻辑机理

不同时期党奋斗的目标和任务构成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历史依据, 是对具体时代课题、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的反映, 在根本、全局和决定性意义上影响民营经济法治顶层设计。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蕴含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文化逻辑, 勾勒出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进程的历史图景。

(一) 理论逻辑: 党对民营经济理论认识的演进

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进程既是党破除传统认识偏差推动思想解放的结果, 也是党在理论创新基础上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党的民营经济理论包含所有制理论、资本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

党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认识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改革开放前, 党的所有制理论既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构想, 又受到列宁和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形成的

所有制理论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现“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列宁认为直接过渡在苏联行不通，“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23]。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确立了单一公有制结构形式。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党强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改革开放后党对所有制问题认识在两方面实现重大突破：一是将生产力水平置于所有制形态之上，打破所有制作为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唯一经济指标；二是超越社会主义是公有制、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的简单认识，确立起“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形式，民营经济存在有其重要性已成社会共识。

资本兼具文明性和野蛮性，它有利于生产力、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及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4]，但如果使用不当，资本也会造成劳动被剥削和异化。党对资本双面性的侧重态度反映于资本理论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注重利用私人资本发展经济生产，一方面将资本发展和国计民生结合，另一方面推行“节制资本”，对私人资本加以限制。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和苏联模式影响，党主张消灭资本，消除资本在生产领域的剥削关系。改革开放后，党重新审视资本的文明性，破除将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误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党鼓励、支持和引导不同形态的资本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提出规范和引导资本有序发展，科学有效利用资本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

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从计划经济“补充”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飞跃。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陈云进一步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此时党虽承认市场经济客观存在，但仍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1992年，邓小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大论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二）实践逻辑：民营经济政策法制化过程

“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治。”^[25] 民营经济政策法制化过程，是党将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上升为法治成果的进程。一方面，民营经济政策主导民营经济法治走向，党的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立法。无论何种位阶和形式的民营经济律法，均要体现党的政策精神。党的民营经济政策导向影响对民营经济的执法和司法工作。同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政策一致，党强调树立平等服务的执法理念，强化司法监督和纠错工作。此外民营经济政策是对民营经济法治的补充。法律制定往往有滞后性，政策能在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尚未完善之时，回应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同时民营经济的政策试点也能够为法治建设提供经验，是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实践依据。

另一方面，民营经济法治对民营经济政策具有保障和规范意义。一是“如果不将政策成果及时上升为法律，也不利于政策的施行与推广”^[26]。民营经济法律的制定以法律形式把对民营经济平等对待、平等保护的要求落实下来，有利于保证民营经济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二是法律具有更加广泛的民意基础和普遍约束力，不仅能够避免随意性和盲目性，还能够规定政治权力在民营经济运行的范围和程序，规避权力滥用现象。“自下而上的需求引发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是中国进行历次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基本逻辑。”^[27] 党领导推动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对于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潘智璇.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逻辑、历史与经验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71-81.

兴,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治文化的价值取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治思想智慧, 是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文化土壤。第一, 党强调对民营经济治理坚持德治与法治并重。“德主刑辅”是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 既崇尚规范人们思想的道德礼法, 又辅之刑法惩戒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把法治中国建设好, 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28]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重视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 通过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思想引导, 推动法律价值转化为民营企业家的道德标准, 充分发挥民营经济治理中德治与法治的合力效应。

第二, 党坚持民营经济法治的人民中心立场。“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 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29]党将人民利益贯穿于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全过程, 是对“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等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创新。在立法环节, 党协调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 在广泛征求各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 领导制定维护、保障和发展人民利益的民营经济律法。在司法环节, 党通过拓宽诉讼渠道、简化诉讼程序, 以及审判程序公开透明的法治建设, 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和司法惠民的宗旨。

第三, 党推进民营经济“良法”建设。“良法”主要包含两大特质: 一是“法不阿贵, 绳不挠曲”的公平性。民营经济法治建设注重加强对行政人员的职能权限规定, 健全和完善监督机制, 以维护法治权威。二是“观时而制法, 因事而制礼”的时代性。“法律的范围一方面应该是一个完备而整全的整体, 另一方面它又需要继续不断地作出新的法律规定。”^[30]当前基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要求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施与完善。

三、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进程与特征

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历程是其逻辑机理在现实层面的展开, 兼具理论创新、政策革新和实践突破三重维度, 呈现出阶段性、渐进性和适应性的特征。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统领下的法治实践初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以思想斗争为内驱动力, 以政策调适为现实路径, 民营经济法治精神蕴含在保护扶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布告、纲领、决议、条例和办法之中。这一时期民营经济法治兼具律法实用性和法治形式灵活性的特征, 既是发挥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功能, 为革命战争提供物资支援和资金支持的重要保障, 也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支持、发展统一战线的前提条件。

党成立之初和大革命时期, 民营经济法规的空白反映出党早期对民营经济的理论认识尚处探索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党对民族资本主义认识逐渐摆脱“左”倾思想影响, 借助布告、决议、条例等多种形式, 以保障物资供应为重点, 在中央苏区形成民营经济法治实践雏形。1928年《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规定“城市商人、积铢累寸, 只要服从, 余皆不论”^[31]。1931年中共湘鄂赣省委明确规定保护商人合理利益, 指出政府应该奖励适应群众需要的私人生产。1931年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 规定政府“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32]。这

些带有法律性质的政策，规范了政府对私人工商业的职权界限，是党早期对民营经济法治的有益探索。1932年苏区中央政府颁布的《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提出私人工商业要“向当地苏维埃政府登记，取得营业证”^[33]，以条例形式规定私人工商业的注册程序，体现出党对民营经济政策重点从“是否允许存在”到“如何规范管理”的法治化转向。

抗日战争时期，党因地制宜颁行了保护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文件，不同边区根据战争形势制定差异化政策和律法，反映出党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地领导民营经济法治的原则。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宪法纲领与专项法规统一的立法架构。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及“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34]，为民族工商业提供制度保障。1942年颁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实业放款简章》，有效解决资金短缺制约私人工商业发展的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针对城市工作中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现象，党以立废结合方式对私人资本主义地位和作用予以法律规定。1948年毛泽东在《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中，提出“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35]。1949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36]，确立起政策、纲领和法律三位一体的过渡期法治依据，形成了新中国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基本框架。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政策主导法治的发展模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制定了少量针对民营经济的法律条例作为政策的补充工具，服务于阶段性政治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艰巨任务，在经济领域注重探索和发挥民营经济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党对私人资本主义态度表现出允许与限制并存、发展和约束并举的二重性。《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实行办法》，均为调整民营经济关系的专门律法。这些法律承认民营经济合法性，但法律数量较少、位阶较低。具体到律法用语看，对民营经济人士使用“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等表述，对民营经济组织多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私营企业”等表述，这体现出对民营经济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的区分。

1953年后，党对民营经济的态度出现短暂曲折。1954年《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原则和方法、合营企业的形式和架构等作出规定，逐步取消资本家对企业控制权。从法律性质看，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主要切断私营企业同市场联系，但并未改变资本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公私合营重塑了企业组织形式，使企业生产过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赎买政策实质是国家向合营企业的私股股东购买股权，兼具法律民事性和行政性。私营企业全民所有制实现后，党根据形势发展提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37]，但未能付诸实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民营经济的法治发展，反映出复杂历史条件下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艰难探索过程，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法治实践提供了历史镜鉴与重要经验。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市场逻辑导向的法治体系建构

“私营（民营）经济再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开放政策的结果。”^[38]改革开放后，党逐步破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的理论认识，实践上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营经济的政治目标与法治功能趋于统一。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要求，党以市场经济作为法治建设的逻辑导向，推动民营经济法治体系的多层次建构和系统性完善，形成以法律为

潘智璇.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逻辑、历史与经验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71-81.

主、政策保障的民营经济法治格局。这一时期党逐步确立起民营经济的制度保障，以法治实践路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为提升新时代民营经济法治效能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民营经济法治结构形成宪法、行政法和经济法的多层次架构。从改革开放后宪法及其修正案演变来看，民营经济法律地位经历从社会主义经济“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八二宪法”承认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补充地位。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3款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进一步明确了民营经济法律地位。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款将私营经济确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赋予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此后2004年宪法修正案提出“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承认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作用。行政法层面，从强调政府对民营经济监管转变为保护促进民营经济发展。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构建了当时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本法制体系。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从规范对民营企业的行政处罚行为、防止行政人员滥用职权方面，拓展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经济法层面，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民营企业的设立、运行和清算进行了详细规定，注重对民营企业的科创扶持、海外市场开拓的引导，顺应了新科技革命和接轨国际贸易的时代需求。

另一方面，党对民营经济发展权、竞争权的基本权利予以法律保障。党的十五大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从放宽市场准入、参与市场竞争方面，对民营经济平等发展权作出规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未禁入的公共事业领域，强调民营企业在土地使用和税收等方面享受与其他企业同等待遇。破除体制障碍，规制行政垄断是保护民营经济竞争权的主要方向。从1980年《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到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对象逐步具体化，在明确主管机关及其法律责任基础上，增加反对行政歧视、行政限定购买行为的内容，将民营经济竞争权上升为法律保护对象，全方位保障民营经济主体的基本权利。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系统治理下法治效能的全面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领导已从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转变为“顶层设计”，推动民营经济法治体系向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方向全面发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兴起，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产生转型需求，要求调整优化经济结构。顺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党注重对民营经济法治的系统性治理，不断优化民营经济法律供给，并且强调民营经济法治运行过程的协同效应，使民营经济法治建设与时代发展、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成熟的标志，也彰显出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能力和水平的显著提升。

第一，党从立废改全方位统筹领导民营经济立法工作。从立新法来看，2019年颁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对市场环境优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作出规定，旨在解决民营经济纠纷多元化危机。2020年颁布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强调包括民营经济在内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充分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利。就废旧法而言，最高法开展司法解释全面清

理工作，废止针对民营经济的不平等司法解释、针对民营经济的不合理条文，消除或减少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阻碍。此外，党领导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以下简称《中小企业促进法》），增设“权益保护”专章，从财税支持、融资促进方面保障中小企业发展；通过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加大对民营经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改”的方式推动民营经济立法。

第二，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导向呈现全视角特征。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立意更加深远，既强调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又兼顾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与社会治理全局。民营经济法治建设视野拓展，从注重保障民营经济的整体权益，到关注中小微企业发展权利，市场主体内涵持续拓宽，主体权益保护体系不断完善。民营经济法治德法并重，不仅关注民营企业发展，也强调民营企业家的思想教育。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专门指出“引导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创业创新、服务社会”^[39]。

第三，党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全过程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注重法治运行的协同性。在立法阶段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既从立废改全方位推动民营经济法治完善，又以促进型专门立法方式为民营经济提供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在执法环节，民营经济法治以反对地方保护和所有制歧视为重点，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在司法阶段，既针对民营企业刑事“挂案”开展专项清理，健全冤错案件纠错机制，又对侵害民营企业权益的犯罪行为依法惩治。在守法环节，民营经济法治建设注重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要求其自觉守好依法经营的底线，引导民营企业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四、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新时代推动民营经济法治高质量发展，一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理论创新、政策革新转化为法治实践；二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筑牢平等公正的法治生命线；三要坚持在改革创新中完善民营经济法治体系，凸显民营经济法治科学性、前瞻性和系统性。

（一）坚持守正创新：推动理论创新、政策革新转化为法治实践

坚持党对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根本领导是“守正”根基，必须贯穿于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全过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40]党的领导使民营经济法治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国家发展战略相协调，有利于凝聚各方共识，形成法治建设合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护和促进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利是“守正”核心。民营经济法治建设要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主要目标。坚持平等公正正是“守正”关键。平等法律地位是开展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前提，也是给予民营企业家信心、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的基本条件。

理论突破、政策革新和法治演进的有机互动是促进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内驱动力。法律能够将科学理论与行之有效的政策固定下来，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制度支撑。民营经济法治发展不仅是对理论突破和政策革新的回应，也是对二者的进一步巩固和保障。在理论创新方面，既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深化对民营经济的理论认识，又要深入探索民营经济理论，对重要问题予以学理阐释，

以多学科交叉视角拓展民营经济理论研究广度。在理论创新转化为法治实践的环节, 不仅要关注政策的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还要调研民营经济政策落实情况, 及时总结那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将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形成制度性安排。

（二）全面深化改革：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41] 构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关键要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的重要关系, 民营经济促进法正是有效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成果。

第一, 相关政府部门要建立负面清单, 明确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条件, 增强其进入的可预测性; 要在依法执政的基础上加大对民营经济知识产权、创新成果的保护力度, 严厉打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 破除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垄断问题, 推动形成公平、透明和高效的市场法治环境。第二, 服务型政府强调优化政务服务, 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线上平台等技术手段, 探索高效法治服务模式, 减少非必要行政流程。第三, 强化民营经济法治实施中的监督和问责。加强对执法过程的监督问责, 防范“远洋捕捞”式异地执法行为。相关部门要对执法行为开展督查,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开展。完善执法反馈机制, 及时发现和纠正非法执法行为, 对相关公职人员依法问责。同时, 在民营经济司法环节加强监督问责。通过自下而上的多层级监督体系, 对已办结案件定期开展质量评查, 发现整改问题案件。司法问责环节要明确规定问责情形和标准, 建立公开、透明的问责程序和司法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三）全面依法治国：构建高水平民营经济法治体系

全面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依托, 推动民营经济法治发展的系统化和时代化是建设高水平民营经济法治体系的重要路径。

系统性的民营经济法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 需要处理好不同律法之间的关系, 注重法治建设各环节的有效配合。首先在制定民营经济新法律法规时, 要使新法律的目的和原则同已有法律的精神保持一致, 注重新旧法律的衔接。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 要使之与《民法典》契合, 细化对民营经济主体的权利规定; 要与《中小企业促进法》配合, 从宏观层面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法治保护; 还要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协同, 健全执法和司法环节的监督问责机制。其次在加强民营经济立法基础上, 推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各环节统一。政府不断提升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水平, 扮演好市场经济服务角色是推动高水平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关键。在全民守法环节, 政府要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为抓手, 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政商沟通机制, 了解民营企业家的法治诉求; 要面向民营企业定期开展普法工作, 提升民营企业家法治素养。

时代性的民营经济法治建设要求推动民营经济法治的改革创新。第一, 坚持问题意识是克服民营经济发展困境、回应时代关切的原则。数字经济时代要适时增加促进保护数字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条款。针对数据资源开发使用、数字技术创新研发、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等问题, 民营经济促进法计划制定相关新规, 旨在保障民营企业的数据权益。第二, 构建法治动态调整机制, 为法律实施预留空间。民营经济发展是不断变动的过程, 其法治建设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出台前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进行修改调整, 并且设有弹性规定。

五、结语

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基础性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制定蕴含深刻的政治逻辑：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坚持党对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根本领导，贯彻党关于民营经济的理论认识、政策精神，并将其转化为法治成果。民营经济促进法制定既是民营经济政策方针的法治化表达，又彰显了民营经济法治建设与经济改革的有机统一，顺应了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高质量转型的迫切要求，标志着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进入系统集成与协同高效的新阶段。其制定既有利于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投资融资提供有效支撑，也增强了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抗风险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蕴含着严密的法治性特征，多次强调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民营经济发展^[42]。新时代以来，我国民营经济规模实力、创新水平、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未来，继续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要从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历史中汲取经验，将党关于民营经济的理论创新和政策革新转化为法治实践，处理好政策和法律的动态平衡关系。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建设主线、保障民营经济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厘清政府监管与市场规律的边界、推动民营经济法治体系的系统化时代化，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参考文献：

- [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2-12-17 (1).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4-07-22 (1).
- [3]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4-12-13 (1).
- [4] 习近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 深入落实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蔡奇出席汇报会 [N]. 人民日报, 2025-02-09 (1).
- [5] 习近平在民营经济座谈会上强调 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李强丁薛祥出席 王沪宁主持 [N]. 人民日报, 2025-02-18 (1).
- [6] 陈柳裕. 建国以来民营经济法制的发展进程及其演变轨迹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06 (2): 11-17.
- [7] 叶英波. 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制演进和立法探思 [J]. 人大研究, 2019 (10): 24-29.
- [8] 唐晨.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法律概念嬗变与立法表达 [J]. 社会科学论坛, 2023 (1): 162-172.
- [9] 郭伦德. 中国共产党的民营经济政策发展历程研究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3): 50-61.
- [10] 刘凝霜, 程霖. 中国共产党民营经济政策演变及其理论创新: 1921—2021 [J]. 改革, 2021 (1): 36-49.
- [11] 石云鸣, 姚桓. 党领导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历史脉络和学理逻辑 [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 (2): 43-54.
- [12] 洪功翔.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理论争论 [J]. 当代经济研究, 2020 (6): 24-31+113.
- [13] 朱卿元, 葛扬.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J].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4): 134-144.
- [14] 周文, 李雪艳.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 关联机理与互动路径 [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4 (2): 1-10.
- [15] 耿灏.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民营经济法治体系的历史演进、现实审视与未来展望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潘智璇.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营经济法治建设的逻辑、历史与经验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71-81.

- 学报, 2024 (6): 130-147.
- [16] 杨新铭.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J]. 学习与探索, 2019 (11): 89-96.
- [17] 王轶.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原则 [J].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3): 240-246+287-288.
- [18] 李建伟. 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实质平等理念的立法表达 [J]. 法治研究, 2025 (1): 33-45.
- [19] 刘俊海. 论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六项核心原则 [J]. 法治研究, 2025 (1): 59-76.
- [20] 陈云良, 朱文辉. 民营经济促进法制定的宪法基础 [J].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6): 44-55+155-156.
- [21] 牛文杰, 姚轩鸽. 民营经济立法的逻辑基础与完善趋向——兼评《民营经济促进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 [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1): 128-139.
- [22] 赵树文.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建构——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J]. 学术论坛, 2024 (6): 1-20.
- [23]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40.
-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27.
- [25] 列宁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754.
- [26] 陈云良. 民营经济专门立法的理据、定位及体系表达 [J].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3): 247-260+288.
- [27] 王久高.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与核心经验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8 (3): 30-36+76.
- [28] 本书编写组. 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成就: 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980.
- [2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115.
- [30]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M]. 范扬, 张企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225.
- [31] 毛泽东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52.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8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717.
- [33] 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 (土地革命时期): 下 [M]. 杭州: 浙江新华印刷厂, 1978: 753.
-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18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43.
-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25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85.
-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26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54.
- [37] 张玉瑜. 过渡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2: 217-218.
- [38] 张厚义, 明立志. 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 (1978—1998)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22.
- [3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
-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27.
-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778.
- [42] 何伟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鲜明特征及实践路向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14 [2025-03-20].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50304.1920.002>.

责任编辑: 卢媛 校对: 王京菁



数字文明新范式： DeepSeek 开源创新的生态建构

许丹荔^{1, 2} 王炳涵¹

(1. 石河子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00;
2. 西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9)

摘要: DeepSeek 的开源创新实践, 不仅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迎来新的前景, 也意味着人类在数字文明时代进入新的阶段。DeepSeek 构建的开源创新生态结构, 从知识共享、技术扩散、产业赋能及创新治理四个维度带来了裂变效应。DeepSeek 的开源创新实践既推动了技术创新模式的变革, 也开创了人类数字文明发展的新形态与新路向, 为全球数字文明演进提供兼顾创新发展、开放安全及绿色可持续的中国方案。DeepSeek 的成功实践表明, 数字文明正经历从“技术霸权”走向“生态共治”、从“人类中心”升维至“生命共同体”的深刻转型; 真正的数字文明不在于算力的无限扩张, 而在于技术能否成为照亮生命价值的明灯, 能否让人类在数字星辰大海的征途中始终葆有对自然的敬畏、对差异的包容、对文明的传承, 这也正是数字文明新范式最宝贵的价值密钥。

关键词: 数字文明; 开源创新; DeepSeek; 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TP18;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2-0082-12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2.008

作者简介: 许丹荔, 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炳涵,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兵团高校讲好兵团故事叙事教学体系研究”(BTSZ2022120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据智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网络具象化传播研究”(24YB01)

引用格式: 许丹荔, 王炳涵. 数字文明新范式: DeepSeek 开源创新的生态建构 [J]. 统一战线学
研究, 2025 (2): 82-93.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推进, 人工智能已然成为全球数字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驱动力。同时,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体现着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更新迭代, 更是预示着人类在自我认知程度、社会关系结构以及技术文明构建上的形塑与再造。然而, 全球范围内的人工智能发展格局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性。自 GPT-3 问世以来, OpenAI、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通过封闭模式的技术垄断, 在人工智能领域形成了近乎绝对的市场垄断地位。

2025 年初, DeepSeek 以开源创新的方式异军突起, 成为打破西方技术垄断的重要力量。1 月 27 日, DeepSeek 在全球主要应用市场的下载量超过 ChatGPT。据彭博社报道, DeepSeek 的 AI 助手在 140 个市场中成为下载量最多的移动应用。Appfigures 数据显示, DeepSeek 的推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成为 App Store 免费应用榜首, 并创造了史上最快突破日活跃用户 3 000 万大关的纪录。令世界 AI 界吃惊的是, DeepSeek-V3 的训练仅用 2 个月, 花费 557.6 万美元, 而美国的 ChatGPT-4 训练成本约为 1 亿美元, 训练时间长达 6 个多月^[1]。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 AI, DeepSeek 以较低成本实现了领先性能, 不仅展现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能力, 掀翻了“更强模型必须更高算力、更高成本”的“刻板印象”, 更为全球 AI 技术的普惠发展提供了全新路径。

近年来, 关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越发受到学界青睐。其中, 对数字文明新范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其一, 部分学者集中讨论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 前沿技术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2], 以及颠覆性技术开发与应用背景下开辟的新赛道^[3]。其二, 部分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聚焦科技创新与提升国际整体实力^[4], 探讨技术“卡脖子”攻关与颠覆性创新应用的破壁动力^[5], 关注数据对生成式 AI 的“打底”功能^[6], 以促进数智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7]。其三, 部分学者着眼于研究现实中存在的伦理逻辑冲突^[8]、数据价值创造与使用风险^[9], 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自主”实施的行为^[10]甚至信任危机、偏见和歧视等方面问题^[11], 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意见。这些研究内容与前沿话题为理解数字文明开源创新的生态建构提供了重要启示。但是, 将数字技术革命简化为生产力的线性提升, 忽视了生产关系调整对技术发展路径的塑造作用, 并且学界过分关注技术伦理的讨论, 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人工智能治理适应性的实证分析。鉴于此, 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以 DeepSeek 创新生态为研究对象, 构建“生成—扩散—价值”三维分析框架, 揭示数字文明新形态构建中内蕴的中国方案。

二、生成机理: DeepSeek 开源创新生态的建构逻辑

DeepSeek 以开源思维挑战 AI 行业的一些传统路径, 展现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巨大潜力。它不仅可以免费使用, 而且是开源的^[12], 是 AI 发展轨迹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转折点。作为一项成功的开源创新生态系统, 其迅速崛起和广泛影响绝非偶然, 它背后深藏着技术、社会、政策和全球化资源配置等多方面原因。

（一）技术垄断引发的结构性困境

中国 AI 产业面临美国技术封锁的“卡脖子”压力及国内公众期待与技术落地现实的落差^[13]。这种技术垄断现象已超越了资源分配的简单范畴，成为影响生产关系变革的关键障碍。其核心机制在于通过技术壁垒、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规模经济等策略，限制其他企业进入市场或发展竞争性替代技术。

在数字时代，科学技术发展与迭代速率加快、行业整合与集中程度提高，极少数的企业、企业联盟及财阀占据高市场份额并操作市场价格，通过专利壁垒和技术封锁拒绝授权或设置高额许可费，限制技术传播从而独占关键核心技术^[14]，造成了技术垄断的结构性困境。在认知维度上，技术创新受研发压制与标准控制等影响呈现同质化特征。当 OpenAI、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主导全球 AI 技术的发展时，其他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被局限于这些头部企业的认知边界之内，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的想象空间与可能性也被严重压缩。在经济维度上，创新资源的不平等配置加剧了全球创新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科技巨头通过控制关键资源并设置行业标准，既限制竞争对手获取资源，又迫使其遵循唯一技术路线；另一方面，通过控制供应链衔接，利用标准制定权，阻碍新技术的推广甚至影响整个行业的生产和研发。如此，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全球技术创新的圈层之外，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主体几乎被边缘化。

技术垄断是阻碍社会化生产发展的生产关系结构。就科技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在维护技术霸权主义地位的同时，既限制了自身创新研发的可能性，更阻碍了人类社会整体科技发展与创新潜能的充分释放。就科技相对滞后的国家而言，割裂与边缘化的风险也意味着自主创新能力与原始创新活力的充分激发。DeepSeek 的出现，体现了结构性矛盾在中国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具体实践与变革，标志着全球技术创新生态系统范式的根本转变。

（二）新型举国体制创新的内生驱动力

制度创新已成为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目的在于解决现行科技创新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面对全球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所遭遇的技术垄断、创新资源的过度集中以及创新主体的单一化等问题与挑战，传统技术路线难以实现根本性突破与发展。尤其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技术创新模式由于过度依赖科技巨头导致创新资源配置不均衡、技术创新路径同质化，其边界效应和收益递减趋势越发凸显。

2022 年，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指出新型举国体制之“新”，在于在科技自立自强和国际科技合作辩证统一的条件下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15]。新型举国体制是攻关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16]，能够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更好激发创新活力。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既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牢牢掌握创新主动权和发展主动权、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需要。首先，新型举国体制实现了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和资源调配，优化科技创新的布局 and 结构，确保有限的资源能够集中到最需要、最有潜力的领域，加速关键技术的突破，提高科技创新的整体效率。其次，新型举国体制打破了传

统线性创新研发模式, 鼓励跨部门、跨领域协同创新, 构建了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创新生态系统。这种良性模式推动科技资源向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最后, 新型举国体制通过重大科技项目和平台建设, 培养和聚集高水平科技人才, 既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大的人才驱动力, 也为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提供强大的市场驱动力。DeepSeek 的出现, 既彰显了我国科技创新研发实力, 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三）开源与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现实

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从其研发到应用, 所涉及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呈现指数型增长态势。然而, 科技巨头对技术创新资源的全面垄断, 导致了技术创新的进入壁垒持续提升, 研发创新成本居高不下, 限制了技术创新的多元可能性。DeepSeek 模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不仅完全开源, 其开发团队还将整个研发历程详尽记录, 撰写成学术论文并公开发表。这打破了高性能模型价格昂贵且闭源的僵局, 甚至成为首个开源且性能可媲美 OpenAI o1 的大语言模型。相比之下, 一直标榜非营利、推崇开放共享理念的 OpenAI, 却从未达到如此深度的开源水平。英伟达资深研究员 Jim Fan 对此评论道: “我们正身处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一家非美国公司正在延续 OpenAI 最初使命——通过真正开放的前沿研究赋能全人类。” 他也称赞 DeepSeek-R1 为“真正开放、赋能所有人的前沿研究”^[17]。

快速发展的 AI 技术必须是开放、包容、合乎道德和安全的^[18]。DeepSeek 团队将 AI 开发成本从“烧钱黑洞”变成“可控投资”, 一方面实现了自主 PTX 计算架构与跨平台加速引擎的关键技术突破, 形成多阶段渐进式蒸馏与参数动态冻结等核心技术发展; 另一方面升级创新模式, 重谋战略布局。DeepSeek 的开源策略不是简单的代码公开, 而是深度的、完全的、真正的开放, 这是打破科技巨头技术壁垒的可行尝试。DeepSeek 以“免费模型+增值服务”商业闭环设计实现开发者共创计划, 通过行业联盟共建共享平台打好持久的“开源生态战”。从创新普惠的角度看, 开源模式有助于降低研发成本、加速技术更新迭代速率、促进区域协作与知识共享, 从而缩小全球技术发展的结构性差距。其自研架构模型直接挑战了“算力霸权”, 在中文理解准确率方面更展现出碾压西方大模型的优势。DeepSeek 在细分领域取得的突破, 表明当今中国已超越简单的跟随与复制阶段, 真正的创新者不会被任何封锁所禁锢。

用算法创新瓦解硬件霸权, 用开源生态打破技术垄断, 用规模效应降低成本预期, 是科技进步趋势。DeepSeek 的问世是对 AI 工业体系的解构与重建, 也是应对全球科技创新系统结构性矛盾的大胆尝试。它的崛起预示着中国在全球 AI 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打破了美国在该领域的主导格局。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在 AI 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也将为全球 AI 技术的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四）多元算力资源协同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 加速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共享^[19]。为满足技术创新需求,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乘数效应并合理调配资源配置模式, 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要素流动范式。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面对计算量和数据量指数级的增长趋势, 如何高效地利用现有的算力资源、优化数据的流动性, 成为推动数字文明新形态的又一关键因素。

进入数字时代, 算力已成为新质生产力, 多元算力的集约化发展演化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的重要指标。数据作为算力算法的支撑要素, 封闭、静态的技术资源管理方

式将严重限制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社会价值释放。随着大模型等人工智能产业与应用崛起，对算力算法的资源需求愈发旺盛。我国从技术、管理、政策和生态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规划，通过成立数据中心与云计算平台、增强边缘计算与分布式处理能力、提供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建设、实施绿色计算与可持续发展等措施，为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打造动态开放的生态系统奠定重要物质基础。

DeepSeek 作为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过程中里程碑式的成果，证明了促进多元算力资源协同发展、增强算力与数据算法的融合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多种资源优势得到充分调配与使用，整体计算效率和性能得以提升。多元算力支持高效的数据流动和处理，能够加速大规模数据集的传输和分析，实现实时数据处理和分析，提升响应速度和准确性；另一方面，多元算力推动新型算法满足复杂需求，促进技术进步和知识传播。多元算力支持复杂算法的训练和优化，通过融合不同计算资源的特点，推动新型算法的研发和创新，促进跨领域应用，进而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满足多样化应用需求。多元算力与数据算法融合创新促进科研机构、企业和开发者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吸引全球开发者参与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和知识传播，加速技术研发进程。高效的数据流动和算力支持，也将有利于加速 AI 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落地和推广。

三、扩散机制：DeepSeek 开源创新生态的裂变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担起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 数字文明基于生产方式深刻变革和数字时代现实需要的作用机制形成，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一种全新文明范式。DeepSeek 开源创新生态系统的裂变效应所展现出的社会技术变革特征，不仅体现了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更体现了技术扩散范式的创新突破、产业结构的系统重构以及治理模式的革新。DeepSeek 通过其独特的开源创新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裂变效应，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文明新形态。

（一）知识共享：从封闭垄断到开放协同的范式重构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DeepSeek 以其最新的开源 AI 模型震惊了国际科技界^[21]。传统技术创新体系以专利制度为核心，形成知识产权的排他性壁垒，加剧了技术垄断与社会分化。DeepSeek 通过开源协议体系与知识生产机制的双重革新，解构了封闭式创新的制度基础。

其一，打造了分层开放的知识共享架构。DeepSeek 采纳了模块化的开源策略，将技术生态系统细分为基础层、中间层和应用层。基础层（例如 DeepSeek-R1 算法架构）完全遵循 DeepSeek Public License 2.0 协议进行开源，确保全球开发者能够自由地访问、修改和进行二次开发；中间层（例如分布式训练工具链）则通过贡献者协议要求对代码进行改进回馈给社区；应用层（例如特定行业的插件）则旨在鼓励商业化的创新。这种层次化的架构设计将知识资源按照不同层次进行组织，极大地提高知识获取效率，通过开放的知识共享平台增强了知识的可扩展性，在确保知识高质量和可靠性的同时增强了知识管理的灵活性，为提升社会整体效益开创了新的发展图景。

其二，应用了知识生产的民主化机制。DeepSeek 依托开源社区构建了去中心化的知识生产网络，通过 GitHub、Gitee 等平台汇聚全球开发者，形成“提交—评审—集成”的协作流程。以自然语言

处理领域为例, 社区成员贡献的多语言语料库优化模块与低资源语言训练方案被纳入核心代码库, 使模型支持语言种类增加。DeepSeek 使用的思维链模式通过模拟人类推理过程, 使模型决策过程更加透明^[22]。这打破了传统研发中“中心化决策”的局限, 有利于充分汲取不同背景参与者的多样化观点, 尤其增强了公众参与度, 促进知识多样性汇聚与知识使用质量整体性提高, 实现了技术创新路线社群共识驱动的理想化模式。

其三, 推动了知识产权的社会化再分配。知识产权分配是指将知识产权的权利、义务和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划分。合理的知识产权分配能够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已有的知识产权分配策略主要包括: 专利权与使用权分离、共有专利权、技术成果从研发方到使用方的技术转移。DeepSeek 通过技术收益共享计划, 将商业应用产生的部分利润反哺开源社区。例如, 电商平台基于模型开发的智能客服系统, 每年将部分销售额注入社区基金, 用于支持边缘地区开发者的技术培训与硬件捐赠。这种将私有资本转化为公共创新资源的方式, 重构了知识产权的价值循环逻辑。

(二) 技术扩散: 开发者社群的“雪崩效应”与网络协同

如果一个开源大模型有足够多的人参与, 那么就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得到发展^[23]。技术扩散理论强调新技术、新想法或新产品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特定的人群或社会系统中传播并被接受的过程, 而技术扩散的效率取决于生态系统的网络效应与协同能力。DeepSeek 通过开发者社群培育与技术工具链优化, 形成了“技术迭代—社群扩张—场景拓展”的循环系统。

其一, 构建开发者赋能的集群生态系统。DeepSeek 公司推出的低代码开发平台与模型微调工具包, 将复杂的算法封装为可视化组件。充分激发开发者创新实践的生态系统, 通过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开源工具, 既有利于促进资源共享与云服务效果, 也将带动更多开发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增强创新开放性与扩展性。例如, 全球知名开源平台抱抱脸公司 (Hugging Face) 等多个团队已经宣布复现 DeepSeek-R1 的训练过程^[24]。

其二, 激活社群的网络协同效应。随着网络社群成员数量增加和互动深化, 社群整体价值的创造将呈指数级增长, 从而增大资源和知识共享的可能性, 提升成员之间的互动频率和质量, 实现网络社群效应的正反馈循环。例如, 英伟达、ADM、微软以及百度智能云、腾讯云等国内外多家科技领先企业竞相宣布接入 DeepSeek, 彰显了全球科技圈对中国大模型技术实力的认可^[25]。

其三, 实现场景应用中技术扩散的指数级增长。DeepSeek 的崛起得益于技术落地的沃土, 包括提供算力补贴、百亿级应用场景等条件。DeepSeek 依托分布式技术节点, 将开源算法模型分发至全球各地, 促进了各行各业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升级更新。每个技术节点都成为一个独立的创新中心, 根据具体需求进行算法微调与优化, 进而加速了技术应用本土化与个性化的进程。这种分布式创新模式不仅扩大了技术的覆盖范围, 还增强了技术的适应性和实用性, 使得 DeepSeek 开源创新生态的影响力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

(三) 产业赋能: 垂直领域应用场景的涌现式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6] 数字技术可提供内部呈叠加聚合的关系^[27]。DeepSeek 带来的产业赋能并非简单的技术移植, 而是通过技术基座标准化与场景插件动态化的结合, 为技术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促进传统产业生态转型与垂直场景的涌现式发展。

其一，构建通用技术基座与领域知识库的耦合体系。DeepSeek 通过基础技术设施搭配行业数据库提升技术应用的精准性与多样性，加速技术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推动跨领域创新研发，增强技术应用与知识利用的普适性。开源社区有评论指出，在颠覆性技术面前，闭源并不能形成长期壁垒，DeepSeek-R1 证明了大模型可能真的没有“护城河”。这意味着，任何企业或开发者都能更轻松地打造高质量的 AI 应用，中国团队将在擅长的应用层面实现爆发式创新。可以预见，借助 DeepSeek 用较低成本快速构建并迭代产品，抢先占据全球市场，中国企业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其二，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生态耦合。DeepSeek 通过开放接口标准与数据互操作协议等形式，促进技术创新和资源共享，加强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合作，推动全产业链的革新与发展。一方面，开源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技术共享和协作，促进技术接口的标准化，实现生态互补，降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对接成本，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开源不仅意味着资源共享，也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去中心化发展。技术风险和成本被分散到整个生态系统中，增强产业生态系统韧性，确保长期健康发展。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共享电池性能数据，联合开发出“电池健康度预测模型”，通过数据共享提升了电池故障预警准确率，实现了上下游企业“竞争—合作”的动态平衡。

其三，催化边缘创新主体的崛起。边缘创新主体通常指处于传统中心之外的中小企业、初创公司、个人开发者或非主流创新者。DeepSeek 的支持和赋能能够为这些主体提供资源、工具和机会，帮助他们在创新生态中脱颖而出。DeepSeek 通过长尾场景扶持计划，降低边缘创新主体的创新研发门槛，以完全开放的平台赋能生态合作，促进边缘创新主体获取资金、技术和市场资源。例如，纺织企业可以发布指令，利用 DeepSeek 的图像识别工具，开发出“面料瑕疵检测仪”，以小投入实现产线自动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

（四）创新治理：多元主体开放协同和可持续发展机制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明确提出，坚持“可控可信、公平普惠”原则，并将“技术向善”作为人工智能领域未来发展的价值导向。DeepSeek 通过“开放平台+社区协作+智能工具+生态融合”的四维架构，构建了一个动态生长、自我演进的知识共建共享环境。其核心在于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将知识生产从封闭的“企业中心化”转变为开放的“社区网络化”，通过技术赋能让每个参与者既是知识消费者也是知识生产者，最终实现技术生态的指数级价值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其一，多元主体开放协同打破技术约束。DeepSeek 通过开放技术生态的方式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将有助于打破传统技术壁垒，促进多方协作，释放创新潜力。有学者指出，人类社会不能以人机关系遮蔽人际关系，不能让智能机器判断代替人类价值判断，不能让机器数据和算法共识代替人类理解和交往共识^[28]。DeepSeek 将核心技术开源，提供开放的 API 和 SDK，支持第三方开发者快速集成和扩展功能，并建立开放的开发者社区，吸引来自不同行业的开发者、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共同参与技术开发，推动技术与产业应用的深度融合。在模型训练阶段，DeepSeek 引入公平性损失函数，通过算法自动检测并修正性别、种族等偏见。例如，在招聘场景中，系统对“女性”“高龄”等敏感词的权重调整使简历筛选的公平性指数得到提升，将抽象价值转化为可量化的技术参数。

其二，构建社区驱动的知识共建共享环境。DeepSeek 通过社区驱动构建的知识共建共享环境，

许丹荔, 王炳涵. 数字文明新范式: DeepSeek 开源创新的生态建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82-93.

是一个融合开放协作、激励机制、技术工具等的体系,旨在提升社区成员的参与度和知识价值。一方面,DeepSeek 通过众包协作模式将复杂技术问题拆解为可协作的小任务,借助贡献积分系统实现知识变现;另一方面,动态知识迭代不仅使社区成员可随时提交技术迭代建议,并且通过专家评审团与草根创新的协同,在确保技术文档准确性和权威性的同时,形成“自下而上”的知识补充结构。例如,DeepSeek 发布新 AI 框架时,社区成员协作翻译多语言文档并补充现实案例,使文档覆盖到从理论到落地的全流程。

其三,建立数据安全保障机制。DeepSeek 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技术与管理措施保障数据安全,综合“技术防御+管理闭环+隐私增强+生态协作”的四维安全结构,确保用户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构建了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防护网络。这种体系不仅满足合规要求,更通过技术创新(如联邦学习、同态加密)在数据利用与安全之间实现平衡,为行业树立了数据安全的新标杆。

四、价值引导:数字文明进程中的中国智慧

作为中国本土大模型的典范,DeepSeek 的出现不仅是技术创新的成功案例,更是在全球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中展现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有力表达。DeepSeek 的开源创新实践既推动了技术创新模式的变革,也开创了人类数字文明发展的新形态与新路向。

(一) 文明形态重构:数字时代的人文价值回归

数字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全新阐释。进入数字时代,技术不仅仅作为简单的工具存在^[29],也成为塑造人与人社会关系的重要力量。DeepSeek 通过开源创新模式构建全新技术生态,表明我国在人机协同领域走出了一条区别于西方“技术至上主义”的道路,不仅内蕴着新文明形态背景下人机协同的东方哲学思想,也促进了生产资料的再分配,推动了社会生产关系向更高形态的演进。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遵循。不同于西方主流科技巨头将技术发展等同于效率提升的线性思维,DeepSeek 将技术创新置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框架之下,强调技术进步必须服务于人的发展。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非单向度的效率提升。DeepSeek 的成功实践意味着,追求技术先进性的同时更要关注技术如何更好地服务人的需要。这种以人为本的技术创新理念,克服了技术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将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紧密结合,为数字时代的人文价值回归提供了重要启示。

其次,在创新与伦理、效率与公平、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把握动态平衡。在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的复杂格局中,如何在复杂的价值维度间找到动态平衡点,是数字时代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部分中国前沿科技企业通过构建“技术向善”的防护网、编织“数字包容”的安全网、打造“和而不同”的生态网,展现出一种融合东方智慧与现代治理的平衡方法论。当西方陷入技术控制两难境地时,中国科技企业正通过东方智慧的系统转译,表明完全可以在保持创新活力的同时,织就更具韧性的数字文明之网。这种平衡艺术正是破解“技术—社会”复杂方程的中国密码。

最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转化为数字时代的治理方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传统技术伦理往往将伦理约束视为技术

发展的规范体系，而 DeepSeek 通过构建开源创新生态，将伦理价值内化为技术创新的内在规定。例如，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优化交通流量时保留“人工调控接口”，避免完全自动化导致的系统僵化，体现“技术为用，人文为本”的平衡；在联邦学习应用中，通过“数据不动模型动”实现跨机构协作，既挖掘数据价值又保护隐私，契合“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自然伦理观。

（二）生产关系变革：数字要素的应用与转化

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要素的性质和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马克思看来，“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30]。当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人们就要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构生产关系，实现数字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已成为当前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问题。

首先，DeepSeek 的开源创新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数字时代生产要素的配置逻辑。传统模式下，数字技术创新的核心要素（如算法、数据、算力）被少数资本垄断，形成了新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开源创新模式通过打破传统封闭式开发的壁垒，重构了核心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实现了技术要素从私有壁垒到公共基础设施的转变、人才要素从雇佣关系到生态参与的转变、资本要素从集中投入到生态价值共享的转变、创新要素从线性发展到指数跃迁的转变、数据要素从孤岛垄断到可信流通的转变等，形成了以开放共享为核心的新型生产范式，催生数字生产关系的范式革命。较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创新价值通过专利垄断实现的机制，开源创新模式重塑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方式，促进更开放、协作和高效的资源配置，推动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DeepSeek 的范式创新在制度层面实现了由产权独占到治理共建的转变与突破。一方面，DeepSeek 建立了多元主体协同的创新机制，突破了传统的科层制创新模式，构建了一个开放、扁平的创新网络，打造了新型产权体系与治理机制，也充分释放了社会创新潜能。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开源社区实现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使创新活动突破了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组织边界，形成了更加开放和民主的知识生产模式，促进了新技术研发与应用阶段安全开放可持续发展态势。

最后，DeepSeek 在数字普惠领域形成了多维度、可持续的赋能模式。这不仅有利于技术可及性的提升，更深入推动了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发展机会的均等化。从技术逻辑来看，集中式架构转向分布式生态，让每个节点都能成为价值创造者；从经济模式来看，零和博弈转向共生增值，促进了数据流通，创造了指数级收益。DeepSeek 的问世正在重塑信息时代的文明基线，当牧区的学生可以通过 AI 教师学习知识，当农民用手机管理着智慧大棚，当程序员在开源社区贡献代码，它所呈现的不仅是技术扩散的表象，也是一个更加平等、开放、包容的数字文明新范式。

（三）文明交往范式：全球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

在大国竞争加剧的国际背景下，实现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有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31]。DeepSeek 催生的“数字不结盟运动”雏形^[32]，体现了中国在数字时代对全球治理模式的创新性探索，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提供了文明交往的新范式。

首先，DeepSeek 所倡导的开源创新模式，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数字领域的具体体现。一方面，这一模式以“技术赋能、包容发展、安全可控、多元共治”为核心逻辑，既植根于中国数字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又回应了全球数字治理的共性挑战，为破解当前全球数字治理的“碎片化困境”

许丹荔, 王炳涵. 数字文明新范式: DeepSeek 开源创新的生态建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82-93.

提供了系统性思路。另一方面, DeepSeek 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通过开源社区的运作机制, 构建了一个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 为全球数字治理领域提供了新的实践范式。

其次, DeepSeek 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新型数字治理架构。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前提下, 它创新基础设施、技术标准、数据应用等分层治理模型, 通过智能合约监管与算法透明度指数等动态治理工具增强治理能力与成效。此外, DeepSeek 在跨境协作模式上, 既有利于边缘创新主体对接国际资源, 拓展全球市场, 也将支持边缘创新主体将技术输出到国际市场, 提升全球竞争力。

最后, DeepSeek 的实践开创了文明对话的新模式。DeepSeek 平台通过多语种支持与文化多样性算法, 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用户能够更便捷地理解彼此, 促进了文明交流的数字化转型和价值观的跨文化融合。例如,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教授温蒂·霍尔认为, DeepSeek 的成功还让欧洲意识到, 不必只听从美国科技巨头的意见, 而是需要更多全球对话^[33]。

(四) 新型文明建设: 数字技术发展的中国样板

DeepSeek 的成功实践打破了传统环保与数字化发展的矛盾关系, 充分证明技术创新可以成为生态修复的加速器, 为数字文明新形态的生态建设提供了有效参考。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创新与生态化治理的深度融合, 探索出一条兼顾效率提升、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数字化发展新路向。这一路向不仅重塑了技术应用的伦理边界, 构建了数字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 也为数字时代的人类文明存续提供了可复制协同发展框架。

在技术架构方面, DeepSeek 创新了绿色数字基座的构建范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34]这一论断强调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 指明了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DeepSeek 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因其低成本、低能耗及开源设计^[35], 打造了以算力-能源协同优化、算法环境友好性设计、硬件循环经济模式为核心的绿色科技创新模式, 充分体现了绿色生产力是“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生产力, 为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指明了道路。

在生态治理方面, DeepSeek 提供了数字赋能的系统解决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 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 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36]DeepSeek 以数据驱动为基础、社区共治为保障建立的新型生态治理方案, 扩展了数字技术赋能的应用范围。这种绿色技术与治理理念的创新, 为传统生态环境保护与数字生态治理转型发展奠定了基础, 也为丰富治理体系内容和增强治理能力提供了鲜活样板。

在文明演进方面, DeepSeek 贡献了数字文明构建的实践力量。DeepSeek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 也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助推力量, 不仅重塑了技术发展的轨迹, 促进了人们在数字空间重建人与自然的精神连接, 也重新定义了数字时代人类社会的价值坐标。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场景变迁, 意味着技术不单单是使用的工具, 更是承载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命体。DeepSeek 的出现为人类打开了数字文明纪元的密码本, 为全球数字文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五、结语

DeepSeek 的出现将人工智能竞争引入新赛道^[33]，开创了数字文明演进的新范式，为全球数字时代开放、共享发展提供了可资镜鉴的中国方案。这也标志着数字文明正经历从“技术霸权”走向“生态共治”、从“人类中心”升维至“生命共同体”的深刻转型。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安全层面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当人们仍在数字割裂与伦理困局中徘徊时，DeepSeek 的成功实践表明，真正的数字文明不在于算力的无限扩张，而在于技术能否成为照亮生命价值的明灯，能否让人类在数字星辰大海的征途中始终葆有对自然的敬畏、对差异的包容、对文明的传承，这也正是数字文明新范式最宝贵的价值密钥。

参考文献：

- [1] 刘建明. DeepSeek 震惊世界新闻业的精准效能 [J/OL]. 新闻爱好者, 1-9 [2025-02-25]. <https://doi.org/10.16017/j.cnki.xwzh.20250219.001>.
- [2] 李晓华. 未来产业的内涵、特征、难点及进路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3): 71-80+2.
- [3] 杨颖, 方茜. 发展新质生产力: 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J]. 社会科学研究, 2024 (5): 120-128.
- [4] 何雨婷, 刘宗灵. 新质生产力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逻辑关系、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40-50.
- [5] 田天亮. 生成式 AI 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困境识别与优化路径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4 (4): 170-177.
- [6] 韩博. 生成式人工智能“物质—话语”分析路径及发展进路 [J/OL]. 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 [2025-02-12]. <http://gfagzcadd5f6184ce4461hqk9bpvqxfqok65kn.fyac.oca.swupl.edu.cn/kcms/detail/13.1027.C.20250120.1945.012.html>.
- [7] 边克冰, 关锋. 数字文明形态下的新质生产力: 理论基础、具体挑战与改革探索 [J].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11): 146-161.
- [8] 江军, 李牧翰. 人工智能金融领域应用伦理风险及其法律治理 [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5 (1): 127-136.
- [9] 王延隆. 数据要素化: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数据治理的功能、困境与变革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6): 68-76.
- [10] 聂立泽, 王祯.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数据安全保护的挑战及刑法应对 [J]. 河南社会科学, 2025 (1): 56-63.
- [11] 孙晓宇, 夏保华. 人工智能可解释性工具的困境及其消解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4 (11): 88-93+137.
- [12] DeepSeek 是中国对全球 AI 发展格局的重塑 [EB/OL]. (2025-02-19) [2025-02-2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4454970597842507&wfr=spider&for=pc>.
- [13] 郭全中, 曾婉琪, 黄昊漪. 技术突围与符号共振: 中美科技竞争语境下 DeepSeek 的整合传播研究 [J/OL]. 新闻爱好者, 1-15 [2025-02-16]. <http://gfagz304790044ec44369sqk9bpvqxfqok65kn.fyac.oca.swupl.edu.cn/10.16017/j.cnki.xwzh.20250213.002>.
- [14] 王金明, 斯建华. 数字技术跨国垄断、“卡脖子”困境与统一大市场构建 [J]. 云南社会科学, 2023 (3): 99-111.
- [15]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强调 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全面

许丹荔, 王炳涵. 数字文明新范式: DeepSeek 开源创新的生态建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82-93.

- 加强资源节约工作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2-09-07 (1).
- [16] 费艳颖, 张栩凡. 新型举国体制的科技法治图景 [J]. 中国科技论坛, 2024 (11): 30-37+60.
- [17] 张慧敏. DeepSeek-R1 是怎样炼成的? [J/OL]. 深圳大学学报 (理工版), 1-7 [2025-02-11]. <http://gflagzcadd5f6184ce4461hqk9bpvqxfqok65kn.fyac.oa.swupl.edu.cn/kcms/detail/44.1401.N.20250210.1628.002.html>.
- [18] 尚凯元, 董铭, 李达飞, 等. 巴黎 AI 峰会热议“中国成功” [N]. 环球时报, 2025-02-12 (1).
- [19] 吕晓凤. 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及其内在矛盾 [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 (12): 69-78+131.
- [20] 习近平向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 [N]. 人民日报, 2021-09-27 (1).
- [21] 高乔. 中国人工智能创新何以令海外惊叹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5-02-15 (6).
- [22] 邓建鹏, 赵治松. DeepSeek 的破局与变局: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方向 [J/OL].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 1-10 [2025-02-16].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50214.001>.
- [23] 高奇琦, 张皓森. 技术扩散基础上的整体性对齐: 大模型的开源与闭源之争 [J].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5): 84-97.
- [24] 吴晓凌. DeepSeek 有望激发新一波人工智能创新浪潮 [N]. 新华每日电讯, 2025-01-29 (3).
- [25] 宋婧. DeepSeek 搅动全球 AI 风云 [N]. 中国电子报, 2025-02-11 (1).
- [2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0.
- [27] 郭波武, 成琼文, 王梦莹. 工业互联网平台如何助力制造企业绿色转型? ——数字技术可供性视角的案例研究 [J/OL]. 研究与发展管理, 1-16 [2025-02-12]. <https://doi.org/10.13581/j.cnki.rdm.20240751>.
- [28] 曹克亮. Sora 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治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166-178.
- [29] 叶飞. 面向数字化转型的教师育人能力结构及其提升路径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 (8): 114-122.
-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0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3-44.
- [31] 沈逸, 高瑜. 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与战略稳定 [J]. 国际展望, 2024 (3): 33-50+154-155.
- [32] 令小雄. DeepSeek 开启后 ChatGPT 时代——基于数字范式革新及其运演哲思 [J/OL].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 [2025-02-12]. <http://gflagzcadd5f6184ce4461huovnxfw5nnqv6b9k.fyac.oa.swupl.edu.cn/kcms/detail/61.1352.C.20250211.1011.004.html>.
- [33] 孙铁牛. 人工智能: 法国多措并举构建竞争优势 [N]. 光明日报, 2025-02-13 (12).
- [3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N]. 人民日报, 2024-06-01 (1).
- [35] 唐霁, 刘芳. 中国人工智能在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受热议 [N]. 新华每日电讯, 2025-02-13 (1).
- [36]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概论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7.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龚静阳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 的 核心特征、价值超越及未来路向

王闻萱 王丹

(大连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6)

摘要: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对话式人工智能模型的登场, 引发了全球对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高度关注。近年来,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DeepSeek 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 展现出了发展目标“高”、发展格局“大”、发展思维“新”的核心特征。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以“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以“开源协同”超越“技术霸权”、以“绿色低碳”超越“能耗污染”等实际行动, 证明了对西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超越, 致力于实现推动人类数智文明进步的目标。DeepSeek 所体现出的价值超越并不是为了与西方进行技术路线的竞争, 而是对“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积极回答。未来,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 要继续通过加强技术保障, 充盈创新活力; 筑牢技术防线, 保护数字主权; 深化技术合作, 推动国际传播等方式来不断开辟人类数智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 数字霸权; 数智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 TP18; F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2-0094-14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2.009

作者简介: 王闻萱, 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丹, 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生态观及其实践路径研究”(24BKS060)

引用格式: 王闻萱, 王丹.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 的核心特征、价值超越及未来路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94-107.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重大意义正在不断凸显。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方向, 推动了人类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 正在加速重塑全球技术创新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 要“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1]。当下, 全球正在经历“数字技术革命”与“绿色能源革命”双重叠加的历史机遇期, 生成式大模型引发的革新浪潮席卷而来^[2]。面对这一浪潮, 如何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给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重大机遇, 如何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赋能技术进步与能源革命, 值得我们深思。不可否认,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出场于西方, 但我们须清醒认识到, 西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深陷“技术-资本”的共谋泥潭。这种以资本增殖为核心诉求的技术迭代模式, 通过数据殖民、算法霸权、算力垄断的方式在空间层面获得了某种技术霸权力量, 进而引发了诸多风险^[3], 对人类文明进步而言更多地是弊大于利。就在此时,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 应运而生。与西方相反, 开源的 DeepSeek-V3 是全球 AI 生态的一次重要变革, 其 API 服务价格每百万输入 tokens 只需要 0.5~2 元, 每百万输出 tokens 仅需 8 元。这将有助于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自主发展, 推动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向更加开放、多元和高效的方向迈进^[4]。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能促进全体人民平等共享数字红利, 还能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享受到更具性价比的人工智能技术贡献中国力量, 以互利共赢的理念推动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进程, 缩小南北国家的数字鸿沟。中国所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坚持以人类整体利益为中心的技术观念, 其在发展路径和发展目的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存在根本区别^[5], 实现了对西方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超越。

国内学界目前关于 DeepSeek 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 研究成果较少。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以下四个层面切入。第一, 技术创新层面。有学者认为, DeepSeek 在 AI 领域的突破主要体现在模型和算法创新、软硬件协同优化以及整体训练效率的提升, 并认为这些创新显著降低了该模型在训练和推理上的算力需求, 这将会进一步为 AI 技术创新带来推动力^[6]。还有学者认为, 在技术创新范式方面, DeepSeek 在创新模式、技术路径自主创新、技术架构创新等方面展现出多维度系统性突破^[7]。第二, 技术应用层面。有学者认为, DeepSeek 作为一款多模态 AI 模型, 能够处理图像、文本、音频等多种数据类型, 将从提供海量文献内容的语料库、优化升级知识服务两个方面对图书馆行业产生重大影响^[8]。有学者表示, DeepSeek 凭借其卓越的数据处理能力、智能优化算法及其对各类技术架构所具有的较强适配性, 在金融行业展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9]。第三, 技术传播层面。有学者认为, DeepSeek 通过技术自主创新、开源共享等要素, 在推动其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的同时, 还推动了中国对外技术合作理念的国际传播^[10]。有学者指出, DeepSeek 充分顺应了互联网元架构的开放性和分布式全球传播特性, 形成了巨大的技术传播效应^[11]。第四, 技术监管层面。有学者认为, DeepSeek 的开源将有利于监管机构持续对其进行技术监管, 相较算法审查及备案而言, 监管机构可及时获取技术使用最新动态, 跟踪其发展情况, 确保其运行的整个周期都符合监管要求^[12]。但是, 也有的学者表示, 开放也代表着控制力的削弱, DeepSeek 的开源将会使传统的“服务提供者监管”难以全面覆盖, 这给技术监管带来全新的挑战, 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13]。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理解与研究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典型代表 DeepSeek 奠定了基础，但是对其价值超越及未来路向层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鉴于此，本文在简要梳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 的核心特征，透视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西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超越，并提出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路向，以期进一步丰富学界关于 DeepSeek 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为人类在人工智能领域内的探索与实践提供一种全新选择，共创人类数智文明新形态。

二、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 的核心特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人类试图破解思维奥秘、创造智慧机器、重塑创造边界的概念与技术的双重探索史。从 1956 年夏天，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举行历史上第一次人工智能研讨会^[14]，到 20 世纪 60 年代，第一个聊天机器人 ELIZA 的开发，人类开始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初步探索。在此之后，“机器学习”技术的诞生为当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奠定了重要技术基础，推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始逐步从实验室走向现实世界，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与创造力边界。人类进入“大数据时代”之后，“深度学习”技术开始流行，同时也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助力，推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始进入深度学习时代。2022 年 11 月 ChatGPT 的发布，引爆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浪潮。ChatGPT 的出场引起了人工智能研究范式的转变，既从感知智能跨越到了认知智能，也带来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第四次范式变迁^[15]。随后不久，另一代表性文生视频类生成式人工智能 Sora 的出场使得生成式人工智能体系又得到了完善，也使得人工智能在理解和创造复杂视觉内容方面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16]。2025 年 1 月，“DeepSeek-R1”震撼出场，其所展现出的强大能力令世人瞩目。生成式人工智能走过了近 70 年的发展历程，当西方机构仍深陷“千亿美元级超算中心”的建设竞赛时，中国的 DeepSeek 已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开辟了“轻量化人工智能崛起”的新赛道，更开辟出了一条人类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领域走向更可持续、更普惠的技术发展道路。

（一）发展目标“高”：以人民为中心

在技术研发的过程中，技术的发展目标不可忽视。与其他生成式人工智能相比，DeepSeek 的独特定位不仅体现在技术路径和应用场景的设计中，更反映在价值取向与社会责任的深度结合上。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 的发展目标之所以被定位为“高”，其核心在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技术创新的价值目标锚定于服务人民福祉、推动社会进步。作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代表性力量，DeepSeek 的“高”发展目标在坚持技术创新自主突破的基础上，以对民生需求的深刻洞察、对社会进步的主动担当为内核，通过技术赋能来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终构建起一个技术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型生成式人工智能。这种“高”发展目标不仅决定了 DeepSeek 的基本方向和运行方式，还深刻影响着技术的整体发展质量和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其一，“高”发展目标首先体现在其普惠性的技术设计上。DeepSeek 的一大技术创新直接体现为其极大降低了技术应用成本。其仅使用 2 048 块英伟达 H800 GPU 芯片，在短短两个月内训练出了拥有 6 710 亿参数的开源大模型，不到 600 万美元即完成了大模型训练，创下了同类模型的效率与性价比的奇迹^[17]。这种高效率技术路线打破了传统范式，使得其服务价格较低，具有将人

工智能技术“平民化”和普及化的潜力,在未来能够让更多人民群众享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技术红利,使科技创新成果实现人人共享。其二,“高”发展目标带来的技术创新推动了人民群众更好使用技术成果。DeepSeek 针对中国社会特有的技术需求进行了内容生成的定向优化。其大模型有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使得其在中文语义理解、方言识别、政务文书生成等场景表现突出,准确率与其他模型相比提升显著^[18]。而以往多数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受限于文化差异和语料库偏向性,难以实现同等深度的内容生成。这种本土化能力使得 DeepSeek 在我国未来的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生产等领域更具实用性与针对性,为广大人民群众在技术应用上带来更多的便利。其三,“高”发展目标带来的技术成果促进了社会和谐与公正。DeepSeek 通过开源策略实现了技术红利的社会化分配。其开放模型权重和训练框架,使地方政府、中小微企业、科研院所和其他同类模型开发人员可基于本地需求进行二次开发,甚至是本地部署。这种“技术授渔”模式与西方封闭式商业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生成式人工智能国际巨头往往通过 API 接口垄断技术使用权,使弱势群体难以享受到技术创新,拉大了数字鸿沟,从而加剧了西方社会不平等现象,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DeepSeek 通过自身实际行动确保了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参与到技术创新中来,进而公平地分享技术发展成果。未来,DeepSeek 在其他领域内的应用还会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医疗公平等,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 发展格局“大”：坚持开放共享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 的发展格局之“大”,核心在于其具备开放共享的发展格局,不断推动技术共建共治共享,在促进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显著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其一,开源生态是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 发展格局“大”的首要体现。DeepSeek 的胜利,就是开源打败闭源,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只有开源才会让技术更好地发展^[19]。DeepSeek 的开源战略通过全栈技术开放重构了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生态,展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深远意义。DeepSeek 在开源后,不仅释放了基础模型层的技术潜能,还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开发者能够基于该模型开展算法优化、应用开发等多样化工作。这打破了西方企业通过 API 接口垄断技术使用权的传统发展格局,使全球开发者能够以低成本共同参与并推动技术迭代进程。这一开源模式不仅降低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使用门槛,进一步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和应用的自由化与便利化,大大减少技术壁垒、降低使用成本,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更多研究人员投身人工智能创新,还将促进更多发展中国家能够享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红利。其二,“大”发展格局还体现在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 可以进行本地部署上。核心在于其通过技术架构创新与生态适配,实现了从云端到本地、从通用场景到垂直领域的全域覆盖,具有“落地生根”的特点。传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较为依赖云端,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将训练数据中包含的隐私数据变换、拼接后生成输出,暴露给平台厂家甚至是无关用户的问题,这可能会使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面临个人数据泄露的风险^[20]。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用于训练的数据集与语料库多来自西方互联网,自然带有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21]。而 DeepSeek 本地部署不仅有效满足了部分对数据隐私有严格要求的场景需求,也有效解决了传统云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的固有缺陷。通过避免数据上传至服务器来降低用户隐私泄漏风险,为敏感行业与人群提供了另一种选择。DeepSeek 本地部署还可以使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人种的用户能够基

于自身实际需要来对其进行本地训练，在无网络环境下仍可使用本地部署的 DeepSeek，既使技术与自身更加适配兼容，降低了知识产权流失风险，也规避了云端服务模式的算法歧视，有效避免了意识形态话语偏见问题的出现。

（三）发展思维“新”：注重生态环境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 在发展思维上具有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将生态环境保护深度融入技术研发全生命周期，体现为以技术创新驱动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为解决传统人工智能行业在能耗、碳排放、废弃物污染等方面的技术发展难题提供了“新”发展思维。其一，DeepSeek 通过算法革新，提高了模型的计算效率，减少了不必要的算力消耗，避免了能耗污染现象。随着人类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与之相关的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体量和规模正在不断扩大。这导致了硬件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空间、电力来维持服务运行，与此同时，淘汰下来的硬件设备倘若处理不当则会对土壤、水资源等造成污染，使技术发展面临着严峻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挑战。DeepSeek 模式普及后，全球在人工智能领域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可能缩减 40%—60%^[22]。随着技术应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对数据、算力等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依赖程度大幅降低，被淘汰的硬件设备数量也将同步减少。这不仅能有效降低传统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运行过程中因高算力需求而加剧的碳排放，还能从源头上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技术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其二，DeepSeek 通过算法革新，在保持高性能的同时降低了计算成本，降低了数字生态建设的成本。从以往的实践来看，数字生态文明技术创新应用的普惠性和可及性还有待提高，这一建设成本压力在城乡间、地区间尤为明显^[23]。成本壁垒和技术壁垒的双重制约，使部分资源相对有限地区的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效果大打折扣。DeepSeek 打破了以往大模型算力竞赛的困境，通过算法优化而非单纯依赖算力和数据量提升模型性能，推动了技术建设周期中的成本下降。此外，DeepSeek 技术普惠性推动了大众的广泛参与，打破了传统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局限于小众用户群体的局面，让更多地区、更多人能够打破技术应用门槛，有机会投身于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当中来。

三、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超越

西方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构建的技术优势，为全人类创造的价值相对有限，反而更多的是使技术红利持续向发达国家单向流动，扩大了数字鸿沟现象。中国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后发国家，通过近年来的不断努力，改变了我国在这一领域中边缘者的地位，破解了西方所构筑的“数智泡沫”。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实际行动实现了对西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超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技术发展选择。

（一）以“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

对“发展什么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靠什么发展、发展成果为谁服务”的发展逻辑思考，构成了当前不同国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所展现的资本增殖与人本福祉之间的优先性排序之争的根本原因。选择人民或是选择资本，这两种不同的发展逻辑直接指向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以资本为中心”历来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逻辑，其目的是实现资本的增殖^[24]，西方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

所选择的发展逻辑依旧如此, 并由此造成了数字剥削、数字鸿沟甚至是数字依赖等诸多危害。与之截然不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构建“数字中国”, 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高度关注数字剥削、数字鸿沟现象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并在牵引资本服务人的发展中展现为“积极式”的扬弃资本路径^[25]。这是对西方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价值导向和实践追求的颠覆性变革, 从而实现了以“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

首先, 我国积极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制度完善, 避免数字剥削, 保障人民数字权益。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们在享受数智化生产生活便利的同时, 也悄然陷入数字劳动的雇佣剥削与非雇佣剥削之中。在技术应用过程中, 他们的知识产权往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侵犯, 而他们利用技术生产的内容, 不断在为资本增殖服务。个体看似自愿“贡献”的背后, 实质上是资本贪婪的“吸纳”。对此, 在制度保障上, 我国广泛采纳人民意见和建议, 针对新技术所产生的新问题, 主动选择依靠人民力量来提出新的制度对策, 将《人工智能法》列入立法规划。2021年,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印发, 规范了平台用工关系, 对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作出了明确要求。2023年8月, 我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 其中明确规定了在技术使用过程中涉及知识产权的, 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 重视保障数智场域新形态下的劳动者权益, 进一步避免了数字剥削现象。

其次, 我国不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弥合数字鸿沟, 保障人民享有成果。数字鸿沟的形成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 当前由西方资本逻辑所催生的“数字鸿沟”已呈现指数级扩大态势^[26]。针对美国不同群体间惊人的数字鸿沟, 美国政府曾在2020年承诺要有所作为, 自那以后, 各地区虽然分配了大部分资金, 进行了许多政府补贴项目, 但是效果差强人意, 高昂的网费仍使很多普通人遥不可及^[27]。反观我国近年来不断加强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 加快推进全国数字基础设施一体化进程, 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空间布局。5G网络的快速铺开, 不仅为我国亿万网民提供了高速、稳定、实惠的连接, 更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网络基础。与此同时, 东数西算工程, 区域间、城乡间各类数据中心和云计算中心的建设, 正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 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进一步技术飞跃提供了更加强大的数据存储、处理和分析能力。尤其是今年DeepSeek的出场, 以其极高的性能和极低的训练成本, 为人民共享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技术红利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与可能。

最后, 我国大力增强数字技术的治理与监管, 摆脱数字依赖, 保障人的全面发展。西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 因其资本逐利本性, 导致了技术权力与资本逻辑的进一步深度合谋, 构建起一套数据化、算法化、微粒化的社会控制体系。该体系通过生成的内容来干涉人的自我意识、行为判断和决策过程, 动摇人的主体性, 不断想方设法地加速人机之间的主客关系异化, 使人们深陷数字拜物教之中。这是因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 人面临的控制力量更加复杂、多元和庞大^[28]。面对这一现象, 我国于2024年出台《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强调要设计有效、可靠的对齐算法, 确保价值观风险、伦理风险等可控, 这为促进日后国产大模型实现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 我国在各类人工智能技术和研发之初就依法加强对资本、算法、开发者的有效监管。通过多种举措, 防止资本的野蛮生长及其与算法的合谋, 引导技术研发人员负责任创新。我国还大力加强对人们开展数字技能培训, 增强国民的数字使用与防数字沉迷能力, 充分保护我国国民在应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过程中的尊严与主体地位，保障数智时代人的全面发展。

（二）以“开源协同”超越“技术霸权”

技术霸权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依托技术先发优势构建的新型统治形态，对全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进行的多重渗透，也是西方国家在战略层面对世界进行的霸权统治。在技术经济霸权层面，数字平台成为西方技术发达国家的新垄断载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托全球数字产业链的顶层设计权^[29]，通过技术标准垄断与核心专利壁垒构建起了数字剥削体系。部分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寡头更是凭借马太效应不断集聚相关资源，强化其通用技术属性。它们通过提供社会基础技术设施服务，享受相关技术红利，并利用平台先发优势，垄断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运行所需的大模型，进一步使发展中国家沦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原料供应地与低端代工环节。在技术政治霸权层面，美国经常假借技术合规性审查之名而行数字技术冷战之实，将技术政治化，炒作“中国技术威胁论”，并以安全为由不断利用技术霸权对中国进行封锁和打压。近年来，美国不断通过联合欧洲和日本等共同对华实施创新知识出口管制措施，禁止荷兰阿斯麦（ASML）芯片光刻设备制造商向中国出售对制造芯片至关重要的主流技术，即使出售，也是面向中国市场的“特制芯片”，无所不用其极地维护其技术政治霸权地位。此外，西方国家还不断进行数字地缘政治的全球布局，划分“敌友”关系，限制涉华科技交流，通过推行“算力崇拜”建立起了所谓数字同盟关系，如“星际之门”计划等，旨在帮助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保持并增强其领先地位，试图建立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政治霸权。在技术文化霸权层面，尽管 OpenAI、谷歌等美西方技术巨头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标榜为中立、客观的人工智能，但其“技术利维坦”仍不可避免地将影响到文化领域。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也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文化输出”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作为美国文化传输的新工具与新渠道，它达到了美国利用军事和经济力量所没有达到的目的，帮助美国强化了全球文化霸权地位^[30]。由于西方生成式人工智能收集的用户数据会留存在西方的服务器中，这些个人隐私信息一旦被西方某些不良机构或政客所窃取，便会成为他们制定文化殖民策略的重要数据支撑。他们利用所获取的用户数据来影响具有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倾向的网络族群，使用户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其背后隐性传递的西方文化价值观。

世界各国虽然国情不同，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阶段不同，但是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愿景是相同的。在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国际合作成为人工智能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不但有助于各国共同应对人工智能领域所存在的诸多风险和挑战，还能够推动各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共同进步。2015 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创造性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此后这一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在国际合作中积极推动数字化，尤其是注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及对外援助工作。2021 年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指出，中国支持建设了 37 个电信传输网、政务信息网络等电信基础设施项目，帮助有关国家发展信息产业，为缩小数字鸿沟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进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31] 鉴于全球数字化趋势和国际上对加强数字合作的广泛共识，我国积极将数字化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以此形成了“数字丝

绸之路”。基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工业体系和全产业链条，尤其是独立自主及合作共赢精神，中国通过自主研发、开源协同，有力地推动世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的“去垄断化”，冲破了西方的技术霸权，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推动跨国界的数据共享和技术合作^[32]。2024年9月，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周期间，中国和赞比亚共同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中方在会上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进一步促进了数字普惠计划的落实，为全球数字治理与合作提供了中国方案，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2025年1月，中国自主研发的 DeepSeek 更是以其发布的 R1 模型将代码、算法和训练框架全面开放，形成“开源即服务”的新范式，使全球开发者都能以近乎零成本接入顶尖 AI 能力。中国以一系列实际行动揭露了西方数字帝国主义的本质面目，通过自身发展造福世界发展，打破了西方国家所吹捧的“算力神话”，让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人民可以享受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便利，实现了对西方技术霸权的价值超越。

（三）以“绿色低碳”超越“能耗污染”

西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虽推动了技术革新，但其带来的能耗污染问题已构成严峻的环境挑战。以 OpenAI、谷歌、Meta 等企业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体系，依托强大算力支撑，形成了“算力军备竞赛”模式，导致能源消耗呈指数级增长。这是由于西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维持数字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生产过程需要不断消耗并追加更多原材料，以维持商品的丰富性、利润与剩余价值的丰厚性，进而造成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大幅上涨，加剧了生态危机^[33]。以 ChatGPT 为例，ChatGPT 的部分训练消耗了 1 287 兆瓦时，并导致了超过 550 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仅仅是训练阶段的排放量，当模型投入运行时，其碳排放量还会进一步增加^[34]。由于西方所鼓吹的“算力神话”及其对强算力功能的过分推崇，其在技术研发与升级的过程中对硬件 GPU 十分依赖，而 GPU 的制造则依靠人们对钴、钽等稀有金属的开采，这种开采十分不利于保护环境，将会导致森林植被破坏与水资源和土壤的污染进一步加重。相关研究人员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能源消耗激增导致碳排放量显著增加，预计两年内将在组织碳足迹中所占份额翻倍^[35]。面对这一情况，尽管西方科技企业尝试通过能效优化和清洁能源采购等方式缓解技术升级所导致的资源消耗矛盾，但行业整体仍深陷“算力崇拜”逻辑。无论是 OpenAI 发布的 Sora 视频模型，抑或是 Anthropic 推出性能超越 GPT-4 的 Claude 3 系列，均延续了“性能提升依赖算力堆砌”的传统技术路径。相关研究显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到 2027 年，与之相关的服务器所消耗的用电量将等同于荷兰全国的年用电量，这可能会破坏长期以来全球为减少碳排放所作出的努力^[36]。

尽管现阶段西方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发过程中呼吁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但由于其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反生态性质，技术进步与生态自然之间的矛盾依然不可避免，且这种矛盾只会随着资本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嬗变而增强，无法消解资本主义的永恒生态困境^[37]。面对这一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38]这凸显了在科技创新和产业生产过程中要做到绿色发展就要努力减少污染、节约资源，并推动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等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已将应对气候变化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层面，明确设立了“双碳”目标。配合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应对能耗与污染问题上，通过系统性布局与技术创新实现了对西方同

类技术“能耗污染”的价值超越。一方面，中国通过“东数西算”战略，将高能耗的算力需求向西部可再生能源富集地区迁移，助力推动绿色算力与电力的协同发展。一直以来，青海、贵州等地依靠其地势及气候条件，有着得天独厚的水电、风电、光伏等绿色能源。西部地区独特的气候条件还能降低数据中心运行能耗、减少碳排放，满足人工智能发展所需的迫切算力需求。2023 年 12 月，我国《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实施意见》发布，首次提出“算力电力协同”，对算力与电力的协同发展进行了科学的空间布局。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新型数据中心就近充分利用清洁能源，越来越多地在西部布局建设。推动数据中心向西部迁移布局，不仅能够节约“西电东送”的成本，还能提高西部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的使用率^[39]。这种地理优势与能源结构的结合，有效地将“绿电”转化为“绿算”，这不仅解决了东部电力紧张问题，还大幅降低了碳排放，形成“绿电”与“绿算”的双向协同效应。另一方面，中国通过算法上的探索与创新，摆脱了对高算力的依赖，有效减少了由于追求算力导致的能耗污染。DeepSeek 通过对模型架构的极致优化和算力需求的精简，实现了在性能一般的中低端显卡上媲美甚至超越 ChatGPT 的效果。这意味着，以前只有顶级算力才能承载的大模型，现在可以“降维”到成本更低的硬件上运行，这将大幅降低模型推理过程中的能耗，实现“绿色计算”。在数据效率与架构创新的双重突破下，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自身行动证明：技术发展并非只有靠堆硬件这一条路可走，通过“算法创新”绕过“算力军备竞赛”，可以实现非对称超越。国外一位学者指出：“DeepSeek 的成功证明，资源效率比算力规模更具决定性。”^[40] DeepSeek “以软补硬”的创新路径，充分证明了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算法革命实现技术的绿色低碳发展，为构筑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

四、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未来路向

当下，英伟达的暴跌和 DeepSeek 的爆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曾经固若金汤的硬件护城河正在被重新定义。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人工智能的进化可以脱离资本裹挟的“暴力计算”运行模式，走向更加普惠、更加包容、更加低碳的技术新道路。未来，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要继续通过加强技术保障，充盈创新活力；筑牢技术防线，保护数字主权；深化技术合作，推动国际传播等方式来不断开辟人类数智文明新形态，为全人类的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一）加强技术保障，充盈发展活力

技术保障是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在未来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政策保障、人才保障、资金保障三位一体协同发力，能够有效充盈其发展活力。

首先，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制度保障。技术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有相互协同、配套的政策体系作为保障。要完善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政策体系，在完善之初要科学评估现有相关政策，区分轻重缓急，从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等多方面健全政策体系。要加强与相关企业的交流座谈，多吸纳科创人员的意见与建议，增强相关政策的科学性、针对性与实用性。尤其是要完善这一产业的奖补政策、信贷政策和保险政策，充分发挥政策的理论前瞻和现实指导作用。要坚持把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严格贯彻落实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政策顶层设计全过程，确保重大决策的方向正确。在政策设计的过程中，要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实现

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相结合。及时开展政策的事中、事后评估, 利用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对政策进行实时监督和评析, 保障相关政策执行的事中、事后评估的即时性并根据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有效缓解以往政策执行存在的政策稳定性与技术创新性之间的矛盾^[41], 为充盈发展活力提供充足政策保障。

其次, 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才保障。DeepSeek 的爆火证明了当前我国该领域人才的卓越才能, 也再次证明了中国在科技人才方面的深厚底蕴, 更证明了我国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有效。对此, 在未来要继续发挥我国的人才优势, 吸取以往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不断创新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机制。要结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需要, 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力度, 注重培养一批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 努力造就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工程师、科学家。面对当前我国地区间、城乡间人才培养的空间差异^[42], 要大力发展在线教育、利用好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普惠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功能, 借助技术弥补部分地区人才培养的短板, 为我国人才培养激发新的地区活力。要完善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 赋予科研人员成果所有权, 为广大科研人员施展才华、实现自我价值、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最后, 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资金保障。一方面, 各级政府要加大对本土生成式人工智能企业的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对在关键核心技术、前沿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或创新成果具有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科技领军企业, 应给予财税金融支持^[43], 以进一步激发相关企业的创新活力, 缓解企业初创时期的成长压力, 尽最大可能解决企业研发人员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 要设立专门的科创金融机构, 丰富投融资方式, 引导耐心资本进场。耐心资本作为科创长跑中的重要力量^[44], 其在未来对于促进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通过引导耐心资本的有序进场, 可以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汇集更多资源与资金, 为其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这不仅有助于分散科创人员的资金压力, 也有利于相关企业更加自信地投身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发与运营, 更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 进而推动整个行业的繁荣发展。

(二) 筑牢技术防线, 保护数字主权

筑牢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防线能够确保该技术平稳运行, 保护我国的数字主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依赖于高新技术的应用, 其中核心技术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因而要加强对核心技术的保护工作。近期 DeepSeek 线上服务受到大规模恶意攻击, 对攻击进行溯源发现, 这些网络攻击的 IP 地址都在美国^[45]。这一现象也提醒了我们, 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数字霸权主义对我国数字空间造成的入侵风险, 必须提升对安全技术的研发攻关能力。通过制定防御预案、加强攻防演习、建立预警机制等方式来牢牢掌握数字主权, 提升对外部恶意技术攻击的抵御能力。

首先, 制定安全防护预案。针对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我国数字空间所开展的恶意攻击, 我们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做到举一反三。由网信部门牵头, 联合各相关企业机构、研究院校、各类社会组织共同研究并制定全面且细致的技术安全防护预案, 明确针对各类恶意技术攻击的应对举措, 清晰划分责任归属, 这是保障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遭受恶意攻击时稳定运行的关键前提。从常见的网络舆情渗透攻击, 到新型的数据投毒攻击, 都需在预案中明确应对策略, 确保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同攻击场景下都有章可循, 不断提升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应对恶意技术攻击的能力。

其次，加强模拟攻击演练。定期的模拟攻防演练对于检验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安全防护预案的有效性、找出并改进预案中的漏洞、提升实际应对恶意攻击的操作水平有着重要意义。要定期开展模拟攻击演练，在政府部门的组织下，各相关企业要合法、合规、有序地在实网攻防靶场中进行全方位的实战演练，模拟各种复杂的恶意技术攻击场景，确保技术团队、安全人员等相关人员熟练掌握安全防护预案的内容和操作流程。在演练过程中，不断强化工作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理技能，保证在真实的恶意技术攻击发生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切实提升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战能力和国家层面的网络攻防对抗能力。

最后，建立先进的风险预警机制。先进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能够及时发现和评估可能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的各类风险。就在 DeepSeek 受到恶意攻击后不久，国产数字安全企业 360 集团的创始人周鸿祎宣布将无偿为 DeepSeek 提供全方位的数字安全防护，并发布倡议书，承诺全力捍卫国产 AI 的技术尊严和安全^[46]。这一倡议的提出，为未来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筑牢技术防线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要引导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与研究人员加强与国产数字安全企业的通力合作。通过共同构建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的风险监测分析平台，国家网络安全部门、技术运营企业以及数字安全企业能够快速实时整合来自网络流量监测、用户行为分析、数据访问日志、信息来源分析等多渠道的海量数据。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帮助技术管理人员实时洞察网络安全态势和潜在的攻击威胁，及时发现恶意技术攻击的早期迹象，精准评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潜在影响程度，进而制定出针对性强的应对策略，全面提升我国数字主权的保护能力。

（三）深化技术合作，推动国际传播

当前，技术与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这些有利因素为我国进一步深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合作，推动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西方内部在数字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其他发达国家同样是美国数字剥削的受害者，是可以团结重塑世界数字体系生态的对象^[47]。对此，我国要通过加强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国际上的技术共研共进、文化平等交流等方式，更好地推动中国技术的国际传播。

首先，打造技术开源协作新范式。要以这次 DeepSeek 开源协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为样板，进一步建设全球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升级“数字丝绸之路”。通过主动开放部分非敏感领域的预训练模型架构与微调工具链的方式，构建多语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平台，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发者共同参与模型迭代。这种“技术透明化”策略不仅能够消除国际社会对“技术黑箱”的疑虑，更能推动相关平台企业深度参与国际技术交流，展现中国良好的技术形象。

其次，推进技术标准互认体系。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数据流动、内容审核等关键问题，我国要积极在国际领域发声，参与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的制定，推动国际算法正义的实现，建立模型安全认证互认机制。与此同时还要大力举办“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峰会”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论坛，增进各国间的了解与互信。积极主导建立跨境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与治理的各项标准，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动权和国际话语权，使中国技术标准深度嵌入国际规则体系。

最后，促进技术与文化的双重交流。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技术合作上不能停留于技术工具层面，而应成为文明对话的“数字桥梁”，才能更好地推动其技术的国际传播。要引导相关企业在技

王闻萱, 王丹.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 的核心特征、价值超越及未来路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94-107.

术研发时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文化交流功能。通过文化符号的智能转译、价值理念的算法内嵌, 实现由“技术传播”到“文明共鸣”的跃升。要针对不同地区语言保护、文化遗产数字化等需求, 与各国家和地区共同开发各自语言的生成模型与文化基因数据库。确保海外用户在使用我国产品时, 依旧能深刻感受到本国的文化元素。此外, 要引导我国研发人员在模型训练中积极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使广大海外用户通过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即可学习中国在技术进步、气候治理、脱贫攻坚等方面的宝贵经验, 使他们在使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理解我国“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数字丝路精神, 更深刻地体会中国“技术向善”的本质, 进一步用“数据故事”打破西方的偏见与误解。

五、结语

从“无名之辈”到“现象级 AI 公司”, 从技术自信到生态布局, DeepSeek 的崛起已超越商业范畴, 其爆火为我国科技创新提供了诸多新的思路与新的选择, 更推动了中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悄然由“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变, 正在不断定义“可能”的边界^[48]。“DeepSeek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着技术整合、深度思考、中文语料、开源共享、免费使用等独特优势, 为中华文明发展传播提供了全新思路与强大动力支持。”^[49]诚然,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相关技术依然需要不断攻关与完善。但是, 中国一直用实际行动, 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在推动人类数智文明进步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尝试, 更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了算法可以不是资本增殖的加速器, 而是成为社会公平的调节阀; 算力可以不是霸权争夺的武器库, 而是成为民生福祉的发电站; 数据可以不是垄断剥削的原材料, 而是成为人民主权的数字家。这种价值超越并不是为了与西方进行技术路线的竞争, 而是对“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积极回答。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4-07-22 (1).
- [2] 米加宁. 生成式人工智能十大认识论问题 [J]. 探索与争鸣, 2024 (11): 5-8+209.
- [3] 崔小燕, 张长立. 生成式人工智能诱发的风险样态、生成逻辑与智慧治理策略——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J]. 宁夏社会科学, 2023 (4): 188-198.
- [4] 李山. 中国大模型助力 AI 技术更开放更高效 [N]. 科技日报, 2025-01-16 (4).
- [5] 陈健. 中国数字现代化对西方数字现代化的超越与重构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 (4): 38-49.
- [6] 张慧敏. DeepSeek-R1 是怎样炼成的? [J/OL]. 深圳大学学报 (理工版), 1-7 [2025-02-19]. <http://gfagz2374dada52f84efcs9vqnkqqnknkb6wkc.fyac.oca.swupl.edu.cn/urllid/44.1401.N.20250210.1628.002>.
- [7] 令小雄. DeepSeek 开启后 ChatGPT 时代——基于数字范式革新及其运演哲思 [J/OL].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 [2025-02-19]. <http://gfagz2374dada52f84efcs9vqnkqqnknkb6wkc.fyac.oca.swupl.edu.cn/urllid/61.1352.C.20250211.1011.004>.
- [8] 杨新涯, 戴立伟, 钱国富. DeepSeek 在图书馆的应用场景构架研究 [J/OL]. 图书馆论坛, 1-8 [2025-02-19].

<http://gfagz2374dada52f84efcs9vqnkqnpnkb6wkc.fyac.oca.swupl.edu.cn/urlid/44.1306.g2.20250218.1639.004>.

- [9] 陆岷峰, 高伦. DeepSeek 赋能商业银行创新转型: 技术应用场景分析与未来发展路线 [J/OL]. 农村金融研究, 1-16 [2025-02-19]. <https://doi.org/10.16127/j.cnki.issn1003-1812.20250217.001>.
- [10] 郭全中, 曾婉琪, 黄昊漪. 技术突围与符号共振: 中美科技竞争语境下 DeepSeek 的整合传播研究 [J/OL]. 新闻爱好者, 1-15 [2025-02-19]. <https://doi.org/10.16017/j.cnki.xwahz.20250213.002>.
- [11] 方兴东, 王奔, 钟祥铭. DeepSeek 时刻: 技术—传播—社会 (TCS) 框架与主流化鸿沟的跨越 [J/OL].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11 [2025-02-19].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50218.001>.
- [12] 邓建鹏, 赵治松. DeepSeek 的破局与变局: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方向 [J/OL].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10 [2025-02-19].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50214.001>.
- [13] 段玉聪. 抢占 AI 话语权: DeepSeek 的技术优势、战略布局与未来生态图景 [J/OL].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 1-17 [2025-02-19].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50217.001>.
- [14] 尼克. 人工智能简史 [M]. 2 版.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1: 17.
- [15] 张洪忠, 黄民烈, 张伟男, 等. ChatGPT 的技术逻辑、社会影响与传播学未来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2): 24-31.
- [16] 孙伟平, 刘航宇.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方式的革命——从 Sora 的冲击波谈起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 (5): 12-18.
- [17] 张佳欣.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破局与担当 [N]. 科技日报, 2025-02-21 (4).
- [18] 钟哲, 吴雅楠, 吴少敏. 千行百业为何纷纷接入 DeepSeek? [N]. 南方日报, 2025-02-20 (A6).
- [19] 无忌. 侠客岛对话郑永年: DeepSeek 带来的震撼与启示 [J]. 中国经济周刊, 2025 (3): 64-66.
- [20] 汝鹏, 苏竣, 韩志弘, 等. 智能引领未来: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与标准化治理 [J]. 电子政务, 2025 (1): 2-14.
- [21] 吴学琴. 从 ChatGPT 到 Sora: 意识形态话语的“真相”审视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4 (8): 75-83.
- [22] 孔海丽, 赵云帆. DeepSeek 改变 AI 未来——最应该关注的十大走向 [N]. 21 世纪经济报道, 2025-02-07 (11).
- [23] 胡仙芝, 陈元. 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问题及对策 [J]. 新视野, 2024 (4): 97-107.
- [24] 刘海春, 张力一翔.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源、思想动力与价值超越 [J]. 求实, 2023 (6): 4-16+107.
- [25] 孟飞, 冯明宇. 数字社会主义及其实现的唯物史观审视——从国外数字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性解读谈起 [J]. 教学与研究, 2025 (1): 132-142.
- [26] 陈文旭, 聂嘉琪. 21 世纪全球数字鸿沟审视与中国方案 [J]. 新疆社会科学, 2023 (6): 147-155+169.
- [27] 美国数字鸿沟使原住民长期处于劣势 原住民群体: 十分担忧没有“数字”的未来 [EB/OL]. (2025-01-16) [2025-02-1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1387569738685309&wfr=spider&for=pc>.
- [28] 巩永丹. 西方左翼对数字资本主义人的“新异化”的批判及其启示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 (1): 123-135.
- [29] 朱晓庆, 蔡丽华. 数字帝国主义的型态、机制与应对 [J]. 科学社会主义, 2024 (5): 117-126.

- 王闻萱, 王丹.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 的核心特征、价值超越及未来路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94-107.
- [30] 张春霞. 世界文化格局重塑中的中国机遇与应对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 (7): 110-119.
- [31] 习近平.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4 年 8 月 22 日) [N]. 人民日报, 2024-08-23 (2).
- [32] 罗会钧, 查云龙. 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应对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12): 13-24.
- [33] 格雷厄姆·默多克, 李雨滢. 连接性、气候与冠状病毒: 数字媒体与可持续未来 [J]. 全球传媒学刊, 2021 (3): 138-150.
- [34] 山白. 从 ChatGPT 碳排放看全球变暖 [EB/OL]. (2025-01-23) [2025-02-19]. <https://news.qq.com/rain/a/20250123A04BE100>.
- [35] 企业需要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以减少生成式 AI 碳排放 [EB/OL]. (2025-01-20) [2025-02-19]. <https://news.qq.com/rain/a/20250120A048DB00>.
- [36] AI 化身“能耗巨兽”, 科技大佬警告: 新的能源危机来了 [EB/OL]. (2024-03-11) [2025-02-19].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634086.
- [37] 冯明宇. 数字资本主义的生态恶化机理及其图景重塑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4 (3): 88-95.
- [38] 习近平.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016 年 5 月 30 日) [N]. 人民日报, 2016-06-01 (2).
- [39] 于施洋, 马骁, 郭明军, 等. 国家算力大通道总体布局和推进策略研究 [J]. 电子政务, 2024 (11): 54-67.
- [40] Gibney E. China's cheap, open AI model DeepSeek thrills scientists [J]. Nature, 2025 Jan 30.
- [41] 王丹, 王闻萱.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 现实功效、卡点瓶颈及因应路径 [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4): 117-124.
- [42] 刘晓娟, 谢瑞婷, 孙镛莉, 等. 高层次科技人才成长中的地区角色研究——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为例 [J]. 科学学研究, 2024 (10): 2110-2121+2160.
- [43] 费艳颖, 张栩凡.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实践进路 [J]. 理论探索, 2024 (5): 108-114.
- [44] 王闻萱, 王丹. 耐心资本助推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关联及实践要求——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 (9): 1-6.
- [45] 突发! DeepSeek 被大规模网络攻击, IP 地址均在美国 [EB/OL]. (2025-01-30) [2025-02-1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2602164419397432&wfr=spider&for=pc>.
- [46] 360 宣布为 DeepSeek 免费提供安全保障 [EB/OL]. (2025-02-01) [2025-02-1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2821268103964893&wfr=spider&for=pc>.
- [47] 蔡翠红, 于大皓. “帝国的新衣”: 世界数字体系下的美国数字霸权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4 (3): 4-12.
- [48] 英媒: DeepSeek 打破美对 AI 话语权垄断 [N]. 新华每日电讯, 2025-02-06 (5).
- [49] 代金平, 覃杨杨. DeepSeek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中华文明发展传播研究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14 [2025-03-19].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50305.0808.002>.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龚静阳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机理与启示 ——基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论析

李培鑫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与嵌入是动画电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间环节。从理论依据看,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具有符号标识、记忆标识、情感标识、精神标识等多元表现形式, 能够直观反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是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载体;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内在契合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要求。从实践机理看, 《哪吒之魔童闹海》通过识别中华文明符号标识, 强化共同体认知; 铭刻中华文明记忆标识, 增进共同体认同; 打造中华文明情感标识, 唤起共同体共情; 彰显中华文明精神标识, 坚定共同体自信。这四者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严密完整的逻辑链条。《哪吒之魔童闹海》从“标识塑造”到“意识铸牢”的创新实践启发我们, 文艺产品等多样载体应自觉挖掘提炼、准确解读阐释、广泛传播弘扬各民族共有的中华文明标识, 为构建一个认同感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符号; 集体记忆; 《哪吒之魔童闹海》

DOI: 10.13946/j.cnki.jcqi.2025.02.010

作者简介: 李培鑫,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度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研究”(22VSZ055)

引用格式: 李培鑫.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理与启示——基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论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2): 108-121.

中图分类号: D633;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2025)02-0108-14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纽带。“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 夯实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思想基础, 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 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1] 2021年8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2]。2023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优化学科设置, 加强学科建设, 把准研究方向, 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 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3]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要求“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4]。2024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 “加强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 积极开展对外人文交流, 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5]

在数智技术崛起、中西文化碰撞、多元思潮交织的背景下, 如何利用电影、动画、小说、音乐乃至电子游戏等各类文化媒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其中, 作为一种兼具文化性与娱乐性、艺术性与大众性、审美性与教育性的特殊文化载体, 动画电影天然具备“全民合家欢”的传播优势, 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想象力消费’主体青少年观众的审美心理需求”^[6]。针对动画电影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 有学者从传播效能视角, 分析了动画电影“跨媒介叙事”技法如何呈现和传递中华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观^[7]; 有学者从文化心理认同视角, 认为国产动画电影通过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角色形象和讲述中国故事, 激发了观众的爱国热情和文化自信^[8]; 有学者从意识形态建构视角, 阐释了动画电影如何通过叙事策略、影像语言等手段, 影响观众的价值判断并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9]。既有研究相对缺乏对国产动画电影如何内嵌中华文明标识、中华文明标识又如何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考察, 应进一步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指示来展开。

文化是动画电影的“高端”属性, 在文化标识视域下,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与嵌入是动画电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环节。“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构建和运用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表达体系, 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1] 67-68} 其中, 一个典型案例便是于2025年1月29日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截至3月6日, 该电影总票房突破145亿, 既刷新了中国影史票房纪录, 还冲至全球影史票房榜第七名, 并成为全球动画电影票房冠军。在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同时, 《哪吒2》的文化价值同样引人瞩目。有台湾媒体人表示“这是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有台湾网友留言“期待在台湾可以看到这些大陆电影”^[10]。在国家电影局指导下, 经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中央政府驻澳联络办和香港、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协调, 《哪吒2》以平均日排片200场的规模在香港、澳门同步上映, 这一规模在港澳影史上前所未有。有香港观众表示: “电

影蕴含的中国传统美学、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所传达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念和精神力量让她很受触动。”^[11]在海外，该影片吸引了海外华人华侨以及留学生群体的高度关注，联合国总部举办“《哪吒2》走进联合国”特别展映活动。可见，《哪吒2》之所以是“中国人自己的故事”，不仅源于商业逻辑导向下的精良制作和技术赋能，更在于文化逻辑导向下将具有民族文化象征意义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嵌入其中，构建出具有共鸣性的民族情感叙事，彰显出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向心力。因此，本文将《哪吒2》置于国家框架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背景中，剖析从“标识塑造”到“意识铸牢”的衔接机理。

二、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依据

从学理层面深入剖析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是考察《哪吒2》案例的前提。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由中华民族在历史演变进程中创造的、具有高度辨识性的文化标识系统。其本质是通过符号标识、记忆标识、情感标识、精神标识等表现方式，传递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底蕴、文化传承、民族情感与精神追求。从民族工作的角度看，这些标识既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元素。例如，共同的语言文字（汉字）、共同的历史叙事（如华夏九州）、共同的节日民俗（如春节、中秋节），这些符号标识都能强化“我们同是炎黄子孙”“我们同属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一）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载体

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由人类社会各种共同体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推而论之，共同体意识并非客观物质存在，而是抽象的理念，表现为在文化心理层面对共同体的认知、认同、共情与自信。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2]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各民族通过密切交往，共同缔造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一意识植根于民族的历史实践和集体记忆。作为一种抽象的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法通过简单的物质手段来“复制”或“还原”。在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历史变迁加剧的当下，如何跨越具体的历史时空、复现集体记忆、弥合情感间隔，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考题。

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满各种象征符号的世界，任何意义表达都必须通过符号媒介实现^[13]。标识，本质上就是一种象征符号。一个国家的文明传统，经过长期演变，最终皆凝注在具有高度标识性的一些符号、记忆、情感与精神上。中国是一个“文化标识”大国，无论是龙、凤、麒麟、哪吒、孙悟空等神话传说，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等历史遗产与文化遗址，还是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集体记忆与民族情感，以及内外兼修、自强不息、容纳万物的精神境界，都是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相区分的文化标识。

“‘共同体’意味着一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共同理解。”^[14]在中华大地上，尽管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语言谱系乃至不同的文化标识，但每个民族、每个个体在看到

中华文明代表标识时, 都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与情感体认。这是因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具有其他标识体系无法比拟的特点——直观地反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2023年6月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以“五个突出特性”对中华文明本质特性作出了规范性概括。“五个突出特性”体现出中华民族拥有其他民族、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极其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 体现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丰厚的历史滋养和最突出的文化优势。直观反映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正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标识性”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创造主体, 中华民族标识体系深刻阐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所在、精神命脉所系、价值追求所向,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库”和核心载体。

(二)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内在契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要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必须服务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要求。2022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 要有形、有感、有效。”^[15]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文化特质, 与这种实践要求天然契合。

第一,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形神兼备、寓情于形, 有助于“有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凭空就能够铸牢的, 而必须依赖相应的载体和外在表现形式。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标识凝结, 可以将抽象的集体记忆具象化、可视化、物质化,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形”的载体和途径^[16]。例如, “中国龙”作为文化标识, 通常与力量、正义、祥瑞以及“龙的传人”等含义联系在一起, 蕴含着关于龙图腾、龙文化的集体记忆, 并与“潜龙勿用”“藏锋守拙”的民族情感与民族精神相关联。

第二,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具有感知力、感染力和感召力, 有助于“有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马克思认为, 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 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7]。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可以通过共享性的文化标识, 唤起受众的集体记忆, 增强受众的文化认同, 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 使受众在中华文化中获得强烈的身份归属感、文化认同感与心灵寄托感。尽管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语言文化存在差异, 但统一性的文化标识可以激活统一性的历史认同和社会行为规范, 由此唤起中华民族精神血脉里的家国情怀和共同理想信念。

第三,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具有丰富的实践效能和传播效能, 有助于“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效能层面, 符号是符号实践的催化剂, 会影响人们在特定时空内的文化行为表现^[18]。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可以通过文化标识的激励作用引导受众的符号实践, 使共同体意识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如在每年的节庆活动中, 人们会进行贴春联、赏月、吃团圆饭等符号实践,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步强化个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联结。在传播效能层面,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具有凝练性、象征性和可借鉴、可推广的特质, 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多元媒介渠道的传播。

总之,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对于突出各民族共创共享的中华文化特质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根基性作用。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有助于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注入强大的文化动能。

三、《哪吒2》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理

在国家框架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背景下,《哪吒2》成为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型案例。其实践机理在于:识别中华文明符号标识,强化共同体认知;铭刻中华文明记忆标识,增进共同体认同;打造中华文明情感标识,唤起共同体共情;彰显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坚定共同体自信。这四者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严密完整的逻辑链条。

(一) 识别中华文明符号标识,强化共同体认知

符号是信息的传递方式,是意义生成和建构的枢纽。透过符号,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得以在一个可被传达和阐释的形式中具体化^[19]。《哪吒2》将各类视觉性、听觉性的中华文明符号标识嵌入自身的影音叙事中,使受众快速进入中华文明的意象空间,并或主动或潜移默化地识别这些符号标识。相较于抽象的理论言说,视觉符号直接关联经验世界与意义世界,更能真实、全面、立体地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象。《哪吒2》主要运用以下符号来建构自身的视觉表征。

首先,历史神话人物符号。在唐代,哪吒是“手捧戟,以恶眼向四方”的形象;在元人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中,哪吒是三头六臂的形象;在明代《封神演义》的记载中,哪吒拥有了脚踏风火轮、手持火尖枪的造型。随后,得益于《西游记》等经典文学作品对哪吒外形、相貌、武器等方面的精细刻画,哪吒成为中华民族家喻户晓的人物。其“玉面娇容如满月,朱唇方口露银牙。眼光掣电睛珠暴,额阔凝霞发髻髻。绣带舞风飞彩焰,锦袍映日放金花”的英雄形象,早已为中国人所熟知。20世纪以来,哪吒形象在动画电影等媒介中被不断重构。例如,在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哪吒闹海》里,创作者在传统年画以及敦煌、永乐宫壁画中汲取灵感,创造出“红衣白裤、乌发赤足”的哪吒造型。而在《哪吒2》中,创作者既延续了哪吒脚踏风火轮、手持火尖枪和正直尽责的少年英雄形象,又颠覆性地加入了黑眼圈、烟熏妆、“鲨鱼牙”等元素,契合传统戏曲里丑角的形象特点,由此凸显哪吒调皮叛逆、外表丑陋但心存善念的“魔童”特征。出于对哪吒的尊崇,供奉主神为哪吒的中国台湾高雄三凤宫,每日香客络绎不绝;澳门哪吒庙每年都会举办“哪吒诞”巡游等民间信俗活动;剧中哪吒拜师学道之地——江油乾元山,更是成为今年春节的“顶流打卡地”^[20]。可以发现,哪吒拥有跨越时空的文化生命力,无论外形如何演变,其符号本身带有的民族特色始终鲜明。此外,剧中的太乙真人、龙宫三太子敖丙、托塔天王李靖等,均是经过历史沉淀而又富有创新元素的中华民族共有符号,连接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与精神世界。

其次,传统服饰符号。在影片中,哪吒的服饰以鲜艳的赤红为主调,辅之以火焰纹、莲花纹等元素。在中华文化里,赤红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往往与热血、勇敢、赤诚等品格相关联。火焰纹、莲花纹均是中国传统服饰与建筑艺术的重要装饰纹样。火焰纹是早期帝王冕服的十二章纹之一,给人以火焰熊熊燃烧、永不熄灭的感受。莲花纹与中国以莲为主体的“莲花文化”紧密相连,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文化寓意,使人感受到生动、圣洁与旺盛的生命力^[21]。火焰纹与莲花纹的结合使哪吒形象具备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彰显出哪吒勇敢无畏、热血冲动的个性,以及渴望自由、勇于挣脱命运束缚的决心。敖丙的服饰则以钴蓝为基调,辅之以云纹、水纹。钴蓝在中华文化中通常与江河湖海等意象以及沉稳、神秘、理智的特质相关联。云纹、水纹均源自中华先民长期

的农耕实践和对自然的崇拜,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情思的集中体现。哪吒的赤红和敖丙的钴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勇气、激情、自由与理智、沉稳、责任的激烈碰撞,恰恰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意志本色。

再次,传统建筑符号。在《哪吒2》里,陈塘关以“汉阙”为原型,复现了中国古代宫殿的重檐庑殿顶,并带有威猛庄严、结构严谨的饕餮纹。这种纹样代表了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历史上玉器、青铜器装饰图案的最高水平^[22]。“天上宫阙”玉虚宫的设计继承了中国传统宫殿与道教建筑的元素,延续着以太极为中心、八卦卦象为整体的构型,其晶莹的琉璃瓦、动态飘逸的飞檐翘角、匾额上代表日月的金乌和蟾蜍,营造出玉虚宫庄严静谧的氛围。东海龙宫则借鉴了福建土楼的环形布局,散落的金瓦朱檐使其往日的繁华依稀可见。有美学研究者发现,青灰色的石阶、朱红的廊柱、鎏金的瓦当……电影场景摒弃了好莱坞式的高饱和色系套路,构建起东方美学的视觉体系^[23]。总之,《哪吒2》对建筑符号的运用,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东方美学特色,力图将观众带入一个如梦如幻的东方仙境。

最后,听觉符号。音乐、音效和对白设计同样强化着观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电影配乐巧妙运用了埙、唢呐、古筝、编钟、大三弦等民族乐器,以及蒙古族呼麦、侗族大歌等民族音乐形式。在哪吒与父母依依惜别时,悠扬的古筝声缓缓响起,如泣如诉,似在低语着离别的不舍;在哪吒与无量仙翁决战时,激昂壮烈的唢呐声响起,配合着紧张激烈的战斗,气氛愈发热血沸腾。《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撰文指出:“《哪吒2》的配乐将中外音乐风格巧妙融合,既饱含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又不乏国际化的多元表达,展现了民族精神与创新能力。”^[24]更有网友表示:“这才是属于哪吒的BGM(背景音乐),太震撼了!”此外,影片对白融入了大量的中华俗语,如“可怜天下父母心”、“替天行道是使命,斩妖除魔我最擅长”;还嵌入了四川话、天津话等地方方言,增强了影片的地域文化特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话语支撑。

综上所述,符号标识构成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多样性格局中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和“识别码”,并以“形式美”传递出“寓意美”“精神美”的境界,不断“戳中”观众的文化DNA。观众通过对这些标识的识别,持续性地明确自身的身份边界与文化归属。

(二) 铭刻中华文明记忆标识,增进共同体认同

集体记忆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在他看来,集体记忆并非对过去的简单复现,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对过去的重新建构,即集体记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25]。当前,集体记忆往往指一个群体或社会共同拥有的、关于过去经验事件的记忆系统,它并非个人记忆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社会互动、文化传承和集体仪式等方式建构起的个人记忆聚合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根植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之中的认同意识,由中华民族的成员共同拥有、共同参与构建,并得到共同体成员共同认同。历史川流不息,记忆代代相传。集体记忆最重要的是“记忆什么”,“集体记忆的缺失、断裂或薄弱势必造成共同体的孱弱、分裂和覆灭”^[26]。从上古传说、夏商周到现代中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跨越了数千年的历史,内涵体系丰富多彩。《哪吒2》借用一系列中华文明符号标识推进自身叙事,具象化地将“战天斗地,自强不息”的抗争记忆和“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社会记忆等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传递给观众,由此增进观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文化和情感的多元认同。

首先，铭刻“战天斗地，自强不息”的抗争记忆。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史，是一部战天斗地、自强不息的历史。精卫填海和愚公移山的神话传说，大禹治水、李冰父子兴修都江堰的历史典故，均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人定胜天”的姿态积极适应与改造客观环境。近代以来，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民族存亡时刻，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相继开启，全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敌。把荆棘密布、荒山野岭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的南泥湾精神，数十万青年奔赴北大荒、建设北大荒、献身北大荒的北大荒精神，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定叫山河换新装”、修建人工天河的红旗渠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文化记忆。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27]广大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引领中华民族投身于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波澜壮阔的实践中，通过顽强斗争攻坚克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在《哪吒2》里，哪吒勇于降妖除魔、勇于抗争、打破桎梏，历经种种磨难后，他振聋发聩地发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地不容，我便扭转这乾坤”的呐喊。人物与话语标识的叠加，帮助观众沉浸式回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回望中华民族战天斗地的光辉范例，铭记中华民族不甘平庸、战天斗地、自强不息、勇于抗争的文化记忆。

其次，铭刻“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社会记忆。“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生活在一个自然灾害频发、外敌入侵频繁的环境中，无论是黄河、长江流域的洪水问题，还是抵御外敌与边疆稳定的民族使命，这种长期共生共存的经验使“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未来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只有全体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不断夺取新的更大胜利。”^[28]《哪吒2》里同样蕴含着“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社会记忆符号。例如，在陈塘关遭遇围攻时，来自仙界的太乙真人、身属龙族的敖丙、“魔童”哪吒与千万守城将士以及城中百姓同仇敌忾、共同御敌。申公豹不再是绝对的反派，他被李靖的尊重与善意所打动，在为陈塘关百姓运输药材、抗击无量仙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夜叉身属妖族，被李靖夫妻收服后一心向善，最终利用“唾沫泡泡”的石化功能帮助李靖夫妻脱险。龙族在遭到天庭驱遣、戍守海底炼狱后，仍然团结一致、奋起反抗，所有龙族把自己身上最坚硬的龙鳞制成“万鳞甲”送给敖丙，最终实现了龙族共同的“逆天改命”。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主导和承继中华民族命运的是“共同体利益”的客观决定作用^[29]。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正是保家卫国、避免亡国灭种的“共同体利益”，使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在《哪吒2》里，养尊处优的捕妖队受到无量仙翁的洗脑，组成了气势非凡的“金色大树”来打击哪吒。他们看似团结，实际上却是“一盘散沙”，在无量仙翁失败后只能“树倒猢猻散”。本质上，捕妖队是“虚假的共同体”，其成员缺乏对共同利益的感知和认同，未能形成自觉的共同体意识。

总之，“战天斗地，自强不息”的抗争记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社会记忆深深烙印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里。《哪吒2》通过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选取和复现，增进了观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三) 打造中华文明情感标识, 唤起共同体共情

情, 是个体对事物的心理体验和主观感受。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可以发现, 情感的生成与流变有赖于情感主体所处的地域环境以及文化环境^[30]。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中华民族基于生产实践的物质连接, 建立了与自己、与他人、与家庭乃至与整个国家的情感连接, 逐渐发展出中国式的情感类别与情感表达方式。情感标识或曰标识性的情感, 是中华文明标识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 有助于唤醒集体情感、调动集体情绪,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情感力量。中华民族是有感情的民族, 是“人情味很浓”的民族。人物山水、飞禽走兽、树木花草, 无不凝结着中华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的体察和情思。从情感层次划分^[31]的角度看, 中华文明情感标识可以分为自强不息的自我情感、厚德载物的人际情感和保家卫国的家国情感。《哪吒2》既“以文化人”, 又“以情感人”, 通过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心领神会”, 连绵不断地传达延续中华民族的情感力量。

首先, 自强不息的自我情感。自强不息源自《周易》中的“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蕴含着中华民族自我珍视、自尊自重的自我关怀。在影片中, “魔丸转世”的哪吒自一出生便被贴上“魔童”的标签, 被陈塘关百姓视为妖怪和祸害, 甚至有街头顽童自发组成“伏魔帮”来降伏哪吒。哪吒在偏见和自我怀疑中孤独成长, 一度陷入自卑中。但哪吒没有选择自暴自弃, 伴随着父母的呵护、敖丙的支持、太乙真人的教诲, 哪吒内心的自我意识逐渐被唤醒——坚持自我、打破成见, 勇于和命运抗争。哪吒通过自己的行动逐渐赢得了他人的理解和尊重, 曾经敌视哪吒的“伏魔帮”也变成了尊敬哪吒、拥护哪吒的“哪吒帮”。在电影结尾处, 哪吒即便冒着形神俱灭的危险, 也要摆脱无量仙翁的束缚, 最终以自强不息的姿态, 实现了自己的升华。哪吒的成长史将“天命”与自我的对抗推向极致, 引发了无数观众的共鸣。当前, 精神内耗是一种普遍困扰年轻人的情感状态^[32], 即年轻人被外界评价所“绑架”, 忽略了最该重视的自我价值。陷入精神内耗后, 少数年轻人往往选择“丧文化”“摆烂文化”“躺平文化”这种逃避现实的方式来疏解压力。而影片中高喊“因为我们都还年轻, 不知天高地厚”的哪吒, 无疑为当下青年寻觅自我价值、达成自我和解提供了新的思路。生逢盛世, 肩负重任, 为中华民族发展而自强不息、奋发图强, 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应有的情感状态。

其次, 厚德载物的人际情感。人是社会的存在,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 501} 中国式的人际情感, 既表现为“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的朋友情, 也表现为“饮其流者怀其源, 学其成时念吾师”的师生情。无论是友情还是师生情, 中国式的人际情感均注重宽以待人、厚德载物^[33]。在《哪吒2》里, 哪吒与敖丙的友情超越了种族、身份和命运的束缚。从哪吒视角看, 哪吒深知被歧视的痛苦, 故而他以平等真挚的态度接纳敖丙。在龙族被栽赃嫁祸袭击陈塘关时, 哪吒尽管怒火中烧, 但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 不仅没有对敖丙大打出手, 反倒继续帮助敖丙恢复肉身。从敖丙视角看, 虽然背负着拯救龙族的使命, 但敖丙没有因为哪吒“丑萌”的外表和调皮捣蛋、离经叛道的性格而歧视哪吒, 也没有在家族使命和友情发生冲突时背刺好友, 而是在哪吒遭遇困境时高呼“我向来恩怨分明, 我一命换哪吒一命”, 与好友共进退。哪吒和敖丙的友情表明, 只要互相尊重、宽以待人, 即便是“水火”, 也能相容乃至相融。此外, 作为哪吒的老师, 太乙真人位列仙班、身份显赫, 但他没有因为哪吒的顽劣而责怪哪吒, 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像《西游记》里没有因为孙悟空天性顽劣不驯而放弃教育的菩提祖师一样, 太乙真人生动地演绎出中国传统文化里“做学

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34]形象。这份感人至深的师生情，同样拨动着无数观众的心弦。

最后，保家卫国的家国情感。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宗法社会决定了中国传统家庭和国家的组织结构、价值观念和运行逻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注重人伦、珍视亲情、家国一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突出特征。为家即是为国、为国即是为家，这种一致性将家庭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的理想追求。保家卫国的家国情感，是中华民族历经风雨磨难而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情感基石。“中国人历来讲求精忠报国，革命战争年代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都体现着向上的家庭追求，体现着高尚的家国情怀。”^[35]在《哪吒 2》里，作为陈塘关总兵的李靖，肩负着家庭责任和国家使命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尽管哪吒是魔丸转世，李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儿子，他希望哪吒能够走上正途，成为一个对百姓有用之人。在他看来，哪吒年纪小、入世浅，必须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在生活细节处培养哪吒立身行事、正义善良的品格，正如剧中他所说的：“一个好的榜样，能改变他的一生”。另一方面，李靖是恪尽职守、造福一方的好官。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他的职责要求他必须公正无私，在处理哪吒与百姓的冲突时，不徇私枉法，时时以百姓利益为重。哪吒的母亲殷夫人亦是如此，“正是殷夫人在去世前不顾一切的拥抱，让哪吒拥有了冲破‘穿心咒’的勇气，完成了重塑肉身的最后一步。母亲用自己的牺牲换来儿子的重生，帮助后者扫清了成为英雄路上的最后障碍”^[36]。

总之，创作者将自强不息的自我情感、厚德载物的人际情感和保家卫国的家国情感等情感标识，封存在作为文化产品的《哪吒 2》里，使其情感气韵浩瀚而丰沛，从而在春节档这一观众“全家出动”的时刻，广泛引发观众共鸣，获得了极高的讨论度。

（四）彰显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坚定共同体自信

个体对共同体的自信，表现为个体对共同体的发展前景持有乐观态度和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全党坚定“四个自信”，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37]。2024 年 12 月 13 日，在被誉为游戏界“奥斯卡”的 TGA2024 颁奖典礼上，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一举斩获年度“最佳动作游戏”和“玩家之声”两个奖项，激发了无数海内外玩家的文化自信心^[38]。2025 年春节前夕，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深度求索（DeepSeek）横空出世，所发布的开源模型颠覆了全球 AI 格局，“是从技术正义到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彰显”^[39]，标示着中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决心与自信。就像这些现象级科技文化成果一样，《哪吒 2》已然成为一种记录中华民族情感和思考、定格中华民族奋斗和探索、激发中华民族创造力和自信心的精神标识。《哪吒 2》彰显出中华文明一系列独有的精神标识，这些精神标识联系着古今、区分着中外，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强大精神文化支撑。

首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信，源自“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主体精神。自信是主体的自信，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巩固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40]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历史，是在“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前提下，不断铸牢文化主体性的历史。1941 年，万氏兄弟在人力物力处处匮乏的条件下，克服困

难、艰苦奋斗,完成了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的摄制,成为以动画电影讲好民族故事的典范。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克服技术落后、人员不足等困难,全力投入制作《大闹天宫》,该影片被网友誉为“动画电影业界史上的两弹一星”。1980年,木偶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上映,阿凡提倒骑毛驴的幽默形象,在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21世纪以来,迪士尼、梦工厂、皮克斯等国外动画进入中国市场,影响了国产动画的市场份额,《大鱼海棠》《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与《哪吒2》等兼具观赏性与思想性的佳作问世,让观众和世界通过多彩灿烂的东方影像世界,进入中华民族深邃浩瀚的精神世界。如《哪吒2》的导演饺子所言,中国的故事该由中国人自己讲,“传统IP能传承这么久,一定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41]。据央视新闻报道,《哪吒2》的成功源自全国近140家动画公司、4000余名工作人员的全力托举^[42]。在我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背景下,近140家中国动画公司合力蹚出了属于中国动画的前路,这亦是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必由之路。

其次,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信,源自“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创新精神。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43]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不是“虚无主义”“西化论”的自卑,也不是“保守主义”“复古主义”的自傲,而是结合时代需求,在文明更新的意义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17] 97},要基于当下时空的实践范畴来思考文化自信。例如,在明代的《封神演义》中,高呼“我一人行事一人当”的哪吒,身上带有反抗父权、倡导人性解放等晚明的思潮印记;2003年上映的《哪吒传奇》,则是延续儿童文学路线,扬弃了原著中的封建暴力元素,更贴近21世纪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哪吒2》化用了哪吒闹海的典故,在叙事结构、角色塑造、视觉技术、文化表达等动画电影的方方面面,实现了别出心裁的创新。在视觉技术方面,《哪吒2》共涉及1900多个特效镜头、1万多个特效元素,其动作捕捉、三维扫描建模、物理引擎渲染技术展现出国际领先的水准,创造出既具有中华文化特色,又符合全球观众审美的视觉效果。《哪吒2》的技术创新,反映出中国动画工业在现代化进程中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折射出中华民族拥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勇气和自我突破、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旺盛生命力。《黑神话:悟空》在哔哩哔哩跨年晚会专场的出场词讲到,“小猴子睁眼看天,从未高过头顶,你真正要战胜的唯有自己罢了”。注重革新、创新、立新的创新精神,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禀赋。

最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信,源自“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包容精神。《哪吒2》实际上蕴含着“不同文明如何相处、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重大命题。其中,作为阐教的掌权者,道貌岸然的无量仙翁为了满足自己炼制仙丹、增进修为的贪欲,纵容捕妖队大肆抓捕其他正常生活的族类。被囚禁于海底天牢的龙族、被屠城的陈塘关,均是仙界内部斗争的牺牲品。结合现实来看,总有美西方国家信奉“民族主义”“地域主义”,通过军事同盟、经济制裁、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输出等霸权主义手段维护自身特权地位,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不公正的政治经济格局,导致贫困问题、教育问题、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愈发难以解决。中华民族始终秉持“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包容精神,致力于打破地缘政治、民族政治“小圈子”,倡导世界各国各民族加强多边合作、推动经济自

主、维护文化多样性，绘就世界和平“同心圆”。《哪吒2》里，战胜无量仙翁靠的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龙族、人类、仙人、妖族的精诚合作。类似地，全球治理实践也离不开每一个国际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和坦诚相待。中国积极主动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发展潮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不断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注入信心和动力。此外，共通的情感叙事使《哪吒2》这样一个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的故事，日益跨越语言、文化、审美、种族、地域的差异，为全世界观众所惊叹。有韩国网友评价道，这是“充满代入感的英雄成长故事”^[44]。《哪吒2》在联合国总部举办影片放映会、敖丙的“万鳞甲”闪耀北美银幕、影片中的蒙古族呼麦与侗族大歌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影院响起，无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出强劲的文化动能，世界也将从中感受到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爱好和平的伟岸形象。

四、经验与启示

从经验启示层面讲，《哪吒2》在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实现了从“标识塑造”到“意识铸牢”的衔接，展现出独属于中国电影创作者的文化抱负，为国产动画电影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呈现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法论。更广泛地看，《哪吒2》案例也为我们创新运用各种载体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供推广的经验和启示。

第一，利用好各民族文化资源“富矿”，挖掘提炼中华文明标识支撑动画电影叙事。“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格局，“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兼收并蓄，逐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5]5}。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标识在经过悠久的历史积淀、时代淬炼和人民意志的选择之后形成的，具有广泛认同感的标识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被反复使用和重新诠释，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可以客观地揭示出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通过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机制，不同民族文化在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框架内得到有效的整合，从而促进了民族团结与文化交融。电影创作者要善于从各民族文化资源中探寻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共享性的中华文明标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增进一体，并不断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元素进行文化再生产，为新时代动画电影叙事提供丰富的素材元素，形成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电影视听体系。

第二，发挥多元主体协同优势，广泛解读宣介动画电影的中华文明标识元素。动画电影的主题和内容往往具有开放性，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对电影进行个性化的理解。多元主体要善于从中提炼符合国情的核心价值，广泛解读宣介动画电影的中华文明标识元素，在影片内外唤起观众的共同体认同意识。党媒党刊积极主动挺进并占领互联网阵地，注重宣传实效，找准思想认识的共同点、情感交流的共鸣点、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化解矛盾的切入点，确保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能量作品“飞入寻常百姓家”。相关部门加强和改进动画电影内容管理工作，落实动画电影管理责任，明确文化导向，使动画电影文化产品更好满足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要求。电影创作者积极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提高影视产品的文化内涵，大力弘扬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在作品中全

面、客观、立体地呈现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并通过展览、讲座、观影会、工作坊等形式, 广泛解读宣介动画电影中的中华文明标识元素。

第三, 建立以“共情思维”为内核的传播方式, 寻求观众最大化的情感认同。共情是凝聚共识的有效途径, 《哪吒2》等承载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动画电影绝非是自我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文化消费工业, 而是与文化历史积淀、社会历史条件和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息息相关的文化产业。观影本身既是互动娱乐的过程, 也是文化熏习与情感共鸣的过程。《哪吒2》在影片叙事中融入了自强不息的自我情感、厚德载物的人际情感、保家卫国的家国情感等中华文明情感标识, 超越了国家、民族和地域的圈层界限, 唤起了观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厚的共情意识, 成为各族人民文化交流和情感互动的重要载体。创作者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基层, 善于选取容易激活观众积极情感的情感标识, 以中华文明情感标识增进观众与电影、观众与观众、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精神契合与情感互动, 以中华文明情感标识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并在艺术创新中对这些具有标识意义的情感加以强化, 增加观众的“入戏感”, 在影视角色与观众自我之间架起情感桥梁。

第四, 不断增强动画电影等载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这种进取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鲜明表现, 使得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国产动画电影正是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的推动下, 不断自我革新与突破, 逐渐摆脱对国外动画的模仿, 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哪吒2》“成功复活了‘往事’, 让古老的故事融入当下, 成为全新的审美经验和当下生活所必需的精神饮品, 让神话中蕴含的梦想和改造世界的能量鼓舞青年一代”^[45]。着眼未来, 国产动画电影应继续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将民族记忆和文明基因熔铸于动画电影叙事中, 用具有民族特色的动画语言彰显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展现中华民族精神风貌、描绘中华民族精神世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使自身成为中华儿女共享文化根脉、共筑精神家园的文化象征。要继续发挥动画电影等多元媒介的力量, 为构建一个认同感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4: 65.
- [2]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3-10-29 (1).
- [4]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29.
- [5]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4年9月27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10.
- [6] 陈旭光, 孙茜蕊. 媒介、文化、技术美学与想象力消费——论近年中国动画电影的工业与美学 [J]. 未来传播, 2024 (1): 85-92+125-126.
- [7] 何超彦, 彭佳. 中华文化符号的间性建构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以中国当代民族动画电影为例 [J]. 民族学刊, 2024 (9): 21-34+151.
- [8] 寇强. “中国学派”动画的民族风格范式及文化观念溯源 [J]. 民族艺术研究, 2014 (1): 100-104.

- [9] 罗兰. 国漫文化的表意实践、发展逻辑与正向建构 [J]. 电视研究, 2022 (7): 74-77.
- [10] 国务院台办新闻发布会辑录 (2025-02-12) [EB/OL]. (2025-02-12) [2025-02-15]. http://www.gwytb.gov.cn/xwdt/xwfb/xwfbh/202502/t20250212_12683854.htm.
- [11] 预售火爆!《哪吒2》今日起在港澳公映 [EB/OL]. (2025-02-22) [2025-02-23]. <https://news.cctv.cn/2025/02/22/ARTIJrakk0JYJiiUcNTz5Vd3250222.shtml>.
- [12]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19 年 9 月 27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7.
- [13] 张碧. 社会文化符号学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2.
- [14] 齐格蒙特·鲍曼. 共同体: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 [M]. 欧阳景根,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7.
- [15]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N]. 人民日报, 2022-03-06 (1).
- [16] 欧阳彬, 魏莹. 日常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逻辑理路与实践向度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82-93.
-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11.
- [18] 冯月季.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元符号机制、挑战与路径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2): 25-32.
- [19] 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 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M]. 徐亮, 陆兴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0.
- [20] 任紫鑫, 肖莹佩, 陈丽霏, 等. 将“哪吒热”流量转化为“留量” [N]. 四川日报, 2025-02-12 (1).
- [21] 李倍雷. “纹”以载道: 中国古典图案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J].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4): 130-138+148.
- [22] 张法. 中国远古之美的总体结构、四大器物与美学特质 [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3 (2): 99-114+158.
- [23] 张娜.《哪吒之魔童闹海》: 以科技与文化的交响, 奏响国漫工业的世界强音 [N]. 中国电影报, 2025-02-19 (3).
- [24] 沈冰. 音乐助攻“哪吒”放异彩 (文化之眼·从《哪吒2》谈开去④)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5-02-21 (7).
- [25]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M].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71.
- [26] 胡百精. 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 [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4 (3): 98-106.
- [27] 习近平.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 [J]. 求是, 2022 (18): 4-9.
- [28]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 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参加看望和讨论 [N]. 人民日报, 2023-03-07 (1).
- [29] 严庆, 余金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论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3): 24-32.
- [30] 高永久, 冯辉.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共同”意涵与建设要求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56-69.
- [31] 胡兆义. 理念、过程与效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路径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4 (6): 55-62.

李培鑫.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理与启示——基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论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108-121.

- [32] 宋德孝, 白靖楠. 当代青年自嘲镜像及其辩证省思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5 (2): 32-39.
- [33] 孙伟平, 贺敏.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价值观及其伟大实践 [J].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 2024 (6): 5-12.
- [34]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王沪宁陪同考察 [N]. 人民日报, 2022-04-26 (1).
- [35]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545.
- [36] 王金跃. 《哪吒2》原来藏着这么多文化密码 [N]. 北京日报, 2025-02-13 (7).
- [37]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6年7月1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3.
- [38] 李培鑫. 《黑神话: 悟空》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逻辑、路径与启示——基于文化符号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63-76.
- [39] 曹克亮. “DeepSeek 时刻”: 从技术开源到技术正义的政治学分析 [J/OL].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1-13 [2025-02-26]. <http://gfagz2374dada52f84efcskqnxw5cpwfv6pvq.fzfy.oa.swupl.edu.cn/urlid/50.1215.C.20250226.0959.002>.
- [40] 习近平. 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年6月2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9.
- [41] 刘阳. 专访《哪吒2》主创解锁成功密码 [N]. 人民日报, 2025-02-13 (8).
- [42] 近140家公司、4000多人全力托举, 这是中国动画的“万鳞甲”! [EB/OL]. (2025-02-13) [2025-02-23]. <https://news.cctv.cn/2025/02/13/ARTIy7gqOP0gcaGAqEQ7BSkx250213.shtml>.
- [43]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8年12月18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39.
- [44] 闫丛笑. 《哪吒2》全球热映: 踏浪出海破圈前行 [N]. 光明日报, 2025-02-19 (12).
- [45] 张妮. 著名神话学家、文化学者朱大可接受《环球时报》专访 “新神话”创作, 要打破“认知结界” [N]. 环球时报, 2025-02-24 (11).

责任编辑: 王京菁 校对: 龚静阳



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机制创新与实践理路

——基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案例分析

刘衍峰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文化主体性凸显出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信程度。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多重困境。符号阐释的僵化导致文化基因的“博物馆化”，叙事逻辑的单一性难以回应现代议题的复杂性，技术工具的依附制约文化表达的独立性。《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语境转化、传统哲学与时代精神的深度对话、本土工业生态的范式革命，实现了符号转译、叙事创新与技术自主的三维突破，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提供了崭新的实践路径。《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成功实践表明，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创新，需以“两创”激活传统基因的解释力，以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构建自主生产生态，以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重构古今对话逻辑，最终实现从文化资源到文明话语的范式跃迁。

关键词: 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产业；《哪吒之魔童闹海》

中图分类号: G122；J9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5) 02-0122-13

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

DOI: 10.13946/j.cnki.jcqi.2025.02.011

作者简介: 刘衍峰，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高等教育专项）“社会调查全方位嵌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研究”（2023GXJK059）；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数字化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研究与实践”（2023WQNCX084）

引用格式: 刘衍峰. 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机制创新与实践理路——基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案例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122-134.

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强调“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1]。主体性作为一个关系范畴,指的是人在实践活动中与对象性客体形成的关系、地位、作用和影响的性质。“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表征,是在推动文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等的价值理念和存在状态,是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文化特质和独特价值体系。”^[2]文化主体性凸显出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信程度。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任何民族要做到自立自强,就必须具有文化主体性。

不同于器物层面的文化输出或符号化的传统展演,影视艺术的深度赋能,在于其能够通过视听语言、叙事逻辑与技术美学的系统性整合,激活传统文化的解释力与行动力,使其从历史遗产升华为参与文明建设的活态资源。这一过程不仅关乎文化表达的创新,更触及文化主体性在当代的根本命题——如何在技术迭代与价值变迁中,守护文化基因的根本,同时构建具有现实意义的叙事体系。当下,学术界关于影视艺术与文化主体性叙事的研究论述颇丰,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一方面,探讨文化主体性对影视作品的影响作用。有学者指出,文化主体性在影视创作中起到了指导和塑造的关键作用,支配着主题创作的方向、内容以及表达方式^[3];不同的文化叙事主体具有自己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其所创作的同一题材的影视作品也会携带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4]。也有学者指出,文化主体性表征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及隐于其后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塑造与建构,依赖于影视艺术等媒介传播^[5]。另一方面,探讨影视艺术对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作用。有学者指出,影视艺术已成为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巩固了文化主体性^[6]。有学者从民俗视角切入,认为影视艺术将民俗文化抽离原生的文化空间并融入影像世界,进行创意加工,达到了文化主体性的再生产^[7]。有学者从著作还原角度出发,指出影视作品将文学名著的文字形态转化为形象的影视形态,并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还原,经由古代文学名著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才得以成为新语境下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播形式,对文化主体性的叙事起到了转化作用^[8]。

已有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影视艺术丰富文化主体性叙事奠定了学术基础,但当下相关成果的研究范畴较为宏观,少有针对某个影视作品去研究文化主体性的叙事机制。基于此,本文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为具体案例,分析当下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的现实困境,解读《哪吒2》创作体现的文化主体性叙事机制创新,提出未来加强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的实践理路,以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参考。

二、际遇审视：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的当代困境

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进程中,面临深层的结构性挑战。符号表达的僵化与误读,折射出传统文化符号在现代传播中的阐释困境;叙事逻辑的单一性与失语,表露出传统文本与现代价值观的适配困境;技术工具的过度依赖,使文化创新受限于外部规训。

(一) 阐释困境：符号表达的僵化与误读

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种条件^[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作为历史的留存汇集了各民族智慧的文化遗产,存储了中华民族共

同的文化记忆，书写了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是当前塑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资源”^[10]，但其在当代语境中的阐释面临静态化与单向度的困境。这种困境并非源于符号本身的贫瘠，而在于其阐释系统未能有效对接现代社会的意义生产逻辑。当传统文化符号脱离其原生的意义网络，被简化为静态的图像或空洞的消费符号时，其承载的文化记忆与价值内核便面临被稀释甚至消解的风险。

符号表达的僵化源于文化传承过程中形式与意义的割裂。传统文化符号如龙、太极、水墨等，往往被视为文化身份的标识物，但在现代社会的传播实践中，其符号价值常被简化为视觉奇观或商业标签。这种简化背后是文化主体对传统符号的“博物馆化”处理，即将其固化为可供展示的“遗产标本”，而非活态的意义载体。“从指代关系的体现看，民族文化符号中包含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能指是符号的物质表现，所指是这一符号所代表的深层次意义。”^[11]符号的能指（如龙的形态、水墨的笔触）总是被过度强化，而所指（如龙象征的宇宙秩序、水墨蕴含的天人合一观）则逐渐隐没于现代认知的盲区。这种割裂使得传统文化符号沦为缺乏生命力的装饰性存在，难以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诉求产生深层对话。更值得警惕的是，当符号的意义生产让位于形式复制时，文化传承便异化为机械的符号搬运，失去了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符号的误读是指“歪曲了文本或其他阅读对象的原本含义，是对原文化的错误阅读和理解”^[12]，其与全球化语境下的权力关系紧密相连。“在海外文化对中国文化想象方式的展开中，包含着文化主体对文化‘他者’的观看动机、文化对话的机制、话语表述等一系列文化问题。”^[13]譬如，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木兰》系列电影将中国原本故事中花木兰出于忠孝之道、替父从军的参军动机，替换成不甘心自己命运、为实现个人价值的西方个体独立精神^[14]。这种误读并非偶然的认知偏差，而是西方文化霸权运作的必然结果。通过将“他者”符号纳入自身的话语秩序，西方得以巩固其作为意义阐释权威的地位。在此过程中，传统文化符号的原初意义被系统性遮蔽，转而成为印证西方文化优越性的“他者镜像”。这种误读机制不仅扭曲了符号的文化内涵，更通过符号的流通与消费，再生产出平等的文化权力结构。

符号的僵化与误读共同构成了文化主体性的解构性力量。当传统文化符号无法在现代语境中实现意义的再生产时，文化认同便面临碎片化的风险。年轻一代对传统符号的疏离，并非源于对文化价值的否定，而是因为这些符号未能有效回应其现实关切。当春节的灯笼被简化为商场装饰，当书法艺术沦为社交媒体的话题标签，符号的形式越是泛滥，其承载的文化意义反而越显稀薄。与此同时，西方话语对符号的误读性挪用，加剧了文化主体性的分裂。本土群体既无法在传统符号中找到认同根基，又难以摆脱西方阐释框架的隐性规训。这种双重困境使得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生态中陷入“表达的焦虑”，既要抵抗符号的僵化以维系文化血脉，又需应对误读的侵蚀以捍卫解释主权。

（二）适配困境：叙事逻辑的单一性与失语

中华文化的传统叙事体系根植于农耕文明与宗法社会的历史土壤，其叙事逻辑以“天命观”“因果轮回”“家国同构”为核心框架，构建了一套自洽的意义生产系统。然而，在现代性语境下，这一系统的适配能力遭遇叙事模式的“单一性”与全球化语境下的“失语症”，即叙事逻辑的固化与阐释能力的弱化。当传统文化无法通过多元叙事回应现代社会的复杂议题时，其价值传递功能便逐渐萎缩，进而导致文化主体性在话语竞争中的边缘化。

叙事的单一性首先表现为叙事模式的程式化与封闭性。传统神话、民间故事等文化载体,往往依托“天命论”“善恶对立”“因果报应”等单一逻辑展开,这种叙事模式在农耕文明中曾有效维系了文化认同与社会秩序。然而,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线性叙事难以承载个体身份焦虑、制度性偏见等复杂议题。例如,“忠孝节义”的道德训诫在传统戏曲中通过脸谱化角色传递,但当人们面对“原生家庭”“职场压迫”等现实困境时,这种单向度的价值灌输反而加剧了传统与现代的割裂。更关键的是,叙事逻辑的固化导致文化解释力的退化。当“哪吒闹海”的故事仅被解读为反抗权威的个体觉醒,而忽视其背后“劫难一重生”的隐喻时,传统文化的哲学深度便被简化为浅表的戏剧冲突。这种单一性进一步演化为叙事话语的自我重复与创新匮乏。在文化工业的再生产过程中,传统叙事常陷入两种极端:一是机械复刻经典情节,如西游题材的无限翻拍;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度创作,通过低品质内容吸引公众流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与流行文化和各类新技术手段进行生硬地结合^[15],二者均未触及叙事内核的创造性转化。其后果是叙事文本沦为“空壳化”的符号堆砌,观众记住的是华服美饰、特效奇观,而非文化价值的深层共鸣。这种“有形式无内容”的叙事困境,实质是文化主体性在意义生产环节的退场。当叙事不再承载独特的价值判断与世界观阐释时,传统文化便失去了与现代社会对话的能力。

失语症则指向更深层的文化话语权危机。西方国家凭借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先发优势,塑造了国际舆论的主导叙事框架,非西方叙事往往被迫嵌入西方设定的阐释框架,才能获得传播“合法性”^[16]。这种“适配性改造”导致双重异化:一方面,“中国文化试图搭载国际化电影走向世界,却在好莱坞类型惯例和标准的要求下被改写和误读”^[17];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独有的价值观念(如“天人合一”“家国同构”)因难以被西方话语体系消化而被阉割。更严峻的是,这种失语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当本土创作者习惯用他者语言讲述自身故事时,传统文化的原生叙事逻辑便逐渐被遗忘,最终导致文化基因的断裂。失语症的本质是阐释主权的丧失,在跨文化传播中,叙事不仅是故事讲述,更是意义争夺与价值输出的战场。当《梁祝》的爱情悲剧必须借助“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类比才能被西方观众理解时,中国叙事便沦为西方话语的注脚;当功夫被简化为动作奇观而非“止戈为武”的哲学表达时,文化阐释权便让渡于消费主义的逻辑。这种阐释主权让渡的后果,是中华文化在全球话语体系中陷入“解释的贫困”——我们能够输出符号,却难以传递符号背后的意义体系;我们能够生产文本,却无法定义文本的解读规则。

(三) 依附困境: 技术工具的外部依赖

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在技术工具层面的困境,本质上是全球文化工业体系中技术标准与文化话语权深度绑定的结构性矛盾。技术工具作为文化生产的物质载体,其设计逻辑与操作规范并非价值中立的客观存在,而是内嵌着特定文化主体的认知范式与权力意志。当本土创作被迫依附于西方主导的技术体系时,工具的技术理性便转化为对文化自主性的隐性规训,导致文化表达陷入“形式自由”与“意义禁锢”的悖论。

技术依附性首先表现为文化生产工具的外源性垄断。“在科技垄断的权力构建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凭借垄断以科技为核心的知识资源,控制着生产和流通的关键节点,并通过强化从属企业和国家对其的依赖关系来维护不平等的权力结构。”^[18]从三维建模软件到渲染引擎,从虚拟制片系统到动作捕捉协议,文化产业的核心技术架构长期由西方企业主导。“技术可以被看作一

种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工具和机器只是这种文化的标志。”^[19] 西方企业通过软件界面与操作规范将文化偏好（如写实主义美学、个人英雄叙事）内嵌于工具使用中，悄然重塑着使用者的创作思维。当中国动画师使用好莱坞开发的骨骼绑定系统时，其角色动作的物理参数已预设了西方身体文化的运动逻辑，中国古典舞的“拧、倾、圆、曲”等东方美学特征被迫进行“技术适配性改造”。这种改造的实质是本土文化符号在技术框架内的阉割，为了匹配工具的限制，创作者不得不舍弃无法数字化的传统美学元素，导致文化表达逐渐趋同于他者设定的视觉范式。

技术依附的深层危机在于技术垄断对创新路径的锁定效应。“创新是社会、经济、政治、技术发展过程相互塑造的结果，而创新的过程往往内嵌着维护社会制度秩序的价值目的。”^[20] 西方通过将特定技术路线建构为“行业最佳实践”，迫使其他国家陷入“追赶—落后”的恶性循环。这种技术演进的单向度逻辑，本质上是文化解释权的争夺。更严峻的是，技术依赖催生出认知层面的自我矮化，本土研发往往聚焦于对西方技术的应用优化，而非基于文化特质开展原始创新。这种思维定式使得中华文化在数字时代面临双重异化，既无法完整传承传统美学的精神内核，又难以建构独立的技术美学体系。技术依附性困境的终极后果，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数字时代的结构性消解。当文化生产的每个环节，从创意生成到视觉呈现，从内容分发到价值评估，都深度嵌套在他者技术体系中时，中华文化对外交流和传播面临困难。更危险的是，这种依附性具有代际传递效应。年轻创作者在西方工具环境中成长，其美学认知与创作思维已被技术标准预先形塑，导致文化创新始终在既定的轨道上滑行。

三、机制创新：《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文化主体性叙事实践

《哪吒之魔童闹海》以实践智慧突破了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困境，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叙事路径。符号转译的突破在于重构文化阐释权，叙事创新的核心是文化升维的现代价值耦合，技术自主的实践则打破西方工具对文化表达的垄断。

（一）符号转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语境转化

《哪吒 2》的符号转译实践，本质上是对文化主体性在当代语境中“可译性”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影片通过双重策略——既保留符号的文化基因本真性，又通过媒介再造实现跨语境共鸣，构建了传统文化符号从“地方性知识”向“普适性话语”的转化路径。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符号移植或形式改良，而是以意义再生产为核心，在符号的稳定性与开放性之间建立动态平衡，为中华文化的现代转译提供了范式性突破。

符号转译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消解高语境文化的传播壁垒。传统符号的意义生成往往依赖特定的历史、地域与伦理语境，例如“三星堆青铜纹饰”隐含的巫覡文明信仰、“川剧变脸”承载的民间叙事传统，若直接移植至现代银幕，极易陷入“文化不可译性”的困境。“人是一种符号性存在，符号的功能除了表达意义之外，还能唤起人类的情感。”^[21] 《哪吒 2》通过降维编码策略，将高语境符号转化为低门槛的视听情感。以“太乙真人”形象为例，其“川普”方言设计并非对地域文化的简单消费，而是通过喜剧化表达解构修仙叙事的权威性。方言的俚俗质感消解了传统仙侠角色的疏离感，使地域文化突破“奇观化”窠臼，转化为情感共鸣的叙事接口。通过降格神圣性，符号得

以在通俗性与严肃性之间建立弹性对话空间, 既保留文化基因的在地性, 又实现跨区域传播的可达性。

符号转译的深层实践体现为符号系统的语义重构。《哪吒 2》对“龙”这一符号进行细腻处理, 敖丙的龙族形象解构了西方影视中喷火怪兽的刻板形象, 通过动态粒子系统与 3D 水墨渲染技术, 将龙鳞转化为 220 万片独立渲染单元, 每片鳞甲的反光、磨损与水珠附着均通过物理引擎模拟。这种技术赋权下的符号再生产, 既保留了“龙”作为东方神兽的神圣性, 又赋予其符合现代审美的视觉质感。这种语义重构超越了符号形式的现代化, 直指文化基因的意义激活。当西方观众惊叹于龙鳞的粒子动态时, 他们必须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符号背后的文化深度。

在视觉符号层面,《哪吒 2》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媒介的辩证融合, 构建了东方美学的表达范式。在结界兽的设计上, 导演团队将青铜大面具的几何化线条转化为卡通角色的方正脸型, 既保留了文物古朴的视觉冲击, 又通过圆润化处理增添亲和力, 通过卡通化处理消解文物的历史距离感^[22]; 混天绫的飘动轨迹暗合书法笔意, 将“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转化为可量化的动态参数^[23]。这种转译实践并非对传统的符号化挪用, 而是通过媒介革新重构符号的意义网络。锣鼓、唢呐以及戏曲唱腔和念白持续融入影片, 哪吒的形象设计、动作、表情等都与京剧武生的“唱念做打”有许多相似之处^[24]。这种转译方式既饱含深厚的文化底蕴, 又展现了民族精神与创新能力。

(二) 叙事创新: 传统哲学与时代精神的深度对话

在传统文化叙事的现代转型中, 如何实现古典资源与当代精神诉求的有机对话, 始终是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关键命题。《哪吒 2》通过叙事结构的深层重构, 将道家哲学的本体论思考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相融合, 在解构传统“天命论”的同时, 构建起回应现代性困境的价值话语体系。这种叙事革新并非简单的主题置换, 而是通过重新编码神话原型的内在逻辑, 使传统文化基因在现代社会土壤中焕发力量,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方法论。

传统神话中的“善恶二元论”被解构。影片中哪吒与敖丙的“灵魔一体”设定, 将道家“阴阳互根”的哲学思想具象化为叙事动力。灵珠与魔丸本为混元珠分裂的两极, 二者既对立又依存, 共同构成人性的完整光谱。哪吒的“魔性”不再象征纯粹的恶, 而是未被规训的生命力; 敖丙的“灵性”也不再代表绝对的善, 而是背负族群使命的压抑性自律。这种设定颠覆了传统神话中“正邪对立”的简单逻辑, 转而以“阴阳共生”的辩证思维, 揭示善恶的本质是权力话语对人性复杂性的暴力切割。

《哪吒 2》对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体现文化升维。李靖夫妇的“牺牲式教育”与哪吒的叛逆, 构成“孝道”与“个体自由”的张力。传统叙事中“剔骨还父”的决裂, 被改写为“穿心咒”下的重生。哪吒肉体的撕裂既是挣脱宿命枷锁的隐喻, 也是代际冲突的痛感表达。然而, 影片并未陷入“弑父”式的极端反抗, 而是通过殷夫人的牺牲与李靖的默默守护, 重构了家庭关系的伦理内核。这种处理既保留了儒家“亲情至上”的价值底色, 又回应了现代个体对情感平等的诉求, 展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耦合可能。

更深层的哲学重构体现在对权力机制的祛魅式书写。以玉虚宫为代表的天庭被塑造为一个洁白无瑕却冰冷压抑的官僚机构, 仙翁们以“教化众生”之名行资源垄断之实。这种设定不仅解构了传统神话中“神仙一凡人”的等级秩序, 更隐喻现代科层制对个体的可能异化。申公豹的悲剧命运揭

示了在固化的制度框架下，个体的奋斗往往被系统性地吸纳为维持现状的养料。《哪吒 2》通过这一角色的挣扎，叩问了现代社会公平的实质，将神话叙事升维为对结构性压迫的哲学批判。“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注入，标志着叙事逻辑的终极升华。最终决战中，众生托举天元鼎的集体觉醒，则将儒家“和”的理念升华为对抗制度性压迫的力量。这种叙事设计拒绝了好莱坞式的“孤胆英雄”拯救模式，转而强调个体觉醒与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当哪吒从“逆天改命”的叛逆者转变为“重构规则”的责任承担者时，其成长轨迹暗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

（三）技术自主：本土工业生态的范式革命

在全球化技术霸权格局下，文化产业的竞争本质上是工业体系自主性的较量。《哪吒 2》的技术自主实践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产业垄断模式，通过协作范式革新与产业集群构建，完成了从技术依附到独立自主的范式革命。这场革命的核心在于将技术攻关与文化主体性建构深度融合，以本土工业体系的全链条自主创新，重构了中国动画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为文化产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

《哪吒 2》的工业化突破，首先在于其颠覆性的协作模式。《哪吒 2》的工业化生产流程打破了传统动画制作的“作坊式”模式，转向高度分工与标准化协同的工业体系。影片制作涉及 138 家本土动画公司，覆盖建模、渲染、动作设计等全流程环节。制片方采用了“模块化管理”模式，将整个项目分解为 26 个独立模块，每个模块由专业化团队负责，实现了从创意到成品的无缝衔接^[25]。例如，追光动画主攻特效，原力动画聚焦角色设计，天工异彩承担场景构建，这种分工模式显著提升了效率与质量稳定性。与此同时，云端协作平台与标准化资产库（如角色模型、场景数据库、动作捕捉库）的建立，使分散于北京、成都、深圳等地的团队能够实时共享资源、同步版本迭代，形成“云上工作室”的协作网络，实现了实时渲染、版本控制和质量监控，大大提升了制作效率和协同能力^[26]。

其次，跨区域技术协作的深化凸显了中国动画工业的集群效应与生态整合能力。《哪吒 2》的制作依托成都、北京、深圳等地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这些地方通过政策扶持（如成都的动漫产业专项资金、虚拟摄影棚建设）与人才储备，形成了“技术研发—内容生产—衍生开发”的完整链条。以成都为例，可可豆动画、成都光线动画、自在境界、墨境天合成都（总部在北京）、千鸟文化、画心科技、云海天聚、炬煌文化、声娱文化等企业在百米半径内抱团合作^[27]，这极大提升了沟通效率。这种区域间“技术互补+地理集聚”的双重协作机制，不仅突破了单一团队的技术瓶颈，更通过资源整合将分散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整体竞争力，为动画工业的分布式协作提供了新思路。

最后，视觉奇观的技术创新从“追赶”转向“定义”国际标准。面对好莱坞设定的写实主义美学霸权，《哪吒 2》选择以东方美学与动态粒子系统建立差异化标准。其一是物理引擎的自主化。为呈现 2 亿角色同屏的“洪流对撞”，团队摒弃了传统的“粒子群模拟”或“远景简化”手法，而是为每个角色绑定独立物理引擎，并开发了独特的动态算法，确保 2 亿角色在动作、节奏、光影上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28]。这种技术路径不仅解决了计算量几何级暴增的瓶颈，更形成可复用的行业解决方案。其二，渲染技术的本土化。通过引入虚幻引擎 5 的 Nanite 技术，将渲染效率提升了 300%；借助“伏羲”AI 渲染系统，制作效率提升了 4 倍，同时成本降低了 37%^[29]。尤为关键的是，团队开发了基于水墨层次感的 NPR（非真实渲染）着色器，以“远虚近实”的光影逻辑再现国画意境。其三，

生产工具的国产化。光线传媒自建神话 IP 数据库与云计算渲染平台, 将毛发、水体等“技术禁区”转化为自主创新的试验场。《白蛇》系列的独立发丝计算、《深海》的水墨粒子技术, 均在此体系下孵化, 逐步摆脱对 Maya、Houdini 等西方软件的绝对依赖。

四、理路勾勒：《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文化主体性叙事启示

《哪吒 2》的成功经验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践路径。要以“两创”原则激活传统基因, 将文化符号转化为现代叙事的价值载体; 通过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生态协同, 构建从资源保护到市场转化的完整链条; 依托中国话语创新阐释, 形成中国叙事新体系, 最终实现从“文化资源”到“文明话语”的历史性跨越。

(一) 文化主体性自觉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0] 在文化主体性叙事的当代语境下,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仅是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原则, 更是文化实践的核心命题。二者的深度融合要求传统文化资源既非僵化固守亦非盲目西化, 而是在现代性转化中实现文化基因的激活与价值逻辑的重构。《哪吒 2》的实践表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并非简单的符号拼贴或技术移植, 而是需要建立一套从符号表达到价值传递的系统性转化框架。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 必须明确转化什么、发展什么。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发展于漫长的历史过程。对传统文化应采取有鉴别的态度, 对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文化元素, 应进行符合当代需要的改造, 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使其在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新使命中发挥作用^[31]。究其实质, 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予以扬弃,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批判性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传统《封神演义》中, 哪吒是灵珠转世, 因性格暴戾引发祸端, 最终析肉还母、析骨还父^[32]。《哪吒》系列电影则通过“逆天改命”的叙事内核, 让反叛的哪吒成为“Z 世代”的精神图腾, 这种创造性改编让哪吒从“神话符号”演变为“情感共鸣”的作品^[33]。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 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性, 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经典性”意味着典范性、超越性、传承性和独创性。在世界文明史上有一个重要现象, 就是各民族都有作为其精神信仰的经典。中华文明的古老经典, 如《诗》《书》《礼》《易》《乐》《春秋》等, 反映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 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 后世许多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最初的原型, 由此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思维方式。从这些重要文献中, 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是谁”“我们中华民族是怎么来的”, 保护它、研究它、传承它, 对后世子孙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哪吒》系列电影对孝道文化的诠释, 实现了从单向服从到双向奔赴的质变。李靖闯天宫求取改天换命符, 为哪吒代受天劫, 将爱子心切的严父形象完整呈现。这种改编精准击中了当代社会的代际沟通困境, 让“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远”的古训焕发新生。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 要以服务人民为出发点。文化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力量。坚持文化的“人民性”, 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显著标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不仅追求物质富足，更追求精神富足，对高品质、个性化的文化生活需求更加强烈，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是“两创”的重要动力。人民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更是文化的享有者，要坚持文化惠民理念，把“两创”成果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传播出去，最大限度、更广范围服务于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哪吒2》之所以能够取得现象级的成功，就在于它坚持以观众为导向去创作。片尾“洪流对战”的场面宏大，人员数以亿计，而且每个人的表情和动作都不一样，有的挥动战旗，有的拿着武器进攻，仅制作这个视效就花了一年半左右。影片开头代表哪吒和敖丙的两坨藕粉，状态既要符合力学规律，又要实现美术造型上的“既有形又无形”，视效制作周期长达半年。正是这种对作品精益求精的态度，使《哪吒2》收获了观众的喜爱。正如导演饺子所说：“电影不是拍给导演看的，而是拍给观众看的。只有尊重观众，观众才会尊重你。”^[34]

（二）文化主体性的生态协同：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七个着力”要求，其中包括“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繁荣发展需要协同并进，但这并非简单的资源叠加或功能互补，而是一种基于价值共享、资源互通与制度耦合的生态化演进过程。《哪吒2》的成功实践表明，公共文化服务与市场化生产的双向赋能，有助于构建从文化资源保护到创意产品开发、从文化思想传播到产业价值转化的完整链条，最终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要深度挖掘、统筹整合文化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35] 迄今全国共有 5 630.43 万件文物藏品，5 058 处重点文化保护单位，10 万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1 557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44 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这些数据背后蕴藏的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资源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都是可供深度挖掘的优质文化资源^[36]。

《哪吒2》深度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从道教哲学、文物彩蛋到地域文化，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哪吒（属火）与敖丙（属水）的设定体现了道教“阴阳”思想，两人重塑肉身时遵循“水克火”“金生水”的五行生克原理；粗眉结界兽和卷鼻结界兽，借鉴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的特征；太乙真人的洞府设计参考四川绵阳江油乾元山金光洞，崖壁石刻与电影场景呼应。以上种种电影设计，为我们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展了视野。为此，应加快构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文化资源数据平台，编制重点文化资源名录，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更丰富、更精准的文化资源基础供给。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要打造衔接联动的共同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37]。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共同繁荣上，需要注重系统集成，对现有文化资源创新、生产、推广、更新等诸多维度进行统一和制度化建设，打造衔接、共生、联动的共同繁荣机制。发挥文化事业引领性作用，通过公共性文化服务基础性建设，为文化产业积蓄力量，逐步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文化资源开发、供给需求平衡、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衔接监督机制进行联通，形成可持续发展机制。在文化事业建设中考虑文化产业发展，以文化服务助推产业发展，以产业繁荣的市场化效益改善文化事业质量和水平。《哪吒2》的成功离不开政府对数字文创产业的系统性扶持。例如近年来，通过施行《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快数字经济产业重点领域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等文件，成都对影视动漫创作、技术研发给予专项支持，以扶持本

土中小型企业快速成长和集群式发展。此次参与《哪吒2》制作的多家本地企业都享受到了“梯度补贴”的政策,在基础制作、技术创新等多个环节,企业的生产成本均有所降低^[38]。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要以数字赋能文化新业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39]数字文化新业态是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发展而形成的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型文化资源。“激活数字叙事赋能中华历史文脉赓续传承的积极效用,有利于盘活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内涵、促进文化遗产保护。”^[40]《哪吒2》的制作以“万龙甲式”管理模式整合138家动画公司,依托先进技术生成1948个特效镜头,其动态粒子效果树立了中国动画的美学新标准^[41]。在特效制作环节,Base Media与天工异彩运用AI生成动画技术,结合自主研发的“动态水墨渲染引擎”与“乾坤流体引擎”,将传统动作捕捉流程大幅压缩80%,实现从传统手绘向智能工业化制作的华丽转身^[42]。这表明,数字赋能文化产业新业态,必须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融入新的文化成果、技术成果,实现创新发展。为此,必须加快建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把数字技术和文化产业有机融合,推动数字科技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创新,用好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大力推进理念、内容、技术、形式、管理等方面创新,推动数字文化新业态支撑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

(三)文化主体性的现代表达: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43]。“话语”是“运用中的语言”和“谈话的内容”,既是文化外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一种权力结构,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价值立场。“叙事”是叙述事情、讲述故事,关键在于通过情感表达和文化认同,促进受众对叙事内容的深刻理解和内在认同^[44]。《哪吒2》的话语和叙事,不仅重在讲好中国故事,更通过这些故事传递了中国价值观念、文化内涵和发展理念。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锚定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45]构建新的体系不是“为体系而体系”,而是为了更好地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从而引导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中国观。要达成这样的目标,既不能照搬西方话语体系,因为西方话语、西方叙事的特有底层逻辑,不仅不能正确解释中国实践,而且往往是有意歪曲中国实践;也不能沿用过去的体系,过去对外话语不够完善、不够融通、不够亲和,国际传播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构建新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要立足中国实践、放眼世界潮流,深植中华文化、面向世界文明,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哪吒2》通过“阴阳共生”的道家哲学重构神话原型,将哪吒与敖丙的对抗转化为内在力量的辩证统一,既消解了“正邪二元对立”的叙事范式,又为破解零和博弈的矛盾提供了东方智慧的解释,指向不同文明共生的可能性,传达了中国协和万邦的天下观。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创新叙事策略、丰富叙事功能。叙事不是简单地讲故事,而应当通过叙事策略的创新推动故事所传播的信息与理念真正入耳、入脑、入心。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创新叙事策略,着力营造平等对话和共情语境,建设更具文化认同、价值认知、情

感共鸣的叙事生态与场域，在换位思考中讲述引发共振共鸣的故事。在国际传播中，对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要确保阐述得清晰准确，又要让国际受众爱听、爱看、能接受、有共鸣。为此，叙事者应善于运用翔实的数据、直观的案例、具象的表达，准确说明中国话语所蕴含的内在哲理。《哪吒 2》通过普遍性议题（如代际冲突、身份认同）建立情感连接：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抗争精神暗合全球青年对个体自主性的普遍诉求；又以众生托举天元鼎的集体觉醒取代孤胆英雄的救赎叙事，将“我命由我”升华至“我们共同定义命运”，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增强主流话语的引导力和影响力。高质量的叙事是思想与语言互相依赖、符号交换和意义建构的总体互动，叙事既要从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念的角度来讲故事，也要尽可能形成一种纽带、环境，让受众潜移默化地分享、交流和接受彼此更多的有效信息与资讯^[46]。《哪吒 2》通过情感叙事，将主流话语隐于角色成长与情节冲突中。哪吒与母亲的亲情线，既展现传统孝道，又映射现代家庭关系的复杂性，使观众在情感共鸣中自然接受价值引导，与当下社会积极推动家庭文明建设所一致。哪吒喊出的“若命运不公，就和它斗到底”，体现哪吒面对不公时的态度，激励人们勇敢抗争，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和鲜明品格相契合。为此，应把准中华文化发展新趋势，统筹考量文化发展战略、文化治理能力，在持续增强主流话语引导力影响力、提升传播效能的进程中，精准选取故事素材、叙事视角，精心设置叙事框架，不断夯实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底层逻辑。

五、结语

《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探索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在当代的方向。它启发我们，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符号的简单复刻，而在于能否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其精神内核；文化自信的根基不源于对历史的怀旧，而在于能否以自主技术、独立叙事和本土逻辑回应时代命题。这一启示远超影视创作的范畴，它指向一个更为深刻的命题——中华文化的当代使命，绝非对传统的机械搬运，亦非对西方模式的被动模仿，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而不同”的伦理观、“器以载道”的技术哲学等转化为破解现代性困境的实践方案。当文化基因被激活为可对话、可行动、可传播的叙事资源时，传统便不再是历史的负担，而是文明创新的源头活水。未来，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用更开放的视野凝聚多元力量。在技术研发中注入人文思考，避免工具理性对意义的消解；在产业协作中强化制度创新，构建可持续的文化生产生态；在文明对话中坚持平等互鉴，以中国叙事讲述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 年 6 月 2 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8.
- [2] 向玉乔. 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化主体性 [N]. 人民日报，2024-05-22（9）.
- [3] 顾亚奇. 重大主题影视创作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逻辑与路径 [J]. 当代电视，2024（3）：4-9.
- [4] 张晶，李晓彩. “中国故事”本土化与国际化叙事的张力——兼论中国电影文化主体性的建构 [J]. 西北民

刘衍峰. 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机制创新与实践理路——基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案例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2): 122-134.

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 171-180.

- [5] 王馨莹, 黄望莉. 新时代中国影视文化的使命担当[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11): 111-118+201.
- [6] 覃媛元, 丘海薇. 文化断裂视域下的中国影视创作[J]. 新闻界, 2016(20): 44-48.
- [7] 刘玉堂, 李振鹏. 传统民俗的现代传承: 基于影视民俗的文化考察[J]. 新疆社会科学, 2023(6): 137-146+169.
- [8] 朱华英. 古代文学名著改编影视作品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与发展[J]. 四川戏剧, 2021(3): 119-121.
- [9] 恩斯特·卡西尔. 符号形式的哲学[M]. 赵海萍,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8.
- [10] 马慧.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符号机制研究[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1): 14-26.
- [11] 马瑞雪, 李建军.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内涵、特征与衡量尺度[J]. 江汉论坛, 2024(5): 106-112.
- [12] 傅守祥. 尊重文化差异 减少文化误读[N]. 中国文化报, 2019-07-03(3).
- [13] 赵敏. 文化自信视阈中的《西游记》跨文化传播[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10-10(7).
- [14] 潘文娇, 董晓波. 中国大众文化的海外“误读”及其国际传播[EB/OL]. (2023-10-26) [2025-02-25].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10/t20231026_5692940.shtml.
- [15] 李培鑫. 《黑神话: 悟空》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逻辑、路径与启示——基于文化符号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1): 63-76.
- [16] 陈盼盼, 孙绍勇.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跨媒介叙事机理、挑战与对策[J]. 甘肃社会科学, 2024(6): 51-59.
- [17] 韩佳宁. 张艺谋国际化商业电影的文化困境[J]. 电影文学, 2017(24): 85-86.
- [18] 李妍. 西方国家全球科技垄断权力的形成背景、构建方式及其困境[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10): 122-132+136.
- [19] 王雷, 王伯鲁. 技术内嵌价值[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11-11(8).
- [20] 肖峰, 杜巧玲. 数据殖民主义的学理探察和现实观照[J]. 科学社会主义, 2024(2): 14-22.
- [21] 冯月季. 和谐律: 中华文化符号国际传播的理论考察、实践形态与建构路径[J]. 湖北社会科学, 2024(7): 5-14.
- [22] 李典. 从青铜神像到光影造梦(文物有话说) 三星堆博物馆解密《哪吒2》结界兽原型[N]. 人民日报, 2025-02-22(7).
- [23] 李蓉. 从《哪吒2》看“中国风”的全球表达[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5-02-18(10).
- [24] 沈冰. 音乐助攻“哪吒”放异彩(文化之眼·从《哪吒2》谈开去④)[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5-02-21(7).
- [25] 央视财经. 《哪吒2》背后: 团队协作5年磨一剑, 生产模式变化推动动画产业升级[EB/OL]. (2025-02-15) [2025-02-2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41348602993737938wfr=spider&for=pc>.
- [26] 陈琦. 屡创票房奇迹, 一场价值超百亿的国产动画工业实验[EB/OL]. (2025-02-03) [2025-02-20]. <https://news.qq.com/rain/a/20250203A068Z600>.
- [27] 王缉慈. 影片《哪吒》系列成功的地理密码[EB/OL]. (2025-02-20) [2025-02-21].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192482.
- [28] 屠晨昕. 《哪吒2》奇迹的背后, 是一场国产动画工业革命[EB/OL]. (2025-02-17) [2025-02-21]. <https://>

- tidenews.com.cn/news.html?id=3047564&source=1.
- [29] 程书书. 从《大圣》到《哪吒 2》，中国动画的工业化突围 [EB/OL]. (2025-02-21) [2025-02-2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202995.
- [30]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39.
- [31] 张明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03-20 (6).
- [32] 宁稼雨，杨沫南. 哪吒闹海故事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3)：139-148.
- [33] 赵欢. “哪吒”有了更多新颖表达 [N]. 工人日报，2025-02-23 (4).
- [34] 刘阳. 票房即将突破百亿元！专访《哪吒 2》主创解锁成功密码 [N]. 人民日报，2025-02-13 (8).
- [3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21.
- [36] 吴田，胡乐明.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着力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N]. 光明日报，2023-10-23 (6).
- [37]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2024-07-22 (1).
- [38] 方民. 从《哪吒 2》看数字与文化产业协同 [N]. 成都日报，2025-02-26 (10).
- [39]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 [N]. 人民日报，2020-09-19 (1).
- [40] 许丹荔，王炳涵. 游戏作为媒介赋能中华文化创新的实践探索——以《黑神话：悟空》为例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 (6)：114-123.
- [41] 央视网. 138 家、4000 多人，合力托举！国产动画电影精益求精“蝶变”向新 [EB/OL]. (2025-02-15) [2025-02-22]. <https://news.cctv.com/2025/02/15/ARTIRLRF01zzDH441dJgNzPL250215.shtml>.
- [42] 张萌. 哪吒 2：AI 赋能创新变革——重塑中国文化的全球叙事体系 [EB/OL]. (2025-02-24) [2025-02-26]. <http://www.xibujuece.com/2025/0224/325422.html>.
- [4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8.
- [44] 曾祥敏，汤璇，翁旭东.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N]. 光明日报，2024-11-29 (11).
- [4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17.
- [46] 唐宁. 找准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着力点 [N]. 光明日报，2024-03-29 (11).

责任编辑：林华山 校对：卢媛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的 话语建构与策略转向

林功成¹ 谷端为¹ 李莹²

(1. 中山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2. 深圳大学 传播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本研究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和《经济学人》在2021—2024年期间涉港报道为样本,运用内容分析和批判性话语分析法,探究《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的变化特征。研究发现,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的频次下降,但仍以长篇报道为主,主题聚焦政治与法律、人权、公共卫生与健康,经济报道也显著增多。西方媒体通过减少政治与法律方面的报道,避免展示香港由治及兴的良好态势。从信源分布来看,西方媒体在港记者人数减少,较多报道缺少权威或一手信源,报道态度总体负面。为此,香港特区政府应强化事实回应、立法监管有害信息、借助国家资源推动以多元主体为基础的“民间外交”,有效应对西方媒体涉港舆论的挑战。

关键词:西方媒体;《香港国安法》;议题建构;批判性话语分析;污名化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5)02-0135-12

DOI: 10.13946/j.cnki.jcqi.2025.02.012

作者简介:林功成,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谷端为,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李莹,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传媒与文化发展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落实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政治传播策略研究”(21BXW070)

引用格式:林功成,谷端为,李莹.《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的话语建构与策略转向[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2):135-146.

一、问题的提出

英美等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将香港视作遏制我国发展的舆论前沿阵地，持续投入资源扶持香港本地的各类资讯媒介，企图掌控香港舆论主导权。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坚决有力地打击各类传播涉及危害国家安全违法资讯的行为^[1]。香港社会逐渐恢复安宁与稳定，经济稳步复苏，民生持续改善，社会井然有序。2022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2]。在这一新阶段，西方国家在香港特区的舆论攻势也随之调整与重新布局。部分西方媒体以所谓“不确定性”等为由搬离香港。2021 年，《纽约时报》将亚太区数字新闻业务从香港迁至韩国首尔，调整范围涉及香港员工的三分之一^[3]。2024 年 3 月，“自由亚洲电台”关闭在香港的办事处^[4]，员工被安排转至中国台北或华盛顿工作。2024 年 5 月，《华尔街日报》将亚洲总部由香港迁往新加坡，在港解雇人员一半以上，在新加坡设编辑部门负责大中华地区的报道^[5]。以英美等国媒体为主的西方媒体派驻香港的记者人数下降，涉港报道逐步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媒体停止抹黑香港。2024 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多次反驳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华尔街日报》、英国 BBC、彭博社、《泰晤士报》等均因报道存在政治偏见、双重标准、虚假指控、误导性等问题而被特区政府批评^[6]。西方媒体将香港地区当作与我国较量的“桥头堡”本质并未改变。就此，本文对《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西方媒体涉港报道进行研究，通过内容分析和批判性话语分析法，分析西方媒体在香港议题上如何调整报道重心及变换策略以妄图卷土重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港舆论监管与引导体系建议。

二、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研究综述

既有研究显示香港一直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西方媒体对香港的报道备受关注并屡屡成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工具”。当下西方舆论持续唱衰诋毁香港，编造渲染“外资撤离香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保”等论调^[7]。陈少波指出，反华媒体报道是西方国家发动认知作战的主要操弄手法之一^[8]。王润泽批评西方媒体在涉港报道中长期采用“他者化”新闻框架，将中国构建为“落后、不民主”的形象^[9]。师文和陈昌凤通过《纽约时报》涉港报道在 Twitter 上的传播模式研究，揭示社交机器人在涉港话题传播中强化了西方媒体的叙事框架，其扩散模式更倾向支持抗议者，进一步扭曲了报道的公正性^[10]。贾文彬等比较了《经济学人》对香港分裂势力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势力的报道，揭示了西方媒体背后的双重标准和意识形态偏见^[11]。王龙以香港修例风波中的新闻评论为对象，对比了内地和西方媒体对香港的报道态度分布异同，揭示了新闻评论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12]。这些研究为理解和应对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偏见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策略。

境外研究也揭示了西方媒体在涉港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及意识形态偏见。Cheng 和 Lam 以香港回归后十年的西方媒体报道为研究对象，分析语料库发现，尽管西方媒体逐渐认可香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成就，但其报道依然局限在所谓“民主受压”和“自由受限”的负面叙事框架中，持续将中国描绘为威胁自由、民主的“他者”^[13]。Du 等比较了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英美等媒体

对非法“占中”的报道, 发现西方媒体通过“民主与自由”的框架支持抗议者, 将其描述为民主化象征并批评内地所谓“干预”香港事务^[14]。Dore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 1998 至 2020 年西方媒体对香港的报道, 研究发现西方媒体更多使用积极意义的关键词 (如“自由”“民主”) 来框定非法“占中”、修例风波等, 特别是在 2014 和 2019 年强化了对中央政府的批评^[15]。这些研究系统地揭示了西方媒体在香港报道中深植的意识形态偏向及其对国际舆论的影响, 西方媒体凭借其在全球传播体系中的既有优势, 试图通过涉港报道来塑造符合其政治意图的叙事框架, 进而影响国际社会对涉港议题的认知。

针对西方媒体在香港议题上的抹黑, 我国政府通过白皮书、新闻发布会、官方声明等形式, 明确表达对西方媒体不实报道和恶意抹黑的严正抗议。内地主流媒体和在港建制派媒体深入挖掘香港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成就, 向国际社会积极宣传“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16]。在此背景下, 关于如何切实增强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权, 有效提升涉港议题的国际传播能力, 学界展开了严谨且深入的研究。学者普遍认为, 我国对外传播的理念、策略和呈现方式都有了很大进步, 基本建立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17]。兰辛珍强调, 对外涉港报道应注重法理依据, 揭露西方政客和媒体的偏见性污蔑^[18]。张沐阳以香港修例风波以来中央涉港工作部门的官方发声作为实证材料, 分析我方在驳斥西方谬论时取得的成果^[19]。钟雪娇指出, CGTN 等主流媒体通过主动设置议程和独家报道, 逐渐在涉港话题上与西方舆论展开竞争, 打破其对舆论的垄断^[20]。王明亮等从新闻史角度出发, 总结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对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宣传策略^[21]。这些研究从多视角就我方的舆论反制策略提出建议, 为应对复杂国际舆论环境提供了宝贵参考。

然而, 随着香港媒体生态格局发生极大变化, 鲜有研究能贴合当下全新的媒体生态环境。2020 年《香港国安法》实施是中央进一步落实全面管治权的重要举措, 开启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依法治港的新时代^[22]。此后, 香港的媒体生态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香港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由“泛民”派把持的媒体生态全面瓦解: 以媒体形式搞极端对抗政治的《苹果日报》、乱港网媒“立场新闻”“众新闻”等相继解散, 数个反中乱港组织停止了运作^[23]。在这一新形势下, 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的方式、渠道以及影响也出现了新特点。西方媒体涉港报道往往是西方国家干涉我国内政的“舆论先锋”。本研究试图分析新形势下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的内容、主题、引用来源和话语策略变化, 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我方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应与反制, 在国际舞台上还原香港的真实形象。

三、研究方法及变量介绍

(一) 样本媒体选择

本研究选择了《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和《经济学人》作为分析对象。《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两大主流报纸, 《泰晤士报》在英国历史悠久, 《经济学人》则以经济分析和国际政治经济评论见长^[24]。本研究选择了 2021—2024 年 4 家媒体中标题包含“Hong Kong” (香港) 的全部报道。在这个时期, 《香港国安法》的效果逐渐显现, 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 媒介生态格局出现转变。研究共抓取 707 篇涉港报道。其中, 《华盛顿邮报》

219 篇、《纽约时报》162 篇、《泰晤士报》257 篇、《经济学人》69 篇。

（二）变量构成

报道篇幅：媒体给予某一议题较长的报道篇幅，意味着该议题在其眼中具有较高报道价值。如果媒体用较大篇幅报道香港，说明涉港议题进入了它们的重点关注范畴。研究按照大部分内容分析的惯例，将篇幅分为 1=1~500 字为短篇，2=501~2 000 字为中篇，3=2 001 字以上为长篇。第一类字数相对较少，如消息类报道、简讯、快讯等。第二类报道有一定的拓展和丰富性，在交代核心事实的基础上，补充了背景资料和相关细节。第三类报道往往是对重大社会事件、复杂社会现象进行深度剖析的深度报道或调查性报道。

报道信源：不同类型的信源意味着不同的立场倾向。分析信源能了解报道背后是否存在某种偏向性，从而判断该报道是否秉持了客观公正的原则去呈现事件全貌。根据试编码的过程，本研究依据国别、身份以及机构立场的不同，将信源区分为 1. 中国香港特区政府，2. 外国政府，3. 中国中央政府，4. 港资企业，5. 外资企业，6. 中资企业，7. 香港媒体，8. 外国媒体，9. 内地媒体，10. 外国学者，11. 香港学者，12. 内地学者，13. 香港民众，14. 外国民众，15. 内地民众，16. 香港社会组织，17. 反对派人士，18. 无信源。当同一篇报道中出现多个来源，本研究选择最重要或篇幅占比最大的一个信源来编码^[25]。

报道态度：本研究根据报道是否符合客观公正的新闻原则、是否尊重我国主权和我国香港特区法治为标准，将报道分为五种态度倾向，分别是 1=非常负面，2=比较负面，3=中立，4=比较正面，5=非常正面。

报道主题：报道围绕展开的核心内容。研究根据试编码的过程，将主题分为：1. 政治与法律，主要涉及香港和内地的政治事务，包括政府决策、政策出台与实施、选举、政党活动内容，以及与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解读和司法审判等相关的内容。2. 人权议题，主要涉及香港公众言论自由、免受歧视等方面的内容。3. 教育议题，主要指有关香港教育政策改革方面的内容（如国安教育、中小学课纲修改）以及师生群体相关内容（如高校学生会改革）。4. 公共卫生与健康议题，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新冠疫情、政府应对、防控举措等）、医院医疗事故、医护组织的政治参与行为等内容。5. 经济议题，主要指香港金融市场、企业经营状况、行业发展动态等相关报道。6. 社会民生事务，包括住房、社区建设、社会风气、公众消费行为、人口结构变化等内容。7. 文化议题，主要指香港文化产业发展（如影视、音乐、出版等）和文化交流活动（如艺术展览、文化演出交流等）相关报道。

（三）信度检测

在正式编码前，由两位研究助理分别就 60 篇根据随机数字表抽选出的新闻报道进行了试编码。信度计算公式是求相互同意的编码次数与总编码数的比例^[26]。研究者在取得共识后对少数相互同意度较低的项目进行了变量的合并和修订。最后，研究的各变量信度分别是，报道篇幅（1.0）、报道信源（0.86）、报道态度（0.92）和报道主题（0.84）。大部分题项求得的编码员间信度都在 0.85 以上，符合内容分析的基本要求。

四、研究发现

(一) 报道频数下降但仍以长篇为主

数据显示, 西方媒体对香港议题的关注度持续下降。《香港国安法》实施后, 部分西方媒体缩减驻港机构规模或转移部分业务至其他地区, 这使得长期驻港报道的海外媒体数量下降。此外, 西方媒体越来越倾向于将香港等同于内地城市, 对香港的关注有所减弱。从总量来看, 4家媒体有关香港报道频数呈下降趋势, 但部分媒体在2024年报道频数有所回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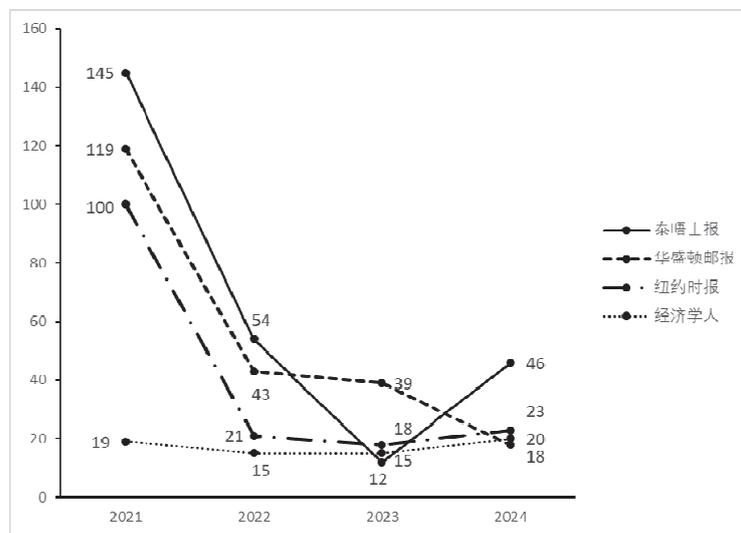


图1 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的频数变化

对报道篇幅的统计发现, 西方媒体的涉港报道均以长篇为主。其中, 《纽约时报》的长篇报道占比高达95.06%; 《经济学人》紧随其后, 占比为89.86%; 《华盛顿邮报》和《泰晤士报》的长篇报道占比相对较低, 分别为57.98%和63.01%。对发表时间和篇幅的交叉分析进一步发现, 2021年、2023年和2024年4家媒体的长篇报道占比分别为77.02%、80.95%和73.83%, 而2022年的长篇报道占比相对较低(45.86%)。短篇报道则呈现逐年递减趋势, 2021年占比为13.84%, 2022年下降至9.77%, 而在2023和2024年下降为0篇和1篇(0.93%)。

综合报道频次和篇幅来看, 涉港议题在西方媒体中的优先级相对降低。一方面, 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 英美等西方国家媒体可用于制造轰动效应和负面炒作的素材减少。香港特区产生的积极变化不符合西方媒体对香港的负面预设和认知偏见, 西方媒体难以找到新的切入点进行负面报道。另一方面, 尽管报道频次减少, 但西方媒体仍不放弃抹黑香港。在关键议题上, 西方媒体刻意拉长报道篇幅, 不断增添新的所谓“论据”或“案例”来强化其观点。长篇报道能够承载更多经过精心包装、带有特定政治意图的内容, 因此, 西方媒体在有限的报道频次下, 仍能一定程度误导国际受众。

(二) 报道主题随时间变化并出现策略性转向

西方媒体延续了以往报道重点，最关注的主题是“政治与法律”（47.67%），报道集中在中央政府对港政策、香港的选举制度改革、司法案件等；其次是“人权”（20.37%）和“公共卫生与健康”（9.19%），如言论自由、疫情防控等；再次是“社会民生事务”（6.93%）、“文化”（6.79%）和“经济”议题（6.65%），如香港音乐与艺术活动、文艺作品评论、香港房地产、贫富差距、经济增长速度等。报道量相对较少的主题是“教育”（2.40%），议题包括中小学国安教育等。

表 1 2021—2024 年报道主题分布

主题	2021 年篇数 (百分比)	2022 年篇数 (百分比)	2023 年篇数 (百分比)	2024 年篇数 (百分比)	合计篇数 (百分比)
政治与法律	214 (55.87%)	48 (36.09%)	30 (35.71%)	45 (42.06%)	337 (47.67%)
人权	77 (20.10%)	22 (16.54%)	23 (27.38%)	22 (20.56%)	144 (20.37%)
公共卫生与健康	26 (6.79%)	29 (21.80%)	10 (11.90%)	0 (0.00%)	65 (9.19%)
社会民生事务	27 (7.05%)	9 (6.77%)	4 (4.76%)	9 (8.41%)	49 (6.93%)
文化	13 (3.39%)	11 (8.27%)	8 (9.52%)	16 (14.95%)	48 (6.79%)
经济	15 (3.92%)	11 (8.27%)	9 (10.71%)	12 (11.21%)	47 (6.65%)
教育	11 (2.87%)	3 (2.26%)	0 (0.00%)	3 (2.80%)	17 (2.40%)
合计	383 (100.00%)	133 (100.00%)	84 (100.00%)	107 (100.00%)	707 (100.00%)
$\chi^2=83.307, d.f.=18, p<.001$					

从报道时间来看，西方媒体涉港报道在 4 年间的主题分布存在显著差异。“政治与法律”由 55.87% 下降至 35.71%，再略微反弹至 42.06%，而“人权”始终占据了约两成比例。这反映了西方媒体关于香港报道主题的策略性调整。2020 年，西方媒体就政治及社会议题不断制造恐慌，散播不实消息和消极情绪，诱导香港市民消极应对特区政府政策，鼓动香港市民移民离港。2021 年后，西方媒体通过减少政治与法律方面的报道，避免展示香港特区法律治理趋于稳定的态势，着重强调所谓“人权”问题，通过对特定人物的关注报道，将中国塑造成对个人权利的所谓“威胁者”。此外，“经济”主题明显增多，报道占比由 3.92% 上升至 11.21%。具体来看，西方媒体自 2021 年后倾向于通过软性方法制造“软对抗”。西方媒体以偏概全、编造渲染香港经济衰退、就业、消费减弱等经济民生议题，妄图煽动市民不满及削弱政府公信力。西方媒体淡化了直接的政治对抗色彩，转而从经济层面暗示香港经济活力受到国家治理影响，暗示香港自由经济体受到国家经济政策的所谓“干预”。这种主题重心的转移反映出西方媒体对香港议题的叙述策略逐渐从大肆质疑香港的法治与治理，转向着重渲染所谓“人权危机”和“经济下行”。而就“公共卫生与健康”类别来看，2021—2022 年，疫情始终是外媒关注的重点。西方媒体试图将香港抗疫问题政治化，把香港抗疫举措与内地关联起来进行歪曲解读。

(三) 无信源文章占较大比重

在 707 篇文章中，有 142 篇没有提及信源，占据较大比重。在有信源的文章中，西方媒体的消息来源以“香港特区政府”（262 条，46.37%）为主，其次分别是“香港媒体”（56 条，9.91%）、“香港民众”（39 条，6.90%）、“反对派人士”（34 条，6.02%）、“外国媒体”（34 条，6.02%）、

“外国政府”（32 条，5.66%）、“中央政府”（25 条，4.42%）、“外国学者”（21 条，3.72%）、“港资企业”（19 条，3.36%）、“香港学者”（17 条，3.01%）和“香港社会组织”（14 条，2.48%）等。“外资企业”（6 条，1.06%）、“外国民众”（4 条，0.71%）和“内地学者”（2 条，0.35%）等信源文章较少。为了更清晰展示数据，本文将引用频次低于 2% 的类别合并为“其他”并在下表中展示。

表 2 各主题报道采用信源区别（不含无信源文章）

信源	政治与法律篇数 (百分比)	人权篇数 (百分比)	教育篇数 (百分比)	公共卫生与健康篇数 (百分比)	经济篇数 (百分比)	社会民生事务篇数 (百分比)	文化篇数 (百分比)	合计篇数 (百分比)
香港特区政府	136 (49.64%)	46 (41.44%)	10 (58.82%)	42 (75.00%)	12 (32.43%)	11 (26.19%)	5 (17.86%)	26 (46.37%)
香港媒体	31 (11.31%)	9 (8.11%)	2 (11.76%)	1 (1.79%)	1 (2.70%)	7 (16.67%)	5 (17.86%)	56 (9.91%)
香港民众	9 (3.28%)	9 (8.11%)	0 (0.00%)	7 (12.50%)	0 (0.00%)	11 (26.19%)	3 (10.71%)	39 (6.90%)
反对派人士	12 (4.38%)	21 (18.92%)	0 (0.00%)	0 (0.00%)	0 (0.00%)	1 (2.38%)	0 (0.00%)	34 (6.02%)
外国媒体	14 (5.11%)	5 (4.50%)	1 (5.88%)	0 (0.00%)	2 (5.41%)	2 (4.76%)	10 (35.71%)	34 (6.02%)
外国政府	23 (8.39%)	5 (4.50%)	0 (0.00%)	1 (1.79%)	2 (5.41%)	1 (2.38%)	0 (0.00%)	32 (5.66%)
中央政府	23 (8.39%)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2 (4.76%)	0 (0.00%)	25 (4.42%)
外国学者	12 (4.38%)	4 (3.60%)	1 (5.88%)	2 (3.57%)	2 (5.41%)	0 (0.00%)	0 (0.00%)	21 (3.72%)
港资企业	2 (0.73%)	0 (0.00%)	0 (0.00%)	0 (0.00%)	14 (37.84%)	2 (4.76%)	1 (3.57%)	19 (3.36%)
香港学者	6 (2.19%)	3 (2.70%)	1 (5.88%)	3 (5.36%)	1 (2.70%)	1 (2.38%)	2 (7.14%)	17 (3.01%)
香港社会组织	3 (1.09%)	7 (6.31%)	1 (5.88%)	0 (0.00%)	1 (2.70%)	2 (4.76%)	0 (0.00%)	14 (2.48%)
其他	3 (1.09%)	2 (1.80%)	1 (5.88%)	0 (0.00%)	2 (5.41%)	2 (4.76%)	2 (7.14%)	12 (2.12%)
合计	274 (100.00%)	111 (100.00%)	17 (100.00%)	56 (100.00%)	37 (100.00%)	42 (100.00%)	28 (100.00%)	565 (100.00%)

$\chi^2=226.083, d.f.=66, p<.001$

卡方分析显示，不同主题的新闻报道在信源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 ($p<.001$)。“政治与法律”“人权”主题的报道大量采用香港特区政府（49.64%，41.44%）和香港媒体（11.31%，8.11%）作为信息来源。香港特区政府作为信源报道，主题还集中分布在“公共卫生与健康”（75.00%）和“教育”（58.82%）等领域。香港特区政府作为当地权威，能够提供可靠且具官方性的政策信息，而香港媒体的报道被认为具有地方特色与独立性，能够反映社会舆情和文化。西方媒体采用这种信源组合为报道披上所谓事实的外衣，同时通过解读和框架设置等手段操弄渲染特定意识形态，如通过“解读”香港特区政府的表态来暗示所谓政治管控或人权问题，以强化对香港“缺乏自由”的负面渲染。此外，西方媒体在经济议题报道上主要参考港资企业（37.84%）的观点，香港大型财团负责人在西方媒体的显示度较高。部分港资企业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向西方媒体提供一些符合西方舆论导向但并非完全客观真实的信息，而中资企业、本地中小企业的声音被忽视。在社会民生事务报道上，西方媒体会采访香港民众（26.19%），但他们往往会刻意留下那些持有反对意见的香港民众的声音，而支持特区治理、认同香港积极变化的民众声音被删除，营造香港社会所谓

“民怨沸腾”的假象。

不同时间的报道在采用信源方面存在差异。香港特区政府作为信源的报道在 2021 年占比 43.25%，2022 年占比 52.63%，2023 年占比 49.32%，2024 年占比 49.30%，说明西方媒体报道对香港特区政府信源的采用比例逐渐提高。2021 年，外国政府作为信源占比 6.75%，2022 年降至 4.21%，2023 年占比 4.11%，2024 年占比 4.23%，整体有所回落。而这也符合近期的社会现实，香港议题在国际政治的显示度有所下降。不过，西方媒体对外国政府及政界人物信源的使用，往往偏向其对香港和内地的批评性言论。西方国家的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经常无理指摘香港的政治、法治、营商等情况，例如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以所谓“一国两制”被干预和扼杀，炒作香港经贸办在美国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反对派作为主要信源的比例持续下降，2021 年占比 8.28%，2022 年占比 4.21%，2023 年占比 2.74%，2024 年占比 1.41%。西方媒体倾向于引用香港反对派的言论，不断投入资源以用于提升如罗冠聪、许智峯等逃窜至境外的反对派在组织动员等方面的能力，进而逐步扩大其在海外舆论网络中的不良影响。然而，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社会秩序的恢复，香港的政治局势逐渐稳定，反对派的影响力减弱，其在西方媒体报道中的存在感逐步降低。这种变化反映了反对派在香港事务中的边缘化。

在 707 篇文章中有 142 篇报道没有提及任何报道来源，占比超过 20%。这些没有信源的报道，往往是基于互联网信息的二次加工。新冠疫情以来，西方媒体派驻香港的记者人数迅速下降，由于缺乏信源，很难采写到有一手数据的深度报道，必须依赖于香港特区政府、香港媒体、政治组织的新闻发布，以及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然而，这些直接来源于网络的信息存在信息过载或真假难辨的问题。有的记者在未充分核实信源的情况下，基于互联网上的热点舆论快速撰写报道，以获取流量和关注，这必然使得相关新闻的质量下滑、甚至失实。部分报道严重偏离西方媒体所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采用耸动式标题，新闻细节匮乏。英美等西方媒体在对香港进行报道时，缺乏针对香港本土语境细致入微的判断，将价值判断置于主导地位，其报道视角被局限在“威权”与“民主”这种非正即反的两极框架之中，很难具备专业客观报道的能力。

（四）报道态度以负面为主

修例风波后，中央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决策，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标本兼治，拨乱反正，引领和推动香港局势和民主发展重回正轨。西方媒体无视香港特区由治及兴的良好局面，对香港的报道态度仍以负面为主，将涉港议题作为抹黑中国的工具，以维护其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霸权，持续对我国进行战略遏制。下表显示了报道倾向与报道主题的交叉分析结果。

表 3 各主题的报道态度区别

报道态度	政治与法律篇数 (百分比)	人权篇数 (百分比)	教育篇数 (百分比)	公共卫生与健康篇数 (百分比)	经济篇数 (百分比)	社会民生事务篇数 (百分比)	文化篇数 (百分比)	合计篇数 (百分比)
非常负面	257 (76.26%)	125 (86.81%)	11(64.71%)	11 (16.92%)	8 (17.02%)	11(22.45%)	9 (18.75%)	432 (61.10%)
比较负面	35 (10.39%)	14 (9.72%)	2 (11.76%)	21 (32.31%)	9 (19.15%)	5 (10.20%)	2 (4.17%)	88(12.45%)
中立	30(8.90%)	5 (3.47%)	2 (11.76%)	29 (44.62%)	2 (61.70%)	3 (61.22%)	3 (75.00%)	161 (22.77%)

报道态度	政治与法律篇数 (百分比)	人权篇数 (百分比)	教育篇数 (百分比)	公共卫生与健康篇数 (百分比)	经济篇数 (百分比)	社会民生事务篇数 (百分比)	文化篇数 (百分比)	合计篇数 (百分比)
比较正面	8 (2.37%)	0 (0.00%)	2 (11.76%)	4 (6.15%)	0 (0.00%)	3 (6.12%)	1 (2.08%)	18 (2.55%)
非常正面	7 (2.08%)	0 (0.00%)	0 (0.00%)	0 (0.00%)	1 (2.13%)	0 (0.00%)	0 (0.00%)	8 (1.13%)
合计	337 (100.00)	144 (100.00)	17(100.00)	65 (100.00%)	47(100.00)	49(100.00)	48(100.00)	70(100.00)
$\chi^2=312.86, d.f.=24, p<.001$								

卡方统计结果显示, 西方媒体对不同报道主题的态度倾向存在显著差异 ($\chi^2=312.86, d.f.=24, p<.001$)。若合并“比较负面”和“非常负面”, 西方媒体在“政治与法律”“人权”“教育”和“公共卫生与健康”主题的报道中, 负面报道分别占 86.65%、96.53%、76.47%和 49.23%, 负面报道占较大比重。在“政治与法律”“人权”主题中, 相关报道高度负面, 暗示我国在香港施加了严格的所谓“政治管控”, 强化香港自由所谓“被剥夺”形象, 强调所谓“人权危机”, 试图引发国际关注。在“教育”主题中, 西方媒体强调国家的教育政策对香港“本土意识”的所谓“侵蚀”, 渲染文化与价值观的冲突, 有意误导受众认为香港教育正在被所谓“政治化”。在“公共卫生与健康”领域, 负面报道常围绕防疫政策展开, 借香港特区的防疫措施影射中国治理的所谓“专制”特质, 批评其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而在“经济”“社会民生事务”“文化”主题的报道中, 西方媒体尝试保持所谓“中立”, 编码为中立的报道分别占据 61.70%、61.22%及 75.00%。通过所谓“中立”视角, 西方媒体在不直接批评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间接表达对中国影响的“隐忧”, 为负面议题奠定了更广泛的基础。

(五) 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西方媒体的对外宣传话语看似在陈述所谓“新闻事实”, 但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就能发现其中隐含着其想要扩大自身地缘政治影响力、推行自身价值观的权力诉求^[27]。本文对西方媒体部分代表性涉港报道进行了分析。

《华盛顿邮报》于 2021 年 1 月 5 日发表题为“数十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根据国家安全法被捕”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 西方媒体延续了以往对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和偏见。报道强调所谓“最广泛、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使用”, 刻意编造夸大《香港国安法》的所谓“强制性和威胁性”。措辞将我国形象固定在所谓“压制自由”“控制异议”框架内, 妄图引导读者对政府行动产生负面情绪。报道中的用词如“清晨突袭”“平民衣着的警察”带有过度渲染色彩, 妄图污名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报道用这种话语操弄暗示特区政府执法是“隐秘、阴暗且不透明的”。报道还将当前事件与并没有明确对象的所谓“历史上打压异议的行为”进行对比。这种“历史对照式”行文, 采用片面和故意缺省的叙述逻辑, 有意将国家描绘为所谓“压制香港自治与自由”的单一力量。报道没有提及《香港国安法》的立法背景, 即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国家安全已成为一项普遍的政策实践。通过精心选择的语言和叙述操弄策略, 西方媒体强化了西方“自由民主”对“威权”的二元对立, 也忽视了香港在法律、社会治理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复杂现实。

《纽约时报》于 2023 年 9 月 21 日发表题为“香港表示自己发号施令而非北京, 投资者持谨慎态度”的报道。这篇报道通过修辞和隐性对比, 不断将香港的经济表现与政治环境挂钩。报道叙事

框架强调“与北京关系的紧密性”和“失去独立性”等主题，意在暗示香港正因与内地更深层次的融合而“失去”其原有的国际经济地位。报道将香港股票市场的表现定义为“中国经济的缩影”，并诬称其是“今年世界上表现最差的市场之一”。报道继而将此归因于与内地的紧密联系，而罔顾客观上的全球经济动荡及疫情后经济结构性调整。在证据链上，报道有意放大渲染香港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困难，以进一步强化香港经济因所谓“政治变化”而变得不确定的叙事框架。报道多次暗示，《香港国安法》“破坏”了香港的法治和商业信心，例如提到“外资担忧香港法律环境恶化”以及“选择其他司法管辖区”等。报道通过对香港经济的片面叙述，强行污名化“一国两制”。

《经济学人》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发表题为“香港人谋求英国公民身份但担心来自祖国的‘报复’”的报道。这篇报道从表面上看是描述英国 BNO 签证计划，但实际上通过语言选择、叙事结构和情感化表达，强化了西方媒体对涉港议题的特定政治解读和意识形态偏见投射。文章还通过对英国相关政策的道德化包装，妄图将香港“移民”现象嵌入所谓“自由对抗专制”的叙事框架。报道赋予 BNO 计划高度的道德化内涵，声称 BNO 签证是“人道动机驱动的签证通道”，并强调这一计划得到英国各党派支持，编造美化“香港移民是理想的移民形象——勤奋、创业、热爱自由并忠于某种英国观念”。与此同时，报道还提及香港建制派政团提出持有 BNO 护照者应放弃香港护照的建议，暗示香港特区政府试图通过行政手段限制“移民自由”。这种叙述模式刻意弱化了我国对主权完整的正当关切，将其歪曲为对个人自由的干涉。报道的叙事结构整体上构建了“西方‘庇护’自由对抗中国‘压制’自由”的二元叙事框架。文章通过话语的两极分化，极力美化西方、污名中国。

五、结语

本研究发现，西方媒体近年来对香港议题的关注度有所下降，但报道仍然以长篇为主。这说明西方媒体出于意识形态偏见，面对香港社会由乱及治的客观现实，降低了对涉港议题的关注度，但并未彻底放弃利用涉港议题来抹黑我国形象的企图。从报道主题来看，西方媒体最关注的议题是“政治与法律”“人权”和“公共卫生与健康”。此外，“经济”报道明显增多。西方媒体自 2021 年后倾向于制造“软对抗”，刻意夸大香港特区政府施政不足。这种主题重心的转移反映出西方媒体对涉港议题的叙述策略逐渐从大肆质疑香港的法治与治理，向着重渲染“人权危机”和“经济下行”等主题方向转移。从信源分布来看，由于西方媒体在港记者人数减少，较多报道缺少权威或一手信源。涉港报道被所谓“失败论”“破产论”“崩溃论”等陈词滥调占领。在大变局下，我国更要有有效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战攻势^[28]。

针对西方媒体主流叙事的转变，我方必须进一步讲好香港故事：

第一，针对西方媒体的偏见、批评、否定和攻击，香港特区政府要及时回应，以事实说话。部分西方媒体针对香港发表不实言论，主要出于政治挂帅、意识形态偏见，但也不乏一些人是因为对香港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又或是受困于固有思维，未能了解香港的真实面貌。鉴于此，特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需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做到以理服人，让外界能够正确认识香港。此外，特区政府要对报道中不实之处予以澄清，付诸实际行动来回应，全力保住香港的竞争优势，扎实推动香港巩固由治及兴的良好发展态势。

林功成, 谷端为, 李莹.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的话语建构与策略转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135-146.

第二, 香港特区政府宜立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有害信息进行监管和处理。西方媒体利用《香港国安法》在域外执法存在难度这一情况^[29], 不时发布负面信息, 一方面误导海外华人对祖国、对香港的认识; 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平台, 从海外对香港本地舆论施加负面干扰。全球不少国家和地区立法要求相关互联网平台删除危害社会和公众的违法信息。例如, 新加坡于 2023 年通过“网络刑事危害法案”, 规定政府有权要求违法信息的作者即刻停止向新加坡民众继续传播相关内容, 要求平台移除或屏蔽相关帖子、页面以及发布这些信息的账户, 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阻止新加坡互联网用户访问特定内容^[30]。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 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的治理。

第三, 香港特区政府宜善用国家资源, 进一步改善国际形象。2019 年修例风波过程中, 香港面对大量西方舆论施压, 国务院港澳办以及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提供了强大支援, 通过高频率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多种手段, 协助香港把握舆论主导权^[31]。有鉴于此宝贵经验, 香港在未来面对西方可能继续发起的舆论攻势时, 必须紧紧依靠国家这一坚实后盾。国家有着丰富的外交资源、良好的国际话语权以及高效的舆论引导能力, 香港与国家紧密相连、协同作战, 才能在国际舆论场中站稳脚跟, 维护自身的稳定与发展。

第四, 香港特区政府宜发挥多元主体作用, 进一步推动“民间外交”。特区政府可以通过国际会议以及双边或多边交流平台, 向国际社会传达香港真实情况、政策走向和发展动态。然而, 扭转认知偏差仅仅依靠政府层面的努力是不够的, 推动“民间外交”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策略。香港商界和专业界在国际舞台上长期经营, 积累了深厚且广泛的国际联系网络, 这构成了香港开展“民间外交”的独特资源优势。他们与国际同行在商业合作、投资、贸易往来过程中建立的互信关系, 可以成为传播香港真实形象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 [1] 徐天骄.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度的建构、成效与完善——基于《香港国安法》的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52-166.
- [2] 习近平.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N]. 人民日报, 2022-07-02 (2).
- [3] 《纽约时报》香港电子新闻业务迁往首尔 [EB/OL]. (2020-07-15) [2025-03-11]. <http://www.takungpao.com.hk/hongkong/text/2020/0715/475307.html>.
- [4] 自由亚洲电台关闭在港办事处 政府谴责其危言耸听及抹黑维护国安条例 [EB/OL]. (2024-04-04) [2025-03-11]. https://hkcd.com/newsTopic_content.php?id=8630173.
- [5] 《华尔街日报》亚洲总部撤出香港迁往新加坡 裁员兼大减驻港记者编辑规模 [N]. 星岛日报, 2024-05-03 (财经版).
- [6] 邓炳强: 为构建新安全格局贡献香港力量 [EB/OL]. (2024-04-13) [2025-03-11]. <https://www.wenweipo.com/a/202404/13/AP6619fd59e4b009ba8536df5f.html>.
- [7] 唐嘉仪, 王童辰. 构建全球认知: 香港“科技安全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J]. 港澳研究, 2024 (2): 61-72.
- [8] 陈少波. 认知作战的内在机理及其涉港实施分析 [J]. 港澳研究, 2024 (4): 3-12.
- [9] 王润泽, 徐诚. 意识形态偏见与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的选择框架 [J]. 中国记者, 2020 (1): 34-38.

- [10] 师文, 陈昌凤. 社交机器人在新闻扩散中的角色和行为模式研究——基于《纽约时报》“修例”风波报道在 Twitter 上扩散的分析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0 (5): 5-20.
- [11] 贾文彬, 杨玉晨, 陈龙. 《经济学人》对中国香港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势力新闻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 [J]. 大学, 2021 (5): 50-52.
- [12] 王龙.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中英新闻评论的态度资源对比研究——基于《卫报》和《人民日报》香港暴乱评论话语分析 [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 82-88.
- [13] Cheng W, Lam P. W. Y. Western Perceptions of Hong Kong Ten Years On: A Corpus-driven Critical Discourse Study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13 (34): 173-190.
- [14] Du Y. R., Zhu L., Yang F. A Movement of Varying Faces: How “Occupy Central” was Framed in the News in Hong Kong, Taiwan, Mainland China, the UK, and the U. 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8 (12): 22-22.
- [15] Dore G. M. D. A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alysis of Newspapers Coverage of Hong Kong Protests Between 1998 and 2020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23 (1): 143-166.
- [16] 张志安, 李宜乔. 作为制度创新话语的“一国两制”: 媒体建构与变迁特征——以《人民日报》报道为例 [J]. 中州学刊, 2022 (6): 164-172.
- [17] 程曼丽. 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理念的演进 [J]. 新闻与写作, 2025 (2): 50-57.
- [18] 兰辛珍. 对外涉港报道要重视法理有据 [J]. 对外传播, 2022 (11): 48-50.
- [19] 张沐阳. 话语解构与建构——以中国官方涉港发声为例 [J]. 港澳研究, 2022 (3): 84-92.
- [20] 钟雪娇. 西方意识形态偏见下如何做好香港局势对外报道——以 CGTN 涉港报道为例 [J]. 对外传播, 2020 (1): 32-34.
- [21] 王明亮, 付满仪. “以商言政”: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宣传——以《经济导报》为中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90-104.
- [22] 夏宝龙: 全面准确贯彻实施香港国安法 [EB/OL]. (2023-01-13) [2025-02-24]. http://www.locpg.gov.cn/jsdt/2023-01/13/c_1211717813.htm.
- [23] 孙璐, 周悦. 香港传媒生态的变化与舆论引导策略研究 [J]. 东南传播, 2023 (5): 72-73.
- [24] 汪金刚, 刘祥睿. 欧美典型媒体智库发展实践及启示 [J]. 传媒, 2023 (14): 65-68.
- [25] 钟智锦, 张津广.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从基础到前沿 [M].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3: 70.
- [26] Lombard, M., Snyder-Duch, J., Bracken. A Call for Standardization in Content Analysis Reliability [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4 (3): 434-437.
- [27] 史安斌, 王沛楠. 断裂的新闻框架: 《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扶贫”与“人权”议题的双重话语 [J]. 新闻大学, 2019 (5): 1-12.
- [28] 史澎湃. 冷战后期美国对苏联的认知战及其当代启示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1): 251-265.
- [29] 韩碧舟. 涉港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域外刑事管辖制度: 基于比较视野的考察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6): 138-151.
- [30] 王彩玉, 曾铨. 新加坡网络暴力防治的立法审视与实践考察 [J]. 现代世界警察, 2023 (7): 74-81.
- [31] 张建. 十八大以来中央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 政策论述与实践行动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2): 109-118.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校对: 卢媛



算法时代的政党政治： 重要影响、现实后果与应对逻辑

曹克亮

（中国计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数字社会正建构起以强大的数字系统、综合的人工智能技术、量化的社会体系为基础模型的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从政治秩序角度而言，大数据技术和算法社交媒介增强政党维护政治秩序的能力。从政党政治选举角度而言，算法推动政党政治选举向“数字亲民型”和“媒体友好型”转向。从政党政治公共舆论角度而言，身份政治遭遇虚拟机器人的严重干扰，政党政治认知地图发生算法型变革。算法技术塑造西方政党政治实践的现实后果正变得严重。一是，“硅幕”政治预示着网络极权与西方政党政治“奇点更近”。二是，算法中介推动着算法政治“再封建化”趋势加剧。三是，算法操纵使得算法民粹主义思潮和民粹政党政治不断崛起。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针对算法的技术治理和西方算法政治所产生风险的有效防范。首先，建构算法舆论自主，破除西方政党政治通过算法技术操纵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袭扰。其次，推动算法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对齐，防止西方政党政治极端思潮和激进主义叙事逻辑的侵扰。再次，加强算法舆论传播监督引导，推动中国共产党形象立体化传播。

关键词：算法政治；“硅幕”政治；“技术封建主义”；数字亲民；政党形象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5.02.013

作者简介：曹克亮，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计量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数字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研究”（22JDSZ3004）

引用格式：曹克亮. 算法时代的政党政治：重要影响、现实后果与应对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147-158.

一、问题的提出

2024 年可谓“全球超级选举年”，大变局背景之下尽显西方各国政治极化和政党分裂的现实。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遭遇“未遂刺杀”暴露出美国政治分裂和政党政治中间地带的缩小。特朗普 2.0 时期正式开启后，美国一些人士针对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DeepSeek 发表不实言论。特朗普明面上表示“美国将从中受益”，但同时声称 DeepSeek 的崛起应当为美企敲响“警钟”，不断将技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德国朔尔茨政府未能通过议会下院信任投票，这凸显了德国政党体系碎片化、政治生态分裂的严峻形势。法国国民议会“三分天下”，没有一支政治力量获得绝对多数席位。法国总理“难产”背后是极端右翼和左翼政党的强势崛起，法国社会的政党对立和政治撕裂导致其国内各项政治议程推进困难重重，暴力事件增加。韩国尹锡悦政府“戒严风波”导致韩国宪法法院正式启动了对尹锡悦总统弹劾案的审理程序。西方政党政治正遭遇社会对立、利益分配、身份政治、移民问题及生态问题所带来的政治极化、政党分化、政策分裂的现实挑战。这些挑战背后暗含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偏向、价值认知撕裂等深层问题。这些深层观念差异和政治分裂行为与政党竞选、运行过程的“计算化”以及对民众认知图式的舆论裹挟有关。

西方政党政治基于“胜选”的选举利益博弈，加速实现与算法技术和社交媒介的深度绑定耦合，削弱了他们所谓“人的政治”中的真实、自由、民主、公开等选举政治的基本价值取向。“政治计算”与“算法政治”的技术理性导致西方政党政治简化（“民主幻象”破灭带来不确定性和对抗冲突）、算法民粹主义（民粹思想和极端群体行动崛起）、算法操纵（竞选操纵、民意操纵、舆论操纵）日益加剧。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西方政党政治走向的技术要素和算法因素，分析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和可能后果，有助于增强对政党政治与技术内在关系的深入理解及其风险规制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推动中国共产党有效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自身组织领导能力、政治动员能力、媒介传播能力、技术驾驭能力，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善政”与人工智能“向善”的双向融合。

二、算法技术的政治影响：大变局背景下西方政党政治的走向

随着大数据技术、算法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技术和算法因素对政治的影响正在不断深化。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审视算法的政治效应，人类政治文明中的政治秩序、政治选举、政治舆论都在技术变革驱动下，发生了极其深刻和明显的方向性转变和范式变革。算法秩序重构了政治秩序，代码即权力，算法即正义加速推进；算法黑箱操控政治选举的方式与行为更加隐秘，发生了“数字亲民型”和“媒体友好型”的政党政治选举转向；政治舆论环境面临大调整，传统身份政治问题未能有效破解，又遭遇虚拟机器人“类人主体”的严重干扰，政党政治认知地图已经发生算法型变革，算法“后真相政治”、生成式人工智能“视觉政治”已悄然而至。

（一）大数据技术和算法社交媒介增强政党维护政治秩序的能力

算法在本质上是对流程和秩序的数字化模拟与建构，是基于大数据规则体系与集合系统符码化

的表征。算法在现实性上是影响人类行为及其社会运转、控制能力的有效工具，这与“政治权力就是一种秩序权力”^[1]的观点不谋而合。政治秩序追求稳定和有序，具有可预测、可监管的可控性特质。从根本上说，算法秩序是一种不同于一般数字秩序的秩序，算法是对规定性数字秩序的公式化表达。传统政治秩序中的民主是指权力掌握在多数人手中，民主（democracy）的希腊词根是人民（demos），古希腊雅典的广场议政民主既是一个场所也是一个统治机构，古典民主表达依靠传统知识、政治德行和爱来实现。但是古典民主的最大缺陷在于如何表达“大多数”，这一缺陷在互联网出现之后，特别是算法技术出现以后得到了改善。数据统计和算法分析为民主表达提供了精确佐证，但也为公民数字画像和政治广告精准投放提供了便利。算法秩序之下的政治民主变成了“无代表，不算法”的“算法输入型民主”。“算法模型扮演了‘机器意识形态家’角色”^[2]，算法权力意志所展现的技术家长主义恰恰与政治秩序所需的家长主义风格密切贴合。虽然技术家长主义和政治家长主义都立足于“善”（实质上是一种极权）去展现某种行动，但是算法作为技术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之外时，在推动政党政治“赋能”还是带来“失衡”方面，算法秩序的“非中立性”就显而易见了。因此，政治失序就会随着“非对称权力格局下的算法垄断、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算法滥权以及功能性失衡”^[3]而出现。算法权力以算法型媒介为基础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和政治秩序的再建构，普通民众以算法型媒介作为政治活动场域，极易容易产生“原生性偏见、学习性偏见和外源性偏见”^[4]交织的政治偏见，这些政治偏见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生态和公共舆论空间表达的基础。政治秩序也在算法型社交媒介的同类同质信息、价值观分化极化、公共舆论失序失衡中变得难以为继。

（二）算法推动政党政治选举朝“数字亲民型”和“媒体友好型”转向

政党精准实现了“通过智能技术增加了对选举结果的预测和引导”^[5]的“技术政治”愿望。在政党政治选举中，“科技的进步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党的运行和竞选方式，重塑了政党与选民间的关系”^[6]。特朗普作为“政治素人”成为继斯蒂芬·克利夫兰之后，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连续三次参选，并在竞选连任失败后再度当选的总统。原因之一是特朗普善于利用新型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媒体拉近与普通选民距离、密切联系共和党内部党员。政党政治选举在数字技术和算法精进变革及技术赋能中，实现了政党选举和候选人能力迭代的动态提升。算法赋能政党政治选举充分彰显了“政党计算”电子化、数据化、智能化与政党打造“群众型政党”“亲民型政党”的耦合。基于数据和算法的竞选策略不仅重塑了选举本身，也在改写党内候选人产生机制、政党运行逻辑以及执政后的社会治理方式等各个方面。

由于受到数字技术和政党媒介化的影响，西方传统左翼大党如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正在迎来艰难变革，不得不加快政党数字化、媒体化的转型步伐。政党数字化以“党员吸纳、组织运作、日常管理、民意采集、议题塑造、舆论引导、政策宣传、资金募集、竞选决策”^[7]的数字化为主要表现形式。政党媒体化以政党领袖“演员化”、“亲民化”、媒体沟通个性化和友好型为主要表现形式。政党领袖直接跨越政党组织的分工和层级，实现与选民的直接接触和沟通，政党组织的能力和结构在不断弱化和边缘化，政党政治选举变成选民对“明星候选人”的“直接选举”。这就为那些小型政党、极端政党组织中的“数字亲民型”和“媒体友好型”政党候选人提供了便捷方式。德国政治新星选择党主席爱丽丝·魏德尔就以独特的政治见解和立场在社交媒体爆火，并赢

得了年轻人的支持和关注。同时，由于受到政党政治选举媒体化的趋势逼迫，西方政党为了赢得选举要么向“中间地带”靠拢以拉拢选民；要么转向更加激进的左翼或更加保守的右翼，甚至走向民粹主义，以获取政治生存空间。一项名为“追踪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在脸上的崛起”的研究指出，“视听内容对在线竞选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民粹主义政党在同一平台上崛起，竞选资源的投资方向也在该平台获得加强”^[8]。这从侧面印证了西方政党政治为了选举而选举的根本性弊端。

（三）虚拟机器人加剧身份政治并使政党政治认知地图发生算法型变革

就政党政治主体而言，公共舆论主体中加入了社交机器人并伪装为人类用户。社交机器人作为“类人主体”加入身份政治主体序列，可能扰乱既有政党政治秩序和公共舆论环境。“各种意识形态在传播背景下被放大，影响了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政治实践活动，既为处于边缘的身份政治群体提供了发声渠道，也因参与主体的特殊性带来了难以解决的合规性问题。”^[9]人机关系的不透明性加剧了政治不透明性和舆论操控的诸多风险。就政党政治客体而言，公共舆论客体中的热搜榜、快餐新闻、爆炸性内容、政治丑闻冲击着公共舆论空间，带来公共空间内的事实失真和信息可见性匮乏，影响了真实的民意表达和注意力分配。政治严肃性逐渐消退，政治娱乐化和政治极化加剧。同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视觉内容不断融入政治领域的公共舆论空间，政治图像的解构主义叙事不断加剧，“世界模拟器”使人们对政治真相更加难以识别和掌握，民众被诱导和被操控的可能性显著增加。技术的视觉暴力与政治宣传的视觉分配机制深度勾连，推动了政治伦理转向深度图像化时代。

此种背景下，“谁掌握精美视频制作和虚拟图像传播的技术和话语权，谁就有引导人们的政治偏好和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偶像和诱导大众意见”^[10]的自主权。更可怕的是，算法通过操纵公共舆论激发了一场“无思”和价值立场缺位的工具理性的“算法民粹主义思潮”。算法技术引导、裹挟公共话语和行动产生了“以算法为技术支撑，以社交媒体为传播载体，以克里斯玛型人物为推动者，实现民粹主义的传播”^[11]。从政党政治本体角度而言，基于算法型的新型“社交媒体的交互、分享、自主和廉价属性激发了选民在线政治参与意愿的迅速增长，为边缘性小党和独立政治候选人提供了竞选的利器，使其可以绕开主流媒体通过社交媒体直接面对选民进行政治动员”^[12]，让政党政治选举与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更加不可预知和复杂化。政治平衡可能被破坏，政党分化将加剧。政治进程中的“黑天鹅”事件发生概率增加，政治议题的媒体化倾向有可能掩盖或背离真正的政治民主。受到舆论裹挟的政党和公众有可能失去政治民主的自我修复机制和能力。技术政治学与算法深度融合，与社交媒介型平台本体深度绑定，与算法实现公民认知效率最大化深度互嵌。由数据和算法堆栈的生成式虚假内容，成为塑造政治认知和打造民主基础的关键。

三、算法技术的政治后果：塑造西方政党政治实践的多重效应

算法中介人类行动类似于大脑掌控人类行为。人类政治生活在算法制造的“缸中之脑”艰难前行。算法主导的“技术政治”（technopolitics）和官僚主导的“技术统治”（technocracy）具有内在一致性，与“硅幕”政治有完美适配性。这极易导致技术极权和政治极化的合谋，带来西方政党政治技术奇点的转向。经由算法中介的算法政治“再封建化”趋势不断加剧，政治公共领域的新结构已经不是转型问题，而是可见的衰退和消解问题。政治公共领域的衰退与消解导致了算法民粹

主义思潮和民粹政党政治的崛起。

（一）“硅幕”政治：网络极权与西方政党政治的“奇点更近”

尤瓦尔·赫拉利在《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 AI 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一书中提出了“硅幕”概念。赫拉利所说的“硅幕”是指受到计算机网络和数字帝国崛起的影响，信息与权力的控制更加简单高效，并集中于单一中央枢纽。“硅幕”之下的人类可能走向分裂而非数字团结，原因在于政权对人工智能一致性的要求可能创造出独立而又非常不同的计算机网络，“在不同的网络以及这些网络所控制的人类之间，互动的难度将越来越高。每个网络的生活经验与世界观都大异其趣，于是几乎无法沟通，也难以达成共识”^[13]。这种趋势指向全球将走向由不透明的“硅幕”所隔成的敌对帝国状态，如美国政府主导了对华的“数据脱钩”和“技术禁运”。美国一直奉为圭臬的“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和“技术自由”具有虚伪性。“硅幕”将导致自由民主制度所宣扬的强大自我修正能力的退化和机制的溃败。因为维持西方民主制度的两大条件，其一是针对关键议题进行自由的公共对话，其二是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与制度信任，都在遭受算法机器和数据极权主义的侵袭。“一项分析估计，在 2016 年美国大选期间产生的 2 000 万条推文中，有 380 万条（将近 20%）是由机器人程序生成的。”^{[13] 296} 作为西方政党政治极权主义新奇点的“硅幕”政治，正在利用由“个体琐碎的喜好（偏好）、意见（偏见）、利益、趣味、欲望转化成的统治性权力”^[14]。目前的政党政治竞选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将来的竞选可能是不同算法之间的对决。“民众实际上从选总统（人类行动元），变成了选算法（非人类行动元）。”^{[14] 225} “算力和数据提速着认知与决策，也拨动着心灵中公平正义的天平。若将一切抉择都交给算法，人的精神与觉醒是否面临荒芜？”^[15] 事实上，OpenAI 并不 open，全新的算法偏见正垒起观念的高墙。“硅幕”政治使得西方政党政治极权化和民主空壳化的过程正在加速。一场由算法主导的“技术政治”和官僚主导的“技术统治”合谋的“硅幕”政治已经主导了人类未来诸多命运和议题。

在算法日益成长为控制权力的权力时，西方社会正在试图实现算法“武器化”的图谋。伊朗“推特革命”和美国主导对 TikTok 的不公正法案和裁决都说明，算法不仅会被政党用于竞选，还会被用于发动“颜色革命”和非正义竞争。“美国政府展现出将算法‘武器化’运用的强烈意愿，试图以算法为抓手、以计算思维为指导遏制竞争对手，塑造霸权优势”^[16]，这显然是一种全球性的霸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体现。算法如同一个无形但又无处不在的“数字法官”，被平台、政党、利益集团用于裁决一切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这种裁决以算法控制为前提。在“代码就是权力”的背景下，“国家会获得一种超强的执法能力”^[17]，且这种执法能力极有可能被某种极端政党或可能的钟情于技术的人物所滥用，导致国家权力“增压”和个人权力“失压”困境。库兹威尔在其新书《奇点更近》中描绘了一个更加激进的算法与核武器结合的政治版本，他指出核武器需要一个更智能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理由是“虽然 AI 无法消除核战争的风险，但更智能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可以显著降低因传感器故障而引发的意外使用这些可怕武器的风险”^[18]。“核政治”的算法版本不论是否真的如其所说的那样能够增强国际安全秩序，都不免让人心惊胆颤，现实原因不是不信任算法，而是任何时候的算法都远没有主导霸权政治和极权主义的政治逻辑背后的人更难对付。能够掌控和利用算法的依然是人，特别是那些技术官僚和政治官僚合谋的“技术狂人”和“政治妄人”。

“硅幕”政治的技术极权要害在于技术统治和技术政治占据和主导了政治秩序的基本盘，政党

竞选的算法矩阵趋势加剧了选举异化风险。更温和的政治主张或许在算法政治和流量时代难以为继。根据诺齐克的观点，曾经“摇摆选民”为国家提供了一种在政治领域追求多种价值观的内在机制。如今，它遭到了算法技术极权的挑战和威胁。这不仅导致政党政治的利益平衡机制失效，更使得“算法的政治偏见可能会通过不断具体化和巩固他们的政治立场，让选民更像政客”^[19]。西方政党政治选民的“政客化”和政客的算法“亲民化”，既是“硅幕”政治的典型表现，也是西方政党政治技术异化的新奇点。

（二）算法中介：算法政治的“再封建化”趋势加剧

基于选举的政党政治，关键是在选举中要有行动主义，即给政党及其候选者投票，帮助政党和候选人赢得选举。算法技术深入政党选举的行动主义趋势加剧了“人类自动化集体”（Human-automated collectives）行动逻辑。现实政治生活越来越多地被算法想象和自动化幻想左右。就选举而言，政党选举和候选人竞选只需要“通过算法策略性地提出集体主张，并在社交媒体上动员算法策略”^[20]，就能很好赢得选民的行动。算法中介和放大了基于“标签行动主义”的行动逻辑。从政党政策的提出到社交平台的行动动员，从政党政策宣传到集体意识的塑造，算法促使政治逐渐走向可见/不可见双重交织的后真相政治时代。“可见的”都是想让你看见的，“不可见的”都是不想让你看见的。算法可以放大意见也可以逃避和劫持意见。算法以互连、组装、增强的社交属性推动了“与交互和行为体的排序、信息过滤以及内容的排序和聚合相关的操作”^[21]，实现透明/不透明性、真实/虚假的随意切换和任意引导。算法中介的政党政治既维持了技术政治的一般公开性原则，又以一种隐秘的方式破坏了这一原则。

人类自动化集体与相信什么是真相有关。真相只有一个，而让人相信真相是什么可以有很多方式。“人类是唯一能与众多陌生个体合作的哺乳动物，原因就在于只有人类能够创造虚假故事，并且把这些故事流传出去，让几百万人相信。”^[22]从某种角度而言，人类就是一个后真相物种，只愿意相信他们相信的故事，哪怕这个故事是虚假故事。算法政治让人们相信的方式和团结的力量具体化为精准数据和算法。算法的隐秘性在于“这种政治与技术的连接，被隐藏在日常的信息获取和沟通中”^[23]。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和民主党鼓吹的美式“全球化”，从表面上看是相互矛盾的。美国选民曾经选择过美式“全球化”，也选择过“美国优先”，这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政党政治宣传和让选民相信这一宣传。马克·费舍引用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说法，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否定的意识形态，所谓否定的意识形态就是越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好，就越是可以自由地嵌入和连接到资本主义世界和意识形态内部^[24]。所以，“驴象之争”的美式竞选使用看似矛盾且针锋相对的竞选话术，都只是让选民相信的第一步，最为关键的第二步就是通过不断的重复议题，通过算法技术和社交媒介推介自身主张。基于算法中介的政党政治话术和宣传，才是让选民相信什么并做出选择和行动最关键的动作。

基于特定的内容个性化生成、个性化推荐，检索过滤的“算法推送”政治信息正在支配网络空间的政治秩序和传播秩序。算法技术微观而隐秘的权力与公开权力合谋，构成了西方政党政治新的政治生活秩序和竞选生态。传统政治权力不是遭到了算法的解构，而是实现了与算法的耦合。此种情况下，“资本支配下技术工具对政治的大范围自动化渗透，数字威权主义下寡头治理的趋势，以及‘后真相’时代下民主形态的更迭”^[25]，是西方政党政治日趋粗暴和堕落的证明。西方算法政治

可见/不可见趋势的加剧是以算法治理和监控资本主义的兴起为基础的, 算法政治打造了一个新型的、基于代码力量的公共领域。这也正是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中所袒露的核心——政治公共领域正在算法时代和新型媒体面前变得衰退和脆弱不堪。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日益模糊化, 监控使得公共领域的包容性逐渐消失, 不同声音和“异识”性话语被强势打压。这表明, 西方政党政治借助算法技术塑造的新媒介损害了政治公众的自我认知、民主进程和协商政治的合理推进。

塞德里克·迪朗曾对这种技术进展用“技术封建主义”概念予以概括。就政治民主而言, 如今的算法平台和社交媒介实现了对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首先, 在意见趋同的过程中, 领袖人物背后政治取向的奇观化和人格化与封建权力的化身和代表相呼应, 在这种情况下, 理性标准就不复存在。其次, 大众娱乐与广告的融合导致了封建主义所特有的各种流派的混杂, 国家本身也不能幸免。”^[26]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曾被作为“加州意识形态”而获得政客和技术大佬们的广泛赞誉, 认为它可能导向一个更加去中心化的理性公共空间。事实上, “数字封建主义”对民主政治的破坏, 导致个人原子化、认知“狭域化”、真相模糊化、监控规模化和系统集成化。

(三) 算法操纵: 算法民粹主义思潮和民粹政党政治的崛起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将希腊城邦政治美化为一个能够完成某种善业的“社会团体”, 认为城邦政治就是一种“善业”并能建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善果”^[27]。如今这种“善”被西方政党政治的虚假民主、丑陋德行以及民意操控所淹没。政党之间、候选人之间都在极尽所能地利用一切算法操控舆论和真相, 达到操控“自由人”的目的。这里的“自由人”只是表面的自由, 是资本主义吸纳与掌控的“伪自由”。因此, 算法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不是“强硬”而是“柔性”, 它是民粹主义政客借助数字混合媒体的表达形式, 以政治精英试图利用大数据分析和算法精准推送实现与普通民众达成共鸣互动, 以赢得民众支持、扩大自身影响作为表现形式。这是社交媒介和预测算法、分类算法、个性化推荐算法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算法技术加持之下, 政党政治从原本的精英政治和有限广场政治转为“平民政治”和网络政治, 但这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政治, 而是加剧了“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

算法从两个方面促进了民粹主义思潮和民粹政党政治的崛起。一方面, 算法通过数据收集、筛选对潜在对象进行了分类, 那些对潜在对象思想和观念的引导才是算法民粹主义思潮真正的落脚点, 即算法加强了通过技术实现“主观极化”、“情感极化”和“政治极化”的三维融合。另一方面, 算法民粹主义政党政治通常以典型人物和领导人物宣传其极端民粹思想。比如, 荷兰“民主党论坛”从一个在众议院只拥有两个席位的小党成长为 2019 年省级选举中规模最大的政党, 就一直被指控实施民粹主义策略。其政党领导人泰里·鲍德特更是通过 Twitter 塑造了极右政治风格。“在鲍德特和政党的 Twitter 话语中, 他者化、心地化、领导权化、阴谋理论化等原型右翼民粹主义倾向都是可见的模式。”^[28] 民粹主义思潮和政党大多以打破传统建制派、反对精英政治的面貌出现, 这种“政治面貌”的个性化、情感化和长期性助长了民粹主义者支持其政党的信念, 还将政党品牌和政党人物形象实现了绑定, 更加固化了认知和行动。有学者认为“算法民粹”和“算法民主”是西方民主进程中的以技术为分割的“一体两面”, “算法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这个旧身子进入算法新时代后发生偏离的产物”^[29], 应实现技术赋能, 推动由算法民粹向算法民主过渡。

事实上, 以算法民主替代算法民粹很可能只是一种技术乌托邦的想象。算法民粹所依赖的社交

媒体具有十分明显的垄断性质，真正受关注、被使用和具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就是那些大型垄断媒体，这些被资本垄断的社交媒体拥有者形式上看似没有参与政党政治，实质上都在暗地里“选边站队”。其政治倾向会在无形算法和有意宣传引导的双重作用下得到释放。2008 年共和党选举操盘手艾伦·雷蒙德在《如何操纵选举：一个共和党选举操盘手的忏悔》一书中就表示，“操纵选民就是美国竞选活动的精髓”。马斯克收购 Twitter 并改名为 X，同时解封了特朗普的账号，而 X 平台则变成“特朗普 2.0”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竞选口号的喉舌。“X 平台从以前的反特朗普，到这次大选成为特朗普的传声筒。如此强烈的变化，绝不仅是马斯克调整平台政策或者单纯修改算法那么简单，他手中的‘核弹级’AI 能力应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30] 算法为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做了由群体极化向政治极化转向的必要准备，为民粹思想形成提供了技术助力。算法提供了政治感知系统的技术转向支撑，对由身份差异转向政治分歧的扩大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算法的技术治理和政治规制：应对西方算法政治的基本逻辑

西方政党政治是选举政治，它必须借助最新技术和媒介传递信息以赢得选举。学界普遍认为 20 世纪下半叶是“媒体政治”时代，21 世纪则是“算法政治”时代。未来很可能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视觉政治”时代，即后真相图像政治时代。算法政治的最大变革在于颠覆了信息内容生产和传播渠道，塑造了人们的认知地图。算法型社交媒介的广泛介入带来了民众互动方式的变革和民主意见表达范式变革，由此导致政治宣传、民意塑造、选举方式以及民主决策过程的算法霸权问题。算法技术对西方政党政治产生的突出影响和严重后果提醒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西方算法技术对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形象建构的影响，要充分 and 有效利用算法技术赋能国家治理，助力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一）建构算法舆论自主，破除西方政党政治通过算法技术操纵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袭扰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是国家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安全涉及党的政治话语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政党形象安全等多个领域。西方政党政治基于选举的执政地位与中国共产党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地位有着本质区别。西方政党政治是“一切为了选举”的虚幻竞争性政治，竞选可以不择手段、不计成本、不讲底线。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从确立到巩固、从巩固到发展，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西方政党政治利用算法技术辅助竞选的做法是一种策略行为，会对西方政党政治的内外政策产生深刻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党政治都在拿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威胁论”作为竞选炒作的关键议题，并充分利用其在国际话语权中的主导地位在西方社会内部和国际舆论界掀起一轮又一轮针对中国的无端攻击，企图扰乱舆论、扰乱民心。我们要始终警惕西方政党利用算法和国际舆论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攻击，以算法技术自主对抗西方算法技术僭越，以民心对抗算计。要通过算法自主技术推动意识形态、党群沟通、政党政策与政治决策公开透明，通过算法自主掌握“对政党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象认知的真实性、政党决策的公正性、形象塑造的主导权”^[31]。对比西方算法政治叙事中的“谎言叙事”，我们要始终贯彻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民心政治”话语立场，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

位的理论话语、政策话语、价值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建设，坚持“以生产机制保障话语原创性发展、以优势集成实现话语多维度延伸”^[32]，破除西方基于算法优势和国际舆论领导地位所建构的话语霸权内容和场域的束缚。

（二）推动算法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对齐，防止西方政党政治极端思潮和激进主义叙事逻辑的侵扰

人工智能价值对齐以一种人机关系新伦理学的理论视域被不断提及和重视。其中，算法价值对齐成为关键领域。西方社会之所以出现人工智能价值对齐难题，其根本原因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西方社会内部分裂和价值观撕裂。西方社会技术精英以人工智能价值对齐的方式讨论人类价值对齐问题，始终无法实现价值对齐问题的根本性解决。不过，西方社会政党政治分裂分化、网络极端思潮迸发、激进主义、极权主义叙事逻辑大行其道，算法偏见在其中起到了不容小觑的推动作用。西方社会算法价值对齐的难题在于由算法主导的社会政治和舆论环境破坏了人类交往和信任的基础，试图通过人工智能价值对齐掩盖西方霸权下的人类价值不对齐真相。伴随算法价值对齐难题的是，“资本通过对数字技术体系的占有和规则制定，建立起垄断一切信息和知识来源的‘能指的霸权’，扭曲了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旨在推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技术无意识化的方式在全球拓展”^[33]。西方网络极端思潮、激进主义叙事的扩大化和全球化是极端政治主张和竞选话语极端叙事的延续，是西方政治资本、技术资本、文化资本在意识形态和舆论生态中的现实性表达。

为了有效防止西方网络极端思潮和激进主义叙事在国内舆论空间流动，必须推动算法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对齐。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和人类整体命运问题的思考和阐述，是校准人类价值方向、牵引人类价值认知、引领人类价值行动、建构人类价值融合机制的重要理论贡献。算法价值对齐不应是一种对社会复杂性问题进行技术价值偏差调校的技术简化主义维度，而应置于防止人类社会整体撕裂和极端思潮、激进主义叙事的政治叙事和人类精神维度内，推动算法价值对齐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向同行^[34]，推动技术向善、算法向善与人类向善携手融合的行动主义进路。同时，算法作为一种先进技术文明的表达，理应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倡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政治与社会文明相衔接和对齐，从而超越地域、民族、肤色、性别等限制，超越狭隘民族主义、政党保守主义、国家优先主义、国家例外主义，向人类文明交汇点、人类价值增长点和多元政治文化秩序坚定迈进。

（三）加强算法舆论传播监督引导，推动中国共产党形象立体化传播

算法舆论安全不仅是算法技术安全的问题，也是涉及网络公共领域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政治舆论安全的重大问题。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算法舆论安全既要关注算法型媒介的算法设计和运行安全，又要防范有组织的算法舆论攻击安全问题。这是涉及数字网络主权、新闻传播自主权、网络意识形态塑造权必须要关注的问题。西方政党和政客从未停止通过广泛的算法媒介和舆论机构对中国共产党形象进行网络攻击，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政治形象进行“污名化”攻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进行歪曲化报道。受到算法媒介的意识形态化驱动的西方媒体在“污名内容多样化、污名主体多元化、污名思维联想化”^[35]方面可谓“处心积虑”。可以说，西方政党政治一直在进行舆论操纵下的“认知战”“意识形态战”。如今，算法技术以社交媒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知识与认知结构的方式，潜移默化、精准匹配地实现认知操纵和意识形态塑造的

“媒介化”和“去中心化”。我们必须加强算法舆论传播的监督和引导，推动中国共产党形象的立体化传播，既要坚定“四个自信”，又要坚决破除西方算法媒介所刻意制造的刻板印象和“标签化”行为。要充分利用算法的长处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作为建构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有利抓手，充分利用西方社会的普通人视角和话语习惯推动内容生产个体化和舆论传播精准立体化，从传统政党形象传播的“点对面”模式转向算法时代的“点对点”模式，推动由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的传播范式转换。

五、结语

美国资深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亨利·基辛格认为，人工智能在探索和管理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方面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在特定领域，人类可能会对人工智能言听计从，更喜欢人工智能的数据处理过程，而非人类思维的局限性。这种遵从，可能使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退回到一个个人的、过滤的、定制的世界。在这种情景下，人工智能的力量加上它的普遍性、隐秘性和不透明性，将引发人们对自由社会甚至自由意志前景的怀疑”^[36]。基辛格所谓“个人的、过滤的、定制的世界”确实正在算法技术的推广中加速来临。西方政党政治领域是除技术领域以外，最先感受并利用这种能力的领域之一。算法秩序与代码力量正在塑造一个带有普遍性、隐秘性与非透明性的计算政治学新格局，加速推动西方政党政治走向政治极化和政党分裂。正如有研究指出：“数字殖民以技术逻辑为支撑与意识形态耦合，催生‘算法异化’，造就‘共景监狱’，引致‘精神空场’，进而诱发意识形态风险的产生。”^[37]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双向奔赴中，中国共产党正以一种开放的、崭新的文明样态绘就一幅世界各国政党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上携手共行的宏阔图景^[38]。中国共产党要充分认识算法的政治影响，加快完善针对算法的政治规制，引领算法技术向善，构建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和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数字网络和算法安全格局。

参考文献：

- [1] 褚尔康. 算法秩序的属性、价值与运行 [J]. 江海学刊, 2024 (6): 160-168+256.
- [2] 曹克亮. ChatGPT: 意识形态家的机器学习转向及后果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34-144.
- [3] 杨华锋. 赋能与均衡: 算法权力秩序的合法性风险及其治理 [J]. 新视野, 2022 (4): 62-68.
- [4] 董青岭, 朱玥. 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正义与秩序构建 [J]. 探索与争鸣, 2021 (3): 82-86+178.
- [5] 高奇琦. 算法政治转向与治理功能弱化: 新科技革命下西方政党政治发展趋势研判 [J]. 行政论坛, 2022 (1): 148-154.
- [6] 阙天舒, 方彪. 西方政党政治现代化中的“迷思”——基于一种“政党计算”范式的比较分析 [J]. 学术月刊, 2023 (6): 88-100.
- [7] 韩荣卿. 政党政治数字化变局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调适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3 (2): 122-136+167-168.
- [8] Olof A L. Picture-perfect populism: Tracing the rise of European populist parties on Facebook [J]. New Media & Society, 2022 (1): 227-245.

- 曹克亮. 算法时代的政党政治：重要影响、现实后果与应对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147-158.
- [9] 张爱军, 徐潇潇. 社交机器人“类人性”对身份政治的干预 [J]. 学术界, 2023 (11): 56-66.
- [10] 曹克亮. Sora 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治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166-178.
- [11] 张鹏. 西方算法民粹主义：生成、表征及缺陷 [J]. 理论月刊, 2021 (11): 38-49.
- [12] 陈家喜, 陈硕. 数字时代的政党政治：变化、形态与争议 [J]. 国外社会科学, 2018 (6): 51-59.
- [13] 尤瓦尔·赫拉利. 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 AI 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 [M]. 林俊宏, 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24: 315.
- [14] 吴冠军. 再见智人：技术—政治与后人类境况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223.
- [15] 用你的活法定义世界的算法 [EB/OL]. (2024-12-29) [2025-01-08]. <https://mp.weixin.qq.com/s/KiAvmaFlpMjbSI2nrfskCA>.
- [16] 董青岭, 关意为. 算法的“武器化”：计算政治时代被嵌入的安全风险 [J]. 东北亚论坛, 2025 (1): 44-64+127-128.
- [17] 杰米·萨斯坎德. 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 [M]. 李大白, 译. 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 290.
- [18] 雷·库兹威尔. 奇点更近 [M]. 芦义, 译.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4: 292-293.
- [19] Ulrik F. Algorithmic Political Bias—an Entrenchment Concern [J]. *Philosophy & Technology*, 2022 (3): 75-94.
- [20] Kwok C, Chan K N. Human-automated collectives: Automating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 [J]. *New Media&Society*, 2024 (9): 4992-5012.
- [21] Michael E, Brindusa O A. Activists in the dark: Social media algorithm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two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J]. *Organization*, 2021 (1): 68-91.
- [22] 尤瓦尔·赫拉利. 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 [M]. 林俊宏, 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8: 213.
- [23] 石晓虎. 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中的算法政治：特点、影响及前景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1 (1): 118-125.
- [24] 马克·费舍.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 [M]. 王立秋, 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25.
- [25] 李小波, 赵依桐. 算法政治推送：一个命题的解构与梳理 [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6): 75-85.
- [26] 塞德里克·迪朗. 技术封建主义 [M]. 陈荣钢,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24: 70.
- [27]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M]. 吴寿彭,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 17.
- [28] Anoenk R V, Pieter M, Sean P. Twitter as a right-wing populist’s playground: The algorithmic populism of Dutch political party ‘Forum voor Democratie’ and leader Thierry Baudet during their political rise [J]. *Discourse, Context & Media*, 2021 (44).
- [29] 高奇琦, 张鹏. 从算法民粹到算法民主：数字时代下民主政治的平衡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 15-25.
- [30] 第四范式显威力，揭秘马斯克 AI 技术如何操纵本次美国选举 [EB/OL]. (2024-11-23) [2025-01-08]. <https://mp.weixin.qq.com/s/2Bz2hJgEj7GvCWdG19VUA>.

- [31] 张亚勇. 智能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研究——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例 [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 (10): 60-72+134-135.
- [32] 王星入. 本体、场域、方法: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建构理路 [J]. 传媒观察, 2024 (10): 86-97.
- [33] 吴静. 赛博资本主义的谎言和技术无意识化的真相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4 (6): 12-20.
- [34] 董慧. 数字经济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哲学思考与中国智慧 [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5): 79-87.
- [35] 靳思远, 秦在东. “污名化”与“去污名化”: 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话语攻击及应对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0 (9): 80-84.
- [36] 亨利·基辛格, 埃里克·施密特, 丹尼尔·胡滕洛赫尔. 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 [M]. 胡利平, 风君,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3: 244-245.
- [37] 蒋蕊韩. 论数字殖民的意识形态逻辑 [J/OL].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11 [2025-03-08].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188.C.20250303.0944.008>.
- [38] 徐艳玲, 易旭. 论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政党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 [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1): 1-8.

责任编辑: 卢媛 校对: 王京菁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探析： 政党政治视角

王贯之

(吉林大学 公共外交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 中美关系未来走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美国作为典型的两党制国家, 其政党在对外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对华政策走向与其政党政治状况的关联日益深化。从战略层面看, 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 都将延续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既定战略。同时, 由于美国两党在政党文化、施政理念、行动纲领与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不同, 共和党上台后可能会对实现美国战略目标所采取的战术和手段做出适度调整: 强化打“贸易战”的力度; 对华科技围堵或将由“小院高墙”升级为“大院高墙”; 在台湾问题上或推行“以台制华”和“以陆压台”的双轨政策、加大对台“勒索”; 其他关涉中国利益的美国对外政策也会有所调整。特朗普重返执政为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挑战和机遇。中国须保持战略定力, 壮大自身实力, 提前研拟对策, 实施“韧性”应对。

关键词: 特朗普; 美国对华政策; 政党政治; 中美战略竞争; “贸易战”; 科技围堵

中图分类号: D822.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2025)02-0159-12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5.02.014

作者简介: 王贯之,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外交学专业 2022 级本科生。

引用格式: 王贯之.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探析: 政党政治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159-170.

一、问题的提出

2025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随即，特朗普政府废除拜登政府近 80 项行政令，宣布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条约，并对华加征 10% 进口关税。在特朗普 1.0 时期，美国在经贸、科技、安全等领域对华采取了力度空前且带有鲜明“美国优先”色彩的遏制举措，深刻影响了中美关系走向。不难预见，此次特朗普的“卷土重来”势必会对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格局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学界亟需关注和研判特朗普 2.0 时期的对华政策走向。

目前，中国学界基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对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动向进行了多角度的预测分析。在经贸领域，有学者从美国经济结构出发，认为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会进一步提高对华关税，逐步推动对华“脱钩断链”^[1]；也有学者指出，中美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因此两国经贸关系仍有保持相对稳定的可能^[2]。在科技领域，有学者认为，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或在技术出口、研究合作和供应链安全等方面进一步对华施压。在政治与安全领域，有学者认为，特朗普 2.0 时期会延续美国“以台制华”政策，将台湾进一步纳入“印太战略”框架，以便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占据更多优势^[3]。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政治人格与决策方式将对美国对外政策走向产生关键性影响^[4]。以上学者的研究视角各不相同，尽管也有个别学者从政党政治视角分析了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但并未将其作为一个突出变量展开分析。鉴于美国是典型的两党制国家，其政党在对外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近年来美国政治日趋极化的背景下，其对外政策走向日益与政党政治状况密切相关，本文特从政党政治的视角出发，深入探析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二、政党政治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内在关联性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政党，主流政党尤其执政党是影响甚至主导国家外交决策的重要力量^[5]。就美国而言，其执政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更是如此。

（一）政党政治深刻影响美国对外政策

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而国内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是具有意识形态的组织，会根据一国历史传统及其代表的社会群体，提出与其意识形态相符的一整套内外政策主张，并根据自身偏好解读国际形势。正因如此，不同政党在“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符合国家利益”这一问题上常常产生分歧^[6]。此外，执政党领袖的性格特质和领导风格也会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关键影响。在世界政治中，某种程度上，“全部国际关系可以描绘成显赫人物或者由他们构成的集团的决策过程”^[7]。

在美国，随着政党轮替和政权更迭，其政府的对外政策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之间的政党轮替都带来了对外政策的调整，乃至对前任外交遗产的否定，如在气候变化和中东问题上的反复^[6]。共和党倾向现实主义、单边主义，主张本国优先，以强大军事实力维护国家安全；而民主党相对支持多边主义，热衷参与国际事务，常打人权、民主、贸易牌^[6]。

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调整过程中，执政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执政党

在外交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具体执行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外交政策制定阶段, 执政党通过掌握国家权力, 主导对外政策议程或推动国会立法等, 对外交政策的核心取向和具体方案施加影响, 从而推进符合本党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落地。在外交政策的具体执行阶段, 执政党任命具备同党背景或意识形态相近的官员, 确保其外交政策顺利实施。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的政党身份也会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 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美国总统在制定国内外政策时必须遵从自己所属政党的政策立场, 但总统作为政党代表, 其政策倾向难免受所属政党的影响, 这使美国外交政策总体上带有总统的党派色彩^[8]。

(二) 美国两大政党对外政策理念比较

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外交理念不同, 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两党外交政策取向有所差异^[9]。

第一, 在意识形态方面, 民主党倾向自由主义, 更多地强调社会多元、平等与公民权利等核心价值。这在外交层面表现为: 通过国际制度和多边条约等来调控国家间关系, 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如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克林顿政府的“民主扩张”战略、拜登政府重返《巴黎协定》并修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均可视作自由主义理念在不同时期的实践。相比之下, 共和党更倾向保守主义。这不仅体现在强调国家主权、传统价值观与社会稳定方面, 也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外政策取向上。里根时期对苏联的强硬遏制战略、小布什时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特朗普 1.0 时期的“美国优先”战略与“退群外交”, 都足以说明保守主义底色贯穿共和党外交政策始终。而在贸易层面, 共和党往往将保守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相结合, 在面对全球化与国际竞争时强调保护国内产业、捍卫国内市场, 或以“新帝国论”方式在特定区域谋求战略存在或支配地位^[10]。

第二, 在外交取向方面, 民主党更侧重理想主义传统, 强调道德与规范的重要性。其背后的逻辑是: 通过凝聚全球共识与加强道德约束, 在规范层面确保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对此, 民主党常将人权和民主目标前置^[11], 在政治实践中, 更加关注民主、人权、宗教、法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具体到对华议题上, 拜登政府编造“民主对抗威权”叙事, 组织所谓“全球民主峰会”, 以意识形态划线, 在世界上制造分裂。相比之下, 共和党更偏向现实主义, 坚持将外交立足于国家利益而非国际利益之上^[12], 强调国家间权力竞争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尽管在不同总统任期内, 共和党政府现实主义外交的方式和范围有所不同, 但“以实力谋利益”的基本思路贯穿始终^[13]。例如, 特朗普 1.0 时期发起的对华“贸易战”, 以经济实力与惩罚性关税作为主要政策杠杆, 便是现实主义外交在经济领域的典型体现。

第三, 在外交风格方面, 民主党推崇多边主义, 主张通过国际组织、区域联盟以及多边谈判等形式协调各国利益、管理国际事务。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美国的自主性或主导权, 而是试图在多边平台为其倡导的自由主义价值与符合美国利益的规范争取更多支持, 同时为美国的全球行动寻求合法性背书。通过与盟友和国际机构的合作, 民主党能在塑造全球治理架构的过程中更好兼顾美国的战略利益与正当性, 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延续并强化美国在制度与价值层面的主导地位。相比之下, 共和党更推崇单边主义。这种外交风格与其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一脉相承, 主张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自主性, 不轻易让渡国家权力或接受外部约束。特朗普 1.0 时期的“美国优先”战略与“退群外交”, 不仅包含保守主义色彩, 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单边主义的外交风格。

尽管美国两大政党在对外政策理念及政策取向上有一定差异，但二者在该问题上的共同之处也不容忽视。如在涉及国家生存和重大利益的基本外交问题上，美国两党往往能达成共识；在有关国家的国际定位和对外发展走向等重要问题上一般也看法相近，而政党之争更多出现在外交政策目标的优先侧重和实现手段等衍生问题上^[5]。此外，执政党进行外交决策时往往从国家的视角进行利益权衡，而非仅考虑自身的执政地位；在野党通常也会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会为了政党利益妨碍本国对外政策的落实^[6]。这使得美国两大政党的对外政策中往往带有“超党派政治”色彩。

三、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共识与延续

从现实政治看，政党轮替后，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会具有相当程度的延续性。

（一）战略层面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华竞争的战略将延续甚至强化。两党虽然在执政风格、具体措施和意识形态立场上呈现差异，但在对华战略竞争、遏制中国崛起方面却存在高度共识。

其一，就宏观战略定位而言，美国两党已经形成了对华竞争的广泛共识。自 21 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与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深度参与，使美国各界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在经贸、科技、金融以及军事实力等领域的巨大潜能。美国相关智库对此做了大量评估，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声称中国崛起会对美国既有的世界霸权以及产业优势构成直接挑战，主张美国须全面遏制中国。久而久之，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不仅成为国会两院在对华政策制定上的共同立场，也在社会和选民中得到一定支持响应。具体来说，在美国国会层面，围绕对华政策的议题常常得到跨党派的协同推动，无论是针对华为、中兴等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还是涉港、涉台或涉疆法案，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跨党派支持。这种“超越党争”情形并非偶然，而是美国单方面坚信“中国崛起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构成威胁”的结果。基于这一叙事，美国部分媒体和智库不断制造煽动“中国威胁”的舆论氛围；两党在对华政策上比拼“谁更强硬”，以在选举中获得民众支持。如此一来，美国国内逐渐形成了结构性、系统性的对华防范与遏制共识。从这一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的接续发展，美国这种认识会继续稳固和强化。

其二，美国两党已经形成了将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关系”的共识^[14]。美国两党长期负面解读中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创新以及全球影响力等方面的实力提升。早在特朗普 1.0 时期，美国就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rival）^[15]；拜登政府则继承并强化了这一定性，指出要在各领域“竞赢”（out-compete）中国^[16]。为此，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力度逐步加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具有全面性、长期性，不会因政党轮替而发生根本性改变。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势必继续将中国视为唯一有能力“挑战”其地位的竞争者，并维持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这一点在共和党党纲中也有体现。譬如，共和党在本次大选的竞选党纲中，批评民主党对华政策过于软弱，再度呼吁以“美国优先”为前提，更加积极地抵制中国，通过关税壁垒、出口管制、动员盟友等方式对中国实行全方位施压^[17]。尽管美国政党的党纲作为一份体现政党或总统候选人原则、政策和承诺的文件^[18]，通常发挥的是“竞选纲领”而非“统治”的作用^[19]，但对政策制定仍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8]。

(二) 战术层面

战术或策略是为战略服务的。美国对华打压遏制的战略目标决定了特朗普政府必会延续民主党执政时期采取的某些战术或策略。

第一, 在地缘政治上继续遏制和围堵中国。美国始终高度关注亚太地区的局势发展。2012 年, 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 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 随后特朗普 1.0 时期美国开启中美战略竞争, 并提出“印太战略”, 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 并将战略资源向亚太地区回调, 维持其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拜登政府延续这一战略, 并以“自由开放”等名义, 带动盟友“小多边”机制, 在外交、经济、军事乃至地区治理等议题上多管齐下^[20], 对华实施阵营性对抗和复合性打压。与此同时, 美国还通过整合地区军事联盟与合作机制, 构建有利于自身的政治与安全网络, 意在以相对可控的成本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21], 同时阻滞中国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鉴于在地缘政治上遏制中国已成为美国历届政府的共识,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极有可能延续甚至强化这一政策。

第二, 在科技领域继续打压和遏制中国。科技封锁已成为美国打压和遏制中国的主要手段^[22]。特朗普 1.0 时期, 美国将中国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重要科技领域的进步视为对美国全球霸权的“现实威胁”, 并对华为、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制裁。拜登政府虽在某些操作层面略有调整, 但并未改变对华技术封锁的基本逻辑。2020 年白宫发布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 明确列出了美国要维持全球技术领导力所需优先发展的核心技术清单, 并将“国家安全创新基地建设”和“保护技术优势”确立为美国科技政策的两大支柱^[23], 以确保美国在相关领域的领先地位。目前, 两党在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稳固美国世界科技霸权的核心目标上形成高度共识。特朗普 2.0 时期科技竞争仍将是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重要支柱, 其强度不仅不会减弱, 还可能进一步提高, 并向更多关键领域延伸。

第三, 在经济与贸易领域延续对华“贸易战”。自特朗普 1.0 时期以来, 美国对华“贸易战”至今尚未有实质性减弱。拜登政府虽在战术层面做了一些调整, 但总体上仍秉承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安全优先的原则。从 2024 年大选中共和党竞选团队提出的“第 47 号议程”(Agenda 47) 来看, 其主张将“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和彻底消除对华依赖作为核心, 逐步推进取消中国对美贸易的最惠国待遇, 辅以相应企业限制与关税政策, 如阻止美国企业在华投资、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并购等^[24],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选择性脱钩”与所谓“战略性去风险”^[25]。总而言之, 不论特朗普 2.0 时期上述政策实施效果如何, 美国对华贸易都无法重回过去的“自由开放”状态, 关税、出口管制和严苛的审查措施都可能被继续沿用。

第四, 在台湾问题上继续打“台湾牌”, 推行“以台制华”。近年来, 美国政府不断加强对台军售, 提升美台官方、半官方接触, 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或在多边场合频繁“亮相”, 以实现“以台制华”目标。美国政府认为, 打“台湾牌”成本小而收益大, 是试探、遏制与消耗中国大陆的关键筹码^[3], 因而一直将台海政策置于对华战略框架内的重要位置^[26]。特朗普重返执政后任命的外交、国防、安全等多位官员均是对华“鹰派”人物, 且在涉台问题上立场激进^[27], 这必然会影响甚至左右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为了给美国政府打“台湾牌”提供所谓法理支撑,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继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秉持其所谓基于“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

的“一个中国”政策^[28]。可以预见，美国必然会继续阻挠中国实现统一，并利用台湾问题作为谈判筹码，在贸易、科技或其他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向中国施压，以实现其战略企图。

第五，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继续打“民主牌”。尽管传统观点认为，共和党不及民主党那样注重推动民主与人权议程^[29]，但从现实政治看，不论在共和党执政的特朗普 1.0 时期还是民主党执政的拜登时期，美国政府对华议题均越来越多地关涉意识形态因素，甚至用意识形态来界定中美关系^[30]。自 2024 年大选启动以来，特朗普的核心幕僚在打“人权牌”“价值观牌”等方面颇为“活跃”，对意识形态话题并不避讳，妄图强化对华“认知战”与塑造“道德制高点”，为美国在国际场合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创造更多“合法性”。对此，依照共和党的现实主义理念，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没有理由不对拜登政府遗留下的“意识形态资产”进行改造并加以利用。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大概率会继续将意识形态当作对华战略竞争工具，但在运用的方式、手段上可能会有变化。

四、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可能调整

从战略层面看，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出于维护自身世界霸权地位的考量，都将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压。但从策略层面看，因为共和党与民主党在政党文化、施政理念、行动纲领与意识形态等方面有所不同，共和党上台后或会对实现美国战略目标所采取的策略手段做出适度调整。

（一）美国或进一步强化打“贸易战”的力度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或将在经贸领域对华进行更高强度、更广范围的施压，并主要通过关税手段来体现。其一，提升对华“关税战”强度。特朗普不仅多次强调关税在对外战略工具箱中的重要地位，甚至公开声称“字典里最美好的词就是关税”^[31]。其任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eson Greer）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均秉持对华强硬态度，并支持对华加征关税。此外，美国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服务于国内政治需要，以应对贸易逆差、制造业回流、技术霸权及就业问题。因此，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或会强化“关税战”这一叙事，以兑现其选举时的政治承诺，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个人政治遗产^[25]。2025 年 2 月 1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华加征 10% 关税后，中国输美产品的平均关税已高达 29.3%，尽管如此，仍不能排除美国对华进一步升级“关税战”的可能。据测算，若美国对所有进口产品加征 10% 关税并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60% 关税，将导致美国实际 GDP 下降 0.16% 至 3.61%^[32]，造成较大的负面冲击。因此，美国接下来或采取渐进的方式，缓步增加对华加征关税的幅度。其二，进一步将关税武器化、筹码化。与拜登政府“去风险”和弱化对华“脱钩”的论调不同，特朗普更倾向于将关税作为解决对华问题的“筹码”。无论是知识产权争端、人权议题，还是地缘政治议题，特朗普政府都可能使用关税作为优先手段。如在对金砖国家“去美元化”的问题上，特朗普声称将对金砖国家征收 100% 关税；而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曾公开声称，若中国大陆对台动武，将对中国征收高达 150% 至 200% 的额外关税^[33]；此外，在美国禁用 TikTok 一案中，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中国不批准 TikTok 的交易协议，将会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这种强化“关税武器化”的策略手法，充分表明特朗普将贸易、外交、安全议题糅为一体，并将关税作为多功能工具。

（二）美国对华科技围堵或将由“小院高墙”升级为“大院高墙”

特朗普 2.0 时期, 美国会进一步加速对华科技“脱钩”, 对华科技打压的范围和力度都将显著升级。早在拜登时期, 共和党便多次批评拜登政府“对华软弱”, 主张采取更彻底、更严格的技术封锁, 以遏制中国在人工智能、芯片、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的快速发展。特朗普在宣誓就职后的第 3 天, 便签署行政命令成立“总统科技委”(PCAST)。此外, 目前在特朗普执政团队中, 一批对华强硬的政治人物, 如鲁比奥 (Marco Rubio)、拉特克利夫 (John Ratcliffe)、万斯 (James Vance) 等均在积极推动对华企业、技术和人才施加更多限制^[34]。依此推断,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极有可能加大对华高科技产业围堵和打压力度。

具体来说, 美国或采取以下手段。一是扩大围堵范围。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或将“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覆盖至更多领域, 进一步切断中美技术交流和关键数据流通^[27]。同时,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范围也会相应扩大, 不仅会要求本土企业遵守严苛的出口许可制度, 还会联动盟友推动对华核心元器件“断供”, 形成实质上的“大院高墙”。二是加强封锁力度。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或将加大融资限制, 对中国企业在美收购、与美企合资合作、在美上市融资等环节执行更严苛的审查标准。目前, 共和党已提出多项针对中国企业收购美国能源、电信、医药和农业用地等“战略资产”的立法草案, 并力图通过新一届国会立法强化监管^[35]。三是以人工智能为重要切入点。特朗普向来高度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 早在其第一任期, 美国就将人工智能问题引入联邦机构。在 2024 年大选期间, 特朗普更是明确声称, 中国与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互为竞争对手, 这一竞争是改变世界的竞赛^[36]。此外, 面对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 DeepSeek 的出现, 特朗普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为美国相关产业敲响“警钟”。由此推断, 特朗普 2.0 时期或将进一步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上大做文章, 并以此为由进一步限制对华高端芯片供应与数据流通。

尽管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总体上对华技术管制可能趋严, 但特朗普的商业交易思维使其不会轻易“斩断”与中国的所有合作。中美两国的巨大体量与经贸、科技方面的密切联系决定了两国必然呈现“挂钩”与“脱钩”并存的二元格局^[37]。对此, 对于能带来美国经济、就业增长的投资或建厂等项目, 如部分中国车企或消费电子企业到美国设厂, 特朗普政府可能“网开一面”, 以便兑现“制造业回流”的承诺并巩固其政治基础^[35]。

(三)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策略或有所调整

在特朗普 2.0 时期, 美国必然会延续“以台制华”的惯常操作, 但具体手法或有所调整,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美国或推行“以台制华”和“以陆压台”的双轨政策。拜登时期, 美国的台海政策更多强调“以台制华”, 而较少强调“以陆压台”。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或许会对拜登时期的这一政策有所调整, 不仅强调“以台制华”, 还强调“以陆压台”。一方面, 将台湾当作遏制中国大陆的重要棋子, 通过军售、外交干预等手段强化“以台制华”效果; 另一方面, 通过渲染来自大陆的所谓“威胁”, 逼迫台湾进一步依赖美国“保护”, 若台当局希望维持来自美国的安全承诺, 就必须向美国出让更多利益。

第二, 美国将会加大对台湾的“勒索”。美国为迫使台湾向其让利, 可能会部分调整拜登时期向台湾作出的相关安全承诺, 给台湾制造更多不确定性。2024 年大选期间特朗普曾公开表示, “如果台湾想要保护, 就必须付费”, 并强调美国跟保险公司“没什么不同”。对此, 特朗普政府或采

取三项措施：一是持续渲染“两岸冲突”与“安全威胁”，要求台湾不断增加防务开支、扩大军购规模，逼迫台湾向美国购买更多先进武器，获取军火收益；二是要求台湾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加进口美国油气、农产品及工业制品^[38]；三是通过更明确的政治压力迫使台湾半导体与高端制造企业迁往美国，实现其“重振制造业”的选举口号^[39]，并进一步阻断大陆获取尖端技术的通道。

第三，美国在台海问题上会继续打“民主牌”，但力度和方式或有所调整。拜登时期曾试图通过连续三年举行“全球民主峰会”来重塑美国“民主灯塔”地位，台湾当局则借机炒作所谓“台湾是民主价值链重要一环”。相比之下，特朗普并无明显的“保卫民主”包袱，尽管其可能不会立即废除拜登时期的某些“民主议程”，但也很难让台湾当局继续借“全球民主峰会”等平台博取更多国际声望^[38]。

（四）其他关涉中国利益的事项

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始终是维护和巩固其世界霸权，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手段，除了直接采取政治、经济、贸易、金融、科技、认知等手段对中国进行全面打压和遏制之外，还包括通过扩大自身实际控制的“领土”范围来提升自身地缘政治优势、获取更多战略资源，从根本上增强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根据目前特朗普执政团队所释放的信息，美国对外政策或有如下调整。

第一，重启美国的“退群外交”。特朗普在对待国际组织和多边条约方面一贯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政策，其判断标准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是否有利于维护美国霸权。在特朗普看来，退出或减少对某些国际组织和条约的参与，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外部“束缚”，节省大量“会费”，从而实现美国的“轻装发展”，以更好地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特朗普已于 1 月 20 日就职当天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并于 2 月 4 日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可以预见，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或将采取更多“退群”操作，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战略收缩，集中资源，使美国在对华战略竞争中拥有更多“优势”。

第二，尽快结束俄乌、巴以两场冲突。从现实来看，尽管美国并未直接参与这两场地区冲突，但因其在这些地区有战略部署，仍导致美国消耗巨大。因此，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首要对外事务议题的焦点将是尽早结束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对此，特朗普早在竞选时就指出，美国的目标是立即全面停止敌对战争行动，和平刻不容缓^[40]；其在就职演说中再度指出，美国的成功要以结束战争来衡量，要成为和平缔造者与团结者^[41]。对于结束战争的实施方案，尽管目前仍处于各方磋商之中，但美国试图通过加强对这两场冲突的干预并使其尽快停火已是可预见的安排。一旦战争结束，美国或会迅速腾出更多的军力、物力、财力和精力投放于东亚地区尤其台海地区，从而全力打压和遏制中国。

第三，扩大美国“实控范围”。就职前，特朗普反复建议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 51 个州，威胁“收回”巴拿马运河，并直言要购买格陵兰岛。在 1 月 20 日的就职演说中，特朗普再次强调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接下来，倘若美国以霸权手段对加拿大、丹麦和巴拿马极限施压，这三个国家是否会做出退让，不得而知。但毋庸置疑，美国的“领土”扩张企图一旦实现，其便可在整个美洲以及北极航道等更广阔地域实现战略主动，巩固其“以美洲为根据地”的全球霸权。尽管美国这一扩张战略从明面上看并非针对中国，但不排除其隐含着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考量，其战略意图一旦达成，必定会增强其在地缘战略、资源等方面对抗中国的实力。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的

扩张战略是一种间接的对华遏制战略。

五、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潜在影响与应对

特朗普的再次执政为中美关系发展增添诸多变数, 使两国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相应的政策与策略调整也将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面对特朗普重返执政后可能发起的新一轮对华战略竞争, 中国需在战略和战术层面同步谋划, 研拟一系列有力的应对措施。

(一) 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影响

第一, 中美两国合作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过去, 中美两国虽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等方面存在分歧, 但双方尚能在部分双边或全球性议题上保持合作。然而, 伴随美国对华打压趋于严苛, 遏制手段不断升级以及各类障碍、壁垒持续增加, 中美之间的合作空间正迅速缩水。同时, 美国国内对华认知的负面化以及舆论环境的恶化, 也使得双方在国际组织等多边平台上对话与协调的难度上升。

第二, 中美关系面临更多不确定风险。在美国不断强调对华战略竞争的情势下, 如今的中美关系呈现更为明显的结构性对立特征, 不确定性上升。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特朗普本人随心所欲且难以捉摸的人格特质^[42], 使其倾向于主动打破现状并将其作为博弈筹码; 也来自其执政团队中部分成员对华的强硬态度。高频率的摩擦与双方沟通的受阻, 必然会大大增加两国保持“斗而不破”的难度。

第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阻力显著增加。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使中国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遭遇更多阻力。首先, 全面竞争格局使中国在经贸、科技等诸多领域面临严峻挑战, 这将迫使中国必须在更短时间内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化。其次, 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对华进行全方位围堵, 联合其盟友对华施加制度性和舆论性压力, 中国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最后, 在地缘政治与安全层面, 美国加强联盟军事部署与对台湾问题的干涉, 亦会进一步增加中国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成本。

(二) 中国的应对策略

首先, 保持战略定力, 以静制动。面对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可能调整, 中国应在国际紧张局势下, 继续保持战略定力, 冷静观察, 沉着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事件; 应保持战略自信, 处变不惊, 秉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处事原则, 采取“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的灵活策略, 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尤其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挑衅时, 既要把握斗争节奏, 也要把控斗争尺度。

其次, 提前研拟应对策略, 丰富反制工具箱。面对美国对华遏制措施的可能升级, 中国要充分预估最坏情况的出现, 应基于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 提前做好各种应对准备。无论是“贸易战”的升级, 还是技术封锁的加剧, 中国都应提前做好有针对性的反制预案。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需要“往好处努力, 做最坏处准备”, 尤其要防止和应对极端情况的发生。

再次, 壮大自身实力, 自立自强。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 中国必须通过自立自强来增强战略自主性。中国应持续提升自身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不断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与竞争力。近年来, 中国

在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面对日益激烈的中美竞争态势，中国仍需继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切实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最后，实施“韧性”应对，对冲美国的“战略预期”。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美国是遏制方，中国是被遏制方。美国试图通过“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对中国极限施压，迫使中国妥协，而中国只要能通过实施有效策略，打乱美国战略部署，阻断其战略“进攻”，便可在博弈中稳住阵脚，立于不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关切并非在于“中国做成什么”，而在于“让美国做不成什么”。这不仅需要中国在外交层面做好精准布局，也需要在政治、军事、安全、经济、科技等领域做好充分准备。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为中美关系发展带来诸多严峻挑战，但挑战中亦蕴含着机遇。如何在挑战中把握机遇，我国既需要进行前瞻预判，也需要即时捕捉。未来一段时期，如何探寻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仍是两国共同面临的考验。中美两国国情和发展道路不同，存有分歧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双方应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以求同存异的远见和定力妥善处理分歧。为此，双方需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处理两国关系，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为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 [1] 罗振兴. 特朗普第二任期经济政策前瞻 [J]. 当代美国评论, 2024 (4): 10-17.
- [2] 杰弗里·萨克斯. 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经贸关系展望 [J]. 国际金融, 2024 (12): 10-12.
- [3] 钟厚涛.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及其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1): 157-167.
- [4] 刁大明. 2024 年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 [J]. 国际论坛, 2024 (5): 12-18.
- [5] 杜胜平. 西方政党对外决策的影响 [J]. 当代世界, 2008 (3): 42-44.
- [6] 钟准. 把政党找回来——政党与对外政策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 (2): 33-52+156+155.
- [7] Fredrick S. Dunn. The Sco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 Contemporar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60: 15.
- [8] 何维保. 美国两党党纲中的对华政策论析 [J]. 美国研究, 2019 (6): 84-111+7.
- [9] 周琪.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35-248+284-293.
- [10] 高祖贵. 美国“新帝国”战略分析 [J]. 国际问题研究, 2004 (6): 44-49.
- [11] 张立平. 美国政党与选举政治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29-131.
- [12] Warren P. Strobel, Kevin Whitelaw. Preparing to face the world Bush turns to some experienced hands to manage his foreign policy [J]. U.S. News & World Report, 2000-12-25: 28-29.
- [13] 李庆四. 美国共和党外交理念刍议 [J]. 现代国际关系, 2001 (5): 29-32.
- [14] 达巍. 终局之辩——2024 年大选背景下的美国对华战略辩论 [J]. 美国研究, 2024 (6): 58-71+6.
- [15]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B/OL]. (2017-12-18) [2025-01-22].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 [16] The White House.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EB/OL]. (2022-

- 王贯之. 特朗普 2.0 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探析: 政党政治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5 (2): 159-170.
- 10-12) [2025-01-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 [17]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2024 Republican Party Platform [EB/OL]. (2024-07-08) [2025-01-22].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2024-republican-party-platform>.
- [18] Jeffrey M. Eliot, Sheikh R. Ali. The Presidential-Congressional Political Dictionary [M]. California: Borgo Press, 1984: 16.
- [19] 史蒂芬·E. 弗兰泽奇. 技术年代的政党 [M]. 李秀梅,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182.
- [20] 韦宗友.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及对中国的影响 [J]. 国际问题研究, 2022 (3): 29-46+123-124.
- [21] 赵明昊. 美国构建亚太“小多边”机制的进展、特征与影响 [J]. 当代世界, 2023 (3): 39-45.
- [22] 余振, 王净宇.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转型新趋势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2 (12): 28-34+62-63.
- [2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EB/OL]. (2020-10) [2025-01-10].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10/National-Strategy-for-CET.pdf>.
- [24] Donald J. Trump. 2024 GOP PLATFORM: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EB/OL]. (2023-06) [2025-01-10]. https://rncplatform.donaldjtrump.com/?_gl=1*1ssl7to*_gcl_au*MTMzNTcxNzY4My4xNzM3NTM5MDA5&_ga=2.16119358.927516412.1737539009-2084706718.1737539009.
- [25] 刁大明. 从 1.0 到 2.0: 特朗普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延续与政策变化 [J]. 国际安全研究, 2025 (1): 96-114+158.
- [26] 邵育群. 特朗普 2.0 时期台海政策的“确定”与“不确定” [J]. 中国评论, 2024 (12): 12-15.
- [27] 杨楠.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对华战略态势 [J]. 当代美国评论, 2024 (4): 33-40.
- [28] 王贯之. 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演变: 历程、动因与影响 [J]. 中国评论, 2024 (6): 71-80.
- [29] 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M]. Washington D. 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4-5.
- [30] 节大磊. 2024 年美国大选与“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外交战略 [J]. 美国研究, 2024 (6): 34-57+5-6.
- [31]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rump Calls Tariffs the “Most Beautiful Word” [EB/OL]. (2024-10-17) [2025-01-22]. <https://www.wsj.com/livecoverage/harris-trump-election-10-16-2024/card/trump-calls-tariffs-the-most-beautiful-word--YMVPAupw4EjBRp6yob0y>.
- [32] Tax Foundation. How Will Trump's Universal and China Tariffs Impact the Economy? [EB/OL]. (2024-11-08) [2025-01-22]. <https://taxfoundation.org/blog/trump-tariffs-impact-economy/>.
- [33] Roll Call. Interview: John Micklethwait of Bloomberg Interviews Donald Trump in Chicago [EB/OL]. (2024-10-15) [2025-01-22]. <https://rollcall.com/factbase/trump/transcript/donald-trump-interview-john-micklethwait-bloomberg-detroit-economic-club-october-15-2024>.
- [34] 刁大明, 奚千涵. 特朗普及其第二任期涉外团队的对华倾向与政策影响 [J]. 国际展望, 2025 (1): 23-45+176-177.
- [35] 张腾军. 从 2024 年竞选言论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 [J]. 当代美国评论, 2024 (4): 41-63+126-127.

- [36]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lon Musk and Donald Trump Interview [EB/OL]. (2024-08-13) [2025-01-22]. <https://www.rev.com/blog/transcripts/elon-musk-and-donald-trump-interview>.
- [37] 朱福林. 中美经贸关系: 特朗普 1.0 冲击与特朗普 2.0 前瞻 [J/OL]. 财经问题研究, 2025 (2): 3-16 [2025-01-2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1.1096.f.20241227.1540.002.html>.
- [38] 袁征, 关成龙.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趋向研判 [J]. 中国评论, 2024 (12): 4-11.
- [39] Rev. Donald Trump Rally Richmond Virginia [EB/OL]. (2024-03-04) [2025-01-10]. <https://www.rev.com/blog/transcripts/donald-trump-rally-in-richmond>.
- [40] Donald J. Trump. Agenda47: Preventing World War III [EB/OL]. (2023-03-16) [2025-01-10]. <https://www.donald-jtrump.com/agenda47/agenda47-preventing-world-war-iii>.
- [41] The White House. The Inaugural Address [EB/OL]. (2025-01-20) [2025-01-22]. <https://www.whitehouse.gov/remarks/2025/01/the-inaugural-address/>.
- [42] 尹继武. 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分析 [J]. 当代美国评论, 2018 (2): 52-74+123-124.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校对: 卢媛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二、著录格式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 [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6): 6-12 [20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l>.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 [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 [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64/138-161e.htm>.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5年第2期 总第50期 第9卷

双月刊 2025年3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王 鸿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 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局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微信公众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定价：20.00 元